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 孟、焦、京易学新探

◎ 张文智 著

齊魯書社

## 序

《周易》未遭秦焚，入汉后由淄川人田何传之，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杨何被立为《易经》博士，至宣帝、元帝年间，田何所传之《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此时又出了费直与高相“两家之说”。费直《易》为古文，无师承，其学“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田何所传之今文《易经》，终两汉皆居官学地位。但任何事物都是盛极必衰，一门学问亦如此。据《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据桓谭《新论》说，当时的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尧典”二字说至十余万言，解说“曰若稽古”四字用三万言。此时对《尚书》的研究已达如此繁琐的程度。

受此风气影响，研《易》也有如此情况。据《史记·儒林传》记，《易》自孔子经六传至汉代田何，又经两传至杨何，杨何被汉武帝立为《易经》博士。而到了宣帝、元帝年间，能通一经的人不但可以免去徭赋，还可以做官，像鲁人周霸、莒人衡胡等都以

治《易》而做了官。于是，人们把治《易》当作晋身之阶，在传习中不断加入自己的标新立异之见，如《汉书·儒林传》中已讲到蜀人赵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故《汉书·儒林传》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寔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但总的来看，汉初之人还是重视经义的，《易经》卦爻辞的本义皆有师承而未失传，像丁宽作《易说》只有三万言，仅“训诂举大谊”而已，尚保持着“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的淳淳之风。但到了东汉末，五世家传孟喜《易》学，被清人誉为西汉古《易》正宗的虞翻，由《周易集解》所引其注《易》之文看，于互体之外又出四爻、五爻连互之法，已极为繁琐。他的注《易》之文我们今天虽已难窥其全貌，但绝非“三万言”矣！

被《汉书·艺文志》排在首位，对两汉治《易》诸儒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施、孟、梁丘三家所传之《易》，据《经典释文·序录》记，施仇与梁丘贺所传之《易》亡于永嘉之乱。《隋书·经籍志》亦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喜《易》由于当时影响较大，散播较广，东汉末年虞翻五世家传孟氏《易》，但南北朝时已残缺不全，至唐失散更多，入宋亦全部亡佚。故《易》虽未遭秦火之焚，且入汉后居于官学地位，并有师承相传，但其传本及其经义今日已不可得见。我们今日所见之传本乃是王弼本，是得之于并无师承传授的费直古文本。故先儒称《易经》为“绝学”，其旨即本于斯。而“扫象不谈”的王弼《易》之所以能兴起，与今文《易》发展至后来以象数说《易》的繁琐有极大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人今文《易》义，只是从《说文》、《周易集解》、《经典释文》及其他籍中辑出来的部分经文

片断,完整的田何今文《易》义,已不可见矣!然而马王堆帛书经传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土使我们有幸得以见到汉初今文《易》与战国古文《易》原貌。虽然这些竹帛《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探求汉初今文《易》与战国古文《易》提供了丰富的《周易》经传资料内容,但是我们若仅依帛书经传的这部分内容,与已残缺不全的楚竹书部分卦爻辞内容,作为研究两汉今文《易》与先秦古文《易》的依据,其内容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在至今出土的所有先秦至汉人的《周易》经传资料中,皆是只有经传之文而从无一本释经注传之作,因为缺乏此类著作的出土,因而对我们系统而完整地研究曾支配两汉《易》研究的今文《易》义,造成了极大困难。

“亡章句”而无师承的费氏古文《易》,在后代古文派大师们为争立学官的不懈努力下,到东汉光武帝时,势力已达到可与今文《易》争立古文博士之职,可见此时的费直古文《易》,恐怕在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王肃以至王弼等数代人的钻研下,已慢慢形成一个完整的解说体系。但古时文字一字多义,这些并无老师系统传授,仅凭个人对经文字义的理解而训解诂释的经义,其解是否符合《易》之本旨呢?兼之当时为争名利,今、古文两派势同水火,难免有古文派对今文派的解说,出于派系门户偏见,往往另出新说,因而无论对《易》学知识的介绍,还是对经传文字的训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下面,我们仅据今日所见之古代典籍与出土简帛《易》资料所示西汉今文经义,与今本所传经义作一简略对比,于是,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看八卦何人所造,及何人重为六十四卦的问题。这是《易》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周易正义·卷首》其“第二论重卦之人”云:“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



图》而作《易》。是则伏牺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案“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者，见之《史记·日者列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及《汉书·司马迁传》记太史公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此所谓“先人”者，当为传今文《易》之前代经学大师也。因为依《史记·儒林传》载，自鲁人商瞿受《易》于孔子而六传至齐人田何，八传至淄川人杨何，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故司马迁父子此说必得之杨何而为今文之说无疑也。此说在汉人中影响甚大。案扬雄《法言·问神》：“《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而《法言·问明》中亦说文王重《易》六爻为六十四。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论衡》中有关伏羲作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的记载。《论衡·对作篇》：“《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其引文之“《易》言‘伏羲作八卦’”，显然是王充在引用当时传《易》的成说，故特予说明：“伏羲造之，故曰‘作’也。”下文说文王自演为六十四卦，又特予说明：“故曰‘衍’。”也同上文之引也。王充所引应是当时人们援今文《易》说经之明证。而《汉书·艺文志》：“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可证当时不仅西汉末年好古文的扬雄仍用此今文义释《易》，东汉初人王充、班固等人亦袭此今文《易》之说也。

至魏晋，王弼扫象，今文《易》衰落。入唐，据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说，当时有关“重卦之人”已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

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今文《易》有关重卦之人，已仅为其四说之一了。且此说亦并非因有著名今文经学家说《易》而得立，乃是因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此说，方得以排在四说之尾也。

我以为《周易正义·卷首》除“论重卦之人”外，其“论《易》之三名”、“论三代《易》名”、“论卦辞爻辞谁作”、“论分上下篇”、“论夫子《十翼》”、“论传《易》之人”、“论谁加‘经’字”等，皆是在今文《易》义至唐衰落后，孔颖达针对当时解《易》出现的各种混乱说法，依仗自己“奉敕撰定”的特殊身份，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判断与辨析。

古文《易》因无师承和对经义的固定传授，故虽同研古文《易》，但其对经义的解释往往皆依据个人的理解而各自说之，如上面孔颖达所引重卦四说中郑玄以为是神农重卦，而王弼则以为是伏羲重卦。有关何人重卦，二人之说已自不同，而有关卦爻辞的诂释，差异就更在所难免。古文与古文的传人之间尚有如此不同，古文与今文的解释，差异就更大了。

对后人影响最大，也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较早的完整《易经》传本，乃是王弼本。史料皆称王弼所传源之于费直古文本，然而今由出土之马王堆帛书本考之，余疑其说未必可信。

我们知道，马王堆汉初帛书本尊崇孔子并由隶书写成，是属汉初今文《易》传本，其八卦卦名皆与今本不同，其六十四卦卦名及其卦爻之辞亦多有不同者。如今本“乾”卦，帛本作“健”，今本“坤”卦，帛本作“川”。而由《说卦》称“乾，健也，坤，顺也”，知帛书“乾”作“健”，实即《说卦》之“健”，古“健”“健”互假也。帛书“坤”字作“川”，实即“顺”字。帛书《繆和》篇曰“川者，顺也”是其证。《衷》篇亦曰：“子曰‘《易》又名曰川，雌道也’。故曰‘牝马之贞’，童兽也，川之类也。”其“川”字显然读作

“顺”也。依此我们可知，若依古文，《象》释《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应作“天行乾，君子以自强不息”。可证《象》文经今文经师讲解时，已改“乾”字为今文经之“健”字。同样，《象》释《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地势坤”之“坤”字是用的古文，若依今文，此文应是“地势顺，君子以厚德载物”。过去笔者读《象》文至此，每每不解：以古人行文之严密，何以会以“天行健”之“健”字对应“地势坤”之名词“坤”字？由于帛书《易》的出土，我们终于得知：此段《象》文，若依今文，应为“天行健”对“地势顺”，若依古文，则是“天行乾”对“地势坤”，后人抄书时，已不知此《乾》、《坤》二《象》今古文之渊蕴，遂释《象》文《乾》卦书以今文，而释《坤》卦则书以古文，致使后人读之总感《象》文语句不工。今读《周易正义》，知王弼注此句时所据者，疑亦是今文本，非古文也！案《周易正义》释《象》“地势坤”引王弼注曰：“地形不顺，其势顺。”显然，王弼当时所见本应是此爻作“地势顺”，故而王弼才以“地形不顺”而“势顺”释之。由此而考之，王弼当年所见本，起码《象》中此段文字非古文本也。王弼未对《象》释《乾》卦的文字作注释，但对《象》释《乾》卦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作了注释，其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

我们统读此段《象》文，由“大哉乾元”始，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止，《象》文中绝无一字言及“健”者，而王弼之注，却一开始即言明：“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又云：“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显然王弼当时所见本之此段文字，亦是今文，应是“大哉健元，万物资始”。王弼乃是据此本而注其文如上也。

以此而考之，魏晋时，今文《易》本仍有传授，王弼并在注《易》时作了重要参考。故后人盲从先儒之说，以为王弼之《易》乃依古文本，今以帛书汉初今文本与王弼注文考对之，我们发现此千古之说恐亦不确矣。故今后要转变传统观念，对王弼《易》注下大功夫作一番探流涉源的探究工作，相信此一工作对挖掘汉人今文《易》遗义，将有极大帮助。

汉人今文《易》义赖汉唐人《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周易集解》等书的流传，至今保留了一些遗义。今举后人多指其书为伪书、争论较大的《子夏易传》一书为例，先列举其训诂举大义的注经文风与保留下来的经文字义，并考证一下此书是否为伪书。

《子夏易传》一书，刘向《七略》中已载，其对《易》义的解释，如解《屯》卦六二之“乘马班如”曰：“乘，音绳，班如，相牵不进貌。”释《比》卦卦义：“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释《小畜》卦之“攣”作“戀”并释其义曰“思也”。释《小畜》卦上九爻辞“月几望”之“几望”作“近望”。释《履》卦九四爻辞“履虎尾，愬愬，终吉”之“愬愬”曰“恐惧貌”。其说与孟喜《易》“愬愬”作“𪔐𪔐”亦解为“恐惧”同。释《泰》卦六四爻“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之“翩翩”曰“轻举貌”。《谦》卦之“谦”，《子夏易传》作“𪔐”，并释之曰：“𪔐，谦也。”释《豫》卦九四爻之“朋盍簪”之“盍簪”曰：“同疾也。”《贲》卦六五爻之“束帛戔戔”，其今本“戔”字，《子夏易传》作“残”，并释“束帛”曰：“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释《复》卦上六爻之“迷复，凶，有灾眚”曰：“伤害曰灾，妖祥曰眚。”释《颐》卦六二爻“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其“拂经”之“拂”作“弗”，并云：“辅弼也。”《离》卦六五爻“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其“戚”，《子夏易传》作“𪔐”，并释之

曰：“吝慚也。”释《遯》卦上九爻之“肥遯”曰：“肥，饶裕。”释《明夷》卦六二爻之“夷于左股”之“夷”，《子夏易传》作“睇”，并云：“旁视曰睇。”释《睽》卦六三爻之“见舆曳，其牛掣”之“掣”曰：“一角仰也。”释《困》卦九四爻之“来徐徐”曰：“内不定之意。”释《井》卦九二爻之“井谷射鲋”之“鲋”曰：“谓虾蟆。”释六四爻之“井甃，无咎”之“甃”曰：“修治也。”释《丰》卦九三爻之“丰其沛”之“沛”曰：“小也。”释“日中见沫”之“沫”曰：“昧（沫），星之小者”，等等。其解皆简略明白，确有汉初解《易》者“训诂举大谊”之风，唐时两汉魏晋抄本还在，且《经典释文》所引三十余家《易》著，当时应皆知是真本无疑，故以陆德明之人品学问及识见，是绝不可能引伪书的，此其一；其二，若以今本与近年出土之上博楚竹书《周易》及马王堆帛书《易经》及其他古籍对比而考察《子夏易传》之文字，更可知其确为学有渊源的先秦古《易》传本无疑也。

案《小畜》卦九五爻“有孚攣如，富以其邻”，帛本此爻作“有复繹如，富以斤邻”。其“有孚攣如”之“攣”，《子夏易传》作“戀”。案帛本作“繹”当为“攣”字之省，汉隶此类字多互通。考《隶释·仙人唐公房碑》洪适注曰：“攣字即戀字。”其《夏丞碑》洪适曰：“戀即轡字。”《李翊碑》洪适曰：“攣即戀字。”等，皆其证也。故《子夏易传》中今本“攣”字作“戀”，正如同帛本作“繹”一样，皆汉隶此类文字相互通假之证也。

《泰》卦上六爻：“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今本之“隍”，《释文》：“音皇，城堑也，子夏作‘堙’，姚作‘湟’。”帛本此爻作“湟”，正与姚说同，亦皆汉人此类隶字互通之证。

今本《谦》卦之“谦”，帛本作“𦏧”，《子夏易传》亦作“𦏧”，与帛本正同，故此书若是伪书，则后人作伪，何以能预知汉初帛

本亦作“嗛”字耶？且今本《谦》卦六四爻：“无不利，撝谦。”帛本作“无不利，譊嗛”。竹书作“亡不利”。案《汉上易传》释此爻曰：“子夏曰‘撝谦，化谦也，言上下化其谦也。’”《汉上易传》此处引子夏曰“撝谦”者，实为“撝嗛”，因“谦”字子夏作“嗛”也。“撝”字竹书作“𦏧”，正合子夏作“化”，因“货”之古文作“𦏧”，故子夏作“化”，竹书作“𦏧”，今本作“撝”，帛本作“譊”，义皆相同，此竹书战国古本与《子夏易传》相同之又一重要证据也！

《颐》卦六四爻：“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今本之“其欲逐逐”，帛本作“汙容笛笛”，竹书作“𦏧猷攸攸”。今本之“逐逐”，帛本作“笛笛”，竹书作“攸攸”。而《子夏易传》此字亦作“攸攸”，正与竹书同。案“笛”字古文作“簫”，故“笛”“逐”实以音义相同而互假。《释名·释乐器》：“簫，滌也。其声滌滌然也。”故《汉书·叙传》：“六世眈眈，其欲澈澈。”颜师古注：“眈眈，威视之貌也。澈澈，欲利之貌也。‘澈’音滌。今《易》‘澈’字作‘逐’。”由颜注可知，今本“逐”字，古本作“澈”，今由竹书作“攸攸”，可证《汉书·叙传》所引及颜师古之注极是。而由《子夏易传》亦作“攸攸”考之，可证《子夏易传》确是先秦时代真古本也，后世卑陋之儒因其所见之偏，总以疑古过勇自诩，悲夫！

《坎》卦上六爻：“系于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今本“寘于丛棘”之“寘”，《子夏易传》作“湜”。案《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不咥人”之“咥”，帛本作“真”。本人在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中辨此文曰：“不咥人”之“咥”，帛本作“真”。考《广雅·释言》：“真，是此也。”王念孙曰：“诸书无训‘真’为此者。各本真字皆书作真……当是‘直此是也’之讹。‘直’为是正之是，‘此’为如是之是。《说文》：‘是，直也。’是其证矣。或曰，当作‘直是正

也’。”《说文》释“直”：“直，正见也。正，是也。”案王氏断“真”乃“直”字之讹，非是。由帛本此处卦辞作“不真人”及六三爻辞作“真人凶”考之，则“真”与“直”古可互用。“不真人”实读作“不直人”，“直”与“咥”以音同、音近而相假耳，故《广雅·释言》作“真”，并“各本真字皆书作真”，可见“真”非“直”字之讹。考坎卦上六爻之“真于丛棘”，《释文》释“真”字曰：“刘作示，言众议于九棘之下也，《子夏传》作湜，姚作寔，寔，置也，张作置。”此处“《子夏传》作湜，姚作寔，寔，置也”，正《说文》“是，直也”之证；而其曰“张作置”，乃“真”“置”互通之证。

由以上所考，知汉隶“真”字与“示”“是”“直”“置”诸字皆可互假。故《子夏易传》在此作“湜”，如同“姚作寔”一样，乃是与“是”互假，此其抄本乃真古本之又一证也。

《明夷》卦六二爻：“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今本“用拯马壮”帛本作“用揜马床”。今本“拯”字帛本作“揜”，《子夏易传》作“拊”。案《子夏易传》之“拊”即帛本之“揜”。古“登”“升”二字互通（详见拙著《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之《升》卦解）。《隶释·博陵太守孔彪碑》洪适注：“拊即拯字。”亦其证也。

《夬》卦九四爻：“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牵羊”之“牵”字，《子夏易传》作“擊”。“擊”字在此疑假为“遣”。案《庄子·徐无鬼》：“君将黜耆欲，擊好恶，则耳目病矣！”《释文》：“擊，崔云‘引去也’。”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庄子拾遗·徐无鬼》：“崔释‘引去’者是也。‘擊’盖假为‘遣’。”此字竹书本作“𠂔”，有“亡”“丧”之义，与“引去”义近。以此知子夏《易》确得古义之传也。

《困》卦九四爻：“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今本“来徐

徐”，帛本作“来徐”，《子夏易传》之“徐徐”作“荼荼”，《释文》并云：“荼，音图，内不定之意。”王肃本作“余余”。

案《周礼·考工记·弓人》：“宽缓以荼。”郑注：“荼，古文舒。”郑玄以“荼”字为古文，以“舒”字为今文。考《左传·哀公十四年》：“齐陈恒执其君寘于舒州。”而《史记·齐世家》作“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州”。《集解》：“《春秋》作舒州，贾逵曰：陈氏邑也。”《索隐》：“徐音舒，其字从人，左氏作舒，舒，陈氏邑。《说文》作郟。”由《史记》，“舒”引作“徐”，知“徐”“荼”亦可互假。故此字今本作“徐”，《子夏易传》作“荼”，王肃作“余”，《说文》作“郟”，诸字古皆以从“余”而可互假也。

《丰》卦九三爻：“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今本“丰其沛”，帛书作“丰其莱”，竹书作“丰丌蒂”，而《子夏易传》亦作“蒂”，此竹书古《易》与《子夏易传》相同又一例也。由《子夏易传》与战国时代古文本用字多有相同而考之，可证《子夏易传》确为先秦古本无疑也。《既济》卦六四爻：“繻有衣袽，终日戒。”“繻有衣袽”之“繻”，《释文》：“子夏作襦，王虞同，薛云‘古文作繻’。”由“薛云‘古文作繻’”知今本作“繻”，确为古文本。而由“子夏作襦”，亦可知此字古文本作“繻”，而传至秦汉，经由隶书抄写的子夏今文本作“襦”也。“衣袽”之“袽”，《子夏易传》作“茹”，而帛本此字亦作“茹”。由《子夏易传》与汉初帛书今文《易》所用之字多相同考之，再次可证《子夏易传》确为真本无疑也。

那么，后人為何总是怀疑《子夏易传》的真伪呢？主要有两条原因：

一、《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三家中无《子夏易传》，刘向《七略》中虽有《子夏易传》，但人们多以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



失真本。又，荀勖《中经薄》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儒已疑非子夏之作矣。之所以定为“或云丁宽所作”者，恐亦因《艺文志》未录也。

二、《子夏易传》之编次乃遵费直、郑玄、王弼所合《彖》《象》《文言》于爻下而传之，显然非《周易》古经之编次。

案《子夏易传》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只两卷，而《释文·序录》所记亦止三卷。至宋《中兴书目》则益为十卷，后又增至十一卷，显系后世抄书者擅自增加内容、变乱编次所至。而后人总是怀疑何以此书《汉书·艺文志》未录，我认为此疑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之所在：由于帛书经传的出土，我们方知，帛书《繆和》等篇中记录了当时很多的研《易》之人，如《繆和》篇中的繆和、吴孟、吕昌、庄旦、张射等及《昭力》篇中的昭力及《要》篇中孔子特别言及自己所不及的周梁山等。由这些人与孔子探讨的《易》学内容观之，其水平是相当高的。但所有这些人在《史记》所记自孔子至田何的传《易》者名单中皆不见之，所列各家《易》中亦不见其著作。更像子贡这样的孔子重量级大弟子，在帛本《要》篇有大量文字记录了他与孔子讨论《易》中的重要问题。但《汉书·艺文志》所录“凡《易》十三家”中竟无子贡的一席之地，仅于地位大大下降的“杂占十八家”中记有“《子贡杂子候岁》二十六卷”。但在排于首位的“凡《易》十三家”中，却列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为什么《古杂》、《杂灾异》可以入于“凡《易》十三家”中，位于《艺文志》之首，而作为孔子极重要弟子的子贡，其著作《子贡杂子候岁》却仅录入地位大大下降了的“杂占”类呢？笔者以为：依据中国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显然是一派得势而另一派失势的结果。是故《子夏易传》之未能录入《汉书·艺文志》，亦以此也！

同时,我们凭借帛《易》资料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明白了何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之传《易》名单,从孔子到田何只有六传,而时间跨度却长达三百五十年左右,可见传《易》名单中所记之人物,凡杨何或杨何一派所不感兴趣者,皆已被删除之!因为对比《史记·儒林传》与《汉书·儒林传》,就可以找到此说的依据:《汉书·儒林传》言及田何传《易》:“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而《史记·儒林传》则仅言“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

很清楚,《汉书·儒林传》不仅言田何传《易》于杨何之师王同,更言还传及杨何之师叔师伯,如周王孙、丁宽、服生等,且也未专事宣扬杨何因何征官,征官时间亦仅言及“元光中”,而《史记·儒林传》中有关汉初传《易》人物的记录,仅仅言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除杨何的直接老师与师祖之外,其余的传《易》人物,已皆被其删去,并特别言明杨何是以《易》而征官,其当官的时间亦记录得极为清楚精确。故考之《史记》与《汉书》的这两段短短文字,我们可以看清:虽是为记载汉兴田何传《易》之事,但《史记》中特别突出炫耀杨何的用意是极为清楚明显的。而更为明显的是:《汉书·儒林传》言及西汉《易》学所本时,曰:“要言《易》者,本之田何。”而《史记·儒林传》竟称:“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史记》于此竟将杨何置于其师祖田何之上,捧为西汉《易》学之本!此足证《史记》所言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所提供也。杨何或杨何一派以征官而取得语言霸权之后,以西汉人言西汉传《易》之事,尚且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将其他传《易》者删去,更何况春秋时代之传《易》人物,如子

夏、子贡乎！故《史记》中所载由孔子六传至田何的这张传《易》名单，当是一份经当时学官删削后的名单，正因如此，才造成了由孔子六传而至田何这种使后人生疑的传承名单！因《子夏易传》之不录入《汉书·艺文志》，是后人疑其书伪的重要依据，故我们今天在考证此一先秦古本时，凭借帛本提供的最新资料，稍费笔墨辨析如上也。

限于字数，对孟喜之遗文及京氏《易传》等西汉人遗传至今的文字兹不一一引述之。

正如前文所述，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传》中，保留下很多对经文大义的诂释与阐解，这为我们研究汉人今文《易》义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帛书《易》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汉初今文本的原貌，而最可贵者，乃是帛书《易传》各篇中多有对经文的解释，虽不系统完整，但亦可使我们窥见不少汉初今文《易》义。今试举《繆和》篇中数条较为完整可观的卦例，并将其与《经典释文》、《周易集解》所引汉魏诸家之解作一对比，以期为我们重新认识汉《易》，特别是今文《易》与古文《易》，提供一些重要启发。帛书《繆和》：“繆和问于先生曰：请问《易》涣之九二曰‘涣贲汭阶，每亡。’此辞吾甚疑焉，请问此之所冒（谓）？”今本此爻作：“涣奔其机，悔亡。”孔子在对繆和所提问题的回答中，就涣卦卦义及其爻辞皆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涣者，散也。贲阶，几也，时也。古之君子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夫时至而能既焉，散走汭时，唯恐失之。故当汭时而弗能用也，至于汭失之也，唯欲为人用，岂可得也才（哉）？将何无每（悔）之又？受者昌，贲福而弗能蔽者穷，逆福者死。故汭在《诗》也曰：‘女弄，不敝衣常；士弄，不敝车轮。’无千岁之国，无百岁之家，无十岁之能。夫福之于人也，既焉，不可得而贲也。故

曰：贲阶又央。圣人知福之难得而贲也，是以又矣。故《易》曰‘涣贲阶，悔亡’，则言于能贲阶时，悔之亡也。”

我们看，在此段有关涣卦及其爻辞之义的解说中，“涣者，散也”，与《序卦》之说相同。案《序卦》：“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故《释文》释涣卦曰：“散也。”可证《释文》依《序卦》而尚知涣卦之古义。而其解辞“贲阶，几也，时也”之旨，已于《释文》、《集解》诸书中皆不可见，其就此旨而展开的高论：“古之君子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夫时至而能既焉，散走时，唯恐失之。故当时而弗能用也，至于时失之也，唯欲为人用，岂可得也才（哉）？将何无悔（悔）之又？”等等，则更不见其义之传矣。所谓“贲阶，几也，时也”之“几”，今本《系辞》中有解：“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以此而知“贲阶”之旨在“成天下之务”。今本《文言》又曰：“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故惟能“知至”而“至之”，才会“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夫时至而能既焉”。帛书此“至也”之“至”旨如此，而此“时也”之“时”亦与今本《象》释损卦“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释蒙卦“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其旨相合。故帛书释此爻“进取”与“以让”，皆须“与时偕行”。而由“至于时失之也，唯欲为人用，岂可得也才（哉）？将何无悔（悔）之又”可知，爻辞之所以曰“悔亡”者，其要在未失其“几也，时也”。如若“失之”，则“将何无悔（悔）之又？”正是鉴于对“几也，时也”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故而才会说出深具哲理的“无千岁之国，无百岁之家，无十岁之能”的名言。而所有这些《易》文奥旨，若非帛本出土，今人何以知之？《象》释涣卦：“涣奔其机，得愿也。”由帛书之解得知此爻之所以“悔亡”者，其

要在于未失“几也，时也”，从而达到了“时福至则进取”的目的，故《象》文以“得愿”释之。因今文《易》义的失传，后人已多不解《象》文何以于此曰“得愿”。而虞翻以“动而得位”释“得愿”，恐已失汉初今文古《易》之旨矣！

帛书《繆和》篇又曰：“繆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九之。是故汤[囚于桀]王，文王絢于条里，[秦繆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戊王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古古至今，柏王之君未尝困而能□□[者，未之有]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猷……”因下文缺字太多，兹不引之。

困卦卦辞今本作：“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今本“有言不信”，帛本作“又言不信”。《集解》引荀爽曰：“阴从二升上六，成兑，兑为‘有言’。”显然荀氏解“有”为有无之“有”。而帛书引“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由“重言”疑帛书解“又言”之“又”，当为重又之“又”。由《象》释“有言不信”作“尚口乃穷也”思之，似乎此二解皆通，但依笔者陋见，以作重又之“又”似更妥。帛书接着由处困卦而能“亨，贞大人吉，无咎”而思及“天道”，云“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九之”。（“人道九之”之“九”疑为“究”字之假借）由此段文字，知《系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乃专指天道也。所谓“壹短壹长，壹晦壹明”者，皆指天道冬之夜长昼短，夏之昼长夜短，及月之盈亏，日之昼夜也。考《春秋繁露义证·天道无二节第五十一》：“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

或出或入，或右或左。”“天之道，由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又说：“天无常于物而有一于时，时之所宜，而一为之，故开一塞一，起一废一，至毕时而止，终有复始于一。”“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灭。”其《暖燠常多节第五十二》又说：“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等等，此皆帛书所云今文天道大义在西汉仍有所传之明证。而下文孔子举“汤囚于桀王”，“文王拘于羑里”等历史人物如何先处困境而后又“困之为达”的故事，以释困卦因何而有“亨，贞大人吉，无咎”之辞，疑此段今文之义汉初人皆知。案《春秋繁露义证·暖燠常多节第五十二》：“桀，天下之残贼也；汤，天下之盛德也。”“故汤有旱之名，皆适遭之变，非禹汤之过。”尤其此文结尾曰：“勿以适遭之变，疑平生之长，则所守不失，则正道益明。”此论与帛书所举例旨之义正同。而《集解》释困卦卦辞“困，亨”，引郑玄曰：“坎为月，互体离，离为日，兑为暗昧，日所入也。今上弇日月之明，犹君子处乱代，为小人所不容，故谓之困也，君子虽困，居险能脱，是以通而无咎也。”郑氏此解，恐其注困卦此辞亦取今文《易》旨，故其注与帛书之释义正同也，后因今文《易》失传，后人已不知郑玄此注之所本矣。

《繆和》又记繆和问丰卦：“今《易》丰之九四曰‘丰，剝，日中见斗，遇，夷主，吉’，何胃（谓）也？子曰：丰者，大也。剝者，小也。此言小大之不惑也。盖君之为爵立赏庆也，若礼孰然。大能[馭]细，故上能使下，君能令臣。是以动则又功，静则又名。列孰必奠，赏禄甚厚。能弄傅君而国不损敝者，盖无又矣。日中见斗，夫日者，君也。斗者，臣也。日中而斗见，君将失光矣。□□□□几失君之德矣。遇者，见也。见夷主者，开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开次秦蓼、荆庄、晋文、齐桓是也。故《易》曰‘丰

斤剖，日中见斗；遇斤夷主，吉’，此之冒（谓）也。”

此爻今本作“丰斤蔀，日中见斗，遇斤夷主，吉”。帛书引孔子曰“丰者，大也。剖者，小也，此言小大之不惑也”。案《释文》释“丰”字曰：“《彖》及《序卦》皆云‘大’也。案丰是腴厚光大之义。郑云：丰之言腴，充满意也。”以此知唐人据《彖》《序卦》而尚知“丰”字之确义。而“腴厚光大”及郑玄所云“丰之言腴，充满意也”，恐皆郑玄注丰卦时，所取今文《易》义也。而《子夏易传》丰卦九三爻“丰其沛”之“沛”字作“蒂”，亦曰“小”也。《释文》释“蔀”字曰：“马云‘蔀，小也’。”以此知马融虽号称传古文《易》，但亦时取今文义注经。由“丰斤剖，日中见斗”而生发出“此言小大之不惑也”、“上能使下，君能令臣。是以动则又功，静则又名”的大道理，而帛书言孔子释“日中见斗”曰：“夫日者，君也；斗者，臣也。日中而斗见，君将失斤光矣。”帛书所云“中而斗见，君将失斤光矣”，此解正合《彖》文“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帛书释“遇斤夷主，吉”曰：“遇者，见也。见夷主者，斤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由“梦兆”而“亟见”，得真遇“夷主”，此行当然为吉，故《彖》释此曰“遇其夷主，吉行也”。此段爻文之义，由于西汉今文《易》的失传，后人已不知其确义，故《集解》引虞翻曰：“震为主，四行之正成明夷，则三体震为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可知至东汉末，虞翻已不知此段爻辞“斤始梦兆而亟见”之确义。而王弼注及《释文》对此段爻辞及《彖》文皆无注释，疑此辞之义，至唐已失传。

帛书《繆和》篇又载：“吕昌问先生曰：《易》屯之九五曰：‘屯斤膏，小贞吉，大贞凶。’将何冒（谓）也？夫《易》，上圣之治也，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以长又斤利而名与天地俱。今《易》曰‘屯斤膏’，此言

自润者也。夫处上位厚自利而不自血下，小之犹可，大之必凶。且夫君国又人而厚金，致正以自封也，而不顾汙人，此余也。夫能见汙将□□□□，未失君人之道也。汙小之吉，不亦宜乎？物未梦頰而先知之者，圣人之志也，三代所以治汙国也。故《易》曰：‘屯汙膏，小贞吉，大贞凶。’此之冒（谓）也。”

此段文字记录孔子借释屯卦九五爻而阐发的一段深具哲理的言论：“夫《易》，上圣之治也，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以长又汙利而名与天地俱。”“夫《易》，上圣之治也”，正是孔子对《易》的这种定位，才使《易》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由秦时的“卜筮之书”而跻身于“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接着他于此爻又阐发了古之君子如何以“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的四“处”四“思”，从而使自己得到“长又汙利”且其名可“与天地俱”的处世保盛之术。因此，“屯其膏”之要旨在于“此言自润者也”。孔子借注此爻而提出了极具人生哲理的“自润”之说，惜乎此说随着西汉今文《易》义的失没而后人不得其传矣！若得传之，此言定将成为后人代代传颂的处世名言。“夫处上位厚自利而不自血下，小之犹可，大之必凶”，此等对身处上位厚自利而不知恤下的批评，在《象》文中亦得到体现：“屯其膏，施未光也。”在王弼对此爻的注文中亦有所存：“处屯难之时，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弘博施，无物不与，拯济微滞，亨于群小，而系应在二，屯难其膏，非能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间，小贞之吉，大贞之凶。”对比帛书此爻之解与王弼注文，王弼此注恐亦得西汉今文之传也。

应引起我们注意与重视的是，前文孔子解丰卦九四爻“遇其夷主”曰：“遇者，见也。见夷主者，汙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而释屯卦此爻“屯汙膏，小贞吉，大贞凶”，又曰“物未梦頰而先



知之者，圣人之志也，三代所以治丕国也。故《易》曰：‘屯丕膏，小贞吉，大贞凶。’此之冒（谓）也。”丰卦所“遇其夷主”者，乃“丕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而屯卦“屯丕膏，小贞吉，大贞凶”者，乃“物未梦颊而先知之者”。可证孔子在解《易》时，是很重视梦兆的。由丰、屯二卦所言看，一种是凭梦兆而应验吉凶，即“丕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如丰卦九四之例，这当然很好，故爻辞曰“吉”，《象》文称为“吉行”。还有一种是未经梦兆启示而已先知事物吉凶的，这是一种更高的《易》学修养境界，惟得“圣人之志”者方能进入斯境。

孔子以此精神境界解《易》，充分体现了帛书《要》篇所谓“《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丕情者也。”“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于辞令，不可求以至善。”古人把梦兆看作是启示事物吉凶祸福的重要方式之一，疑此亦属“古法”之一。《礼记·文王世子》记有周武王梦见天帝为其增寿的记载：“文王谓武王曰：‘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故孔子非常重视梦兆。《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礼记·檀弓上》记孔子将死，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此皆其证。

帛书《易传》诸篇中有关谈占筮梦兆、阴阳五行及风雨灾变的内容，当属周王孙所得《周易》古义的内容，这些汉初尚传的内容于今本《十翼》之文中皆已不可见矣！疑杨何在武帝时代，利用其博士的身份，对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易传》版本，按今义的内容进行统一删削与整理，然而由《淮南子》及《史记》等书中所引《易》文多有不见于今本《十翼》之文者思之，《十翼》内容的最后确定，似应在西汉宣帝、元帝年间。

今本蒙卦卦辞之“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缪

和《篇》则引作：“‘初筮吉’者，闻开始而知其终，见其本而知其[末，故]曰‘初筮吉’。‘再参读，读即不吉’者，反复问之而‘读’，‘读’弗敬，故曰‘不吉’。弗知而好学，身之赖也，故曰‘利[贞]’。君子于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岂能已才(哉)? 日夜不休，终身不倦，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故《易》曰：‘蒙，亨，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参读，读即不吉，利贞。’此之谓(谓)也。”

今本“初筮告”之“告”字，帛本作“吉”，且《繆和》篇通篇皆以“吉”字释之。《释文》、《集解》皆未言“告”字先儒有作“吉”字者。且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文，亦仅发现时有脱去“无咎”“悔亡”者，未发现蒙卦此“告”字作“吉”字者。故今本此“告”字，帛本作“吉”字是否是帛本抄书者的失误呢? 如是抄书失误，何以此段文字前后共有六处“告”字皆误抄作“吉”字呢? 且由文字的内容观之，“闻开始而知其终，见其本而知其[末]”，既已闻始知终，见本知末，此处不应再用“告”字，而理应作“吉”字，此其一；其二，考《彖》释“初筮告”曰“以刚中也”，又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而《彖》释师卦之“刚中”曰：“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彖》释颐卦之“养正”曰：“养正则吉也”。可知《彖》皆以“吉”释“刚中”，释“养正”，故此辞作“初筮吉”正合《彖》文“以刚中也”、“蒙以养正，圣功也”之旨。

由于今文《易》义的失传，帛本释蒙卦卦辞“弗知而好学，身之赖也，故曰‘利[贞]’。君子于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岂能已才(哉)? 日夜不休，终身不倦，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后人已不知此辞所含对“仁义之道”的阐发与追求，而《彖》、《象》作者正因为深通帛本此旨，《彖》文才会讲“蒙以养正，圣功也”，《象》

文才会云“君子以果行育德”。今见后人于此辞之注，皆是望文生义、附会发挥之辞。若非帛本出土，我们何以能知蒙卦此辞之真旨也。

限于文字篇幅，仅举帛书《繆和》篇如上数条以证之，故清儒曾叹，《易》学之研究，两千余年来如在漆室之中，由于有师承传授的今文《易》失传，故《易》已成为“绝学”，后人之研究多是在漆室中摸索其门径而已。近年来随着帛书与竹书《易》的出土面世，人们终于见到了一条通向漆室之门的路径，为照亮漆室引来一线光明。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我们仅凭目前的出土资料，绝不足以完成对汉人今文《易》的解读与研究，我们对汉人《易》学及《易》学史的研究，还须以传统资料为主。今见到刘玉建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汉代易学研究”课题组诸同仁对易学研究史上一个极重要的历史时期——两汉易学，进行了深入探究，该课题对揭示汉代易学的演变与发展，对深刻认识汉代易学在易学史、哲学史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都将产生积极的意义，鄙人见到此一丰硕研究成果，非常高兴，遂将近年读帛易的一点感想述之如上，聊为本书之序。

刘大钧

2006. 12 于运乾书斋

## 目 录

序·····	1
<b>第一章 西汉经学发展述论</b> ·····	1
第一节 从黄老道学到“独尊儒术”·····	2
第二节 《五经》博士的确立·····	13
第三节 灾异说的兴起及经学内部之分化·····	24
第四节 博士制度的演变及公羊、谷梁《春秋》之争·····	31
第五节 西汉末期的今古文之争·····	59
<b>第二章 西汉易学源流</b> ·····	73
第一节 《史记》、《汉书》所载西汉易学源流·····	73
第二节 帛书《周易》及其在汉代的流传蠡测·····	96
第三节 《易》筮、《易》经、《易》阴阳 ——《周易》在西汉时期存在的三大形态·····	114
一、西汉时期的《易》筮·····	115
二、西汉时期的《易》经·····	121
三、西汉时期的《易》阴阳·····	126
<b>第三章 孟喜易学研究</b> ·····	130
第一节 孟喜生平评述 ——兼论施、孟、梁丘关系之公案·····	132

第二节 孟喜易学的理论架构	
——卦气说 .....	144
一、孟喜之前的“卦气”理念溯源 .....	146
二、与孟、焦、京易学相关的古代式图观念 .....	160
三、孟喜卦气说之建构原则 .....	164
第四章 焦延寿易学研究 .....	214
第一节 焦延寿生平评述	
——兼论孟、焦易学之关联 .....	216
第二节 “焦林直日”法及焦氏对卦象之扩展 .....	230
第五章 京房易学研究 .....	249
第一节 京房易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	251
一、重用宦官与西汉再衰 .....	252
二、利用“灾异说”评议政治 .....	255
第二节 京房生平评述	
——兼论《汉书·京房传》所涉及的	
阴阳灾异说 .....	264
第三节 京房《易》注及著述 .....	290
第四节 京房灾异说研究	
——以《汉志》所引《京房易传》为例 .....	293
一、初一日五行 .....	296
二、羞用五事 .....	300
三、建用皇极 .....	324
四、《京房易传》与《焦氏易林》之关联 .....	340
第五节 京房八宫卦说研究 .....	345
一、八宫卦说中的阴阳对待与流行理念 .....	345
二、京氏建候、积算的建构原则 .....	358

三、京氏“世卦起月例” .....	361
四、京氏纳甲说探源 .....	363
第六节 京氏卦气说研究 .....	376
一、京氏八卦卦气说 .....	376
二、京氏“六子卦气说”与“飞伏说” .....	386
第六章 孟、京易学与《易纬》 .....	397
第一节 《易纬》诸篇与孟、京易学之关系 .....	398
第二节 《易纬》对孟、京易学的拓展与完善 .....	404
第七章 孟、焦、京易学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及对 后世易学之影响 .....	412
参考文献 .....	420

## 第一章 西汉经学发展述论

孟喜、焦贛、京房之易学是整个西汉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所说的象数易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以往对孟、焦、京易学的研究，多从《汉书》本传及《儒林传》的相关记载中寻找资料进行研究与探讨，鲜有从整个西汉学术发展的大脉络中研究孟、焦、京易学产生的原因及其政治与学术地位者。而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则由于对以孟、焦、京易学为代表的西汉易学之具体内容了解不够，在写中国哲学史时对西汉易学的理解与介绍则失之偏颇。本书虽取名为《孟、焦、京易学新探》，但目的却是从哲学与史学的角度将整个西汉易学进行条贯，把孟、焦、京易学放在整个西汉经学发展史中进行审视，所以在此要费些笔墨将孟、焦、京易学产生之前及产生之时的政治背景与学术演变进行评述，以期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包括易学在内的整个西汉学术发展的脉络。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孟、焦、京易学产生的时代与学术背景及其在整个西汉经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会产生较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在此首先对西汉经学发展的脉络进行一下必要的梳理与评论。

## 第一节 从黄老道学到“独尊儒术”

经过两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四年（公元前 206 ~ 前 202 年）的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开创的大汉王朝开始确立。众所周知，西周武王灭纣建国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遍封功臣同姓戚者。”<sup>①</sup>更具体一点说，“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sup>②</sup>。当时主要是根据功劳与宗亲关系而将功臣与同姓子弟分封建国，旨在强固根本，建万年之业。“此一封建制度……是根据宗法制度，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未继承王位的别子（武王不是嫡长子），有计划地分封到旧有的政治势力中去，作为自己势力扩张的据点，以连络、监督、同化旧有的政治势力，由此而逐渐达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目的。被封的别子，即成为封国之祖，他的嫡长子，即成为封国的百世不祧之宗，按照宗法建立一个以血统为纽带的统治集团。”<sup>③</sup>而这种分封建国的体制最终以秦灭六国而告终。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对于采取何种体制，并不甚了了。一开始丞相王绾等建议继续实行分封制，得到群臣的认可，而廷尉李斯则建议

---

① [汉]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515 页。

② [汉]班固：《汉书·诸侯王表》。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1 页。

③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



### 实行郡县制：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sup>①</sup>

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sup>②</sup>所以秦始皇便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实行郡县制，同法度，车同轨，书同文字。而秦始皇之所以称为始皇帝，亦希冀“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sup>③</sup>。但事实上秦王朝只持续了短短的十五年时间。项梁、项羽、范增是六国残余贵族的代表，他们起兵后，为了笼络六国残余贵族而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而对平民出身的功臣们却刳印不封。刘邦从内心并不想实行分封制，所以当时韩信欲为假齐王时，刘邦恼怒，而为了让韩信牵制项羽的兵力，刘邦不得已才听从张良的建议，“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sup>④</sup>。“因为此种形势的逼成，所以他（刘邦）在始封之时，即藏有杀戮之意。”<sup>⑤</sup>灭除项羽后，刘邦本想

---

①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39 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39 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36 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76 页。

⑤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7 页。

多封同姓诸侯,无奈同姓子弟太少。如《汉书·高五王传赞》曰:“悼惠之王齐,最为大国。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sup>①</sup>刘邦内心总感觉异姓诸侯将会影响刘汉王朝的巩固,所以,在汉朝建立不久,刘邦、吕后等便设法剪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据徐复观先生统计,“到(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刘邦)死时,异姓诸侯王除无足轻重的长沙王吴芮外,皆已被诛灭,代之以同姓的诸侯王,作为控制大一统天下的基干”<sup>②</sup>。而刘邦对异姓诸侯的剪灭,是对卓有战功的萧何、张良、曹参、陈平等异姓功臣敲响了警钟,再加上复杂的宫廷斗争,使他们不得不表现低调,从表面上表现出“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以免引起刘邦的怀疑。从萧何不断适应刘邦态度之变化,便可见一斑。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萧何)。鲍生谓何曰:“今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刘邦)大说。<sup>③</sup>

尽管萧何年轻时“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高祖为布衣时,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佑之”<sup>④</sup>,可以说是汉高祖刘邦年轻时的恩人,但仍须设法消除刘邦对自己的疑心。由此可证,刘

① [汉]班固:《汉书·高五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02页。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③ [汉]班固:《汉书·萧何曹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07-2008页。

④ [汉]班固:《汉书·萧何曹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05页。

邦时时在对异姓诸侯设以提防。张良也应该早看透了刘邦的这一禀性,所以当刘邦大封功臣时,欲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而张良表示“愿封留(即陈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sup>①</sup>。

萧何、张良等人的此种态度从客观上促进了黄老道学在汉初整个社会得以流行,以至于作为孝文皇后、被汉武帝封为太皇太后的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sup>②</sup>。

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被剪除后,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相继辅政。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sup>③</sup>。陈平“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sup>④</sup>,这也应该是刘邦在临终时向吕后推荐陈平的原因之一。

刘邦刚建汉时并没有确切的治国方略了然于心,由于当时战乱后的情势所逼,不得不采纳休养生息的方案。又由于秦始皇时期“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sup>⑤</sup>。迫于此种经济形

---

① [汉]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31页。

② [汉]班固:《汉书·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45页。

③ [汉]班固:《汉书·萧何曹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21-2022页。

④ [汉]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38页。

⑤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6页。

势,西汉初期的在位者不得不遵循黄老道家所倡导的“因循”策略: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sup>①</sup>

这样,汉初选择“黄老道学”作为治国理念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道家思想“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sup>②</sup>,汉初所遵循的黄老道家思想虽然在一定层面上是“人君南面之术”,同时也具有“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特点。这种思想除了促进汉初的经济与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为学术的自由发展铺平了道路。为了钳制人们的言论,使“法令一出”,丞相李斯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向秦始皇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sup>③</sup>这就是著名的“挟书令”或“挟书律”。秦始皇采纳了这一建议,不准个人私自藏书,严重阻碍了学术及各种思潮的自由发展。汉惠帝四年(公元前 191 年),“挟书令”被废除,人们在言论与

---

①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127 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292 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55 页。

学术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自由。汉初从高祖到景帝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政策,至战国末期形成的“百家争鸣”中的一些学术流派这时开始抬头。从春秋末期开始出现,到战国中后期逐渐壮大的士阶层,是“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初期,儒、墨两家成为当时的显学。至战国末期,儒、墨、道、法、阴阳诸家争奇斗艳。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就十分重视法家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然运用法家思想治国,其严刑峻罚有违人性,成为秦朝很快灭亡的重要原因。汉初的许多知识分子或“士”亲历了秦朝灭亡的惨状,他们从秦亡的历史教训中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了汉初较为切合实际的治国理念,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反对以法家思想治国。当时除了上层崇尚黄老道家思想以外,一些崇尚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奉劝皇帝接受并实行儒家的治国理念。

儒家思想在汉初被皇家接受、采纳的过程曲折而漫长。汉朝建立之后,虽然在制度方面仍“汉承秦制”,但在礼仪方面则力求简易,悉去秦仪法。但过于简易的礼仪又导致大臣们在朝堂上经常发生失礼的行为。“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叔孙通便趁机说服刘邦制订宫廷礼仪:“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sup>①</sup>得到刘邦的许可后,叔孙通便到鲁国故地征召三十名儒生到达长安,帮助制订和演习宫廷礼仪。演习熟练后,叔孙通请汉高祖进行观瞻,得到高祖的首肯,并命令大臣进行彩排。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长乐宫落成之际,汉高祖首次使用叔孙通制订

---

① [汉]班固:《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6页。

的宫廷礼仪进行新年朝会。由于受新制订的庄严礼仪的约束，整个朝会没有发生喧哗和失礼的行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刘邦感到甚为满意：“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sup>①</sup>其实，叔孙通所制之朝仪乃“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与儒家古代的礼仪应相差甚远。刘邦只是觉得此类礼仪对他统治有利，而没有从深层次上思考儒家思想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作用。但“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sup>②</sup>的陆贾，对刘邦改变对儒家思想的看法，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sup>③</sup>

可见，刘邦已意识到儒家思想对汉家天下长治久安的作用。及汉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及有口者。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sup>④</sup>。所以，陆贾的思想没有完全实现即遭遇

---

① [汉]班固：《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28 页。

② [汉]班固：《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11 页。

③ [汉]班固：《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13 页。

④ [汉]班固：《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14 页。

夭折的命运。

铲除异姓诸侯王后,相继辅政的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并没有为汉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典章制度方面提出系统而具体的方案。直到被文帝召为博士的贾谊,才向汉家提出修改典章制度的建议。贾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sup>①</sup>。贾谊“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年二十余即超迁至太中大夫。贾谊还意识到被封为列侯的功勋大臣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便向文帝提出列侯就国的建议。因这些建议触及列侯的切身利益,所以“绌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sup>②</sup>。汉文帝后来也疏远他,故贾谊“易服色”、“兴礼乐”的想法也没有得到贯彻执行。针对当时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等情况,为稳固中央政权,贾谊还向文帝提出“众建诸侯而小其力”的方针,但这一建议也没有得到汉王朝的具体实施,最终酿成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所以,在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没有确立,并不是陆贾、贾谊等没有努力,而是当时黄老道家思想充斥上下的时势使然。当时的易学当然更是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与民休息、重农抑商、息租减税等措施,汉王朝国力大增: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

①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22页。

②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22页。

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阡陌）之间成群，乘犂牛者摈而不得会取聚。守閭閻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sup>①</sup>

与汉初“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sup>②</sup>的情景已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武帝喜粉饰太平及好大喜功的性格，一种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改换了面目的、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为基础的儒学便应运而生了。但在董氏学说出现之前，极力恢复儒家思想与典章制度的赵绾、王臧等与当时崇尚黄老道家的窦太后等产生了磨擦。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sup>③</sup>

于是绾、臧便向武帝推荐他们的老师申公。在此之前，时任丞相的赵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sup>④</sup>奏可。说明在此之前所召之吏多为治申商刑名之士。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据钱穆先生统计，汉初之诸臣，除

---

①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135—1136 页。

②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127 页。

③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215 页。

④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56 页。



治黄老者外，确多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如张良“尝学《礼》淮阳，又受《太公兵法》于下邳圯上之老人”；陈平“少时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韩信“通兵法”；张苍“好书律历”；蒯通“通战国时说士权变”；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盖公“善治黄老言。曹参相齐……参独敬盖公言”<sup>①</sup>。只有酈食其、陆贾、叔孙通近儒。赵绾受《诗》于鲁申公，事景帝、为太子少傅的王臧亦受《诗》鲁申公。“武帝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sup>②</sup>，“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sup>③</sup>。由此可见，当时武帝对申公这样的宿儒是十分器重的。武帝想从申公那里听到关乎治乱的高见，而当时已八十余岁的申公则以传统的儒家观念来对答：“为治者不(至)[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sup>④</sup>这虽与孔子所主张的“不重言，观其行”的观念一致，却与当时好文辞、重虚饰、“内多欲而外施仁义”<sup>⑤</sup>的武帝预想要得到的答案不合。“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sup>⑥</sup>建元二年(公元前

---

①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76—77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8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8 页。

④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8 页。

⑤ [汉]班固：《汉书·张冯汲郑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317 页。

⑥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8 页。

139年)冬十月,时任御史大夫的赵绾又“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sup>①</sup>,这下惹怒了“喜《老子》言,不说儒术”的窦太后,于是窦太后便“使人微伺赵绾等奸利事”<sup>②</sup>,并责让武帝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sup>③</sup>武帝因此“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sup>④</sup>。这样,武帝力图正式恢复儒家典章制度的第一次努力便以赵绾、王臧下狱自杀而告终。但武帝“乡儒术”的初衷并没有改变,所以在窦太后去世前一年的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还是下诏设立了《五经》博士。

赵绾、王臧的失败,除申公对武帝问题的回答不合武帝的意愿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顺应时代需要,从学理上为儒家争取政治地位,向窦太后、武帝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这一任务直到董仲舒才得以完成。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sup>⑤</sup>。董仲舒就是在此时向武帝对奏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的最后指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

①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页。

②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15页。

③ 案:新垣平是文帝时的一个方士,以“仙人送玉杯”、“周鼎”出汾阴等骗术骗取文帝信任,并爬上大夫之高位。后丞相张苍、廷尉张释之等发现其诈,下吏治,诛夷平。此后,文帝便急于改正、服、鬼神之事。窦太后利用刚过去不久的此事件来排除异己,令武帝难于申辩。

④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8页。

⑤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5页。

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sup>①</sup>

又据《汉书·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武帝“诏贤良曰：‘……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sup>②</sup>。从董仲舒对策的内容可知，其对策时间正应该是在此时。又“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sup>③</sup>。至此，儒学正式取代黄老道家而成为汉家政治的指导思想。董仲舒较之赵绾、王臧成功的原因，除了窦太后的势力变弱之外，重要的是他所建构的“天人感应”、“人副天数”及“大一统”的理念，从学理上为汉武帝实现自己的抱负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后来孟、焦、京象数易学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基础与哲学根据。

## 第二节 《五经》博士的确立

前文已述，汉武帝在崇尚儒术之初，虽然受到窦太后等的百

---

①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

②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161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3页。

般阻挠,但武帝之“乡儒术”则是矢志不移的。所以,在窦太后去世前一年的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还是下诏设立了《五经》博士。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之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sup>①</sup>。“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sup>②</sup>。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汉武帝实现其抱负提供了理论基础,还对武帝决定收回各诸侯国的学术自由产生了鼓动作用。刘邦建汉之初,无暇顾及学术,在诸多方面仍承秦制。秦禁《诗》《书》的政策也相应地延续下来,直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才废除“挟书令”,而后民间公开教学,如伏生授《尚书》、田何授《易》等以及各诸侯国广泛搜罗民间藏书等活动才得以展开。而这些自由在确立《五经》博士后渐被喜好专制的武帝所限制。

“文景之治”时汉王朝在经济上已走出困境而臻富庶,虽然文帝、景帝仍躬身自俭,但各诸侯王已开始生活奢侈糜烂,尽管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这一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此外,各诸侯国还设有博士,可以招徕文学之士。战国时期养士的风气继续流行于各诸侯国。如曹参到齐国任相时便“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sup>③</sup>。“汉兴,

---

①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1页。

②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5页。

③ [汉]班固:《汉书·萧何曹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18页。

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其后吴既败，诸人去吴归梁。梁孝王亦招延四方豪杰。……梁游士宾客之盛掩汉廷。王国宾客文学之事，愈后愈盛，并不以吴楚之败而中折。其后则南有淮南王刘安，北有河间献王刘德，皆及武帝世。”<sup>①</sup>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编纂的《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流传于世。据《汉传》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sup>②</sup>

对于《淮南子》成书的政治背景，徐复观先生是如此分析的：

汉初的政治形势，是刘邦以大封异姓诸侯王，而战胜项羽，取得天下。在即帝位的同一年内，即开始剪除异姓诸侯王而代之以同姓诸侯王，以安定天下。从文帝起，开始了对同姓诸侯王的防闲，贾谊、晁错诸人，都先后提出实行削除诸侯王以便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且不惜出之以制造冤狱的手段。到了景帝，更进一步实行此一政策，因而有七国之变。其亲弟梁孝王亦几乎不免。刘安与景帝为堂兄弟；且因刘安是两世含冤，早为朝廷所侧目。景帝削平七国后，岂能一日忘记刘安兄弟？而刘安的惴惴疑惧，自亦为情理之常。同时，汉初士人承战国余习，遨游于诸侯王间，下焉者博衣食，上焉者显材能，尤为朝廷所深恶。随对诸侯王的疑忌压迫倾覆，势必影响摧残到这一批游士的自身。尤以淮

①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0页。

② [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45页。

南宾客之盛,更成为朝廷欲得而甘心的大目标。<sup>①</sup>

基于这种认识,徐先生指出:“《淮南子》中的道家思想,与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有一个很大的界域。汉初所承继的战国中期以后的道家思想,乃属于‘黄老’并称的这一系。……而黄老并称,即是把权谋术数乃至许多方技迷信,掺进道家思想中去,这是原始道家思想的变形。但自战国末期以至西汉初年,这是道家中最有势力的一系。所以《史记·外戚世家》:‘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老子韩非列传》:‘申子之学,本于黄老。’‘韩非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sup>②</sup>徐复观先生所论甚是。由此可知,窦太后等学习黄老,更有学习其中权谋之术的成分在内。他进一步指出:“《淮南子》中,不仅未将黄帝与老子,并称对举……在本书中,由黄帝所代表的政治理想,还不及伏羲所代表的分量。……大概门客精通易学的人,占有相当的势力;而他们又是以八卦及六十四卦,皆出于伏羲的。”<sup>③</sup>所以,在徐先生看来,《淮南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与“黄老”道家有根本的区别。他认为:“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一书中所占地位,深入地看,并不次于道家。除大量引用了《诗》、《易》之外,《礼》、《乐》、《春秋》皆为其征引所及,且多发挥《六经》的微言大义。”<sup>④</sup>徐先生所论是极有道理的。

---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

③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④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恐怕这也是武帝决意除掉淮南王刘安的深层原因,因为武帝想隆儒术,而《淮南子》亦暗含隆儒术之意,淮南王那里又养着那么多儒学材士,这些都足以引起武帝的疑忌。

另外,当时“数上疏言事”、“岁中四迁”,令武帝感到相见恨晚并以《易》至大官的主父偃,曾上疏曰: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sup>①</sup>

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不管当时用了什么办法让梁王、城阳王愿以邑分弟,这当是主父偃上疏以后的事。“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sup>②</sup>。主父偃又上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sup>③</sup>武帝又听从了他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这样,诸

① [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02页。

②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页。

③ [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02页。

侯王的势力就进一步被削弱了。这时,只有淮南王刘安那里势力独盛,武帝要着意对付的目标便是淮南王刘安了。

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河间献王刘德藏书之事。据《汉书》记载: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者)[多]从而游。<sup>①</sup>

河间献王以一种“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态度好儒,与武帝内喜神仙方道而外饰以儒术的态度有天壤之别。淮南王刘安养宾客及河间献王刘德藏书都让武帝心中不快,但一开始武帝在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又由于武帝内喜神仙黄白之术,所以,“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指武帝)爱秘之。”<sup>②</sup>但此等诸侯王势力的强大一直是武帝心中的一个梗块。虽然武安侯田蚡的挑唆是加深武帝与淮南王之间矛盾的一个原因,而武帝也正好除掉淮南王之意,所以才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一月以谋反的罪名,诛灭淮南王刘安,“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

---

① [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② [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45页。



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sup>①</sup>。同时被除的还有淮南王的弟弟衡山王及其宾客，“党与死者数万人”<sup>②</sup>。至此，淮南王的势力被一网打尽，同时也除去了武帝心头的一个遗患。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考《史》《汉》所载，淮南王谋反状，似颇无实据。”<sup>③</sup>在此之前，武帝对付“修学好古”的河间献王则采取的是另一种手段。据《史记·裴驷集解》：

《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艳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sup>④</sup>

可知河间献王“刘德非以罪死，而系以猜嫌忧愤而死”<sup>⑤</sup>。钱穆先生指出：“献王即以来朝之年正月薨，见《武纪》。其时朝十月，盖归而即卒……淮南献所著书，而武帝爱秘之。夫爱矣，云何而秘。宜乎河间书之尽藏秘府，伏而不发矣。盖其时淮南河间，皆以王国讲文学，流誉驾中朝，遂为武帝所忌。二王均不得其死，

① [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52 页。

②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4 页。

③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80 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094 页。

⑤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0 页。

其书入汉廷，亦遂抑而未行也。”<sup>①</sup>果如此，则成帝时刘向所校秘书当有河间献王所收之书。《汉书·艺文志》载：“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考之《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夏六月武帝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武帝敕令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当于此时。而此时离河间献王去世（公元前130年）已有六年之久。可证武帝充之秘府之书策当包括河间王所藏之书。或至少到成帝刘向校书时，河间献王所藏之书应早已充之秘府，因为在此之前，河间已遭遇国除的命运。<sup>②</sup>

需要注意的是：“董氏在对策中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话，实际是指当时流行的纵横家及法家之术而言。他的反纵横家，是为了求政治上的安定。他的反法家，是为了反对当时以严刑峻罚为治。他的推明孔氏，是想以德治转移当时的刑治，为政治树立大经大法。而他的所谓‘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指的是不为六艺以外的学说立博士而言。……董氏的意见，并不是要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的流通。董氏这一建议，只考虑到当时的政治问题，立论诚然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而发生很大的流弊。但即使在两汉的经学盛时，也不曾影响到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态度。”所以，本于刘歆《七略》的《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不仅将儒家与诸家并

①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3页。

② [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2页。

列”，且“对诸子百家的开明态度，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精神是一致的”<sup>①</sup>。这一见解十分正确。至于董仲舒的论点为汉代统治者所利用，除他的理论有疏漏之处之外，武帝制订的专制体制并不是董仲舒所能左右的。武帝时形成的专制体制正是导致西汉中衰、元帝时宦官弄权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一体制也影响了学术的发展，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阻碍学术发展的，是专制政治；决定学术发展方向，是专制政治下的社会动态与要求。”<sup>②</sup>《五经》被立于学官后，多数知识分子为利禄所诱惑而治《五经》。由于进入仕途又要争权夺利，《五经》又成为获取政治资本、攻击政敌的工具，这又从另一方面扭曲了儒学并窒息了儒学的发展。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一再向武帝强调教化的作用，并在回答第三道诏策的末尾，强调独尊儒术。那么，董仲舒对策之后，武帝在文教上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据《汉书·武帝纪》可知，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立《五经》博士之后，直至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才下了一道与德化荐贤相关的诏书：

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闾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15页。

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sup>①</sup>

由此诏书可以反映出如下几个问题：（1）立《五经》博士（公元前136年）及董仲舒对策（公元前134年前）后至此，汉武帝虽然开始重视儒术，但还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儒术上，而是注重北击匈奴，学术因此仍在较自由的氛围中发展。这就为淮南王刘安所聚才士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发展空间。（2）河间献王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薨，河间献王的“修学好古”或许对武帝有所触动，所以在河间王薨后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才有此诏书的发布。（3）这一诏书总体上还是“荐贤与能”之举，与董仲舒的对策及儒家的大方针还算一致。据《武帝纪》可知，针对武帝的这一诏书，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sup>②</sup>由此奏议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清明的。但随着博士弟子的设立，儒家一尊的地位才真正确立，由此而导致了后面每经内部的分化，出现后来越来越为繁琐的章句之学，并由此导致经分数家的纷争局面。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

①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167页。

②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页。

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sup>①</sup>。由此可知，公孙弘应该是此时上的“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奏请，并得到批准。自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sup>②</sup>。

这一诏书说明，武帝开始重视礼乐教化，虽然他所理解的礼乐教化与原始儒家所说的礼乐教化有很大差异，至少他在形式上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百姓的内心平和。也可以说这是对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到的“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的认同与落实。而在董仲舒对策时，武帝“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sup>③</sup>。在此奏之前，“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可知河间献王所献为儒家传统的雅乐，而武帝时制作了那么多郊祀之乐，“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sup>④</sup>。据钱穆先生所考证，“献王即以来朝之年正月薨，见《武纪》。其时朝十月，盖归而即卒”<sup>⑤</sup>，那么，河间献王献乐当在此

① 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1 - 172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596 页。

③ [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32 页。

④ [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70 - 1071 页。

⑤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83 页。

之前。虽然“河间乐在武帝时，本以备数，不及郊庙大典。其后亦迄未施行也”<sup>①</sup>，但河间献王对礼乐教化之说的重视未免不对武帝产生影响。综合以上因素，武帝才于立《五经》博士九年后以诏书的形式强调教化的作用，并置博士弟子员，完善博士制度。

随着公孙弘对博士制度的进一步推动，儒术终至独盛。受利禄的诱惑，以前儒、道、法、名等多家并存的局面被独尊之儒术所掩盖。特别是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十一月，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以谋反的罪名被诛后，“党与死者数万人”，诸侯国中的文学才士，亦被剪灭殆尽，这样就只有儒术挺立，儒术也因此而逐步成为文人才士及百姓步入仕途的独木桥。除了极少数的高洁之士或隐士之外，大多数才士趋向儒术一脉。这样，武帝时期便进一步由政治的专制走向文化与学术的专制。但这时经学内部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分化。从下文“博士制度的演变及西汉末期的今古文之争”诸节探讨可知，武帝时的许多儒者并非专治一经而是兼通数经。

### 第三节 灾异说的兴起及 经学内部之分化

武帝时代儒术渐受重视之后，受利禄的诱惑，文人才士渐渐以通经作为入仕的捷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天人一体的架构为儒家的伦常之理找到了天道上的根据，而其中所提到的

---

<sup>①</sup>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82 页。

“谴告”说又极大地促进了“灾异”说的形成与完善。

就昭、宣时期的学术发展而言,昭帝时仍延续武帝时所立的《五经》博士。由于武帝忙于拓边、封禅、巡狩之事,在学术上并未给予真正足够的重视,而且儒生对封禅、巡狩等的看法与武帝之内心想法不合,武帝又多用尚书上传下达,而丞相只是备员而已,所以当时儒术并没有成为文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各经内部也没有发生剧烈的分化。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却对当时的人们认识天道与人事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而影响深远,从其“天人感应”思想中衍生出的阴阳灾异说也影响至巨,“汉兴推阴阳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sup>①</sup>。但董仲舒因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推言灾异而差点丧命之后,便不敢复言灾异。可证当时武帝虽然十分欣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但对其灾异说并不以为然。“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明于阴阳的夏侯始昌有“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的本领,可证武帝对灾异说也不特别反对,“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sup>②</sup>。昭帝时霍光秉政,灾异说对他亦没有发挥明显的谴告作用。如:

孝昭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94-3195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4页。

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sup>①</sup>

对于这一灾异现象，“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的眭孟曾予以推断：

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襁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sup>②</sup>

显然，眭孟借灾异来阐发其圣人受命而王及天命转移的观点，并指出，这一灾异现象寓示着汉家所受天命应自觉地禅让给天下有德之贤人。这正是原始儒家崇尚尧舜禅让说的继续。眭孟让其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其时秉政的大将军霍光甚为反感，“奏赐、孟妄设袄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起自民间的汉宣帝是武帝的曾孙，是受巫蛊之祸而自杀的戾太子的孙子，而他的名字正好叫病已，所以眭孟对这一灾异现象的解释正好应了宣帝兴于民间之事，所以宣帝即位后，征眭孟的儿子为郎，也是对眭孟灾异说的一种肯定。

由于眭孟对灾异的解释与霍光维护汉家天命的内心想法不合，所以霍光对灾异说便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但夏侯胜对灾异的一次解释却改变了霍光对灾异说的看法。夏侯胜是夏侯始昌

---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53 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53 - 3154 页。



的族子,“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蒯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sup>①</sup>。昭帝驾崩后无嗣,当时霍光秉政,便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帝。由于刘贺即位后行为淫乱,霍光即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谋废掉昌邑王而立宣帝。刘贺即位后经常外出,夏侯胜挡在刘贺的车驾之前直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昌邑王为此而发怒,以为夏侯胜妖言惑众,并“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霍光以为张安世泄露了机密,而张安世确实没有泄露他们的密谋。于是霍光乃召问夏侯胜,夏侯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霍光与张安世听到夏侯胜所推灾异后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sup>②</sup>。由此我们亦不难理解,宣帝即位后至霍光归政前的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因“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而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sup>③</sup>当然,从上述宣帝对眭孟推灾异的认可可知,宣帝本人也是承认灾异说的。而在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八月同样发生过地震,则没有类似的诏书发布。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5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5页。

③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页。

但我们不要以为夏侯胜善推灾异而把他视为江湖术士一类，因为当时的经师注重通经致用，夏侯胜对经学的致用功能深信不疑，他认为经学即是道的体现，道之体与道之用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夏侯胜在讲授经术时，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sup>①</sup>从后面的分析可知，我们将要论述的京房亦对此怀有坚定的信念。

宣帝时期正是孟喜、焦延寿易学产生的时代。我们将在下文孟、焦生平部分进行详述，在此我们主要看一下当时大的学术背景，以便更好地把握孟、焦、京易学在整个经学中的地位与处境。就学术沿化来说，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恐主要针对经而言，而经师在讲解经时，必定对经多有自己的阐发，此种解释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既已存在，称为《传》。如据《汉书·艺文志》可知，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的汉人周王孙著有《易传周氏》二篇。其他尚有《尚书传》四十一篇，《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六卷，等等。在此之前，对经进行较为系统解释的《传》已经存在，如据《汉书·艺文志》可知，《春秋》三传在立《五经》博士前既已存在。就《易经》而言，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或立《五经》博士之初主要是针对《周易》古经上下篇而言的，如据《汉书·艺文志》，在此之前有：周王孙著《周氏易传》二篇；《服氏易传》二篇，颜师古注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估为田何的弟子服生所著；《蔡公易传》二篇，注曰“卫人，事周王孙”；《韩氏易传》二篇，注曰“名婴”，当为韩婴所著；《王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9页。

氏易传》二篇，注曰“名同”，当为田何弟子王同所著。这些《易传》皆为“二篇”，可证这些《易传》应都是以《周易》古经上下篇为框架而进行阐发的。直到武帝时的杨何仍然以《周易》古经上下篇为框架而著《杨氏易传》二篇。只有景帝时的田何的弟子丁宽释《易》“训故举大谊而已”而著有《丁氏易传》八篇，而不是二篇。笔者认为，今本《易传》在汉初田何传《易》时当已作为田何《易》的系统得以流传，此将在下文《汉代易学源流》部分详论，此不赘述。而武帝时的易学又以杨何易学为代表。由此可知，在孟、焦易学产生之前，对《周易》的解释主要以《周易》古经之上下篇为框架，那么武帝一开始所立《易经》博士也当主要针对《周易》古经上下篇而言，而《易传》类的《传》则未被作为《经》来对待。虽然至施、孟、梁丘时，已有“《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但把《易传》十篇作为“经”来对待当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之时。下文对此将有详论。而在诸经师传“经”的过程中，又对包括《传》在内的《经》的解释进行扩展，从而形成了章句之学，而在这种分化产生之初，经师之间对此问题便有分歧。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明阴阳灾异的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蒯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sup>①</sup>，夏侯胜从父之子夏侯建“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sup>②</sup>。夏侯胜对夏侯建“具文饰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5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9页。

说”之章句颇为不满而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而夏侯建则认为夏侯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sup>①</sup>。可证夏侯胜“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的目的是为了应敌而作，经学也因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获取利禄、攻击政敌的工具。至孟、焦易学产生之时，章句之学当已十分盛行，如据《汉书·艺文志》可知《易》之《章句》有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由此“各二篇”亦可知，此三家之《章句》亦当以《周易》之上下篇为框架。而章句之学兴起之后，“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的丁宽之学，也被称为“《小章句》”。此《小章句》恐怕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丁氏易传》八篇。

孟、焦易学产生的时代正是学术分化之时代。各经之间以及各经内部为争取各自的政治地位而建章立说以各自成家。就如上文所云，夏侯建为了应敌而立章句，可想其他经章句之立亦与此类似。当然，学术从建立到一开始传播便面临分化问题。就如《周易》之传承而言，汉初田何授《易》“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sup>②</sup>。既然“皆著《易传》数篇”，那么田何这几个弟子虽同出一师，但对《周易》的阐发当已不尽相同。丁宽授田王孙，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后来经学的传承又出现所谓的师法、家法之说。于易学，“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sup>③</sup>。至宣帝末年，各家之说已经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59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597 页。

③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36 页。

成熟,各家为争各自的政治地位亦互相攻讦,宣帝为广道术,乃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sup>①</sup>。

灾异说逐步受到重视也是孟、焦易学产生的重要原因。由上文所述可知,武帝虽重神仙之事,并以儒术文饰其政治,灾异谴告说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大作用。昭帝富于春秋,政令皆由霍光出,灾异说在此时也并未在政治中发挥重大作用。但夏侯胜对霍光与张安世密谋废掉昌邑王的推测则令霍光“益重经术士”。可见,至夏侯胜时,经、术已因言灾异而进一步合为一体,言灾异已成为当时通经致用的一种重要表现。这与当时汉代整个学术界所接受的对天道、人道及其内在关系的认识有内在联系。

#### 第四节 博士制度的演变及公羊、谷梁《春秋》之争

“博士”是西汉经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西汉博士制度之演变可以看出西汉学术之演变,特别是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汉经学内部分化的细节与原因。为了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下把握孟、焦、京易学产生的背景,我们有必要根据《汉书》所载博士情况进行统计、梳理,以便对西汉博士制度的演变进行考察,从而把握西汉经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及孟、焦、京易学在此脉络中的角色。

---

①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页。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据此可知，博士是秦朝设立的一种官衔，其职责是掌通古今。皇帝对古今问题不明白时，便向博士征询意见。陈胜、吴广揭竿起义时，“二世诏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sup>①</sup>可知秦时至少应有三十余个博士之位。据《汉书》记载可知，叔孙通由于对秦二世所问问题的回答令二世感到满意而由待诏博士被拜为博士。汉文帝时的齐人伏生为“故秦博士，治《尚书》”<sup>②</sup>。

孔子八世孙孔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sup>③</sup>。据《汉书·儒林传》载，“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sup>④</sup>。可知此孔甲即《孔光传》所说的孔鲋。由于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燔《诗》、《书》，杀术士，尽管陈涉起于匹夫戍卒，“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sup>⑤</sup>。由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六艺之学从此断阙，所以，当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后，鲁诸儒便持孔氏礼器往归陈胜，以期延续六艺之慧命。陈胜时期的博士制度应该仍袭秦制。而孔甲主治六经中的哪一经，我们已无从考察，或者

---

① [汉]班固：《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24 页。

② [汉]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277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352 页。

④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592 页。

⑤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592 页。

那时六经内部尚未分化,他也许是一位通儒。

刘邦建汉以后仍袭秦制。他不喜儒生,但看到叔孙通能变儒服为短衣,便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sup>①</sup>这时的汉家制度非常疏阔,所以博士制度也似乎不是特别严密。

汉惠帝时,孔鲋弟弟的儿子孔襄“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傅”<sup>②</sup>。

文帝时,贾谊因“颇通诸家之书”,而被文帝召以为博士。<sup>③</sup>据《汉书·儒林传》可知,贾谊曾修《春秋左氏传》,并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sup>④</sup>。鲁人公孙臣据五德终始说推汉家当为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而当时则据丞相张苍推定汉家为水德。由于文帝十五年(公元前 165 年)春,黄龙见于成纪,应验了公孙臣所说的话,所以,“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sup>⑤</sup>。文帝时治《尚书》的伏生已“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晁)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sup>⑥</sup>。汉定以后,

① [汉]班固:《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25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352 页。

③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221 页。

④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20 页。

⑤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212 - 1213 页。

⑥ [汉]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277 页。

晁错的老师伏生“即以(《尚书》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sup>①</sup>。由于文帝时伏生因年老而不可征,他的弟子张生为博士当在文帝或景帝时。另外,“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sup>②</sup>。燕人韩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sup>③</sup>。这是《汉书》所载文帝时的几位博士。

景帝时,“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sup>④</sup>,齐人轅固“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后来“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sup>⑤</sup>。齐人胡毋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sup>⑥</sup>。这是《汉书》所载景帝时的几位博士。

值得注意的是,据汉初的官制可知,汉初的诸侯王亦有设置博士的权利:“诸侯王,高帝初置……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sup>⑦</sup>所以景帝时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3页。

②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2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3页。

④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5页。

⑤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2页。

⑥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5-3616页。

⑦ [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1页。



修学好古的河间献王从民间搜集到许多古书,得书之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sup>①</sup>可证河间献王曾设立博士。据《汉书·儒林传》可知,赵人毛公“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毛公当是河间献王所立的《毛诗》博士。《汉书·儒林传》还有:“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sup>②</sup>由此可证,贯长卿的父亲贯公为河间献王之《左氏春秋》博士。“七国之乱”后,景帝为削弱诸侯王的权利,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sup>③</sup>,可证河间献王所立博士官当在此诏令下达之前的一段时间。而河间献王“以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sup>④</sup>,所以河间献王立博士的时间段应该不会太长,至多也就是十年的时间,之后便被强行取消。

由于“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

---

① [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0页。

③ [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1页。

④ [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sup>①</sup>。

就易学而言，据《汉书》可知，文景之时没有为《易经》博士者，也没有以《易经》居显要之位者，只有丁宽在景帝时“为梁孝王距吴楚，号丁将军”，也只不过是梁孝王的一个将军而已。可见，当时《周易》虽然没受秦火的影响而“传受者不绝”，但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易经》的地位并不显耀。而文景时已有以治《尚书》、《诗》、《春秋》等经为博士者。直到“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sup>②</sup>。

公孙弘四十多岁以后才开始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公元前140年），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案：此时尚未立《五经》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案：据《武帝纪》，当为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案：此时已立《五经》博士）待诏金马门。”<sup>③</sup>公孙弘希世用事，武帝初即位时，以治《诗》为孝景时博士的辕固“复以贤良征。……时固已九十余矣。公孙弘亦征，仄目而事固。固曰：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2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3页。

③ [汉]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13-2617页。

‘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sup>①</sup>可见，辕固已看出公孙弘曲学阿世之性格。但公孙弘深得武帝赏识，“一岁中至左内史”，“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元朔（公元前128～前123年）中，代薛泽为丞相”<sup>②</sup>。

此后，公孙弘奏请为博士置弟子员，逐步导致儒术独尊并深刻影响了此后博士制度的确立与演化：

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sup>③</sup>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2页。

② [汉]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18-2620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3-3594页。

公孙弘的这一奏请得到武帝的批准。这样,就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估计每一经置十位博士弟子。博士弟子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以及郡国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而可察者,得受业如弟子。而博士弟子的出路则是:“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这样,绝大多数才子便被笼络到《五经》博士的系统内,成为人们步入仕途的有效途径。

《汉书·武帝纪》有这样一段记载,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sup>①</sup>。由此可知,公孙弘应该是此时上的这一奏请,并得到批准。自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sup>②</sup>。武帝所立《五经》博士之性质亦因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盖其前申公之俦为博士,乃以通古今,非以其专经也。至武帝专隆儒术,乃特称五经博士。其他不以五经为博士者,遂见罢黜。因又名之曰诸子传记博士。其先则皆以通古今为博士,不别五经与诸子传记也。故独以经学设博士,其事自武帝始。……若谓武帝继文景时之一经博士而增成为五经,则为不明秦汉博士官性质衍变,失之远矣。<sup>③</sup>

①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72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6页。

③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2页。

《汉书·儒林传》有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据此可知，“《易》杨”应指杨何被立为《易经》博士。杨何是汉初传《易》的田何之徒孙：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公元前134～前129年）中征为太中大夫”<sup>①</sup>。如此，杨何当为武帝立《五经》博士后的第一个《易经》博士。《汉书·儒林传》又接着说“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这几个人都应该是武帝时人。他们几位是否相继为杨何之后的《易经》博士，我们不可得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其中的周霸亦治《尚书》与《鲁诗》<sup>②</sup>，主父偃除学《易》之外，还学习《春秋》、百家之言。所以，至少这两位成为专门的《易经》博士的可能性不大。《汉书·郊祀志》有一点关于周霸的记载，就是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计划草制封禅之仪时，“周霸属图封事”，但没有令武帝满意，所以被武帝罢黜。

据《汉书》记载，武帝时的《五经》博士除上文所说的《易经》博士外，其他四经的博士有以下一些人。“兒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sup>③</sup>欧阳生是伏生的弟子。兒宽曾向武帝谈论过《尚书》，并改变了武帝对《尚书》的看法：“‘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7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3页。

③ [汉]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28页。

观。’乃从宽问一篇。”<sup>①</sup>武帝计划进行巡狩封禅时，不知其仪，“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聘。上为封祠器视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武帝于是“尽罢诸儒弗用”<sup>②</sup>。而兒宽认为：“……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武帝认为兒宽说的有道理，“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并在即将东封泰山之前，拜兒宽为御史大夫。

《汉书》还如此记载：“初，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时宽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征褚大，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洛阳，闻兒宽为之，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诚知人。’”<sup>③</sup>由此可知，兒宽起初为博士弟子，“受业孔安国”。当时的梁相褚大治《公羊春秋》，是董仲舒的学生。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武帝曾“遣博士大（案：师古注曰“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鰥寡废疾”。<sup>④</sup>据《汉书·儒林传》载，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的弟子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我们已知褚大为博士，段仲、吕步舒也可能做过博士，而孟喜的父亲孟卿是因推灾异而遭杀身之祸的眭孟的同门，共同师事“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

---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3页。

②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33页。

③ [汉]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3页。

④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0页。

的嬴公。嬴公在武帝时是否做过博士已不可得知。另外孔安国及其侄子孔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sup>①</sup>。治《鲁诗》的申公,其“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亦治《易》与《尚书》)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殳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sup>②</sup>。由上下文看,这几个人都应该做过博士。可以明确的是,孔安国以治《尚书》为博士。据《汉书》记载,“元鼎中(据《武帝纪》可知,当为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5年),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sup>③</sup>。由此可知,徐偃亦曾为博士,且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与公卿诸生议封禅之事时,他所提的建议没有得到武帝的认可,“于是上黜(徐)偃、(周)霸,而尽罢诸儒弗用”<sup>④</sup>。另据《汉书》记载,“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是时御史大夫兒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sup>⑤</sup>这里的“博士赐”有可能是申公的学生后为东海太守的鲁赐。由此可以看出,《汉书·儒林传》所说的武帝立《五经》博士后的某某至某某官位,在他们为某某官之前,有

---

①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52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8页。

③ [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17页。

④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33页。

⑤ [汉]班固:《汉书·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4-975页。

可能都做过博士。

对于主治《齐诗》，明于阴阳灾异，以《齐诗》、《尚书》教授而兼通《五经》的夏侯始昌来说，“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sup>①</sup>。据《汉书·武帝纪》可知，柏梁台灾日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乙酉日，而昌邑哀王刘髡以“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立，十一年（后元二年，即公元前87年）薨”<sup>②</sup>。由此可知，夏侯始昌当主要活动于太初之后而终武帝世。“诸齐以《诗》显贵，皆（轅）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sup>③</sup>，他有可能做过当时的《齐诗》博士。从《汉书·儒林传》来看，当时治《齐诗》显贵者不如治《鲁诗》显贵者多。就《礼经》来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徐生的孙子徐延、徐襄当生活在武帝时，由于徐襄不能通经，他不可能为《礼经》博士，而徐延虽通经，但不精，所以也不可能为博士。“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栢）[桓]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儒林传》没有明确说他们是否做过博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萧奋是孟喜的父亲孟卿的老师，萧奋当生活在武帝时，他时否做过《礼经》博士，《汉书·儒林传》亦无明

① [汉]班固：《汉书·睦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4页。

② [汉]班固：《汉书·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64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2页。



确说明。《汉书·艺文志》有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迄孝宣世，后仓最明。”由此可证，在汉人看来，自孔子时《礼经》已经不全了，到秦朝的时候已经大坏，所以汉初高堂生所传的《士礼》不可能达到“经”的地位。宣帝时的后仓是孟卿的学生，他最精通《士礼》，《汉书·儒林传》又说，“初，《书》唯有欧阳，《礼》后”，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汉武帝初立《五经》博士时，《礼经》博士有可能处于缺员的状态，直到后仓才真正成为《礼经》的第一个博士，“苍亦通《诗》、《礼》，为博士”<sup>①</sup>。

《汉书》还记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sup>②</sup>，我们无从知道“博士中”是谁，《汉书·儒林传》没有记载。

从以上统计可以发现，武帝时这些儒者中的好多人并非专治一经而是兼通数经。如夏侯始昌即师从张生的弟子夏侯都尉学习《尚书》，又从辕固受《齐诗》，所以说他“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sup>③</sup>。孔安国既治今文《尚书》，又治《鲁诗》，又治古文《尚书》。从《周易集解》辑有孔安国《易》注来看，孔安国也应该治过《易》。周霸既治《易》，又治《尚书》、《鲁诗》。公孙弘既学《春秋》杂说，又学《齐诗》于辕固。这是由传记博士向《五经》博士过渡阶段时的情状。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3页。

②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2页。

③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4页。

以上是武帝一朝博士制度及学术发展之概况。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sup>①</sup>。由上文可知，武帝时公孙弘上疏以后，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据《昭帝纪》可知，昭帝时的这一举措当实施于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因纵观昭帝一朝，只在这一年的春天发了一道有关举贤良的诏书：“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sup>②</sup>就昭帝时的博士而言，据《汉书·儒林传》可知，丁宽授《易》田王孙，田王孙为博士。由于施雠为宣帝时博士，施雠被补为博士时当在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时（请参见下文孟喜易学部分对此之论证），那么，施雠的老师田王孙为《易经》博士当在昭帝时至宣帝初期。当时还有一位京房，是杨何的弟子，梁丘贺的老师。后来此京房迁为齐郡太守，梁丘贺便更事田王孙。此京房在出任齐郡太守前为太中大夫，在任太中大夫之前，极有可能做过《易经》博士，其做博士的时间有可能在武帝末至昭帝时。

武帝时以治《尚书》闻名于世的兒宽曾师事欧阳生，而兒宽又“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sup>③</sup>。兒宽于张汤任御史大夫期间（元狩元年即公元前 122 年至元鼎二年即公元前 116 年）因张汤的推荐而被“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则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596 页。

② [汉]班固：《汉书·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23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3 页。

兒宽教授当在此之前。据此可知,欧阳高为博士当在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之时,而欧阳高的孙子欧阳地余“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sup>①</sup>。石渠阁会议召开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则欧阳高为《尚书》博士当在昭帝时或宣帝初。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蔣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sup>②</sup>。如前所述,夏侯始昌主要活动于武帝末期,夏侯胜是夏侯始昌的族子,那么,夏侯胜为博士当在昭帝时,而且在昭帝崩时,他还据灾异说提醒过计划让其继皇帝位的昌邑王刘贺。《汉书》又载,武帝时曾以治《尚书》为博士的孔延年之子孔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sup>③</sup>。据此可知,昭帝末年时夏侯胜的学生孔霸已为《尚书》博士,那么,夏侯胜为博士当在此之前,而当孔霸为博士时,夏侯胜当已升迁为光禄大夫。夏侯胜迁为太子太傅则是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以后的事<sup>④</sup>。

“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sup>⑤</sup>。大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3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5页。

③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52页。

④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9页。

⑤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9页。

江公为教授《鲁诗》的申公的弟子。韦贤“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sup>①</sup>，可证韦贤曾为昭帝时的《鲁诗》博士。

前文已述，燕人韩婴为文帝时的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sup>②</sup>，可证韩婴的孙子韩商当为武帝或昭帝时的《韩诗》博士。

就《礼经》博士来说，在后仓为《礼经》博士之前，可能没有礼经博士。《汉书·儒林传》称后仓“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sup>③</sup>。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sup>④</sup>。霍光薨于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萧望之事后仓在此之前的十余年，所以萧望之事后仓时则在昭帝时。因为后仓曾师事孟喜的父亲孟卿，孟卿及眭孟从嬴公受《公羊春秋》，眭孟因推说阴阳灾异不合上意而被诛于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眭孟与孟卿为同时代人，所以，孟卿当主要活动于

---

① [汉]班固：《汉书·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07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3-3614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3页。

④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71页。

昭帝时代,而孟卿的弟子后仓当主要显耀于昭帝末及宣帝时,估计萧望之师事后仓时,后仓当仍在民间而没有成为博士。而后仓成为博士不会早于昭帝末年。《汉书·儒林传》只是说孟喜的父亲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sup>①</sup>,又说孟卿“事萧奋,以授后仓、鲁国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sup>②</sup>,还提到孟卿的老师“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sup>③</sup>,而没有提及孟卿官居何位,由此看来,孟卿一生当主要在东海老家教授,而没有做过博士。后为昭帝谏大夫的嬴公即孟卿的老师,则有可能做过昭帝时的《公羊春秋》博士。

以上是昭帝时的博士发展状况。

昭帝末至宣帝初,正是《五经》内部剧烈分化之时。虽然昭帝时亦有许多儒者兼通数经,如夏侯胜除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之外,还善说礼服;后仓既通《礼》,又通《齐诗》;孟卿既通《礼》,又通《公羊春秋》;韦贤亦兼通《礼》、《尚书》,但诸儒已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学说,呈现出逐渐从其师法中分化出来而自成一说之趋势。其实,这种趋势在《五经》博士初立后不久已出。如《汉书·儒林传》这样称说孟卿的老师嬴公:“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嬴公治《公羊春秋》,师事董仲舒。这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5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6页。

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嬴公的许多同门师兄弟已开始不守师法。至昭帝时这种分化而自成一说的趋势更为明显，如《汉书·儒林传》称“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sup>①</sup>，可证孟卿在向其弟子后仓、疏广等授《礼》时，已作了很大发挥，而孟卿的学生后仓则应该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因此，昭帝末至宣帝初，经学开始由传、说、训故向章句之学转变。而这一转变亦遭到时人的反对，如夏侯胜从父之子夏侯建，“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夏侯胜对此持反对态度：“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而夏侯建亦不服气夏侯胜之批评，非议夏侯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sup>②</sup>。利禄的诱惑是一个原因，而儒术一旦获得独尊之地位而没有诸子之说的比照，则其内部势必要分化。因为现象界的任何事物有其对立面，一旦没有了其对立面，其自身内部就必然会产生分化。儒术内部的这种大的分化是在宣帝时期进行的。

据《汉书·儒林传》载，“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可证宣帝前期博士弟子员仍为百人。就宣帝时的博士情况而言，前文已述，田王孙当做过昭帝时的《易经》博士。施雠为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后来，“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梁丘贺以筮有应而近幸后，很快为太中大夫并至少府，并派遣他的儿子梁丘临及门人张禹等从施雠问《易》。“博士缺”时，梁丘贺便极力推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599 页。

② [汉]班固：《汉书·睦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59 页。

荐施雠。于是“诏拜(施)雠为博士”<sup>①</sup>。因此,施雠被拜为博士当在梁丘贺迁为少府之后。而梁丘贺迁至少府则当在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他“以筮有应”及霍氏被诛后不久。《汉书·儒林传》还说,“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由于当时为少府并给事中的梁丘贺极力推荐,施雠被拜为博士,而孟喜则因“改师法”而未被见用。说孟喜“改师法”也当是梁丘贺的事。关于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关系之公案,我们在下文“孟喜生平评述”部分将有详述,此不赘述。总之,在此之后至宣帝末立施、孟、梁丘《易》之前,施雠为《易经》博士,并以《易经》博士的身份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我们在“施、孟、梁丘关系之公案”部分将会论证,在宣帝末立梁丘《易》之前,孟喜《喜》已经被立于学官。详见下文。

孔延年的儿子孔霸治《尚书》,是夏侯胜的学生,“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sup>②</sup>。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孔霸曾以博士的身份与霍光等向皇太后弹劾过昌邑王刘贺<sup>③</sup>,说明孔霸在宣帝初仍为《尚书》博士。后来,“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sup>④</sup>。治《尚书》的欧阳高的孙子欧阳地余“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当为宣帝后期之《尚书》博士。林尊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8页。

②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52页。

③ [汉]班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45页。

④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4页。

师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当为宣帝后期之《尚书》博士。与孔霸同事夏侯胜的周堪以译官令的身份“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他在做译官令之前是否做过《尚书》博士，《汉书》没有明确记载。张山拊是小夏侯建的学生，“为博士，论石渠”，当为宣帝后期之《尚书》博士。由此可知，至少有欧阳地余、林尊、张山拊等三位治《尚书》者同时以博士的身份论《五经》同异于石渠阁。由此可证，至宣帝末期，一经已同时设多个博士。

瑕丘江公是申公的弟子，而瑕丘江公的再传弟子王式曾为昌邑王刘贺之师，昌邑王刘贺以行为淫乱被废之后，昌邑群臣皆下狱诛，而王式因以《诗》谏刘贺而得减死论，后亦“诏除下为博士”，后来遭“世为《鲁诗》宗”的博士江公之辱而“谢病免归，终于家”，可证，王式曾做过宣帝时的《鲁诗》博士，但时间极短<sup>①</sup>。而此处“世为《鲁诗》宗”的江公当为瑕丘江公的孙子：“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sup>②</sup>因为《谷梁春秋》至宣帝末年才立于学官，所以这位小江公当为宣帝前、中期之《鲁诗》博士。山阳张长安幼君、唐长宾、褚少孙等都曾师事过王式。后来，三位皆为博士。而且张生还以《鲁诗》博士的身份论于石渠。元帝时代贡禹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的薛广德一开始曾师事王式，后来“以博士论石渠”<sup>③</sup>，可证薛广德在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10—3611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17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11 页。



石渠阁会议时亦为《鲁诗》博士。这样,于石渠阁论《五经》同异的至少有两位《鲁诗》博士:张生与薛广德。

《儒林传》没有记载以《齐诗》博士身份参与石渠阁论议者。

韩婴授《韩诗》于赵子,赵子授蔡义(蔡义于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至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为丞相<sup>①</sup>),蔡义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王]中尉……食生为博士……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sup>②</sup>,可证食生当为昭、宣两帝时《韩诗》博士,而长孙顺应当为宣帝时的《韩诗》博士。

大戴(戴德)与小戴(戴圣)都是后仓的学生。《汉书·儒林传》所载只有小戴以《礼经》博士的身份参与石渠阁会议。

曾师事孟喜的父亲孟卿而习《公羊春秋》的疏广“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至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广为少傅”<sup>③</sup>,可证疏广曾做过宣帝初期的《公羊春秋》博士。眭孟的弟子严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sup>④</sup>,可证严彭祖曾为宣帝时《公羊春秋》博士,且在评议《公羊》、《谷梁》同异时仍为《公羊》博士,后迁太子太傅,并以太子太傅终官。贡禹“以明经洁行著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元帝初即

① [汉]班固:《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99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4页。

③ [汉]班固:《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9页。

④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6页。

位,征禹为谏大夫”<sup>①</sup>。“始贡禹事嬴公,成于眭孟,至御史大夫(元帝初元二年即公元前47年)”<sup>②</sup>。眭孟被诛于昭帝后期的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由以上两条记载可知,贡禹曾做过宣帝中后期之《公羊春秋》博士。

以上谈到的是以博士身份参与石渠阁会议者。据《汉书·儒林传》可知,没有以博士身份参与石渠阁会议者尚有以下人员:一是梁丘贺的儿子梁丘临(治《易》,专行京房法。案:此京房乃淄川杨何弟子,非元帝时之京房)以黄门郎的身份“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一是周堪(治《尚书》,师事大夏侯胜)以译官令身份“论于石渠”,一是假仓子驺(治《尚书》)“以谒者论石渠”,一是韦玄成(治《鲁诗》)以淮阳中尉的身份“与太子太傅萧望之(治《齐诗》)及《五经》诸儒论同异于石渠阁”<sup>③</sup>,一是通汉(治《礼》,事后仓)以太子舍人的身份论于石渠。

宣帝时期是儒家《五经》内部剧烈分化及各经传人进一步争夺政治地位的时期,孟、焦易学正产生于这一时期。石渠阁会议则是应对这一分化的一次重大会议,而这一分化的主要标志则是就《公羊春秋》与《谷梁春秋》之同异所进行的论争。

关于《谷梁春秋》与《公羊春秋》之争,《汉书·儒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

① [汉]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69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7页。

③ [汉]班固:《汉书·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13页。

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官，使卒授十人。自元康（公元前65～前62年）中始讲，至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sup>①</sup>

由此可知，在立《五经》博士之前，申公就以《鲁诗》与《谷梁春

---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7-3618页。

秋》教授。瑕丘江公(又称大江公)是申公的弟子,亦教授《谷梁春秋》与《鲁诗》。由《汉书·儒林传》可知,瑕丘江公授《鲁诗》于韦贤,而据此段记载可知,大江公授《谷梁春秋》于卫太子、荣广王孙及皓星公。武帝立《五经》博士后,之所以“江公与董仲舒并”,是因为二人同治《春秋》。但因为江公不如董仲舒的文笔与口才好,又因为当时的丞相公孙弘亦是治《公羊春秋》出身,最后还是选择了董氏之说。公孙弘于武帝元朔(公元前127~前123年)中“代薛泽为丞相”<sup>①</sup>,而公孙弘以丞相的身份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请为博士置弟子员”<sup>②</sup>,卒用董氏之《公羊》说当在此时或稍前。由此亦可证,武帝在为博士置弟子员时,亦应对官方所用《五经》版本予以确定。武帝既尊崇《公羊春秋》,乃诏卫太子受《公羊春秋》。卫太子刘据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七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sup>③</sup>。由此可知,卫太子受《公羊春秋》当在公元前105年前后,通《公羊》后“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当在公元前102年前后。《谷梁传》之所以被流传下来自有其理由,大江公的弟子荣广王孙“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说明《谷梁》自有其长处,所以学者自然有人倾向《谷梁》。汉宣帝是卫太子的孙子。他听说卫太子在世时即卫太子在遭巫蛊之祸而身亡之前喜欢《谷梁春秋》,从感情上便喜欢《谷梁春

① [汉]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20页。

②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页。

③ [汉]班固:《汉书·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41页。

秋》，所以他便询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等大儒及侍中乐陵侯史高。他们几个都是鲁人，认为《谷梁传》属于鲁学系统，而《公羊传》属于齐学系统，认为应该重视一下《谷梁传》。为了不让《谷梁》学断绝，宣帝选了十个人受《谷梁》。从元康（公元前65～前62年）中开始讲习，至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共十几年的时间，十人皆已明习。于是宣帝乃召《五经》名儒时为太子太傅的萧望之等大议殿中，评论《公羊》与《谷梁》之异同，双方各自以经义对是非进行判断处理。这就是著名的石渠阁会议。据《汉书·宣帝纪》可知，此次会议召开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即这些人皆已明习《谷梁春秋》两年以后。

当时《公羊》一派参加评议的有博士严彭祖（眭孟的学生）、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一派则有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参加。双方各有四人参加。人们多不赞成《公羊》一派的说法，所以《公羊》一派又提出请内侍郎许广出面参加。为了平衡双方，主持者又请《谷梁》家中郎王亥参加，可见当时争论之激烈。这样，双方各有五人参加，对三十多件事进行了评议。萧望之等十一人（这十一个人的具体名字见下文）各根据经义进行评议，多数人赞同《谷梁》之说。从此以后，《谷梁》之学才开始兴盛。

《谷梁春秋》兴盛的原因，固然有汉宣帝对卫太子的感情及《谷梁》一派争取政治地位的因素在内，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独尊儒术后就《春秋》来讲，只有《公羊》一家之言，而《公羊》家对社会问题的某些解答又不能令人感到心悦诚服，而《谷梁》一派对许多问题的解答可能更为贴切。因为当时评议的具体内容今天已无从得知，我们只能根据这一段记载做如上之推测。

既然《春秋》除了《公羊》之说立于学官之外还可以允许《谷

梁》之说兴起,那么在宣帝中后期各经剧烈分化之时,从师法中分化出来的各经传人经过发挥经义而进一步立说的分支,已到了争取得到官方认可的时候。

石渠阁会议是宣帝后期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能有资格参加此次会议当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因此,《汉书》对参加此次会议者皆有记载。据《汉书》所载可知,参加此次会议者有太子太傅萧望之(治《齐诗》)、博士施雠(治《易》,事田王孙)、黄门郎梁丘临(治《易》)、博士欧阳地余(治《尚书》,欧阳高的孙子)、博士林尊(治《尚书》,事欧阳高)、译官令周堪(治《尚书》,事夏侯胜)、博士张山拊(治《尚书》,事夏侯建)、谒者假仓子骄(治《尚书》,事张山拊)、淮阳中尉韦玄成(治《鲁诗》)、博士薛广德(治《鲁诗》,事王式)、博士戴圣(治《礼》,事后仓)共十一位。据这些记载可知,这十一个人当是“平《公羊》、《谷梁》异同”的十一人。加上上文所提《公羊》、《谷梁》两家各五人,共二十一位儒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宣帝尽管不好儒,也“亲称制临决焉”<sup>①</sup>,可见此次会议之重要。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佚。唐代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我们不难推测,这次会议应该以评议《公羊》、《谷梁》同异为引子,而对其他诸经内部分化之说亦因之而进行评议。所以,萧望之等十一人之所以“多从《谷梁》”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为自己的一家之说也能够被立于学官,以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们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sup>②</sup>。《汉书·儒林

①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页。

②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页。

传》说,“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可证在石渠阁会议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之前,施氏《易》与孟氏《易》及大小戴《礼》已经被立于学官。(下文所引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亦可证明之一点)同时也说明,尽管孟喜因背着“改师法”的罪名而没有被拜为博士,最后孟氏《易》还是被立于学官,一则说明孟喜易学在当时的影响太大,二则说明官方对“改师法”之举的认可。这也是宣帝为将《谷梁春秋》立于学官而付出的一种代价。最后,博士官的员额也有所增加,“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稍增员十二人”<sup>①</sup>。估计这些博士大致是如下十二个人:施氏《易》博士施雠,孟氏《易》博士孟喜或其弟子白光或翟牧,梁丘《易》博士梁丘临<sup>②</sup>,前文所说的参与石渠阁会议的欧阳一支的《尚书》博士欧阳地余及林尊,大夏侯《尚书》博士周堪或其弟子牟卿,小夏侯《尚书》博士张山拊或其弟子假仓,《鲁诗》或《诗经》博士薛广德<sup>③</sup>,大戴《礼》博士戴德,小戴《礼》博士戴圣,《公羊春秋》博士严彭祖,《谷梁春秋》博士周庆或丁姓。

---

① [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6页。

② 梁丘临以黄门郎的身份参加石渠阁会议,黄门郎的地位不如博士高,估计石渠阁会议上立梁丘《易》之后,梁丘临便成为梁丘《易》博士。

③ 从《汉书·儒林传》可知,参加石渠阁会议者没有《齐诗》及《韩诗》博士,当时可能以《鲁诗》博士为《诗经》博士之代表。其中原因可能正如《汉书·艺文志》所云:“(《诗》)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轵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8页。)

复立诸家博士之前,章句之说已十分盛行,各经内部之分化已十分显著:孟喜通过吸收《易家侯阴阳灾变书》的内容而对《周易》进行了一种新型的解释;梁丘临专行京房法,与王同、杨何之易学系统一定已经有很大不同;大夏侯(即夏侯胜)“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sup>①</sup>,早已对《尚书》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小夏侯(即夏侯建)“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sup>②</sup>,已经自成一家之言;汉初,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至后仓已“说《礼》数万言”,后来《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而后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治《公羊春秋》者至眭孟之弟子严彭祖、颜安乐时,已“各持所见”,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复立诸家博士说明官方对诸家学说的承认,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各经内部之分化:在“《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之后,施家有张、彭之学,孟家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鲁诗》有韦氏学,又有张、唐、褚氏之学,而张家又有许氏学;《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公羊春秋》颜家有冷、任之学,复有管、冥之学;《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

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及施、孟、梁丘《易》的后果是,新出现的各经分支亦力图立于学官,元帝时又立《京氏易》就属于这种情况。这说明当时的官方与学术界已承认可以对《五经》进行新的诠释以自成一说。正如钱穆先生所云,通经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5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9页。



本以致用,“惟自治经而为章句,则文字蚀其神智,精神专骛饰说,而通经益不足以致用”<sup>①</sup>。而立《谷梁春秋》则表明,除了追逐利禄的因素之外,当时对《五经》的解释已偏离古人所要表达的主旨,或对当时所出现的各种政治与社会问题已不能做出合理的解答,人们从而可以从与《五经》相关的古籍中重新挖掘圣人之意,说明时人对《五经》的解释有亟待完善之处。刘歆后来力图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之举就属于这种趋势使然。从博士弟子的逐渐增员,即可见这一趋势之一斑:“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时“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博士)弟子员三千人”<sup>②</sup>。这就逐步导致了西汉末期的今古文之争。

## 第五节 西汉末期的今古文之争

宣、元以后,人们对武帝时所确立的汉家郊祀制度已进行怀疑,并指出当时所行的制度多不合古制。这就促动人们一方面在承认新出学说的同时,对现行制度重新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则是从古代制度中汲取更多的营养。这样,已经立于学官的势力不想失去既得利益,而力图恢复古制的一方又不甘退让,这反映在学术上就是西汉末期的今古文之争。

所谓今文,乃指汉人所使用的隶书;所谓古文,乃指先秦所

①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253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596 页。

使用的文字,主要指篆书。今文经是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博士置弟子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充之秘府时确定的官方《五经》之系统。汉初至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本来没有什么今古文之分,因为当时的官方《五经》都是用今文即隶书写成的,直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sup>①</sup>。而这里所谓的二十九篇,是指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sup>②</sup>由此可证,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应该就是伏生所找不到的数十篇中的一部分,而伏生所教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亦有之。《汉书·儒林传》又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sup>③</sup>,可证这些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当时的今文《尚书》中已找不到或保留得极少。虽然古文《尚书》没有立于学官,孔安国仍在传授古文《尚书》,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与今文经之间的剧烈矛盾与论争。

随着《五经》内部学术的分化,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谷梁春秋》等于宣帝时被立于学官,人们

---

①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6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3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7页。

一方面在接受已分化的儒学,另一方面又力图从古文经中寻找资源而主张恢复古制。所以当宣帝向韦贤(治《鲁诗》及《礼》)及夏侯胜(治今文《尚书》)了解《谷梁春秋》时,他们指出,“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他们所说的鲁学与齐学是从源头上而言的。如前所述,至宣帝欲兴《谷梁》时,官方的齐学学说与鲁学学说已相互融合,他们在此特意提出鲁学与齐学,主要是认为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有不完备之处。而后来把《谷梁春秋》立于学官则为学者欲立《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理下了伏笔。特别是刘向、刘歆父子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以后,为少数儒者研究古文经并与今文经进行对照、比较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sup>①</sup>

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刘歆在校秘书时,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而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里所说的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

丞相史尹咸是治《谷梁春秋》并以《谷梁》议郎的身份参加石渠阁会议的尹更始的儿子,尹更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sup>①</sup>。所以刘歆既了解当时流传的《左氏传》之内容,又亲见古文《春秋左氏传》。由于《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当时的学者只是传训其旨趣而已,而刘歆则以传来解经,达到了章句义理兼备的效果。刘歆认为《左氏》优于《公羊》、《谷梁》的原因在于,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亲见夫子,其好恶与圣人同,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他们的学说只是传闻而非亲见之。刘歆多次以《左氏》说向刘向问难,刘向亦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刘向仍坚持其《谷梁》之义。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sup>②</sup>。《毛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sup>③</sup>。《毛诗》之所以未立于学官,恐怕是因为河间献王好之而引起武帝的反感;《逸礼》乃指《汉书·艺文志》所说的《礼古经》比《士礼》十七篇多出的那部分:“《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sup>④</sup>;古文《尚书》则是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之古文《尚书》。哀帝(公元前6~前1年在位)时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古文经之义,这些博士们不对此问题予以回应,刘歆因此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8页。

②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

③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8页。

④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

而写了一篇责让他们的文章,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著名的《移书让太常博士》。在此文中,刘歆首先对汉之前文化发展脉络进行了回顾: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筵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sup>①</sup>

在刘歆看来,夏、商及西周这段时间,世间仍有大道流行,至孔子时已经礼崩乐坏。孔子担心大道之浸微,乃正订《六经》以纪帝王之道。而至孔子及七十二贤弟子去世之后,天下已偏离大道。之后又逢战国混战,人们舍弃孔子所设之礼,而更之以行军布阵。孔子之礼乐教化受到贬抑,而孙武、孙臆、吴起之兵法谋术兴起。特别是到了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又设挟书之令,道术因之而遭灭绝。这是汉兴之前的道术发展状况。刘歆接下来讲汉兴之后的《六经》之存在状况: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8页。

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公元前140～前135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秦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sup>①</sup>

汉朝初建之时，由于秦时的焚书坑儒之举及颁布挟书之令，《诗》、《书》遭禁，孔子之道已绝，人们已不知道古代的礼仪法度，当时只有叔孙通略定汉家礼仪。对《五经》来说，只有《易》卜，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挟书之令，但当时公卿大臣如周勃、灌婴等都是武将出身，不以文学之事为意。至孝文帝时，才令晁错从伏生受《尚书》。这就是西汉流传的今文《尚书》。此书已经不全，然后时师进行传读。在刘歆看来，今文《尚书》不是一个全本。《诗》在汉文帝时刚刚开始萌芽，此指治《鲁诗》的申公为文帝时博士，开始公开教授《鲁诗》。当时众书颇出，都是诸子之书及传说，但文帝都将这些立于学官，并置立博士。这时的博士称为诸子传记博士。前文已述，由于“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sup>②</sup>。当时朝中只有贾谊是一位儒者，但因“绌、灌、东阳侯、冯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8-1969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2页。

敬之属尽害之”<sup>①</sup>，所以没有得到重用且早逝。直到武帝时，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邹、鲁先师当指传《鲁诗》与《谷梁春秋》之申公、高堂生及韦贤的先人。“其（韦贤）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sup>②</sup>，“自孟至贤五世。贤……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sup>③</sup>。梁之先师当指“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传《韩诗》之韩婴。赵之先师当指董仲舒。这些人大都出于建元之间（公元前140～前135年）。此时已经“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因为各自所得只是各经之片段部分，已经不是全经。就《尚书》来说，《泰誓》篇是后来才得到的，博士们汇集到一块而解读之。如上所述，刘歆在此所说的这一诏书，颁布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而此年也正是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年，即开始“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sup>④</sup>之时。而在此之前立于孝景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的河间献王，已经开始搜集民间善书，“得书多，与汉朝等”，所得之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书，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sup>⑤</sup>。换句话

①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22页。

② [汉]班固：《汉书·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01页。

③ [汉]班固：《汉书·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07页。

④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⑤ [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说,当时即使在独尊儒术后,汉家官方所流传的儒家各经也已经远远不是全经。刘歆接着叙述道: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公元前100~前97年)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①

刘歆在此旨在说明,在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后,当时因为书缺简脱,各经之经文除《易经》之外,其他经典已非全经。而鲁恭王坏孔子宅时在旧宅壁中得到多出今文《尚书》的十六篇之古文《尚书》,多出当时的《士礼》三十九篇之《逸礼》,以及刘向、刘歆父子在成帝时校秘书时发现的多古字古言的《春秋左氏传》。刘歆据此而考证当时流传的今文经学,发现“经或脱简,传或间

---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9-1970页。



编”，已经不是完璧。而在民间传授的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却与古文经相同。我们无从知道这里所说的鲁国桓公是谁，而据《儒林传》可知，这里所说的赵人贯公曾师事贾谊，是《春秋左氏传》的传人：“（贾）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sup>①</sup>而贯长卿又治《毛诗》：“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sup>②</sup>可证贯长卿的父亲贯公及其老师毛公皆为河间献王博士，由此亦可证河间献王当时所搜集之古文旧书与刘歆所校中古文秘书相同；这里所说胶东庸生传古文《尚书》，源于孔安国“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sup>③</sup>。而古文《尚书》、《逸礼》、《春秋左氏传》当时皆未立于学官，当时立于学官的则多是“书缺简脱”之文，刘歆认为这是当时的有识之士感到十分可惜可痛之事。当时的儒家士大夫不想以所得古文经来弥补今文经之阙漏，而是“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这正是今文经章句之学的弊病所在。特别是遇到皇家大的礼仪如辟雍、封禅、巡狩等，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们却不知其渊源所在。在刘歆看来，当时的今文经学家“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0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4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7页。

声是非”，压制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三门学说。据此段文字可见，当时的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丘明不传《春秋》。刘歆继续说道：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sup>①</sup>

此段说明当时哀帝想将此三种古文经立于学官，但又迫于当时今文经之众及已经形成的今文经之学术趣向，他让刘歆与今文经学家进行论议。其结果是，今文经学家们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不肯试立古文经，所以令刘歆感到愤愤不平。刘歆接着又从另一角度提出应立古文经的理由：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970 - 1971 页。

二三君子不取也。<sup>①</sup>

从此段文字可以看出,刘歆欲立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并不是想把今文经全部推翻,而是如宣帝时广开学术门路,与今文经并立于学官,认为这样各家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特别是孔子曾说过“礼失则求之于野”,而当时明明有古文《逸礼》、《尚书》等,有现成的资料不用,而相信据《士礼》而推出的天子之礼。据《汉书·艺文志》可知,“《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脩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sup>②</sup>。由此亦可证,所谓“仓说《礼》数万言,号《后氏曲台记》”及其弟子之大小戴《礼记》乃据《士礼》而推出天子之礼,与《逸礼》当有不小的出入。但当时的大小戴《礼记》已立于学官并根深蒂固,治今文《尚书》者时有高官在位,治《鲁诗》、《齐诗》者又把持要职,治《公羊春秋》及《谷梁春秋》者已盘根于朝,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想让古文经立于学官,因为一旦承认古文经,就是对他们所治的今文经的某种否定,以他们所治今文经为治国依据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所以他们死死把住这一关口,不让古文经立于学官。虽然刘歆之言辞十分真切,而“诸儒皆怨恨”。只有当时的名儒“光禄大夫龚胜(治《鲁诗》,师事薛广德)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时任大司空的师丹(治《齐诗》,师事匡衡)则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幸好哀帝为刘歆圆场:“歆欲广道术,亦何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1页。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

以为非毁哉？”<sup>①</sup>但刘歆因此而构怨于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刘歆欲立古文经之努力因执政大臣及众儒之反对而在哀帝世宣告流产。武帝以后逐渐建立的专制体制，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伞。虽然这些执政大臣及众儒皆以儒者自称，他们并没有真正高扬起孔子礼乐教化之大旗及内圣外王之道，没有担当起他们的使命与责任，或者说，没有尽其天命。正如《汉书》所云：“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sup>②</sup>这是对政治化的儒学之极大的讽刺。

另外，从刘歆的这一段说法可以看出，在梁丘《易》立于学官之前，孟氏《易》已经立于学官。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对古文经的欣赏除反对政治利禄诱惑的因素之外，正如《汉书·儒林传》所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当时的今文经学家据经所衍生出的章句之学已十分反感，且如《汉书·艺文志》所云：“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2页。

②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66页。

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sup>①</sup>章句之学之繁琐失义于此可见一斑。但古文经的出现亦对今文经学家形成了一定压力,后来在王莽的主张下,古文经还是立于学官:“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sup>②</sup>

正如《中庸·哀公问政》节引孔子之语所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仁。”汉儒偏离作为儒家心法的心性之学,徒以解经而获得利禄为务,而不注重个人实践,故“儒教至秦后,其所传已非圣人全旨;如(《大学》所云)止至善用极,及格致诚正诸义,均无实行之功;学者仅为文字解说,故其所成先失其本,而病弊百出;世常以为诟病,此传之者之过也。”<sup>③</sup>再加上当时的专制体制,儒者成为政治的附庸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至西汉末,人们对繁琐的章句之学已甚为反感,从而青睐训古举大义或以传解经的古文经学家的解经方式已是大势所趋。东汉时期虽然古文经没有立于学官,但学者十分重视古文经学家之

①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3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0-3621页。

③ (题)列圣齐注:《大学证释》。台北:若意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60页。

学风。就《易经》来讲，因费氏《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sup>①</sup>。费氏《易》的这一诠释理路正好与刘歆等古文经学家以传解经的路子相同。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费氏《易》的释《易》理路会受到东汉中期以后马融、郑玄等的青睐了。另外，从下文对孟、焦、京易学的分析可知，孟、焦、京易学发挥作用主要是在推演灾异方面，而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解经。所以尽管有施、孟、梁丘之章句，施雠、梁丘贺两支易学有可能如其他经典一样沿着解经的路子发展，而孟、焦、京易学则在推演灾异方面逐步完善。所以，从西汉末至东汉中期，习孟、京易学特别是习京氏《易》者还是大有人在。因此，从整体上来讲，今、古文经学之间的矛盾在《易经》这里并不像《尚书》、《礼》、《春秋》等经那样反应得如此剧烈。

---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2页。

## 第二章 西汉易学源流

西汉易学在中国易学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先秦易学,下启魏晋南北朝易学。特别是至孟喜、焦贛、京房而完备的以“卦气”说为主线的象数易学,开启了整个象数易学发展的大门,对中国传统的中医学、天文、历法、乐律、丹道等理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上文已对西汉经学之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结合新出土的易学资料,我们在此对西汉易学发展源流进行梳理,以期更为全面地了解孟、焦、京易学在西汉易学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几支易学体系之关系。

### 第一节 《史记》、《汉书》所载 西汉易学源流

《史记》是现存最早的系统介绍中国古史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前的史书如《竹书纪年》、《左传》、《国语》等都没有对《周易》的制作与传承谱系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记载,直至《史记·儒林列传》才对孔子晚而喜《易》并为《周易》作传以及孔子以后的易学传承谱系有了一个粗略的介绍。《汉书》继而承其绪,并对《史记》所载之后至西汉末《易经》的传承作了更为

详尽的描述。《汉书》所载乃是易学在西汉一代传承的主线,主要记载于其《儒林传》与《艺文志》中,但《汉书》中有关《易》与易学人物的记载亦有不在此谱系中者。为了更好地把握西汉易学的整个发展脉络,我们在此首先对《史记·儒林列传》、《汉书》中《儒林传》及《艺文志》所述易学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对《汉书》其他篇章所涉及的易学流派与人物进行解析,并对与西汉易学相关的帛书《周易》进行相关探讨。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sup>①</sup>。“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sup>②</sup>。这就是秦始皇时颁布的著名的“挟书令”。因为《周易》是卜筮之书,所以才逃过了这把秦火。因此,《汉书·艺文志》才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据《汉书》的这一记载可知,田何是建汉之初《周易》的主要传人。现在我们据《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中《艺文志》、《儒林传》的相关记载,对《周易》在西汉的传播之源流进行梳理。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公元

①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6页。



前134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而《汉书·儒林传》的相关记载是:“自商瞿子木受《易》孔子……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对同一件事情记载而有如此不同,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有猜测,而笔者通观整个西汉易学的发展脉络以后认为,《史记》所记乃是为了突出杨何一支易学的传承谱系,所以从田何至杨何只是以每代单传的形式进行记载,而《汉书》所强调的乃是从田何易学生发出的多条支脉,而又着重记载了一下杨何一派易学的传承,这一部分显然是抄自《史记》。《史记》之所以如此记载,除了刘大钧先生所说“《史记》所云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提供”以外<sup>①</sup>,估计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丁宽一支的《易》学传人尚未发展壮大起来,所以《史记》才着重强调“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从而也将田何的其他两个弟子周王孙与服生未载入其书。即便是杨何的学生——后为太中大夫的京房(此京房为梁丘贺一开始的授《易》之师),后出为齐郡太守,亦因其在昭、宣之时才任以上职务,也没有被《史记》列入杨何授《易》之谱系。估计直到班固写《汉书》时,整个易学在西汉的发展脉络才更为清晰可观,且后来丁宽一支易学的发展

<sup>①</sup> 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更为壮大,所以,班固在写《汉书》时才将《史记》的这句话向前推为“要言《易》者本于田何”。但《史记》如此记载不一定意味着汉初所有的《易经》传人皆为杨何一系,因为从上下文来看,《史记》此段记载所提到的齐即墨成、广川孟但、鲁周霸<sup>①</sup>、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等<sup>②</sup>,不一定全是师承杨何一派之易学。同样,虽然《汉书》说“要言《易》者本于田何”,但从《汉书》的其他相关章节之记载来看,汉初传《易》者并非皆本于田何。如汉初的陆贾在其向刘邦所进的《新语》中,既引有卦爻辞的内容,且其论说深受《系辞传》的影响。据《汉书·陆贾传》可知,陆贾“以

---

① 据《汉书·儒林传》可知,周霸亦治《尚书》,又师从申公治《鲁诗》,为《鲁诗》博士,后为胶西内史,并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参与武帝封禅泰山的准备工作,因不合武帝意而被罢黜。(请参见《汉书·郊祀志》)可证周霸并不是专门的治《易》者。如果他受《易》于杨何,则有可能于杨何为《易经》博士乃至被征为太中大夫之后,但《汉书》没有明确记载周霸与杨何受《易》谱系之关系。

② 据《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终王贾传》可知,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他一开始游于齐诸子之间,因遭到诸儒生的排挤而不见容于齐,后来才北游燕、赵、中山,直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才西入关见卫将军即卫青。这时杨何刚被征或即将被征为《易经》博士。由于当时还没有设博士弟子,所以主父偃这时向杨何学《易》的可能性不大。而又过了数年,主父偃才得到武帝的赏识,“迁谒者、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并于元朔(公元前128~前123年)中被拜为齐相。而据《史记·儒林列传》可知,杨何于元光(公元前134~前129年)元年被征为太中大夫。如果主父偃在受武帝重用之前学《易》,由于他不见容于齐之诸子,他向杨何直接学《易》的可能性就不大。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如果主父偃向杨何学《易》,唯一的可能是在他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之时,而这时杨何为太中大夫。据《史记》、《汉书》所载可知,主父偃被重用后十分猖狂,睚眦必报,且与杨何同为大夫,所以他被重用之后亦不可能再屈身向杨何学《易》。

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与田何是同时代的人，甚至有可能比田何年长，又一直在刘邦左右，所以他直接从田何处受《易》的可能性不大。而他在《新语》中引有与《周易》经传相关的内容，说明他所学之《易》有可能与田何所传之《易》皆祖于《史记》所说的这一《易》学传承谱系，但陆贾直接从田何受《易》的可能性极小，说明汉初亦有其他人在传授《周易》之内容，只是这些授《易》之师不一定是专门的授《易》之人。钱穆先生据《汉书·儒林传》“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和《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诸语推断，汉初治《易》者特多，以“书易得，文易习”也。<sup>①</sup>因此，泛泛来讲，汉初传《易》、授《易》者恐怕并非只有田何一人，只是至班固写《汉书》时，从整个西汉易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本源于田何的易学十分兴旺发达，而其他支易学之传承或者断流，或者至后来隐而不彰，所以《汉书》才以这句话来概括西汉易学之源头。即使如此，《汉书·儒林传》也只是主要记载了田何弟子中王同、丁宽两支易学之发展谱系，而对田何其他两位门人周王孙、服生之易学流传则没有记载。丁宽既然后来又从周王孙受古义，说明周王孙在以《易》授人，《汉书·艺文志》载有《易经》“《蔡公》二篇”，注曰“卫人，事周王孙”，亦可证明这一点。服生也极有可能以《易》授人。但《汉书》没有对这两人后面的《易经》传人进行记载，应该是因为这两支易学传人后来没有以《易》至大官或以《易》显名者，所以后来其传人才销声匿迹。

据《汉书·艺文志》可知，田何的这几个门人皆有著作问

① 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3页。

世。王同著《易传王氏》二篇；周王孙著《易传周氏》二篇；丁宽著《易传丁氏》八篇。从以上《易》注可知，王同、周王孙之《易传》皆应以《周易》古经之上、下篇为框架，而且他们对《易经》的解释只有二篇，应该不会有过多的阐发，但既然他们各自成作，其对《易经》的解释应该已经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的差别。只有丁宽之作《丁氏》为八篇，比其他几位对《易经》的解释应该长出许多。《汉书·儒林传》说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可能就是这八篇。说明丁宽已对《易经》的解释进行了较大的扩充，并初步从传记之学转入章句之学。

现在我们首先根据《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中《艺文志》、《儒林传》的相关记载来梳理一下西汉易学源流。

(1)王同、杨何一支易学在西汉之传承谱系。田何授《易》王同，王同授杨何。杨何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被征为太中大夫。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从《汉书·儒林传》所说武帝初立《五经》博士时《易经》唯有杨（何）可知，杨何当为立《五经》博士之后的第一个《易经》博士。《汉书·司马迁传》有云：“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于黄子”，可知司马谈是杨何的弟子，司马迁对《易经》的理解一定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引《易》文“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等文不见于今本《易传》可知，他有可能同时受其他易学流派的影响。又据《汉书·儒林传》说梁丘贺“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可知此京房亦是杨何的弟子，而梁丘贺又是此京房的弟子。后来，此京房擢升为齐郡太守，梁丘贺便更事丁宽弟子田王孙。至梁丘贺乃出现王同一支易学与丁宽一支易学相交叉的现象，虽然二支

同源于田何之《易》，但至此二支之间又有一些差异。“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sup>①</sup>。梁丘贺后来虽然从田王孙受《易》，但其后产生影响的乃是其师京房之《易》，因为尽管他的儿子梁丘临师从过其同门师兄施雠，但梁丘临“专行京房法”，“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sup>②</sup>。梁丘临初为黄门郎，后替代梁丘贺的弟子五鹿充宗为少府。梁丘临又授《易》王骏。王骏后为御史大夫。五鹿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sup>③</sup>。就杨何一支易学的发展来说，杨何曾著《易传杨氏》二篇，如前所述，此时对《易经》的诠释当十分简约，只有二篇。从梁丘贺的儿子“专行京房法”来看，此京房之易学与其师杨何所传不一定完全相同，且被梁丘贺父子所继承。所以，尽管梁丘贺父子后来亦师从田王孙施雠师徒受《易》，但梁丘贺父子之易学仍以此京房之易学为主干。由《汉书·艺文志》所说“《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可知，梁丘贺曾对《易经》作过注解。据颜师古之注，此处“十二篇”指“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艺文志》又说“《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由此可知，至梁丘贺时，《周易》章句之学已经流行。这是重师法家法之时。宣帝末，梁丘《易》立于学官。到西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0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1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1 页。

汉末时,“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sup>①</sup>。以上是王同、杨何一支易学在西汉的传承谱系。

(2) 丁宽易学在西汉传承之谱系。丁宽一开始并不是专门去田何处学《易》。有位项生从田何受《易》,当时丁宽是项生的从者。丁宽“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sup>②</sup>。从此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一是丁宽有很高的学《易》之天分,所以受到田何的赏识;二是既然田何对其门人说“《易》以东矣”,可证田何当时是在徙杜陵后授《易》于丁宽的,又可证明田何的门人除《汉书·儒林传》所载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以外,尚有不少其他门人;三是既然“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可知当时丁宽的同门师兄周王孙已返回故里洛阳,相应地说明丁宽是田何招收的年龄比较小的弟子。至于这里所说的“古义”,刘大钧先生有详细的考证。<sup>③</sup> 读者可参阅之。《儒林传》又说:“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据《汉书·景帝纪》可知,吴楚等“七国之乱”发生于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当时七国之兵“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将军以距吴、楚”<sup>④</sup>,可证当时丁宽亦在韩安国、张羽之列,但没有韩安国、张

---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1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7页。

③ 刘大钧:《周易古义考》,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④ [汉]班固:《汉书·文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08页。

羽等有名,亦说明丁宽为文武双全之人。比较奇怪的是,据《史记》、《汉书》可知,像丁宽这样的才分极高之人,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丁宽本人及其门人在武帝一朝并没有成为《易经》博士或以《易》至大官者,《史记》干脆提都没提过丁宽。估计原因如下,作为景帝少弟的梁孝王在距吴楚后居功自傲,在制度方面僭越皇帝之制,且“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sup>①</sup>,后又争立太子,引起景帝的怨恨,且通过负斧质请罪才免于一死,最后在郁闷中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死去。梁孝王死后,他所招延的四方豪杰各自归去,如作为孝王宾客的枚乘在梁孝王薨后即返回老家淮阴。<sup>②</sup> 丁宽本来就是梁人,梁孝王薨后估计丁宽即归教于家。从武帝对河间献王及淮南王的压制可知,曾作为梁孝王将军且在治《易》方面有过人之才的丁宽一支易学受到武帝一朝的极力压制就在情理之中了。丁宽“授同郡碭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sup>③</sup>。据《儒林传》可知,施雠为沛人。沛与碭相近,施雠为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前文已证,田王孙当为昭、宣二帝时的《易经》博士,说明田王孙在做博士之前居家授业已经很久。田王孙为博士之后应该没有被提升为其他官职,而是以博士的身份

① [汉]班固:《汉书·文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08页。

② [汉]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5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8页。

终生授业,因为做博士以后如被进一步擢升之人,《汉书·儒林传》皆有说明,甚至单独为他们立传。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梁丘贺易学亦属于王同、杨何一支之易学体系。至梁丘贺时,王同、杨何一支易学体系与丁宽一支易学体系发生了交叉。前文已述,梁丘贺一开始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而此京房乃是杨何的弟子。后来此京房出为齐郡太守,梁丘贺便更事田王孙为师。

孟喜的父亲孟卿以治《礼》、《公羊春秋》著称。“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sup>①</sup>。在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中,施雠既然从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那么他应该是三人中受《易》最早、学《易》时间最长者,而且是了解丁宽、田王孙一系易学内容最多者。虽然孟喜有“好自称誉”的毛病,但从“博士缺,众人荐喜”来看,孟喜治《易》之名声则应该远在施雠之上。关于施、孟、梁丘三人关系之公案,我们将在“孟喜生平评述部分”详论,此不赘述。

施雠“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后来梁丘贺以筮有应而近幸并升为少府后,由于事务太多,便遣送他的儿子梁丘临及门人张禹等从施雠问《易》。“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sup>②</sup>。在梁丘贺的极力推荐下,施雠在宣帝时被拜为博士,并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与诸儒杂论《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博士缺时,虽然众人推荐孟喜,但因为宣帝听说孟喜改师法,所以没有擢用孟喜为博士。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8页。



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sup>①</sup>。就学术发展来说，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此当为《易》章句之学之雏形。《汉书·艺文志》称有《易传丁氏》八篇，估计即指此三万言之《易说》。《艺文志》又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说明至迟到施、孟、梁丘之时代已将《周易》经、传皆称为《经》。另外还有“《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说明《易》章句之学其时已经成熟。从《艺文志》来看，田王孙当时没有著作留于世，梁丘贺的学生五鹿充宗有《略说》三篇。施、孟、梁丘易学产生时期正是西汉经学急剧分化之时。至宣帝末时，施、孟、梁丘《易》皆已立于学官。施雠授张禹、鲁伯。“伯为会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崇为九卿，宣大司空……繇是施家有张、彭之学”<sup>②</sup>；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sup>③</sup>。同时，宣帝时的“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后见韩氏《易》而好之，从而改学韩氏《易》。<sup>④</sup>

焦延寿、京房之易学体系亦与孟喜易学有些许联系。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8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8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④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4页。

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sup>①</sup>。既然焦延寿说尝从孟喜问《易》，京房亦以为延寿《易》即孟氏说，笔者在此姑且把焦延寿、京房一支易学体系归入丁宽一支易学系统。笔者将在后文考证，其实焦延寿、京房易学系统并非完全属于孟喜易学系统，而是自有其来源，但焦氏《易》与孟喜“《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确有相通之处。京氏《易》于元帝世立于学官。从学术发展来看，《汉书·艺文志》所载《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皆属于焦延寿、京房一支易学系统。“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sup>②</sup>。

高相一支易学亦自称出于将军丁宽之易学。“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繇是《易》有高氏学”<sup>③</sup>。虽然当时灾异说早已得到官方的认可，但《高氏易》最终没有立于学官。

以上是丁宽一支易学在西汉时期之传承谱系。

(3) 韩婴易学在西汉之传承谱系。韩婴为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sup>④</sup>。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韩诗》与《齐诗》、《鲁诗》有较大差异，但三者之要归则是一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1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2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2 页。

④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13 页。

致的。“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此段记载说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韩婴既然是文帝时博士，且“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sup>①</sup>，可知韩婴当时是比较知名的人士，而《儒林传》没有把他这一支易学归属于田何一支，说明韩婴这一支易学非田何易学之系统。韩婴既然推《易》意而为之传，说明韩氏《易》应是汉代《易》学中无师传而自“推”其义以成其说者，而田何一系之学，乃有师承渊源者；一是既然韩婴推《易》意而为之传，说明韩婴已对《周易》之义作了较大的发挥。韩婴曾著《易传韩氏》二篇，可证《韩氏易传》乃以《周易》古经之上、下二篇为框架；一是因为燕赵间好《诗》，所以韩氏《易》便显得隐而不彰，但韩婴仍自传之。“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说明其后代除传《韩诗》以外，仍在传韩氏《易》。宣帝时的“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sup>②</sup>。但宣帝末复立施、孟、梁丘《易》于学官时，没有立韩氏《易》于学官，韩氏《易》后来就越来越衰微了。

现已没有单独的韩氏《易》传本流传于世，而“《韩诗外传》全书，引《易》者凡七见，有引卦辞者，有引爻辞者，有引《系辞》者”<sup>③</sup>。《汉书》亦曾引过《韩氏易传》中的一段话：“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13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14 页。

③ 蒙传铭：《周易成书年代考》。载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79 页。

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sup>①</sup>实际上,正是宣帝信任中尚书宦官才导致了贤才受阻及元帝时的衰落,可以说,盖宽饶正好指出了宣帝一朝政治的症结所在。但在“家天下”的专制社会,这种“公天下”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徐复观先生据此段引文指出,“由此可知《韩氏易传》之深,乃在于《易传》中发挥了战国末期盛行于儒家中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其《易传》所以传习者少的真正原因在此”<sup>②</sup>。

《韩诗外传》中有一段与《易》相关的引文与汉初其他易学流派有关,我们在此转引之。《韩诗外传》卷三“周公践天子之位”章有云:

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险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以衣成必缺衽,官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

《韩氏易传》卷八“孔子曰《易》先《同人》”章亦有类似此段之引

---

① [汉]班固:《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7页。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文。这说明韩婴对谦德之重视,并符合儒家宪章文武的品性。而帛书《易传》《繆和》篇有类似之解释,其文稍异:“子曰:‘天道毁盈而益谦(谦),地道销[盈而]流谦(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亚(恶)盈而好谦(谦)。谦(谦)者,一物而四益者也;盈者,一物而四损者也。故圣君以为丰者,是以盛盈使祭服忽,屋成加葺,宫成初(缺)隅。谦(谦)之为道也,君子贵之。故曰:‘谦(谦),亨,君[子有冬(终)]。盛盈[而能谦(谦)]下,非君子元(其)孰当之?’”(第3050页)<sup>①</sup>另外,刘向《说苑·敬慎》亦有与上文《韩诗外传》所引几乎一样的文字。三者都是对《谦》卦卦辞的发挥。这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可以进一步证明《彖传》在先秦时期既已存在;二是“衣成必缺衽,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拙”已成为先秦至西汉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对《谦》卦进行发挥的内容,而这一段解释却不见于今本《易传》,可证今本《易传》与以上说法应不属于同一个版本;三是刘向所引有可能来自《韩诗外传》或先秦的其他版本,因为刘向写《说苑》是在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诏校中《五经》秘书之后。<sup>②</sup>另外,本于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之《汉书·艺文志》在评论道家源流时亦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显然亦受这些版本《易传》之影响。

#### (4) 淮南九师之易学在西汉时期之传承。《汉书·艺文志》

① 本书所引帛书《周易》经传之文除特别注明者外,皆引自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载杨世文等编:《易经集成》(第三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50页。

在介绍《易经》书籍部分说有《淮南道训》二篇，班固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法）[说]”。现在我们已无法见到系统的“淮南九师说”，但据《淮南子》中的相关记载，我们仍可以看出“淮南九师说”的部分端倪。据蒙传铭先生统计，“《淮南子》全书，言《易卦》者凡二见”，“又《淮南子》全书，引《易》者凡十二见，有引卦辞者，有引爻辞者，有引《序卦》者”<sup>①</sup>。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是《淮南子·人间训》引《易卦》的一段话：“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帛书《易传》《要》篇亦有类似的说法：“孔子读《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其冬（终）也凶；损之始也凶，其冬（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喜，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虽然二者所说道理一致，但帛书《要》篇说得更为详细，并且以冬夏之变化来说明损益吉凶相互转变的道理。特别是二者都说损益之道乃王（或君）者之事。看起来《淮南子》这一段有可能受帛书《易传》的影响或先秦其他古本《易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① 蒙传铭：《周易成书年代考》。载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刘向《说苑·敬慎》亦有类似之引文，其文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决，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虚以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于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弑，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sup>①</sup>孔子在这里借损益两卦而讲盈虚之道，而这里所说孔子借天道以明损益则与帛书《要》篇所论旨意相同。由此可见，孔子应十分重视并不止一次地强调损益盈虚之道，而《淮南子》所引与刘向所引皆可在帛书《要》篇找到联系点。刘向校中《五经》秘书时一定见到过许多讲《易》论《易》之版本。刘向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时曾治淮南狱，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他得到《淮南子》一书的可能性就更大，或者刘向有可能亲眼见到过“淮南九师训”。刘向、刘歆之易学中因此有可能保留有部分“淮南九师说”。在后文探讨帛书《易传》时，笔者将说明，刘向亦极有可能见到过帛书《易传》之版本，甚至是以先秦古文写成的帛书《易传》版本。而“淮南九师”之说是否皆与田何所授《周易》系统直接相关，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难以对此问题进行论证了。淮南王刘安以

① [汉]刘向撰，赵善治疏证：《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273页。

谋反罪被诛之后，“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sup>①</sup>。“淮南九师”也一定脱不了这一干系，“淮南九师说”在武帝一朝不但不会受到重视，而且一定是被压制的学说，且有可能被充入朝廷秘府，伏而未遇再发之机会。

(5) 费直易学在西汉之传承谱系。据《儒林传》载，“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sup>②</sup>。费直治《易》与高相同时即王莽或王莽稍前之时。在西汉末期“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sup>③</sup>、“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下，随着今文经学之极盛而衰及古文经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崇尚费氏易亦是时势使然。刘向校书时，“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sup>④</sup>。尽管西汉末期刘歆等极力推崇古文经，而费氏《易》真正兴起则是在东汉中期之后。

以上是《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中《儒林传》、《艺文志》所载汉代易学源流。

除《汉书》中《儒林传》与《艺文志》所载易学传承谱系之外，《汉书》还涉及不少未明确说明是否在这些传承谱系之内的人

① [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52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2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20 页。

④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04 页。



物,我们在此对这些易学体系之传承进行蠡测并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探讨。

(6)魏相易学。据《汉书·魏相丙吉传》载:“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相明《易经》,有师法……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sup>①</sup>。《汉书·儒林传》与《汉书·艺文志》皆未谈及魏相,既然他有师法,但我们无从知道他师事何人。但可以明确的是,其师承不属于丁宽、田王孙一支之易学谱系,亦不属于王同、杨何一支之易学谱系。因为如果属于以上两支中的一支,像魏相这样后来至宣帝丞相的大官,《儒林传》必书之。从魏相向宣帝所上奏的内容与“卦气说”有关来看,魏相之易学体系与孟、焦、京之《易》阴阳系统相近,其说或得之于像焦延寿易学似的隐士之说,或受丁宽所传“古义”之说之影响。魏相易学是否有传人,我们无从得知,但他的这些理念出现之后,更为精密的孟、焦、京象数易学很快便展现于世人面前。关于魏相的生平及其《易阴阳》的相关内容,我们将在“孟喜易学研究”部分详论,此不赘述。

(7)刘向、刘歆易学。刘向、刘歆父子是楚元王的后代。据钱穆先生推证,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sup>②</sup>,比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年长两岁。刘向治《谷梁春秋》,属于今文经学家;刘歆则治《左氏春秋》,是欲立古文经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而据《汉书》本传记载,“歆及向始皆治《易》,宣

①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3、3137、3139页。

②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页。

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据《汉书·儒林传》可知,刘向于元康(公元前65~前62年)中始受《谷梁春秋》,可证在此之前刘向、刘歆父子皆治过《易》。但《汉书·儒林传》与《汉书·艺文志》都没有说明其具体的师承关系。脱胎于刘歆《七略》的《汉书·艺文志》及基于其《三统历谱》的《汉书·律历志》处处显示出其易学之痕迹,而《汉书·五行志》则把刘向、刘歆父子对灾异的解释作为重要条目。笔者揣测,因为刘向的父亲刘德为汉家“宗正”之官,刘向、刘歆父子一开始所学之《易》极有可能为以田何今文《易》为源头的官方博士系统之《易》。据《汉书·儒林传》,田王孙为博士之后,仍然教授从民间来的他原来的弟子施雠,说明当时的博士所传授的对象除博士弟子之外,亦包括其他有志于学的人。《汉书》所载刘向征引的大部分《易》文见于今本《周易》,但他所引的有些《易》文则不见于今本《周易》,如刘向所引《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此文不见于今本《易传》,所引“《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与今本《乾·象》相仿而不相同,说明刘向所见到的《周易》文本应该很多,特别是他于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诏领校中秘书之后,更有机会见到《周易》的更多版本。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听从公孙弘的建议置博士弟子员以后,官方博士所传《五经》一定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教材,今本《易传》有可能是沿着这一官方文本一直流传下来。由刘向、司马迁、东方朔所引《易传》传文与今本有不同之处可知,当时虽然官方已有相对固定的《易传》传本,但仍允许其他的《易传》版本在社会上流传。如上所述,刘向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时曾治淮南狱,并得淮南《枕中鸿宝苑秘书》,那么刘德得到《淮南道训》即“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

说”之内容并以之示于刘向的可能性也很大。笔者在下文帛书《周易》部分还将论证,刘向、刘歆在校中古文秘书时有可能见到过帛书《周易》或与帛书《周易》相类的版本。而《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向推灾异亦有以“卦气说”进行解释者,说明刘向对“卦气说”已十分明了,并对《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之说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刘向、刘歆父子至少学习或研究过京氏之说。我们将在下文孟、京卦气部分对此进行探讨。简而言之,刘向、刘歆易学是一个包容多家学说的综合性的易学体系,对他们建构《七略》、刘歆作《三统历谱》、刘向据《谷梁春秋》刘歆据《左氏春秋》推言灾异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深刻影响了西汉末期整个学术的发展。“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他的三个儿子都应该学过《易》,只是他的长子刘伋专门以《易》教授。

除此之外,《汉书》还记载了一些与《易》相关的人物,我们在此简要介绍如下: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以孝景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立”。广川惠王的孙子刘去在武帝末时被封为广川王。该传说刘去从师受《易》,但我们无从知道其师承关系。其师数次谏正他,刘去不但不听,还于壮大以后把他的《易》师驱逐而去,后来又让家奴把他的《易经》老师父子两人杀死。由此看来,广川王刘去的《易经》老师可能出于民间,而不是地位显赫的博士。果如此,则说明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仍有不少人在民间传授《易经》。

元帝时有位叫朱云的清高之士,他“少时通轻侠……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

皆能传其业。……元帝时，琅邪贡禹为御史大夫<sup>①</sup>……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斋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为博士”<sup>②</sup>。我们无从知道朱云的具体师承关系，这里提到他“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因为《汉书》在其他地方没有再提到过白子友。白子友为《易经》博士，他是不是孟喜的弟子白光少子呢？我们无法确定。果如此，他就应该是孟氏《易》的传人。从此段记载来看，朱云的易学功底与口才都比较好，以至于让以治梁丘《易》而为少府的五鹿充宗连连语塞。五鹿充宗亦因与京房同治《易经》而与宦官石显共同陷害过京房。成帝时，朱云因触犯成帝的师傅丞相张禹而差点掉脑袋，他“自是以后不复仕”，“其教授，择诸生，然后为弟子。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传云学，皆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sup>③</sup>。

宣、元时期的大将军冯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长女媛以选充后宫，为元帝昭仪”。冯奉世的三子冯遂“通《易》，太常

---

① 贡禹为御史大夫是在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而萧望之被拜为将军在宣帝末年（公元前49年），可证朱云受《易》当在宣帝末年之前。

② [汉]班固：《汉书·杨胡朱梅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12—2914页。

③ [汉]班固：《汉书·杨胡朱梅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16页。

察孝廉为郎,补谒者”<sup>①</sup>。我们亦无从知道其《易》之师承关系,有可能是从当时的《易经》博士受业。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成、哀之际官至大司空的何武,少时亦治《易》。《汉书》有这样一段记载:“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娄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哉!’以褒为待诏,武等赐帛罢。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sup>②</sup>据《汉书》中《宣帝纪》、《郊祀志》、《刘向传》可知,宣帝“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后文将有论证,施雠被拜为《易经》博士亦有可能在此时前后。由此可推断,何武诣博士受业治《易》时,施雠可能刚刚或稍后被拜为《易经》博士,而施雠被拜为博士之前,他的老师田王孙曾为《易经》博士,那么,何武所治之《易》应该为田王孙、施雠一支之易学系统。但《艺文志》与《儒林传》皆没有把何武列入传《易》之谱系,说明何武或者是治《易》时间较短而不足以列入,或是因为当时诣博士受业者颇多,而何武没有被看作门弟子之列。

从上文所述可知,西汉时期有不同流派的《易经》经师或在太学或在民间在传承《易经》。就官方易学系统来说,以田何易学系统为源头,后来分化出王同、杨何一支及丁宽、田王孙一支

① [汉]班固:《汉书·冯奉世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01、3305页。

② [汉]班固:《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81页。

之易学,宣帝时杨何一支的传人梁丘贺又与丁宽、田王孙一支交叉,学术进一步分化。至宣帝末时,施、孟、梁丘《易》皆立于学官。而孟喜、焦延寿、京房之《易》阴阳系统亦渐至发展壮大,以至于京氏《易》亦于元帝时被立于学官。而民间则有高相易学与费直易学在流传。

除此之外,《汉书》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初,天子(武帝)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sup>①</sup>说明武帝时官方亦在用与《易》相关的卜筮类的书进行占筮。阜阳汉简《周易》的出土及《汉书》所记其他小人物进行占卜之事则说明民间以《易》进行卜筮亦未曾间断。我们在下文还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 第二节 帛书《周易》及其 在汉代的流传蠡测

马王堆帛书《周易》出土以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已成为易学研究的热点。帛书《周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西汉易学源流提供了前人所不能见到的材料。笔者在此从整个西汉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帛书《周易》的相关学术问题,以期对西汉易学发展之脉络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并进一步研究帛书《周易》与孟、焦、京易学之关系。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

① [汉]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3-2694页。

(1)帛书《周易》诸篇的抄写年代为汉兴之后、惠帝即位之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共分为1、2、3号墓。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三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即第一代轪侯利仓本人。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sup>①</sup>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sup>②</sup>可知,利仓是“长沙相,侯,七百户”,比较可知,“七百户”是比较小的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称轪侯黎朱苍(即利仓)于孝惠“二年(公元前193年)四月庚子封,八年薨”,可证利仓薨于高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该表又有“高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孝侯穉嗣,二十一年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有“(高后)三年,侯穉元年”,利仓的儿子孝侯利穉于公元前185年嗣立,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卒。1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有“妾辛追”骨质印章,1号墓在构建时分别打破2号墓和3号墓的封土,说明该墓墓主下葬年代应该更晚一些。学术界已证明她是利仓的妻子。<sup>③</sup>3号墓墓主遗骸属于30余岁的男性,墓中出土有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份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简报》据此推断,此墓主“显然不是利穉”,而应是利穉的兄弟。后来,傅举有先生“从三号墓的棺制、铭旌(帛画)、遣

① [汉]司马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8页。

② [汉]班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18页。

③ 参见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策所记的美人、才人，遣策所记的谒者，记事木牋中的郎中……”，推定3号墓主即为孝侯利豨本人。《史记》、《汉书》所载利豨薨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有误。实际情况是利豨薨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而其母辛追则薨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此说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同。<sup>①</sup> 其说可从。研究人员还根据3号墓中的帛画、《驻军图》等材料推断，利豨曾作为长沙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中尉，率军参加过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还击南越王赵佗进攻的军事行动，并在长沙与南越边界驻守了很多年。<sup>②</sup>

为了更好地研究帛书《周易》的抄写时代与背景，我们有必要把与帛书《周易》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献一块了解一下。马王堆帛书于1973年出土于3号墓。帛书放在一涂漆木匣中。有写在整幅帛上的和写在半幅帛上的两种。字体有篆、隶之分。3号墓出土的帛书共有28种，计十二余万字，均破损严重。依《汉书·艺文志》分类，六艺类的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的有《老子》甲本（附佚书3篇）、《九主图》、《皇帝书》和《老子》乙本；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3种；数术类有《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录》、《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方术类有《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篇）、《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篇）。另外，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3幅地

① 参见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② 参见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400页。



图。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其中的《阴阳五行》一书由篆书与隶书两种文体写成,说明当时正是由篆书书写向隶书书写过渡之时。由《汉书·艺文志》可知,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sup>①</sup>。虽然秦始皇时期极力要统一文字,但统一文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以至于汉初时的史官等仍会用六种字体书写,所以,“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sup>②</sup>。可证至汉初时人们仍可以用六种字体中的一种书写,隶书替代其他几种字体应当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另外,“据初步推断,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这一批帛书,抄写的时代可能有先后,也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可能抄写的人对汉字发展的态度不一样,因此字体既有小篆,也有隶书,同时还有正在蜕变中的各种过渡形式。整个帛书上的文字代表了这一时期字体的全貌。除了字体之外,另一个特点就是假借字多,简化字多,这些情况进一步表明,在秦统一全国文字后,西汉初年中国文字又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过程中”<sup>③</sup>。至于帛书《周易》的抄写年代,刘大钧先生通过比较今、帛、竹书《周易》后指出:

---

①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0-1721页。

③ 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今本师卦六爻“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开国承家”帛本作“启国承家”，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经文(以下简称“竹书”)作“启邦丞”。今、帛本作“开国”“启国”而竹书作“启邦”，由《象》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可证《象》作者所见《易》本作“邦”而不作“国”。帛本改“邦”为“国”，疑为避汉高祖刘邦之名讳也。据此，帛《易》的抄写年代应在汉高祖之后。<sup>①</sup>

刘先生的这一推断毋庸置疑。另有学者指出：“帛书《周易》的字体与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接近，其中的《易经》屡出‘国’字，无‘邦’字；各篇屡见‘盈’、‘恒’两字，未避西汉惠文两帝名讳，由此可以推帛书《周易》各篇多是刘邦称帝以后、惠帝即位以前的抄本。”<sup>②</sup>又由于从帛书《周易》的抄写情况来看，“帛书《易传》共六篇，依次抄写在两张黄帛上，书手与帛书《易经》为同一人”，“《二三子》与帛书《易经》同写在一张黄帛上，其余五篇则依次抄在另一张上”<sup>③</sup>，“字体为隶书，它们都是一人的笔迹”<sup>④</sup>。因此可以断定，帛书《周易》诸篇为汉兴之后、惠帝即位之前所抄写。

① 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1 页。

② 王葆玟：《帛书〈周易〉所属的文化地域及其与西汉经学一些流派的关系》。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2 页。

③ 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7 页。

④ 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8 页。

(2) 帛书《周易》与今本《周易》在结构上有很大不同。为了从整体上研究西汉乃至先秦易学发展的历史,更清晰地了解孟、焦、京易学产生的背景及其与前期易学之关系,我们在此有必要对帛书《周易》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帛书《周易》经传与今本《周易》经传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帛书《易》经不分上下。六十四卦次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完全不同,以八卦相重的方式成卦,共分八组,每组八卦。属另一系统的卦序”<sup>①</sup>。帛书《易》经是以八经卦为单元进行组合。如首卦为天为乾(䷀),第二卦为天地否(䷋),第三卦为天山遁(䷗),第四卦为天泽履(䷉),第五卦为天水讼(䷅),第六卦为天火同人(䷌),第七卦为天雷无妄(䷘),第八卦为天风姤(䷫)。对这八卦来说,上卦皆为乾(䷀),下卦则依次为天(乾䷀)、地(坤䷁)、山(艮䷳)、泽(兑䷹)、水(坎䷜)、火(离䷄)、雷(震䷲)、风(巽䷸),正与《说卦传》所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案:帛书《衷》篇与此相对应的文字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搏”)的配应方式暗合。而接下来的八个卦则以艮卦(䷳)为上卦,下卦则依次为艮、乾、坤、兑、坎、离、震、巽。再下面的八卦则以坎为上卦,下卦则依次为坎、乾、坤、艮、兑、离、震、巽。不难看出,将帛书六十四卦依次分为八组,则八组上卦分别为乾、艮、坎、震、坤、兑、离、巽,遵循的是四阳卦以乾为首,四阴卦以坤为首的原则,六子之序则按少、中、长之序。这一点与京氏八宫卦序不同,因在京房八宫卦序中,八纯卦中的六子之卦序遵循的是长、中、少的原则。帛书《周易》下卦之卦序则体现的是“天地定

① 陈仁仁:《从楚地出土易类文献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态》,载《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第4页。

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的原则,主要体现的是阴阳之间的对立互补,而京氏八宫卦每宫从一世卦至归魂卦反映的是一种阴阳渐次转换的原则,主要体现的是阴阳之间的流行。至于今本卦序之寓意,除了《序卦传》所陈之义之外,唐代《五经正义》的撰定者孔颖达有言:

案《乾凿度》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而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之主,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sup>①</sup>

孔颖达据《乾凿度》“阳三阴四”说来阐释今本《周易》分为上下经的原则,并据以说明上经首乾坤而终坎离以明天道,下经首咸恒而终既济未济以明人道王道。从下文“孟、京易学与《易纬》”部分可知,《乾凿度》此说是对京房“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之说的进一步发挥。对于今本《周易》毗邻两卦之关系,孔颖达认为它们之间遵循的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原则。

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亦有很大不同,“其《易传》没有发现《彖》、《象》、《文言》、《序卦》、《杂卦》,但有今本《系辞》和

①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分上下二篇》。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今本《说卦》前三章的内容,以及其他几篇不见传世的解《易》著作……(帛书)《传》文有五种六篇”<sup>①</sup>,包括《二三子》、《系辞》、《易之义》(原有篇题为《衷》),《要》四种及《繆和》、《昭力》一种两篇。

今本《系辞》中的易象之“象”字,帛书此篇皆书作“马”字。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估计当与某种避讳有关,而“荆楚民族有象崇拜的习俗以及象牙压胜术”,说明帛书《周易》当是在楚地流传的一个版本。<sup>②</sup> 其说可从。

(3) 帛书《周易》经传所属墓主不可能直接受《易》于田何,但与田何今文《易》系统亦有许多内在相通之处。通过系统研究汉初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帛书《周易》所属马王堆3号墓墓主利豨不可能直接受《易》于田何。如上所述,软侯利仓是建汉后的长沙国丞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sup>③</sup>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可知,利仓以长沙相被封侯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八年薨”,也就是说利仓卒于高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有

① 陈仁仁:《从楚地出土易类文献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态》,载《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第4-5页。

② 参见魏启鹏:《帛书〈易传〉窥管》,载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二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③ [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1页。

学者指出,“利仓上任(长沙国丞相)时应在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左右,距他封侯的时间约三至四年的样子”<sup>①</sup>。至于利仓有何具体功劳而被封为长沙国丞相,《史记》、《汉书》皆无明确记载,但《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有云:“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由此可知,利仓被封侯是因为他是“高祖时遗功臣”。《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也说他是“以长沙相侯”。而其功劳又不是特别大,所以没有被封于高帝之世。如上所述,其被封七万户属于封户较少之侯。而他又被封于惠帝二年,属于惠帝之世封侯较早的一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沙国的情况。刘邦建汉后长沙国的第一个国王是吴芮,关于吴芮,据《汉书》吴芮本传可知,秦时吴芮为番阳令,由于他在江湖间甚得民心,所以人们称他为番君。天下初叛秦时,黥布归附吴芮,吴芮把女儿嫁给黥布,并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当时的沛公刘邦正在攻南阳,正好遇到吴芮的大将梅鋗,并一同进攻析、郾之地,析、郾之地投降。至项羽封王时,因为吴芮曾率百越帮助诸侯并跟随入关,乃立吴芮为衡山王,以邾为国都。由于其大将梅鋗战功多,所以将梅鋗封为列侯,封十万户。项羽死后,汉高祖刘邦以梅鋗有战功并从入关,从而以吴芮为有德,乃徙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由此可知,吴芮是高祖建汉后被封的异姓诸侯王。由于吴芮对汉王朝忠心耿耿,所以没有作为异姓诸侯成为刘邦铲除的对象,故《史记·惠景间侯

---

① 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349页。

者年表》称“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sup>①</sup>，曰：有以也夫！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sup>②</sup>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帝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亦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可见吴芮是以忠出名的汉代异姓诸侯，并一直保全，世代嗣位，直到无嗣而国除。有学者指出，黥布谋反朝廷时，利仓因协助吴芮诱杀黥布而立功。<sup>③</sup>据《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可知，高祖四年（公元前 203 年）九月初置长沙国，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二月乙未，王吴芮始，六月薨”<sup>④</sup>，可证吴芮徙为长沙国国王于高祖五年即公元前 202 年二月。但他于四个月后即当年的六月即去世。他的儿子成王吴臣于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嗣位；汉惠帝二年（公元前 193 年）吴臣的儿子哀王吴回嗣位，可证利仓为长沙国丞相时哀王吴臣为长沙国国王；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 年），吴回的儿子共王吴若嗣位，而马王堆 2 号墓墓主利仓卒于高后二年，而这时 3 号墓墓主利豨还是一个十五六

① 便侯为吴芮的儿子吴浅所封，亦嗣至其玄孙吴千秋，至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千秋坐酎金国除。

② 裴骃《史记集解》引邓展曰：“汉约，非刘氏不王。如芮王，故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

③ 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8—352 页。

④ [汉]班固：《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77—378 页。

岁的少年。可知在利仓去世数年后,利豨被任命为长沙国的中尉。孝文前元二年(公元前 178 年),吴若的儿子靖王吴产嗣位。吴产于孝文后元七年(公元前 157 年)“来朝,薨,无子,国除”,贾谊为长沙太傅正是在吴产为长沙国国王时。由此可知,吴芮及其后代为长沙国国王自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始,至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 157 年)止,最后因无嗣而国除。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 156 年)复置长沙国,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 155 年)为长沙定王刘发(景帝子)之元年。

我们再来看一下田何最初传《易》之情形。《汉书·儒林传》载:“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从上下文可见,田何教授这四个著名的学生应该是在他徙至杜陵之后。据《汉书·儒林传》,丁宽从田何学成后,说丁宽“东归”,田何则说“《易》以东矣”,进一步说明丁宽是在田何徙杜陵后所授之徒。为了防备匈奴及诸侯有变,充实关中,汉高祖刘邦听从刘敬的建议,于高祖九年(公元前 198 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sup>①</sup>,可知田何于此年徙至杜陵。如前所述,利仓于惠帝二年(公元前 193 年)始以长沙国丞相暨高祖遗老的身份封侯,这时马王堆 3 号墓墓主利豨只有十岁左右,不可能至杜陵从田何受《易》。

又据《汉书·高惠后文功臣表》可知,利仓封侯后八年即于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 年)薨。这时利豨十五六岁,正是适合学习的年龄。这时田何仍在杜陵授徒,3 号墓主这时有没有可

---

① [汉]班固:《汉书·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66 页。



能去田何处学《易》呢？从利豨当时的处境来看，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利仓去世后，由河南都尉越接任长沙国丞相一职，而利豨则承袭了其父的封爵，成为第二代软侯。这时的利豨不可能以列侯的身份前往杜陵向田何学《易》。而利豨有可能心中仍怀有在某一天能出任丞相的雄心壮志，“便在某位高人的指点与教诲下，加紧了对社会各个学科的涉猎和攻读”<sup>①</sup>。另从帛书《周易》经传是汉兴之后、惠帝即位（公元前 194 年）之前的抄本来看，因为在惠帝即位时利豨仅是一个六七岁的孩童，而在汉兴之前，在楚汉战争时期利仓恐无暇顾及礼文之事，所以此抄本有可能是利仓赴任长沙国丞相之后令人所抄写。如前所述，田何授徒主要在他于高祖九年（公元前 198 年）迁至杜陵之后，所以帛书《周易》经传之抄本不可能直接来自田何所传《周易》经传之版本。另外，从利豨当时的身份与地位来看，利豨学习这些科目不可能由他本人负笈前往某位老师处去学，而应该是请专门的师傅前来任教。而由帛书《周易》经传有可能是楚地流行的一个版本来看，利豨的《周易》师傅很有可能来自长沙国所在的楚地。

另外，从长沙国所处地理位置与交通状况来看，利豨直接向田何学《易》的可能性亦极小。在汉初人看来，长沙国乃边远卑湿之地，所以即使至孝景前元二年（公元前 155 年）景帝立其子刘发为长沙定王的原因乃是“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sup>②</sup>。所以当年贾谊被谪为长沙王太傅时感到很不得意。“谊为长沙

① 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8 页。

② [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426 页。

傅三年……谊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sup>①</sup>。贾谊为长沙太傅三年后傅梁怀王，“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sup>②</sup>。贾谊为梁王傅以后，“梁王胜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sup>③</sup>。由《汉书·文帝纪》可知，梁怀王薨于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六月，说明贾谊应死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亦即马王堆3号墓墓主利豨入葬之年。由此可证，贾谊为长沙太傅当在公元前173～前170年之间。这是《史记》、《汉书》所载当时从内地去长沙国的最有学问的一位官员。而贾谊作为太傅的主要职责是辅佐长沙王，因此，虽然贾谊颇通诸家之书，他在长沙国对外公开教授门徒的可能性不大。长沙国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蛮荒卑湿之地，又与南越接壤，随时都有与南越发生战争的可能，在当时信息、交通皆不便利的情况下，长沙国的百姓去杜陵田何处学《易》的可能性亦不大，而田何的弟子亦不可能赴长沙国教授，因为除了像到梁孝王、河间献王、淮南王等处的游士欲携自己所学谋得一定的声望或官位以外，当时学有渊源的《易》师极有可能仍保持着“有来学而无往教”的信条。从丁宽从田何处学成后归回老家梁国，丁宽的师兄周王孙学成后亦返归老家洛阳来看，田何的学生学成后有可能多返回故里教授。所以，田何的弟子不可能赴长沙国教授。

---

①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26页。

② [汉]班固：《汉书·文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12页。

③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4页。

而《史记》、《汉书》没有记载田何是否有来自长沙国的学生。从长沙国当时的政治地位、地理环境来看,长沙国在经济与文化上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诸侯国。综合以上因素,3号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经传与田何一派易学不可能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另外,在文帝即位之前的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汉廷与南越的战争已经爆发,利豨曾作为将军在前线作战。南越王臣服后,原驻守在长沙国与南越边界的军队仍在原处驻守了很长时间。<sup>①</sup>这时利豨就更不可能直接向田何学《易》。特别是3号墓出土的帛书有28种之多,计十二余万字,而帛书《周易》经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说明3号墓主爱好广泛,不是专门学《易》之人,这样,他刻意到内地学《易》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此,帛书《周易》极有可能是当时流传于楚地的一个《周易》经传版本,不可能是直接来自田何《易》之传本。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帛书《周易》经传特别是帛书《易传》与田何今文《易》的内在联系。正如刘大钧先生所说,帛书《易传》的相关资料,“对于我们正确解读《彖》、《象》、《文言》等《易传》之文,提供了先儒从未得见的依据和旁证”<sup>②</sup>。因此,帛书《周易》经传仍然是我们研究、厘清汉初田何今文《易》系统的十分珍贵的材料。

(4) 帛书《周易》在西汉的流传蠡测。如前所述,帛书《周易》经传当是当时在楚地流传的一个版本。据廖名春先生初步统计,帛书《易传》诸篇“一共引用了《易经》四十四卦的卦爻辞,

---

① 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400页。

② 刘大钧:《再读帛书〈繆和〉篇》。载《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第10页。

只有需、履、随、临、贲、剥、无妄、颐、坎、离、家人、夬、萃、升、井、革、旅、巽、兑、既济这二十卦不见征引”<sup>①</sup>。通过比较帛书《二三子》所引《易》文是来自帛书《易经》或今本《易经》或其他版本的《易经》，廖名春先生发现，《二三子》有的引文“与今本《史记》、《新序》、《韩诗外传》较为接近，它们可能有相同的来源，与帛本之经显然不同”，而对有的引文来说，“《二三子》所据之本，距帛本、今本远，与《韩诗外传》所据之本同”<sup>②</sup>。说明帛书《易传》所引卦爻辞并非全部来自帛书《易经》，亦说明帛书《周易》经传不是一个十分严密、自成一体的系统，其经传之间以及《易传》诸篇之间皆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与严密的逻辑性。

3号墓墓主利豨去世之后，帛书《周易》经传是否在西汉继续流传呢？就帛书《易经》的卦序来看，我们从传世文献中找不到与此完全一样卦序之《易经》。虽然元帝时的京房八宫卦卦序与此有相似之处，笔者将在下文说明，京房八宫卦序自有其内在的建构原则，与帛书卦序之建构原则尚有很大差别，因此，京房之八宫卦序与帛书卦序应该没有直接的关联。《淮南子》中共有十几处与《易》相关的文字，其中有些地方对《周易》卦爻辞的解释与帛书《易传》对《周易》的解释有相通之处，《淮南子》所引对《易》的注释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说“淮南九师说”的遗存。

《淮南子·缪称训》有这样一段话：“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

① 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2页。

② 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页。

向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帛书《二三子》中亦引有孔子对此的解释：“守财弗施则[凶。卦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孔子曰：此言大德之好远也。所行□□□□□远，和同者众，以济大事，故曰[利涉大川]。”（第3028页）可以看出，两种说法意思相近。《淮南子·人间训》有“‘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之语。对于《乾》卦九三爻辞“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之义，王弼认为九三爻“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sup>①</sup>。而干宝注为“君子以之忧深思远，朝夕匪懈”<sup>②</sup>。这些解释都与《淮南子》的解释相差较远。帛书《二三子》的解释为：“此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屈力以成功，亦日中而不止，时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务时，猷驰驱也。故曰君子终日键键。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故曰：夕沂若，厉无咎。”帛书《易之义》对此的解释为：“知息也，何咎之有？”这些解释都与《淮南子·人间训》的说法旨意相同。以上这些类似之处说明帛书《易传》作为在楚地流传的一个版本，其所讲的《易》之微言大义有可能被“淮南九师”所采纳。果如此，则帛书《周易》在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确定官方《周易》经传版本之前，仍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楚地流传。官方《周易》经传版本确定之后，亦即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之后，帛书《周易》经传亦有可能被充之秘府。特别是淮南王刘安

① 刘玉建：《周易正义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01页。

②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89页。

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被诛,“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之后<sup>①</sup>,楚地流行的这些“淮南九师”之说及帛书《周易》经传,恐怕亦受到严格钳制,以加强文化方面之专制。

另外,前文已述,刘向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时治淮南狱时,曾得到淮南王刘安之《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更生(刘向)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宣帝)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sup>②</sup>。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是一个重视文化、喜欢收藏书籍之人。他治淮南狱时既然得《枕中鸿宝苑秘书》,我们也不排除他能得到“淮南九师说”、帛书《周易》等与《易》学相关的书籍,我们从刘向引《易》之文中亦可得到佐证。除了上文所说帛书《要》篇、《淮南子·人间训》及刘向《说苑·敬慎》等皆引有“孔子读《易》至于损益二卦则喟然而叹”及帛书《繆和》篇对损益之辩证关系的讨论之外,刘向在给元帝的奏文中还引过不见于今本《易传》的“飞龙在天,大人聚也”这句话,并引申其义为“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我们在帛书《易传》可以发现类似的义理,如帛书《二三子》说:“易[曰:蜚龙在]天,利见大人。[孔子曰:此]言□□□□□□□□□,君子在上,则民被其利,贤者不蔽,故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与刘向所说旨意基本相同。帛书《繆

① [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52页。

②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8-1929页。

和》有这样一段话：

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以重言也，曰又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尤之。是故汤[囚于桀]王，文王拘于条里，[秦缪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古古至今，柏天之君，未尝困而能□□[者，未之有]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猷□□□□□□其□□□□□□□□□□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此]之冒也。

刘向《说苑·杂言》亦有类似的一段话：

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应，曲终而曰：“由，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偃也，其谁知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终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乐不休，子路愠见曰：“夫子之修乐，时乎？”孔子不应，乐终而曰：“由，昔者齐桓霸心生于莒，勾践霸心生于会稽，晋文霸心生于骊氏，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智不广，庸知而不遇之。”于是兴，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遇此难也，其不可忘也！”孔子曰：“恶是何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

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两段所引历史典故及要说明的问题几乎完全一致，而且都是对《困》卦卦辞的注解。刘向此段极像是通过润色帛书《繆和》此段而成。据《汉书·刘向传》可知，刘向“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是在他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之后。由此段引文可知，刘向在写《说苑》时，极有可能受到帛书《易传》的影响。如上所述，帛书《易传》所引的有些《易经》卦爻辞不同于帛书《易经》而与《新序》、《韩诗外传》、《史记》等所引相关《易经》卦爻辞相同，一则说明刘向有可能见到过包括帛书《周易》在内的多种《周易》传本，二则说明刘向著说曾受到过帛书《易传》或相近版本的影响。帛书《周易》经传极有可能是在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时被充于秘府的，只有像刘向这样领校中《五经》秘书的人才有机会见到其原貌或其古本。而西汉末期的今古文之争，又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作为今文经代表的施、孟、梁丘、京《易》及与古文经学家诠释精神一致的费氏《易》，帛书《周易》经、传此后也就隐而不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帛书《易传》不像韩氏《易》那样有明显的“公天下”的内容，所以没有遭到武帝、宣帝等的打压，而在民间默默流传。但随着官方易学的兴盛，受利禄的诱惑，力图步入仕途的学子把目光主要转向了官方易学，帛书《易传》因此而逐渐受到冷落并逐渐不为官方所闻。

### 第三节 《易》筮、《易》经、《易》阴阳

#### ——《周易》在西汉时期存在的三大形态

从前文“西汉易学源流”部分之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周易》



在西汉时期大体有三种存在形态——《易》经、《易》筮与《易》阴阳。《易》经指官方承认的经学系统，《易》筮指《易》之卜筮之功用，《易》阴阳指运用《易》进行灾异推衍之形式。因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所以官方经学系统之《易》经亦含有卜筮之功能，但其主要作用仍是以作为治国之大“经”的身份存在。《易》筮主要发挥《易》的占卜功能，主要是通过运用蓍草布卦等手段来推断具体事物之吉凶，甚至包括射覆等游戏性的内容。而《易》阴阳系统与古代的式盘所体现的时空一体观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主要包括魏相以及孟、焦、京据以推言灾异之系统，而这一系统在宣帝末亦成为经学系统，特别是推言灾异屡中的京房之易学于元帝时亦被立于学官，成为官方经学的一部分。为更好地了解孟、焦、京易学在西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从中亦可以看出孟、焦、京《易》阴阳系统与梁丘《易》的一些区别，我们在此对《周易》在西汉时期存在的这三大形态进行一下梳理与分析，以期对整个西汉易学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

## 一、西汉时期的《易》筮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据《郭店楚简》中《语丛》、《六德》等篇所说六经包括《易》来看，《周易》在战国中期以前已作为儒家的六经之一，成为儒家教育弟子的重要内容，但运用《周易》进行卜筮从战国至整个西汉就没有间断过。尽管荀子主张“善为《易》者不占”，但他的这一主张并没有阻挡住《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在社会上的广泛运用。我们在这里只是简要谈一下《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在西汉时期的运用情况。从双古堆阜阳汉简《周易》的出土可知，《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可能有与其他方术相结合的不同版本形式之存在，并有可能一直在民间流传着。如

《汉书》有载：“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sup>①</sup>武帝此处所发《易》书当为《周易》的另一版本，估计专为卜筮之用，有可能与阜阳汉简本《周易》相类。同时也证明武帝在重视《易》之“经”的地位的同时，亦重视《易》的占筮功能。

其实在武帝之前，汉高祖刘邦与汉文帝刘恒也运用与《易》相关的术数进行过卜筮。刘邦刚起事时，父老帅子弟共杀沛令以后，开城门迎高祖，欲以为沛令。刘邦认为这是大事，应该推选更适合当沛令的人，而“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高祖。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奇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高祖数让。众莫肯为，高祖乃立为沛公”<sup>②</sup>。不管当时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卜筮，说明当时的人们与刘邦本人都相信并承认卜筮的结果。

高后去世之后，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当时的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共同诛灭诸吕之后，想立当时为代王即后来的文帝刘恒为帝。大臣遂使人迎接刘恒入京。刘恒害怕其中有诈，犹豫未决，“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sup>③</sup>文帝在这里用的是卜法。这种卜法是否与《周易》筮法有关，我们不得而知。这里虽说是用卜法，估计不

① [汉]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693—2694 页。

② [汉]班固：《汉书·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 页。

③ [汉]班固：《汉书·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6 页。

会用灼烧龟甲的方式来卜，一是因为这种卜法造价太高又太麻烦，二是当时筮法已流行很长时间，所以这种卜法应该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卜法。特别是《汉书》还记载，窦太后的弟弟窦少君年四五岁时由于家境贫穷而被人略卖，其家人不知道被卖到什么地方。“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山作炭”。后来窦太后新贵后，窦少君曾“自卜，数日当为侯”<sup>①</sup>。像他这样的烧炭翁都能进行自卜，说明当时的卜法应该很容易操作，甚至本身就是一种筮法，而泛称为“卜”。

武帝晚年，下了一道对以往过度征伐表示后悔的诏书。在这一道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帝曾用《周易》之筮来指导战争：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句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鹑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贰师下鹑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毋）[得]虏侯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遣天子马裘，常

---

① [汉]班固：《汉书·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994 页。

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sup>①</sup>

这是贰师将军失败投降匈奴后武帝所下的一道陈悔之诏。从此诏书可以看出，在贰师将军李广利这次出征之前，武帝令人占了一卦，得《大过》卦，九五爻动。《大过》九五爻的爻辞是：“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我们据此无法断定匈奴是否困败，而据该爻的《象》辞“‘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也不是什么吉兆。看来当时的解卦者有可能是根据卦爻象或其他解卦方法而得出“匈奴困败”的结论。武帝还令卦师占断一下哪位将军带兵出击最吉，占筮的结果也是贰师将军率师出征最吉。但事情的结果与占断正好相反，不但匈奴没有困败，就连贰师将军也被迫投降匈奴。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在进行每一次大的征伐之前，武帝都有可能令人预卜战争之结果。这里还提到武帝令公车方士、太史望气者及太卜龟蓍等进行推断此次出征的结果，大家都认为匈奴必破，机不可失。由这些占断与结果全不相符来看，这些占筮望气者有可能为了迎合武帝出征之意已决之心理，而不是根据实际兆象如实地回答。但武帝重视包括《易》筮在内的术数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些占筮是由当时以《易》至大官的杨何、墨成、孟但、周霸或主父偃来操作还是由专门进行卜筮的筮人来操作，由于《汉书》没有详载，我们就无从得知了。《汉书·东方朔传》有一段与武帝相关的运用《易》筮的记载：

①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3页。

上(武帝)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官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著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官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

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蓂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sup>①</sup>

这一段记载说明以《易》进行射覆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游戏,民间占筮《易》一直在广为流传。东方朔能连射连中,除了他的滑稽智慧在起作用之外,亦可证明他确实有很高的射覆水平。此段记载还说明,武帝喜欢数术家言。《史记·日者列传》还记载:“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论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sup>②</sup>《史记·日者列传》为褚少孙所补。褚少孙曾为宣帝时的《鲁诗》博士。<sup>③</sup> 此段记载说明武帝喜

① [汉]班固:《汉书·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843—2845 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222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10 页。

欢这些数术家。既然褚少孙在这里说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说明宣帝时有为太卜待诏之郎官。这一官制是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时制定的，而贰师将军李广利北击匈奴是在征和三年（公元前 90 年），这时这种官制已实行十余年，说明武帝所聚会之占家恐怕亦多为此种郎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可知当时郎官设有很多人，上述数术家补征为郎或待诏之郎是极有可能之事。所以，上文所说贰师将军出征前所占之卦也有可能为此种郎官所操作与解析。这也进一步说明，当时民间当有为数众多的用《易》进行占筮者。

除了民间用《易》进行占筮，作为官方《易》经系统的治《易》者亦有以《易》进行占筮者。如宣帝在行祠孝昭庙之时，“先驱旄头剑挺堕坠，首垂泥中，刃乡乘舆车，马惊”。宣帝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于是召当时刚从待诏黄门升为郎官的梁丘贺进行占筮。梁丘贺先师事武帝立《五经》博士后的第一个《易经》博士杨何的学生京房，此京房后来出任齐郡太守后，梁丘贺又师事时为《易经》博士的田王孙，田王孙当时的学生已有施雠与孟喜。梁丘贺预测的结果是“有兵谋，不吉”<sup>①</sup>。正是这次“以筮有应”，梁丘贺才“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的。成帝时曾官至丞相的张禹一开始是梁丘贺的学生。后来梁丘贺为少府后，由于公务繁忙，便派遣他的儿子梁丘临及门人张禹更事施雠。所以，张禹既懂丁宽、田王孙之易学体系，又懂杨何、京房一支易学体系。成帝末，“禹见时有变异，若上体不安，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00 页。

择日洁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则献其占，如有不吉，禹为感动有忧色”<sup>①</sup>。可见，当看到灾异发生时，张禹亦以《易》进行占筮。需要注意的是，张禹用筮法推断灾异，与孟、焦、京等据《易》阴阳推言灾异的路径不同，因为据《易》阴阳推言灾异不用以筮法起卦，而是根据八卦卦气说、“六日七分”说等以风雨寒温为候来推断灾异发生之原因与预期之后果。由此亦可证张禹从施雠与梁丘贺那里没有学到用《易》阴阳推言灾异的方法。换句话说，施雠与梁丘贺不懂据《易》阴阳推言灾异。所以，梁丘贺对其同门师兄弟孟喜诈言从其师田王孙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反应强烈，并极力否定此说。而施雠有可能确实不懂《易》阴阳系统，这也应该是他对孟喜之说未置可否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一公案，下文将有详论。

总之，《易》筮系统在西汉一代不管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仍有市场，且与《易》经之经学系统没有截然分开。

## 二、西汉时期的《易》经

据郭店楚简《语丛》、《六德》等相关内容可知，《周易》在战国中期之前已经作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在儒家内部流传，可证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颁布《挟书律》之前，《周易》已作为儒家的“经”在诸子百家中广为流传。《挟书律》颁布之后，《易》师们应该不敢再公开传授富含儒家思想的《易传》诸篇，所以至汉初时仍然是“天下唯有《易》卜”之局面。估计直到汉定之后，特别是惠帝四年（公元前 191 年）《挟书律》被废除之后，

---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351 页。

田何、韩婴之师、淮南九师之师(们)、帛书《周易》传人之师等才敢公开传授《易传》类的内容。但这些传《易》之师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并没有像其他经典之师那样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治《尚书》曾为秦博士的伏生虽没有被汉文帝拜为博士,但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sup>①</sup>;治《鲁诗》的申公曾为文帝时博士<sup>②</sup>;治《齐诗》的轅固为景帝时的博士;治《韩诗》的韩婴为文帝时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治《公羊春秋》的胡毋生为景帝博士。从《汉书》所载来看,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唯独没有以治《易》为博士者。韩婴虽然既治《诗》又治《易》,但他被文帝拜为博士及景帝时任常山太傅乃是因他治《诗》之故。当时的诸侯王亦设立博士,如治《诗》的赵人毛公及治《春秋左氏》的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当时的淮南王刘安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他当时是否设立博士,《汉书》、《史记》没有记载。他所聘的明《易》之九师应该与其他游士的地位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由此可见,《周易》在武帝之前并未受到官方的重视,而只是在民间流传。直到武帝立《五经》博士后杨何被立为《易经》博士,《周易》才作为《五经》之一被立于学官。武帝立《五经》博士后虽然治《易》的杨何官至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亦治《尚书》与《鲁诗》)、莒衡胡、临淄主父偃(亦治《春秋》),皆以《易》至大官”<sup>③</sup>,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3页。

②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2页。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7页。



但他们的地位远没有以治《尚书》而为御史大夫的兒宽、以治《齐诗》与《公羊春秋》为丞相的公孙弘地位显赫。以上这些以《易》至大官者在学术上亦不如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及明灾异在武帝一世显名而成为儒者宗,说明杨何等当时虽以《易》至大官,但他们在适应时事及儒家外王方面远不如董仲舒、公孙弘等能提出关乎天人关系的宏阔远大之建议。而《易传》本身就阐发了不少关乎天人关系的论说,这也从侧面说明杨何等在《易》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不如董仲舒、公孙弘等在《公羊春秋》方面的理论建树高。但武帝在其诏书中仍多引《周易》经传之文为根据,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武帝提出“更化说”以后,武帝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下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sup>①</sup>这是引用《系辞下传》的一句话来佐证自己的施政措施。另外,武帝还引用《周易》经文作为其礼仪的根据。如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下诏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望见泰一,修天文祀。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岁未咸登,飭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sup>②</sup>可知武帝所说的“先甲三日”为“辛”日,“后甲三日”为“丁”日。武帝时期最受官方赏识的通经之士是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公孙弘,治《尚书》的兒宽、夏侯始昌等

①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页。

②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5页。

人,而治《易》之人没有受到特别的赏识。

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霍光秉政。由于霍光不学无术,虽然他证实夏侯胜根据《洪范五行传》推灾异而推测出他与张安世之密谋后“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但总体来说,他对经学之士并不是从心底里重视,所以这期间没有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人物。据《汉书·儒林传》可知,董仲舒的学生瀛公为昭帝谏大夫,治《尚书》的夏侯胜在昭帝时被征为博士、光禄大夫,比较大点的官是“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的韦贤,在昭帝时“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sup>①</sup>。就《易经》来讲,田王孙在昭帝时为博士,但最终也没有升任什么具体的官职。梁丘贺初始的老师京房(案:此京房为杨何的学生)也只是做到齐郡太守。昭帝时任御史大夫、丞相者如车千秋、王訢、杨敞等人皆非通经之士,只有一位治《韩诗》的蔡义官至丞相,亦因霍光秉政而只是做个陪衬而已。由于昭帝无嗣,所以当时也没有太子太傅、太子少傅等。因此,昭帝时是整个经学较为黯淡之时期。

至宣帝时,经学重新受到重视,也是经学系统进一步分化、章句之学大为彰显之时。就《易经》来说,在宣帝时期,施、孟、梁丘三家从田王孙及杨何易学系统分化出来而自立门户,最终于宣帝末皆被立于学官。其中梁丘贺升至少府,位居九卿,深受宣帝信任与赏识。宣帝时任丞相者魏相、丙吉、黄霸等人皆非专门治经之士,所以梁丘贺在专门治经之士里面是官位比较高的一位(治《齐诗》的萧望之在宣帝时亦曾做过少府),说明《易经》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07页。

在《五经》中的地位也在逐渐得到提高。宣帝时,孟喜称从其师田王孙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孟氏《易》在宣帝世比梁丘《易》立于学官之时还要早。所以,在宣帝时,《易》阴阳系统开始以《经》的身份跻身官学。

元帝时又将大谈阴阳灾异的京氏《易》立于学官。虽然《易》阴阳系统得到官方认可,但治《易》阴阳者如京房的学生殷嘉、姚平、乘弘等只做到郎、博士,而没有升居御史大夫、丞相等高位者。专说阴阳灾异的高相易学则始终没有被立于学官。而施雠兼梁丘贺的学生张禹至成帝世曾位居丞相,张禹的学生彭宣于哀帝末迁为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张禹的另一个学生戴崇则至少府,为九卿。可见此时《易》经相对于其他诸经来说已被推至极高之地位。至西汉末期,受刘歆古文经学风气的影响,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的学风因与刘歆所倡导的古文经学之古朴学风相近,费氏《易》因此引起易学界的关注,但费氏《易》在西汉一代始终没有立于学官。尽管《易经》在西汉后期遇到如此多的变故,但《易》在儒术独尊之后的哲学地位逐渐显露出来,所以本于刘歆《七略》的《汉书·艺文志》对六经做出如下评判:“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sup>①</sup>这样,《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原的地位在西汉后期便确立起来。

---

①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3页。

### 三、西汉时期的《易》阴阳

《易》阴阳，顾名思义，乃是《易》与阴阳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周易》的阴阳爻符号已符示出阴阳之概念，但真正深阐阴阳之义并形成门派者则是战国中期以后的邹衍。司马谈在《谈六家要旨》中是这样评价阴阳家的：“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sup>①</sup>由此可知，阴阳家之主张既包括“使人拘而多畏”之小数，又有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自然之道之阐释。《汉书·艺文志》也有类似的说法：“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sup>②</sup>“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sup>③</sup>对于《易》，司马谈是如此评价的：“《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又说“《易》以道化”<sup>④</sup>，一则说明阴阳家与《易》都注重阴阳四时之内涵，二则说明在司马谈之前，《易》家已将阴阳、四

①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289—3290 页。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34—1735 页。

③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60 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297 页。

时、五行与《易》卦相配属。因为《周易》卦爻符号本身就符示着阴阳,所以阴阳家立派之后,阴阳家与《易》本来就很容易结合起来。其实,《说卦传》就描述了四时、八节与八卦之配应关系。司马谈在这里所说的对《易》的认识是来自其师杨何还是其他与《易》相关的资料,我们就无从知道了。因为尽管司马谈受《易》于杨何,但作为太史令,他又不可能拘于一家之言。从杨何—京房—梁丘贺一支易学传承谱系来看,由于梁丘贺及其弟子张禹遇到大事时仍用筮法而不用《易》阴阳之法进行推断,说明杨何一支易学体系可能没有传承《易》阴阳之学,司马迁父子所说的阴阳与《易》卦之配应说恐怕来自他师之说,因为武帝时一人师从多位老师的情况很普遍,如公孙弘既学《公羊春秋》又学《齐诗》,孔安国既治《尚书》又治《鲁诗》,从《周易集解》辑有孔安国《易》注来看,说明他还治过《易》,周霸既治《尚书》又治《鲁诗》与《易》,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sup>①</sup>。自董仲舒据《公羊春秋》推言灾异以后,“灾异”说渐受重视。此后,《公羊春秋》、《诗》、《尚书》(《洪范五行传》)、《易》等皆向灾异说靠拢。与元帝时的京房同时代的善言灾异的翼奉(治《齐诗》,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元帝后期任丞相的匡衡共同师事后仓)在奏封事中即说道:“《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sup>②</sup>可证此时《易》阴阳已成为以《易》推言灾异的代名词。

在《汉书》中首次明确提到“《易》阴阳”一词是在《汉书·

① [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98 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72 页。

魏相传》中,称宣帝时曾官至丞相的魏相“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sup>①</sup>。从魏相据《易阴阳》及《明堂月令》所奏来看,他所说的《易阴阳》已将八卦与八风、五神、五行等因素相配属,并据以推言祥瑞与灾异。但他所说的这种配应尚不如孟、焦、京之“六日七分说”精密。此部分的详细内容将在下文“卦气说”部分讨论,我们在此不作详论。宣帝采纳了魏相在奏疏中的说法,说明官方对《易阴阳》说的认同,这为《易阴阳》进一步开宗立派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孟喜所说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正是与《易阴阳》密切相关的内容。孟喜虽然由于梁丘贺的阻挠在“博士缺”时没有得到此缺,而代之以他的同门师兄施雠,但从“博士缺,众人荐喜”来看,孟喜所说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等与《易》阴阳相关的内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与官方认可“灾异说”的政治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从施雠“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且为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来看,施雠当为墨守师法之人。因此,尽管当时孟喜没有补为博士,但他明确标出《易》阴阳内容在当时的易学界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代表的是一股正在兴起的新势力,所以宣帝在保留带有丁宽《易》传统的、恪守师法的施氏《易》的同时,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立具有杨何—京房易传统的梁丘《易》于学官之前,还是将孟氏《易》立于学官。元帝世又将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系统至此而大备。

虽然通过孟喜、焦延寿、京房等努力而使《易》阴阳系统大为完备,但治孟、焦、京易学者在西汉一代没有身居显位者,京房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9页。

还因据“灾异说”力排佞臣而丢掉了性命,“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的谷永虽然曾被征“为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给事中”<sup>①</sup>,但由于他与国舅王凤等结党,所以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重用。然而,在当时阴阳灾异说大盛的时代背景下,《易》阴阳系统在提高人们对天人关系的把握方面仍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阴阳灾异的过度渲染及对汉家厄数的推断,又助长了王莽篡汉的野心及谶纬神学的出现。虽然随着西汉末期古文经学的抬头,有人开始关注与古文经学风相近的“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的费氏《易》,但只在短暂的莽新王朝“诸学皆立”,在东汉一代古文经一直没有被立于学官。就易学而言,《易》阴阳系统在宣、元时期由孟、焦、京大开其风之后,在西汉后期便不乏治《易》阴阳者,直至整个东汉一代,亦复如此,形成了洋洋大观的象数易学体系。

---

① [汉]班固:《汉书·谷永杜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65页。

### 第三章 孟喜易学研究

如前所述,据传世资料及出土文献可知,汉初,有田何、韩婴、淮南九师或他们的老师、长沙国丞相利仓之子利豨的老师即传授帛书《周易》之师等在传授《周易》。韩氏《易》因有“公天下”思想而没有得到官方的更多认可,“淮南九师说”则随淮南狱受到严厉打压,帛书《周易》经传因地处偏远且与淮南为临,“淮南九师说”被打压后,帛书《周易》经传亦应受到一定影响,且从整体来讲,帛书《易传》不如源自田何一系的今本《易传》齐整而系统,在武帝立《五经》博士特别是武帝广开献书门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之后<sup>①</sup>,帛书《周易》经传极有可能被充于秘府而变得隐而不彰了。由前文所述可知,武帝时仍有卜筮类的《易》书在流传。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汉初几支《周易》流派。至于汉初是否还有其他《周易》流派流传,只能看将来是否有新的《周易》资料出土了。当然,这些流派虽然有不同的师承,但所传内容可能会有许多相同之处。从上文考证可知,田何的几名高徒主要是在高祖九年

---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公元前198年)田何迁至杜陵之后所授。而田何公开传授富含儒家思想的《易传》类的内容当在汉兴之后特别是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令》之后。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立《五经》博士时,《易经》博士为杨何,杨何一系源于田何。从此,田何一支易学便成为官方易学正统。但杨何的老师即田何的弟子王同与田何的其他几个弟子对《易》的解说恐怕已有差别。特别是《汉书·儒林传》说丁宽从田何处学成之后又从其同门师兄周王孙学古义,说明王同与周王孙所学所传已有所不同,从而汉导致汉代易学后来之分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及其所治《公羊春秋》影响了当时的整个学术界,同时开创了以阴阳学说“言灾异”的风气。《周易》虽然本来就是卜筮之书,但在宣帝时的丞相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上奏中有类似言灾异的内容之前,没有以《易》言灾异的记载。而随着作为今文经学代表的《公羊春秋》与《尚书五行传》推言灾异的流行并得到官方的认可,以《易》言灾异也逐渐露出水面,那就是孟喜易学的产生。由于孟喜与梁丘贺之间有矛盾,孟氏《易》刚露头时受到一定的打击。但当时由于推言灾异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后来孟氏《易》还是于宣帝后期立梁丘《易》之前被立于学官。在把言灾异与《易》相结合的过程中,孟喜及后来的焦延寿、京房师徒之《易》阴阳系统当另有所受。而孟、京易学被立于学官之后,《周易》中本来就有的象数内容得到极大的扩充,形成了洋洋大观的象数易学体系,成为后世象数易学发展的坚实基础。深入研究孟、焦、京象数易学,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汉人天人一体的宏大宇宙视野,有助于我们理解后世整个象数易学的根柢所在。我们在此先从孟喜易学进行探讨。

至于孟喜易学产生的时代与学术背景,我们已于第一章“西汉经学发展述论”部分论及,在此不再单独进行讨论,我们在孟喜生平评述中还会涉及这一问题。

## 第一节 孟喜生平评述

### ——兼论施、孟、梁丘关系之公案

关于孟喜之生平,《汉书·儒林传·孟喜传》是如此记载的: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荑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掾。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sup>①</sup>

据《汉书·儒林传》可知,孟喜的父亲孟卿与善言灾异的眭孟皆

---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师事董仲舒的弟子瀛公治《公羊春秋》，可证孟卿对《春秋》应颇有造诣。孟卿又师从瑕丘萧奋治《礼》。所以，孟卿既通《礼》又通《春秋》，特别是在治《礼》方面应该更有独到的建树，因为孟卿的学生后仓是治《礼》的一代宗师，“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sup>①</sup>，据《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迄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这里所说的“世所传《后氏礼》”应该就是与《后氏曲台记》相关的著作，因为它出于孟卿，所以孟卿在治《礼》方面可以说是开宗立派式的人物。而这里所说的《疏氏春秋》，当是孟卿的学生疏广对《公羊春秋》之解说：“疏广事孟卿，至太子太傅。”<sup>②</sup>孟卿认为《礼》太多而《春秋》又太繁杂，所以才让孟喜从田王孙受《易》。但因为孟卿治《公羊春秋》且懂阴阳灾异之说，孟喜喜欢阴阳灾变说应该受他父亲的一些影响。孟喜喜欢自夸自誉，从别处得到“《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谎称是他的老师田王孙临死时单独传给他的一部书。而他的同门师弟梁丘贺否认此说，指出田王孙去世于他们的同门师兄施雠之处，当时孟喜已回东海老家，所以孟喜所说是不可能发生之事。而当时有一个叫赵宾的蜀人喜欢小数书，以阴阳气之说来释《易》。赵宾在世时因其“持论巧慧”，众《易》家无法驳倒他的说法，都说赵宾的解释不合古法。赵宾说是从孟喜那里学的，当时孟喜也承认这一点。后来赵宾死了，他的说法无法得以坚持。这时孟喜又不承认赵宾是他的弟子了，孟喜因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5页。

②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7页。

此而不见信于人。这为他后来的仕途带来一定的麻烦。当后来博士缺时,众人推荐孟喜。宣帝听说孟喜改师法,所以就没有拜孟喜为博士。

对于孟喜所说从其师田王孙处独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引起梁丘贺反对这一公案,我们无从得知施雠的看法。我们从《汉书·儒林传》所载施雠与梁丘贺的材料大体可以看出他们的矛盾与分歧所在。为了解决这一公案,我们来看一看施雠与梁丘贺的情况。

施雠,字长卿,沛人也。沛与砀相近,雠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業,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雠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sup>①</sup>

据此可知,施雠的老师田王孙为砀人,而施雠是沛人,与砀相近,这就为施雠学《易》从地理上提供了方便,所以他为孩童时即从田王孙受《易》。后来施雠迁至长陵。据《汉书·地理志》可知,长陵在左冯翊的地盘上,而左冯翊属于京师的一个辖区。施雠迁至长陵后,又为施雠向这时已为博士的田王孙学《易》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由此段记录来看,在施雠来长陵之前,在学《易》方面有可能间断过一段时间,所以才说他“复从田王孙卒業”。这之后才是施、孟、梁丘共同从田王孙受《易》的阶段。但

---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8页。

施雠为人谦让,不肯以《易》教人。等到梁丘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而为少府之后,因为公务繁忙已经没有时间教授门徒,所以才派他的儿子梁丘临及他的门人后至丞相的张禹等从施雠问《易》。施雠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肯见他们,梁丘贺执意一再相请,施雠不得已才教授梁丘临等人。那么,施雠为什么不愿教授梁丘临等人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梁丘贺的来历。

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人也。以能心计,为武骑。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时为都司空令,坐事,论免为庶人。待诏黄门数入说教侍中,以召贺。贺入说,上善之,以贺为郎。会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坠,首垂泥中,刃乡乘舆车,马惊。于是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终官。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同异于石渠。临学精孰,专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①

由此可知,梁丘贺所学乃王同、杨何一支之易学。梁丘贺的老师京房为太中大夫,而杨何亦曾为太中大夫,是武帝立《五经》博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0-3601页。

士之后的第一个《易经》博士。司马迁一直活到武帝末,而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所涉及的易学人物不包括这里所说的为太中大夫的京房,说明此京房主要活动在昭帝时。其活动时间至早在武帝末期,而至晚至宣帝初期,因为既然宣帝听说京房为《易》明而求其门人,说明这时此京房已经过世。而梁丘贺“以筮有应”之时为霍家被族之年即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而宣帝本始元年为公元前73年。那么,“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之时当在昭帝末期乃至宣帝即位之初,据此亦可知,田王孙为博士亦在昭帝时,至晚至宣帝初期。《史记·儒林列传》所提易学人物亦没有田王孙,所以田王孙为博士的上限不会早于武帝末,因为像司马迁这样比较客观的良史不会因为田王孙易学属于丁宽而不是杨何易学之谱系而不把田王孙载入史册,且司马迁所记“以《易》至大官”的周霸、主父偃等也可能不属于杨何一支易学谱系。从《汉书·儒林传》所介绍施雠与梁丘贺之情况之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田王孙所传之《易》与此京房所传之《易》应该有不少的差别,否则宣帝就没有必要寻求此京房之门人了。从后来梁丘临“专行京房法”,“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来看,此“京房法”应自有其特色,并为梁丘贺、梁丘临父子所继承。

我们再返回来看一下田王孙易学的来龙去脉。如前所述,丁宽从田何处学成东归之后,“复从周王孙受古义”,说明丁宽所学所受与其大师兄王同所学所受有所不同。丁宽曾为梁孝王距吴楚,号丁将军。吴楚“七国之乱”发生于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梁孝王是景帝的少弟,与景帝同为文帝窦皇后即武帝时所说的窦太后所生,为窦后所宠爱,曾贵盛一时并招贤纳士。邹阳、枚乘、严忌等曾为吴王刘濞之士,后来他们发现“吴

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sup>①</sup>。至“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有韩安国、张羽为将军拒吴楚之兵，丁宽号为丁将军当在此时。由此亦可知丁宽为文武双全之士。后来梁王失势并于郁闷中去世（公元前144年）以后，邹阳、枚乘等各别而去。如梁孝王薨后，枚乘即返回他的老家淮阴。<sup>②</sup> 丁宽亦应如此。《汉书·儒林传》称“宽受同郡碭田王孙”，亦可证明田王孙学《易》是在丁宽的老家。丁宽离开梁孝王归家后当以教授门徒为业，而他在民间授徒亦当主要在武帝之时。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载以《易》至大官者没有丁宽之门人，可证丁宽一支易学在武帝时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直到昭帝时丁宽的学生田王孙为博士以后，丁宽一支易学人物才跻身官学系统。从《汉书·儒林传》所载可知，田王孙虽为博士，但并不十分得势，因为《汉书·儒林传》只说他为博士，而没有提到他曾任何官职，可知田王孙终生只为博士而没有被授予实际官位，而与他同时代的此京房则曾为太中大夫（估计此京房在任太中大夫之前亦曾做过《易经》博士），后又升任齐郡太守。此京房出为齐郡太守后，梁丘贺乃更事田王孙。田王孙所传与此京房所传易学一定有较大的不同，因为王同与丁宽当时从田何处所学已有所不同。王同是田何年龄较大、入室较早的弟子，而丁宽则是田何较小、入室较晚的弟子。丁宽从田何那里学成东归之后，又从周王孙处学习《周易》古义，可证周王孙与丁宽所学已经不同。周王孙所授古义是否是从田何处所学呢？笔者以为不是。因为如果周王孙之古义是从田何处所

① [汉]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43页。

② [汉]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5页。

学,那么,为什么田何不把古义直接传授给“读《易》精敏”而受到田何赏识的丁宽呢?因此,周王孙所学之古义极有可能是从其他《易》师处所学到的内容。王同学没学过《周易》古义我们无从得知。从王同曾著《易传王氏》二篇而丁宽则有《易传丁氏》八篇来看<sup>①</sup>,王同与丁宽对《周易》的诠释已有较大不同。而据《儒林传》可知,丁宽“作《易说》三万言”,他诠释《周易》的理路则是“训故举大谊而已”。丁宽的学生田王孙当是死守师说之人,《艺文志》没有关于田王孙所著易学著作。王同的弟子即武帝元光(公元前134~前129年)中被征为太中大夫的杨何亦曾著《易传》二篇,估计杨何对《周易》的诠释、发挥和他的老师王同对《周易》的诠释、发挥应该比较相近。但杨何的学生京房对《周易》的解释可能已经与杨何的解释有很大不同,所以宣帝听说京房“为《易》明”之后,才寻找京房的门人而得至梁丘贺,以至于后来梁丘贺的儿子梁丘临“专行京房法”,宣帝于是“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由此可证,梁丘贺更事田王孙之前已精于“京房法”,所以他在更事田王孙之时,对《周易》的认识与丁宽、田王孙一系对《周易》的认识与运用已经有很大不同。施雠应该知道两支易学体系之差异,施、孟、梁丘之间,特别是孟喜与梁丘贺之间在对《易》的认识方面应该产生过磨擦与争论。而施雠为人谦让,他一定了解孟喜、梁丘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为了避免卷入这种矛盾之中,施雠才“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这也是为什么梁丘贺在做少府之后让梁丘临、张禹等从雠问《易》时,“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的原因所在。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3页。



施雠后来既然接受了梁丘临、张禹等人，梁丘贺为了还这个人情并孤立孟喜，才极力推荐施雠为博士，并谦虚地说“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于是宣帝乃拜施雠为博士。梁丘贺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说服力呢？一是由于在此之前他曾“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一是由于他“以能心计”、“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所以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时，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梁丘贺亦在其中，与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刘向的父亲）、萧望之、苏武等具被画于麒麟阁，而当时的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翁归及曾做过长信少府的名儒夏侯胜等皆未被列于其中<sup>①</sup>，可证梁丘贺深得宣帝信任与看重之程度。

那么，梁丘贺推荐施雠为博士发生在何时呢？《汉书·萧望之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8-2469页。

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对奏，天子拜望之为谒者。时上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白处奏皆可。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其后霍氏竟谋反诛，望之寔益任用。

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望之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远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曰：……书闻，征入守少府。……复以为左冯翊……

是岁西羌反，汉遣后将军征之。<sup>①</sup>

萧望之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sup>②</sup>，后来为太子太傅即元帝的师傅。上面这段事记载的是萧望之最初是如何被重用的事迹。霍光薨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此后，宣帝才开始亲理政事，但仍重用霍光的亲属。而地节三年夏，在京师下了一场雨雹，萧望之因此而上疏言灾异，借《春秋》暗讽此灾异仍霍家一姓擅势所致。宣帝在民间时即听说过萧望之之名声，便拜萧望之为谒者，接着又将其官职连升三级，从谒者升为谏大夫，又升为丞相司直。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而“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谏大夫秩比八百石，丞相司直则秩比二千石。可见萧望

①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73—3275页。

②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71页。

之升迁幅度之快之大。后来,霍氏竟然因谋反而被族诛,说明萧望之所言灾异得到了验证。霍氏被诛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秋,梁丘贺亦在此时以筮有应而近幸,并很快升任少府之职。萧望之因言灾异有应而更加受到重用。后来正遇到“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之事。因为萧望之亦做过谏大夫,所以他也在补阙之列而被任命为平原太守。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之后,估计由博士再升任谏大夫,这样,就出现了“博士缺”的局面。萧望之不想离开京师,宣帝乃征他为少府。宣帝觉得他有宰相之材,所以要以政事来试试他的能力,所以又任命他为左冯翊。这些变化发生在西羌反叛之年。据《汉书·宣帝纪》可知,西羌反叛并遣后将军赵充国征之之年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夏四月。可证《汉书·儒林传》所云“博士缺,众人荐喜”之时有可能在此年或稍后。

由于博士缺,众人都推荐孟喜为《易经》博士。梁丘贺极力推荐施雠为《易经》博士亦当在此时。这时梁丘贺已任少府五六年之久,深得宣帝的信任,而孟喜则“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掾”<sup>①</sup>。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多至千人”,可证“郎”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职位,而“署长”一职则为少府之下属,丞相掾也不是什么大官。所以在时为少府的梁丘贺的极力推荐下,宣帝最终拜施雠为博士。如前所述,在更事田王孙之前,梁丘贺已精于京房法,所以他在更事田王孙之后对《易》的见解与田王孙原来的弟子施雠、孟喜等对《易》的见解已经有所不同。从宣帝如此注重京房法以至于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选高材郎十人从梁丘临学习来看,京房法与田王孙之易学一定有很大差异。孟喜与梁丘贺在私下一定因对《易》的不同理解而产生过分歧,而从京房法之特受重视来看,孟喜如果只以田王孙所传之《易》与梁丘贺辩论恐怕处于劣势。这样,孟喜“好自称誉”而不服输的性格就迫使他不得不借助外援来与梁丘贺抗衡。通过个人努力或他人的帮助,他得到“《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并“诈言”是从他的老师田王孙在将死之时单独传给他的一部书。诸儒生以此而对孟喜另眼看待。而与他有矛盾的梁丘贺对此则绝不认同,指出田王孙去世时是施雠在侍候他,孟喜此时已回东海老家。施雠对梁丘贺的这一说法没有回应,所以孟喜是否真的从田王孙处得到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成为一个无法对证的问题。由于施雠性格谦让,从上文所云他不愿收梁丘贺的儿子梁丘临及其门人张禹为徒来看,他既不愿与工于心计的梁丘贺为伍,也不愿与“好自称誉”的孟喜作对,只是在梁丘贺的一再请求下才接受梁丘临、张禹等人。他们之间的这些分歧与矛盾在梁丘贺“以筮有应”之前已经存在。

那么,田王孙是否真的有“《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呢?笔者以为,虽然田王孙的老师丁宽曾从周王孙处受《周易》古义,但“古义”之性质与“阴阳灾变”说之性质应该有较大的差别。就像《春秋》一样,尽管《春秋》本身有一些言灾异的内容,但真正较系统的“灾异说”则发端于董仲舒。既然在田王孙之前已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孟、夏侯胜等以言灾异受到武帝、宣帝等的认可与重视,如果田王孙真的有“《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他就没有必要隐藏之而独传于孟喜。所以,孟喜所得之“《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应该另有来源。笔者管见,孟喜生活的时代正是“灾异说”逐渐受到重视并为官方所认可的时代,而孟喜的父亲

孟卿亦治《公羊春秋》，与灾异大师眭孟共同师事“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的瀛公，而瀛公又是董仲舒的学生。所以，孟喜之阴阳灾异说应该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与熏陶。孟喜的借助外援之举招致梁丘贺的反感。正好孟喜又因为一开始承认“好小数”的蜀人赵宾是他的学生，而赵宾死后其说不能自立，孟喜又矢口否认赵宾为自己的学生，孟喜因此而不被人信任。所以，当“博士缺，众人荐喜”之时（估为神爵元年即公元前 61 年或稍后），宣帝“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但由于“灾异说”已成为当时宣帝与众人普遍接受的一种学说，宣帝最后还是将施、孟、梁丘《易》皆立于学官。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中说，“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sup>①</sup>，《汉书·宣帝纪》也说，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汉书·儒林传》则说“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说明施、孟之《易》比梁丘《易》立于学官要早。因此，孟喜尽管当时由于梁丘贺的反对而没有当成《易经》博士，但他的伴有“《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内容的易学体系在石渠阁会议（公元前 51 年）之前已被立于学官。由此可知，施氏《易》应当主要为田王孙所传之易学内容；孟氏《易》当以阴阳灾变为其易学之特色；而梁丘《易》则以“京房法”为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从而形成了三家各具特色的西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971 页。

汉今文易学系统与学风。

## 第二节 孟喜易学的理论架构

### ——卦气说

《汉书·儒林传》说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尽管他的同门师弟梁丘贺出面否定此说，但不管是不是田王孙传给孟喜这部书，当时孟喜拥有此书当为事实。现在我们已无从知道这部“《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具体内容。《汉书·艺文志》所载孟喜的易学著作包括：《孟氏易经》十二篇，《孟氏章句》二篇。《汉书·艺文志》还载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这些应该是京房的著作。由于永嘉之乱（公元311年）后，施氏、梁丘之《易》已亡，孟、京、费《易》已人无传者，所以我们已无法窥见孟氏易学之全貌，我们只能根据《汉书》的有关记载、新出土的相关资料及后人的对孟氏易学的辑本来研究孟氏易学了。

就传世文献来看，研究汉易的著名易学家清人张惠言在其《易义别录》中辑有“《周易孟氏》一卷”。张本辑自《释文》、《周易正义》、《周易集解》、《说文解字》、《五经异义》<sup>①</sup>、《新唐书·志》卷二十七上僧一行《卦议》、朱震《汉上易传》、《晁氏易》、王应麟《困学纪闻》、宋人程迥《周易古占法》等。孙堂在《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中辑有《孟喜周易章句》一卷。其来源除张惠言所辑之来源之外，尚辑自宋人李心《丙子学易编》、王

<sup>①</sup> 《五经异义》现已亡佚，张惠言辑自《曲礼正义》、《仪礼·既夕》疏、《左传正义》、《公羊传》疏、《王制正义》所引。

应麟《小学紺珠》及《汉艺文志考证》、《汉书·儒林传》、《路史注》等。清人马国翰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周易孟氏章句》二卷。其辑本来源除上述孙堂所辑之外,尚辑自《诗干旌正义》、僧一行《易纂》、惠栋《易汉学》、《春秋谷梁传》范宁集解、《新唐书》卷二十八上历四上《发敛术》等。“与张本、孙本不同的是,马国翰以虞翻曾自称五世家传孟氏易学为由,将虞氏逸象也归于孟氏易,附录于后”<sup>①</sup>。黄奭的辑本最为晚出,他于《汉学堂经解》(《黄氏逸书考》)中辑有《孟喜易章句》一卷。该辑本所辑比马国翰本又多出明人熊过《周易象旨决录》、宋郑刚中《周易窥余》等,并与马国翰一样,把虞氏逸象归于孟喜,并附录于后。

《汉书·儒林传》说“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荑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可证是赵宾开了以气释《易》的先河。尽管魏相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中已以《易》来解释祥瑞与灾异之原因,但他还没有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周易》之卦爻辞。看来孟喜是认可赵宾以气解《易》的理路的。从上文所说孟氏易辑本来看,孟氏易学的核心内容正是其以气释《易》之说——卦气说。我们在这一节即对孟氏卦气说其及哲理内涵进行探讨。

<sup>①</sup>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册)。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 一、孟喜之前的“卦气”理念溯源

业师刘大钧先生曾发表《“卦气”溯源》一文。<sup>①</sup>在该文中，刘大钧先生指出，今本《易传》中即有“卦气”说的内容，乃至殷商甲骨文所说的“四方风”以及《尚书·尧典》中都有“卦气”说的影子。我们在此首先对传世文献中与孟京卦气说相关的内容进行梳理，旨在说明“卦气”思想确实有其渊源，而不是在孟喜那个时代突然冒出来的。

所谓“卦气”说，就是将卦爻符号与节令相配应的一种学说，亦即前文所说《易》阴阳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学说首先与中国古代的时空一体观密切相关。时空一体观指时间含有方位的属性，而方位亦含有时间的属性，二者相合为一，且时间与空间亦涵有阴阳五行之属性。比如说，春天在方位上与东方相配属，春天亦有东方的属性。夏天与南方，秋天与西方，冬天与北方，四季或季夏与中央之配应也是这种时空一体的关系。在孟喜“卦气说”之前，这种观念已经流行了很长时间。我们首先在此做一下简要的梳理，以期更好地了解孟、京卦气说出现的缘由与意义。

(1)《尚书·尧典》、《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历法体系中的时空一体观。《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话，充分说明了中国远古时代的时空一体观：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

① 刘大钧：《“卦气”溯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毼。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奥，鸟兽氄毛。<sup>①</sup>

这样，四方、四时、星相以及物候就形成了一个正常的配应关系，一个时空一体的图画便跃然纸上了。有学者指出，“很明显，‘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分别指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而帝尧命羲仲、羲叔、和仲与和叔分居四极以殷正四气，其为司分司至之神至明”<sup>②</sup>。这与中国古人十分重视天文观测是分不开的。“古史辨派”认为周以前的历史不可信，特别是认为尧、舜禅让的制度更不可信。根据郭店楚简资料，裘锡圭先生指出，“从《容成氏》、《子羔》、《唐虞之道》和《礼运》都认为在传子制建立之前普遍实行过禅让制来看，广泛流传的禅让传说很可能确保留了远古时代曾经实行过的君长推选制的史影”（编按：《庄子·秋水》说“帝王殊禅，三代殊继”，也认为三代之前行禅让）<sup>③</sup>。同样，对上述《尧典》所描述的时空一体的图景我们亦不能轻易否定，尽管当时的规划不可能像上述文字所说的那样细腻。而近年来出土的相关资料可以佐证，在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确实已经开始进行较系统的天文观测了。“1987年6月，中国考古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位于河南省濮阳市的西水坡发

① 李学勤主编，[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0页。

②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③ 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现了一群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迹,其中包括编号为 M45 的奇特墓葬”。在 M45 之墓葬中,“在墓主骨架的左右侧及脚端,分别发现了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像和三角形图案,而且蚌塑三角形还特意配置了两根人的胫骨。墓中蚌龙居右,位于东方,头北向,蚌虎居左,位于西方,头亦北向,龙虎均背朝墓主作行走状;蚌塑三角形图案位居北方,配置的人骨指向东方”<sup>①</sup>。冯时先生指出,这一墓制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星图景象,说明天文上的龙、虎、鸟、麟(鹿)四象已经形成,是古人观象授时的活生生的表现。他还据此说明,“中国传统的所谓四象,其实并不是东、西、南、北四宫中的七个星宿构成的形象,而是古人对各宫主宿形象——授时主星——的提升。这种做法显示了四象体系的古老渊源,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利用早期授时星象估算四象起源年代的可能性,这个时间在今天看来无论如何不能晚于公元前 4000 年,因为当时的实际天象表明,心宿、参宿、张宿和危宿基本上位于二分点与二至点上,而这四宿所呈现的龙、虎、鸟、麟四象在西水坡遗迹中都已出现”<sup>②</sup>,说明当时已有二分二至的观念。该墓葬年代在公元前 4500 年左右,比我们传说中的帝尧时代还要早 2000 余年,可证《尚书·尧典》这一段关于“敬授人时”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2)《夏小正》、《周书·时训》及《吕氏春秋·十二纪》所反映的时空一体观。《尧典》所论与历法相关的内容之后较系统的历法为《夏小正》。《夏小正》首开月令之先河,在它的基础

---

①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8-279 页。

②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0 页。

上,产生出《逸周书·时训》、《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越来越完备的月令体系。

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夏小正》、《周书·时训》及《吕氏春秋十二纪》之相关内容,以了解这种与阴阳灾异相关的时空一体观的发展。我们以正月为例。关于正月之物候及顺时布政情况,《夏小正》是这样描述的: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响,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涂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獾兽祭鱼,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柳梯,梅杏桃李则华。缙缡,鸡桴粥。

《周书·时训》相应的描述如下:

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风不解冻,号令不行。蛰虫不振,阴气奸阳。鱼不上冰,甲冑私藏。惊蛰之日,獾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獾不祭鱼,国多盗贼。鸿雁不来,远人不服。草木不萌动,果蔬不熟。

《吕氏春秋·十二纪·孟春纪纪首》则扩充为: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膺,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獾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

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麋无卵……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sup>①</sup>

《淮南子·时则训》基本是对《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概括，我们在此不做转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从以上引文大体可以看出古代历法发展的脉络及中国古人对天人合一之重视。据以上三段引文，我们可以发现，《夏小正》只是客观地描述孟春之月的正常物候，且对物候的表达也比较粗略而不具体，而因应这些物候的是农人，特别是在此没有说如果雁不北乡或獾兽不祭鱼寓有什么意思，所以没有与言灾异相关的内容。在天文方面只说到“斗柄县下下”。而《周书·时训》除系统地说出孟春之月的物候为“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獾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等六种物候现象以外，还分别指出，如果这些物候没有按时发生亦即灾异现象发生会表示什么样的后果，但它没有把这种不好的后果归咎于人主，而是客观地描述这种时令不正常所寓示的后果。而至《吕氏春秋·十二纪》则将天文、音律、历法、干支五行等做了进一步的结合，说明此时五行学说

<sup>①</sup> 包瑞峰：《〈吕氏春秋〉译注》。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已经比较成熟,并将顺时布政的主体预设天子,表达的是一种历政思想。这与《易传》本天道以立人道,开天文以立人文的思维理路是一致的。这里提到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与泰卦(䷊)卦象相符。

(3)《管子·四时》中与卦气及灾异相关的部分内容。《管子·四时》所表达的思想与《周书·时训》及《吕氏春秋·十二纪》所反映的思想有所不同。《管子·四时》有这样一段记载:

……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谗则生祸。然则春夏秋冬将何行?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赢,而发出节时。其事号令修除神位,谨祷糗梗,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瓮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佰;五政曰无杀麋豕,毋蹇华绝竿。五政苟时,春雨乃来。<sup>①</sup>

接下来是对夏、秋、冬季节特性与施政要求之描述。多数学者认为,《管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显然,这是一种时空一体观,这种观念要求人们要顺时而行,亦即春天时要顺春生之特性而行政,这样才能生福而避祸,“柔风甘雨乃至”。对于夏、秋、冬来说,也是贯穿着这种理念。这是一种人与天的自然的合一之理

① [汉]刘向校,[清]戴望校正:《诸子集成·管子校正》。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93-294页。

念。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不同的是,《管子·四时》没有将节令与五音相配应,也没有把这种顺时而动的主体规定为天子,但在这里把春与风、木、骨、长寿等配应起来,与《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的说法更近,主要描述的是春天生发万物的一种意象。这里提到的“春行冬政则雕”,呈现的是冬天雕零之象;“行秋政则霜”呈现的是秋天霜杀肃降之象;“行夏政则欲”呈现的是夏天宣泄之象。所以,这样的推断是根据较为系统的五行说。而在这一点上,《吕氏春秋·十二纪》则说“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没有反映出夏令的特点;“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亦没有显示出秋令肃杀之特点,说明这种推衍灾异所据的理论并不系统。《管子·四时》还提到“刑德”,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阴阳家“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之特点正好相符,说明《管子》此段即含有阴阳家之说。

其他在孟喜之前的传世文献与孟、焦、京卦气说有联系者尚有《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将在下文具体探讨孟、焦、京卦气说时穿插进去,在此就不多做介绍与分析了。

(4) 魏相《易》阴阳中所体现的“卦气”理念。魏相“少学《易》”,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时“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宣帝即位(公元前73年)后,“征相为大司农,御史大夫”。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韦贤以老病免,相遂代为丞相”<sup>①</sup>。如果“博士缺,众人荐喜”确实发生在神爵元年(公元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5页。

前 61 年)或稍后,则这时魏相已为丞相多年。魏相薨于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汉书·魏相丙吉传》称魏相“明《易经》,有师法”,“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其文曰:

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

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倪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sup>①</sup>

在魏相之前，我们看不到把《易》卦与阴阳灾异相配属之记载，《说卦传》只是把八卦与八方相配属，并暗含八卦与八节相配属之关系，反映的是一种理想状态。魏相在这里所引之《易阴阳》明确把八卦与五行、五方、五季、五神相配应，与《说卦传》之系统并不完全相同，而与董仲舒所说的“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之说更为接近。<sup>②</sup>《说卦传》系统与八卦卦气说有内在联系，我们将在下文详述，在此不作详细讨论。魏相在这里将八卦里的四正卦及坤艮两卦与五方、五季、五神相配应，而没有把巽、乾两卦纳入此体系，说明此《易》阴阳系统据以推言灾异的理论是以五行说为基础的。而对于异象，他在这里只举了“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而没有说东方之卦是否可以治南方及东方之卦治南方将会有何后果。所以，他这里又突出了《易》卦中的“应在其冲”说。（后文将会详论此说）而他这里

①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9—3140页。

②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五行之义第四十二》（《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22页。



所说“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亦是运用的春华、夏泄、冬寒之属性。因而，这里的《易阴阳》是以阴阳为纽带将八卦说与五行说相结合，并把国君的作用加以突出：“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且因之把阴阳的地位大大提升：“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这仍是对古人“顺时布政”之理念的进一步落实，只是到《易阴阳》这里把五行与八卦进一步结合起来，并从更高的层面突出《易》阴阳之地位。魏相的这一理念贯彻于他的施政方针中，并为时为御史大夫、后来继魏相为丞相的丙吉所继承。丙吉在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代魏相为丞相后，发生过这样一段故事：

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sup>①</sup>

丙吉是宣帝的恩人，武帝末巫蛊之祸事起时，曾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郡邸狱。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闲燥处”，并设法把宣帝培养成人。丙吉“本起狱法小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47 页。

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sup>①</sup>。由此可知,丙吉并不是出身于专治《五经》的儒者,在他的头脑中能有“调和阴阳”的观念,说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已普遍接受以阴阳治国这一理念。魏相与丙吉是宣帝时期的两位贤相,为宣帝时期的汉廷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之所以如此,与他们两位心目中的这种顺时布政、知大体的天人一体观念不无关系。这种观念与灾异说又有内在联系,因而为孟、焦、京灾异说的兴起提供了政治与思想基础。

重要的是,在魏相所采《易阴阳》与《明堂月令》一段,提到了汉高祖刘邦所述的叫作《天子所服第八》的一部诏书。如淳注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于施行诏书第八。”<sup>②</sup>这一诏书记载汉高祖时有大臣襄章等曾议天子所服,可证高祖时曾议论过易服色之事。当时参与论议的有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将军王陵及太子太傅叔孙通。而论议的内容是众人都认为“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但里面没有提到当时天子应服何色。特别是他们建议由四个大臣各职一时。这是对上文《尚书·尧典》所述重四时精神的贯彻。这一论议得到刘邦的批准。叔孙通于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徙为太子太傅,可证此议发生在公元前198年之后,高祖去世(公元前195年)之前亦即高祖临终前的一二年。<sup>③</sup> 由于魏相在世之时离高祖之时

①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42、3145页。

②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41页。

③ [汉]班固:《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9页。

代不远,以上所述当是史实。估计后来因吕后专政而没有把这一制度贯彻下去,所以魏相认为至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违反了顺时布政的原则。当时的太子家令晁错亦提到过这一问题。我们在《汉书·晁错传》可以看到晁错对此问题论说的一些痕迹。据《汉书·文帝纪》可知,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之诏下达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春三月。晁错一开始“学申、商刑名于轹张恢生所……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后从伏生处受《尚书》,归来后,“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之后,晁错又上书言:“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sup>①</sup>文帝很欣赏他说的这些话,于是于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拜晁错为太子家令。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汉文帝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晁错亦在选中。文帝亲策诏之。在这次诏策中,文帝谈到“明于国家之大体”。从晁错的对策中,我们可以看到魏相所说的这种理念: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官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

① [汉]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6-2277页。

雨时，膏露降，五谷熟，祆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sup>①</sup>

可以看出，魏相之说法与晁错之理念如出一辙。晁错在这里提到“明堂”，可证上文所引魏相所采《易阴阳》与《明堂月令》之文的前半部分为《易阴阳》的内容，而后半部分则是《明堂月令》的内容，亦说明魏相所采之《明堂月令》自有其师承，或者他的《易》学老师已经将《易》阴阳系统与《明堂月令》之说合而为一了。无独有偶，我们在《管子·轻重》亦可以发现与明堂相关的内容，并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及下文要讲的八卦卦气说有内在的联系。《管子·轻重》有这样一段话：

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服青而纁青。……发出令曰：“生而勿杀，赏而勿罚。罪狱勿断，以待期年。”……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天子东出其国九十二里而坛，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星。十日之内，室无处女，路无行人。苟不树艺者，谓之贼人。……三不树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发号出令曰：“毋聚大众，毋行大火，毋断大木，诛大臣，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

① [汉]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93页。

至，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其盛以麦。麦者，谷之始也……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讳也。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天太祖。其盛以黍。……天子之所以异贵贱而赏有功也。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天子……西出我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纁白……凿动金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发号出令；罚而勿赏，夺而勿予。罪狱诛而勿生，终岁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马之实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计也。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发号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斩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以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坛，服黑而纁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号曰发繇。趣山断伐……故耕械具则战械备矣。<sup>①</sup>

这里反映的仍是顺时布政、天人合一的一种观念。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不同的是，这里是以八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为时间划分单位，只是这里没有明确提到这些节令的具体名称。这一段话与魏相所云《明堂月令》之观念相类，又与魏相此处所采《易阴阳》观念有相通之处。虽然它们可能不属于同一个传承体系，但至少可以证明，魏相所采之《易阴阳》与《明堂月令》在观念上一定有极早之渊源，只是渊源甚古的这种顺时布政、天人合一的观念主要不是用来推言灾异而已。

《汉书·魏相丙吉传》说魏相“少学《易》，有师法”，可证其

① [汉]刘向校，[清]戴望校正：《诸子集成·管子校正》。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89-490页。

《易阴阳》亦自有其师承。但《汉书·儒林传》没有明确说魏相师承于哪一支易学系统。因为《汉书·儒林传》主要记载了王同—杨何及丁宽—田王孙两支易学传承体系,魏相不会属于这两支中的任何一支,因为像魏相这样一位位至丞相并深得宣帝器重之高官,比当时为少府的梁丘贺的位置更为显赫,如果魏相属于其中的一支,他们应该早已把他拉入其传承体系了。另外,从传承年代来看,魏相与田王孙应该年龄相仿或比田王孙稍年轻一些,与梁丘贺的老师京房在年龄上亦应该不相上下,如果魏相易学属于以上两支中的某一支,《儒林传》不可能不明确指出。由于魏相“数陈便宜,上(指汉宣帝)纳用焉”<sup>①</sup>,在宣帝的心目中应该已经树立了这种与“卦气”相关的顺时布政的观念。这也应该是“博士缺,众人荐喜”时,尽管在梁丘贺的阻挠下,宣帝“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但最终“以《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为特色的孟氏《易》还是早于梁丘《易》被立于学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下文的介绍可知,孟喜卦气说与魏相卦气说具体来说还是有较大差别,这也是二者并非一师的一个佐证。

## 二、与孟、焦、京易学相关的古代式图观念

不仅传世文献中有在孟喜“卦气”说面世之前久已存在的与卦气说相关的理念,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献中亦有不少与孟、焦、京易学相关的材料。其中出土的古式盘就与卦气说有内在联系。

中国古代的时空一体观形象地表现在式盘中。这种式图观

---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40页。

念牢牢地树立在人们的心目中,与中国古代的方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样,这种式图观念与《易》阴阳系统又有直接相关。如前所述,《易》在西汉时期有三大形态:《易》经,《易》筮,《易》阴阳。当然,这三种形态之间又有交叉。《易》筮是用蓍草布卦的方式对一些事物进行占断,如梁丘贺和他的学生张禹仍用这种方式。《易》阴阳则是承续《说卦传》的思路,以时空一体的式图观念作为占断灾异的基础。从下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孟、焦、京易学与这种式图观念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我们根据出土资料并结合传世资料,在这一部分探讨一下古代式图观念,以期对孟、焦、京易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直以来在民间流传的“太乙”、“六壬”、“奇门”,被人们称为“三式”,是中国古代式图观念的三种表现形式。“三式”皆是以天、地、人三盘为其式盘模式,表现出中国古代天人一体、时空一体的观念。虽然“三式”在流传的过程中有被神化的成分,但从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与“三式”相关的古代式盘来看,“三式”所反映的观念确实源远流长。

据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考》(修订版)中的统计,截至他出版此书时,已出土的古式共有 8 件,分别是:(1)漆木式(西汉初),1997 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M1(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年代在公元前 165 年后不久)出土,有天盘与地盘;(2)漆木式(西汉初),出土同上,有天、地二盘;(3)象牙式,传山西离石出土,仅存天盘;(4)漆木式(西汉末),1972 年甘肃武威磨咀子 M62(年代在王莽时期)出土,有天、地二盘;(5)漆木式(西汉末或东汉初),1925 年朝鲜乐浪遗址(在平壤南部)石岩里 M201(年代在王莽时期或东汉初)出土,仅存天盘;(6)漆木式(东汉初),1925 年朝鲜乐浪遗址王盱墓(年代在东汉明帝末或章帝前后)出土,

有天、地二盘,但均残破不堪;(7)铜式(东汉),仅存地盘;(8)铜式(六朝晚期),有天地二盘。

这些式盘所反映的式图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孟、焦、京易学的含义。这种式图观念同样反映于古代的《日书》之中,我们在此以睡虎地秦简《日书》为例作一下简要的说明。比较典型、全面的式图是以北斗七星为核心,将天干、地支、二十八宿、八卦、六十四卦等纳入圆盘之中。其实,在传世文献中,《管子》中的《幼官》所描述的君主所服服色与方位四时之配应,《四时》篇所描述四时之变化,《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述的天文、律吕与历法,皆可浓缩于式图之中。而《淮南子·天文训》不仅是对十二地支浓缩于一张式图的描述,而且还提到了十二地支中之三合局之关系及木火土金水五行之生壮死之说:“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这与后世所传《纳甲筮法》中亥卯未合木局,寅午戌合火局,巳酉丑合金局,申子辰合水局以及未为木库,戌为火库,丑为金库,辰为水库之说相类。从睡虎地秦简《日书》可以看出,《淮南子》中的这些说法应来源甚古。

睡虎地秦简《日书》有关于选择迁徙之吉月的记载:“正月、五月、九月,北徙大吉……二月、六月、十月,东徙大吉……三月、七月、十一月,南徙大吉……四月,八月、十二月,西徙大吉。”<sup>①</sup>十二地支分别对应于十二月。这里的正(寅)月、五(午)月、九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戌)月正是寅午戌所合之火局;二(卯)月、六(未)月、十(亥)月正是亥卯未所合之木局;三(辰)月、七(申)月、十一(子)月正是申子辰所合之水局;四(巳)月、八(酉)月、十二(丑)月正是巳酉丑所合之金局。如果按式图所说的东方为木、南方为火、西方为金、北方为水之说,那么这里所说的寅午戌月迁徙大吉之方向为北,正是与南方火局对冲的方向;亥卯未月迁徙大吉之方为东,则是与东方木局相同的方向;申子辰月迁徙大吉方向为南,又是与北方水局对冲之方向;巳酉丑月迁徙大吉之方向为西,则又是与西方金局相同之方向。有水火可以相交,而金木不可相战之意。

《作事》篇说:“二月利兴土西方,八月东方,三月南方,九月北方。”<sup>①</sup>据式图观念,二(卯)月位居东方,利于在其所冲之西方兴土;八(酉)月位居西方,利于在其所冲之东方兴土;三(辰)月与七(申)月、十一(子)月合成北方水局,利于在此合局所冲之南方兴土;九(戌)月与正(寅)月、五(午)月合成南方火局,利于在此合局所冲之北方兴土。

《啻》篇有:“春三月,毋起东乡室。夏三月,毋起南方室。秋三月,毋起西向室。冬三月,毋起北乡室。有以者大凶,必有死者。”<sup>②</sup>根据式图观念可知,春三月与东方木位相配应,这里要求在春三月不要起东向之屋,显然是由于春三月旺气在东方,不可与旺气相冲之故。其他三个方向也是这个道理。

《室忌》篇载有:“春三月庚辛,夏三月壬癸,秋三月甲乙,冬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②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三月丙丁，勿以筑室。”<sup>①</sup>据式图观念，春三月属东方木位，而庚辛则属于与东方相冲之西方金位；夏三月为南方火位，而壬癸则属于与南方相冲之北方水位；秋三月为西方金位，而甲乙为与西方相冲之东方木位；冬三月为北方水位，而丙丁属于与北方相冲之南方火位。而《室忌》在这里说春三月之庚辛日，夏三月之壬癸日，秋三月之甲乙日，冬三月之丙丁日不可以筑室，显然是为了避开相冲之位。这是将天干纳入式图观念的明证。

特别是《五行》篇说到“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火胜土，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sup>②</sup>，直接把五行相胜及五行所居方位引入式图之中。

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其他篇章中，仍有许多与式图观念相关的内容。以上内容可以说明，睡虎地秦简《日书》深受式图所符示的时空一体观的影响。但从出土的《日书》等资料中我们尚未看到在孟喜以前直接将易卦与式图相配应的内容。传世本《说卦传》亦是式图观念的一种反映。从下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孟、焦、京之《易》阴阳系统深受式图观念之影响，只是他们加入了更多卦象的内涵。搞清楚式图所寓示的意义之后，我们就易于了解孟、焦、京《易》阴阳系统所要表达的意义了。

### 三、孟喜卦气说之建构原则

根据其配应之不同，卦气说可分为四正卦卦气说，八卦卦气说，十二消息卦卦气说，七十二候卦气说或六日七分说。多数学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②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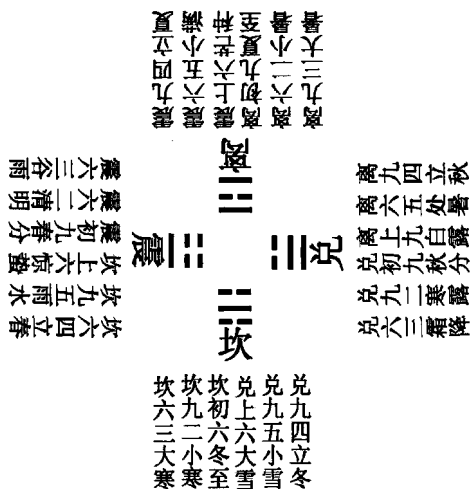
者认为,四正卦气说、十二消息卦气说,七十二候卦气说或六日七分说为孟喜所创,而京房又将七十二候卦气说进一步完善。学术界将八卦卦气说归于京房。卦气说是对中国古人时空一体、天人一体观的进一步落实,是对《易传》三才之道的发展。我们在此首先对孟喜卦气说进行探讨。

#### (1) 四正卦卦气说所彰显的时空一体图景。

四正卦卦气说是将坎震离兑四卦与冬春夏秋之二十四节气相配应的一种学说。四正卦卦气说是其他种卦气说的基础,是将《周易》卦爻与节气之间的初步配应。根据《说卦传》所寓示的含义,坎、震、离、兑分别与冬、春、夏、秋四季相配应,所以后人将这种更为具体的配应称为四正卦卦气说。关于四正卦卦气说,唐僧一行《卦议》有云:

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固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南正,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新唐书》卷二十七)

坎、震、离、兑四正卦又被称为方伯卦。每卦有六爻。这里将四正卦二十四爻分别与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相配。今据宋代易学家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所引李溉卦气图作四正卦卦气图如下:



《说卦传》云：“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这里说“兑，正秋也”，正秋即是秋分。这里已经寓有坎主冬至，震主春分，离主夏至之意。由此可知，《说卦传》已将坎、震、离、兑与四正方位及二分二至相配应。上文说“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坎卦(䷜)可以表征出“以阴包阳”之象，但不能表征出“微阳动于下”之象，“微阳动于下”显然与十二消息卦中的复卦(䷗)卦象相合。又说“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此与震卦(䷲)卦象相符；又说“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离卦(䷝)卦象可以符示出“以阳包阴”之象，但符示不出“微阴生于地下”之象，而十二消息卦中的姤卦(䷫)则可以符示“微阴生于下”之象。因此，四正卦卦气说亦有十二消息卦卦气说的内涵。据传世资料可知，《周书·时训》首先提到二十四节气，但《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

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故知《时训》所说二十四节气当为后人所篡改或增入,不足为信。《吕氏春秋·十二纪》虽然提到了七十二候,但没有提及二十四节气。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采纳了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才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可信的完整的二十四节气之名称最早出现于《淮南子·天文训》。其说为:

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艮则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卯则雷惊蛰,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辰则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巳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午则谷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未则立夏,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小满,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酉则芒种,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戌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亥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子则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丑则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寅则处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卯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则秋分雷戒,蛰虫北乡,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巳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午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未则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申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酉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

五手指子。<sup>①</sup>

这是以斗杓所指定出二十四方位与二十四节气相互配应之关系,形成一副完整的时空合一的宇宙图式。吕不韦汇集天下英才而作的《吕氏春秋》里面没有这样详细的配应,说明这种配应应该是汉初至武帝初特别是文景之时黄老道学兴盛时期完成的。与《史记·律书》不同的是,这里将十二律吕在一年二十四节气中配应了两轮,而《史记·律书》将十二律吕与一年十二月相配,只配应了一轮。郑玄之纳辰说与《史记·律书》的配应一致。显然,《淮南子·天文训》在这里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十天干中的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十干,以及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阳之维、蹄通之维等四维共二十四项与二十四节气相配属。这里的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通之维、蹄通之维等没有像后世那样代之以艮、巽、坤、乾四卦,说明在写《淮南子·天文训》之前还没有将这四隅之卦纳入此系统,这至少说明《淮南子》的作者没见过或不接受艮、巽、坤、乾与四隅之配应。因此,四正卦卦气说应是据《天文训》此段配应而来,从而说明四正卦卦气说之形成不会早于武帝初年。如果四正卦卦气说来自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那么,至少“《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中的此部分内容也不会早于武帝初期。

孟喜是怎么用四正卦卦气说解说阴阳灾异的,我们已无从得知。黄奭等所辑《孟喜章句》除上文所引一段之外,其他部分没有与四正卦卦气说相关的内容。但《汉书·五行志》有据四

---

<sup>①</sup> 何宁:《淮南子集释·天文训》(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4-218页。

正卦说解说灾异的内容。如《尚书·洪范》有：

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艾，明作兹，聪作谋，睿作圣。休征：曰肃，时雨若；艾，时阳若；兹，时奥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咎征：曰狂，恒雨若；僭，恒阳若；舒，恒奥若；急，恒寒若；雾，恒风若。<sup>①</sup>

貌、言、视、听、思分别与木、金、火、水、土相配应。对于此休征所说“时雨若”、“时阳若”、“时奥若”、“时寒若”，《汉书·五行志》如此解释：

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奥，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逆之，其极曰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sup>②</sup>

这是用四正卦卦气说来解说灾异。在此，《五行志》既运用了四正卦所主之方位与季节，又运用了四正卦所属之五行属性，旨在说明人君的外貌、言语、视容、听力以及思虑要与其位相配，才不会发生灾异现象，贯穿的是一种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理念。

《周易集解》由唐人李鼎祚集汉魏乃至唐代三十余家《易》注而成，以象数注《易》为主，是研究汉代象数易学的必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评价其价值：“千百年后，学者得以考见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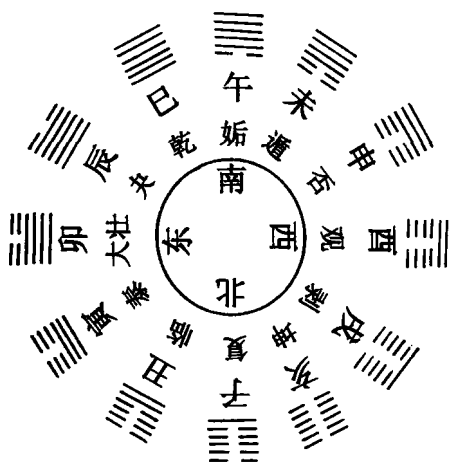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51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54页。

画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周易集解》所辑诸家《易》注中，有运用四正卦卦气说注《易》者。如《随》卦(䷐)初九之《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郑玄注曰：“‘震为大涂’，又为日门。当春分，阳阳之所交也。”这是以四正卦卦气说注《易》。《益》卦(䷩)初九爻的爻辞为：“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虞翻如此注解：“……震，二月卦，‘日中星鸟’……”也运用了四正卦卦气说。四正卦卦气说与其他卦气说有许多内在的联系。四正卦卦气说从大的框架上将四正卦之二十四爻与二十四节气相配应，形成一个较为疏阔的时空合一天宇宙图式。它受《淮南子·天文训》之二十四节气与二十四向配属关系所形成的宇宙图式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2) 十二消息卦卦气说所彰显的阴阳盈虚理念。

所谓十二消息卦，是指符示阴阳二气消退与息长的十二个卦：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其中前六卦即从复卦到乾卦，表示阳息阴消；后六卦即从姤卦至坤卦，表示阴息阳消。十二消息卦卦气说即是将这十



二卦分别与十一(子)月、十二(丑)月、正(寅)月、二(卯)月、三(辰)月、四(巳)月、五(午)月、六(未)月、七(申)月、八(酉)月、九(戌)月、十(亥)月相配应。以式图的方式表示则为：

据此式图可知，从



十一(子)月到四(巳)月,正好是一个从“一阳来复”至阳气盛大的过程,从五(午)月至十(亥)月正好是一个微阴始生至阴气盛大的过程。十二消息卦卦气说十分形象地将十二消息卦与一年十二个月相配应,据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消息盈虚,符示出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常态变化规律。

唐僧一行在其《卦议》中指出,十二消息卦气说出自孟喜:“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志第十七上历三上])但《易传》已于多处提及“消息”,如《丰·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从《复·彖》“刚长也”,《临·彖》“刚浸而长”,《泰·彖》“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夬·彖》“夬,决也,刚决柔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遁·彖》“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否·彖》“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剥·彖》“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等语可以看出,《彖传》作者确实已注意到阴阳消长与卦象之配应关系。这种配应应是后人归之于孟喜的“十二消息卦卦气说”之源头。而《复·彖》“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确实表明了复卦与仲冬十一月之关系。《丰·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节·彖》“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随·彖》“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等说法更突出了《易传》要求人们“顺时而行”的思想。又据《系辞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等说,可知将卦爻符号的阴阳消息与历法中之日月运行之常态相结合,当在先秦早已完成。《史记·历书》亦云:“盖黄帝考定

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皇侃注云:“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正如李道平先生所说,“消息之义,盖已古矣”<sup>①</sup>。宋代易学家朱震在其《汉上易传》卦图中有关《复》“七日来复”图下有云:

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京房曰:“六爻反复之称。”陆绩曰:“六阳涉六阴,又下七爻在初,故称‘七日’,日亦阳也。”虞翻曰:“消乾六爻为六日,刚来反初。”盖先儒旧传自子夏,京房、陆绩、虞翻皆以阳涉六阴,极而反初,为七日。

刘玉建教授据此认为,子夏在此正是以十二消息卦卦气说来解释“七日来复”,并进一步指出,“《子夏易传》不仅影响了西汉的孟喜与京房,而且汉魏时期的马融、郑玄、荀爽、虞翻、陆绩、《九家易》以至于唐代的崔憬、李鼎祚等人的许多易学思想,亦出自《子夏易传》”<sup>②</sup>。笔者以为,子夏的这种解释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坤卦(䷁)代表六日,复卦(䷗)之初爻代表一日,这样一共是七日,那么,言外之意即为十二消息卦每卦主六日,这样十二消息一共主 72 日,与十二消息卦主一年当期之日的预设不符。

《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 486 年)有这样一段记载:

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

①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14 页。

②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册)。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7 页。

可。”

这里提到“子，水位也”，杜预注曰：“赵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sup>①</sup>虽然这里“子”指宋之姓，但亦明确指北方水位，可证至晚在春秋末期已将“子”与北方水位相配应，将其他十一个地支与方位相配亦应在情理之中。另外，《左传·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有载：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汉书·五行志》所引《说》对此段是如此解释的：

颛顼以水王，陈其族也。今兹岁在星纪，后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陈将复封”。楚之先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则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为火二牡，木以天三为土十牡，土以天五为水六牡，火以天七为金四牡，金以天九为木八牡。阳奇为牡，阴耦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于《易》，《坎》为水，为中男，《离》为火，为中女，盖取诸此也。自大梁四岁而及鹑火，四周四十八岁，凡五及鹑火，五十二年而陈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

① 李学勤主编，于振波整理：《春秋左传正义》（下）（《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页。

也”。哀公十七年(公元前 478 年)七月己卯,楚灭陈。<sup>①</sup>

由上文所云“水胜火”及此处所云“火,水妃也”可知,至晚到春秋时期,五行相胜说已经流行。而《汉书·五行志》所引《说》的解释应该符合郑裨灶的原意。如此则宋人多称之为河图之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之说亦有可能在春秋时期即已存在。再结合上文子与水位相配之说可知,与后世所谓河图相类的式图对十二消息卦卦气说当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僧一行将之归于孟喜的十二消息卦卦气说之来源确应十分久远。

另外,董仲舒在谈论阴阳之关系时说道:“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故阴,夏入居下,不得任岁事,冬出居上,置之空处也。”<sup>②</sup>董仲舒这样论证阴阳之关系,旨在规劝人君通过顺应天道而崇尚仁德、忌用刑杀。而他在这里所说的阴气“夏入居下”,“冬出居上”的描述正好与仲夏五月姤卦(䷫)之卦象及仲冬子月复卦(䷗)之卦象相符。因此,董仲舒在建构其阴阳灾异体系时有可能受到十二消息卦卦气说的影响。

虽然十二消息卦卦气说之源甚古,但在孟喜之前,我们尚难以看到据此说以言阴阳灾异之资料。孟喜是如何以此言阴阳灾异的,我们亦无从得知。而《汉书·五行志》引有据十二消息卦卦气说推言灾异之内容。《左传·定公元年》(公元前 509 年)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27 - 1328 页。

②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阳尊阴卑第四十三》(《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327 页。

有：“十月，陨霜杀菽。”杜预注曰：“无传。周十月，今八月。陨霜杀菽，非常之灾。”孔颖达《正义》曰：“《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应霜杀菽。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谷，今以八月陨霜，霜能杀菽，是非常之灾，故书之。僖三十三年‘陨霜不杀草’，此云‘杀菽’彼言‘不杀草’者，《谷梁传》曰：‘未可以杀而杀，举重；可杀而不杀，举轻。其曰菽，举重也。’<sup>①</sup>说明这一年八月霜应不至而至，而所至灾异则十分严重。杜预所《注》与孔颖达《正义》都没有将此灾直接与当时的政治相联系，且《正义》仅以《月令》来说明此月霜不应至。而“刘向以为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为《观》，阴气未至君位而杀，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时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见灾以视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陨霜不杀草’，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后卒在臣下，则灾为之生矣。异故言草，灾故言菽，重杀谷。一曰菽，草之难杀者也，言杀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杀草，知菽亦不死也”<sup>②</sup>。据十二消息卦卦气说，观卦(䷓)为八月卦。据爵位说可知，五爻为君位，而观卦是由阴消乾卦(䷀)至第四爻而成，尚未消至五爻君位，所以刘向认为此象表示“阴气未至君位而杀，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刘向在这里是以卦象来推言灾异，旨在说明此灾异之发生乃由于当时季氏专权之故。

《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

① 李学勤主编，于振波整理：《春秋左传正义》(下)(《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1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6页。

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这是平子、太史等对发生于昭公十七年（公元前 525 年）一次日食所发表的看法。这里所说的“正月”杜预注为“谓建巳正阳之月”，“慝，阴气也。四月纯阳用事，阴气未动而侵阳，灾重，故有伐鼓用币之礼也”。“日过分而未至”指“过春分而未夏至”<sup>①</sup>。《汉书·五行志》引《说》曰：“正月谓周六月，夏四月，正阳纯乾之月也。慝谓阴爻也，冬至阳爻起初，故曰复。至建巳之月为纯乾，亡阴爻，而阴侵阳，为灾重，故伐鼓用币，责阴之礼。降物，素服也。不举，去乐也。避移时，避正堂，须时移灾复也。啬夫，掌币吏。庶人，其徒役也。”<sup>②</sup>杜预注“慝”为“阴气”，而《说》注“慝”为阴爻，并说明四月纯乾(䷀)之月是从复卦(䷗)阳爻逐渐息长而来。四月为乾(䷀)纯阳之卦主之，没有阴爻。其时“日有食之”，说明阴侵阳，为灾重。所以才有以上所说的那些避灾之措施。这里正是用十二消息卦卦气说释此灾异。

传世资料虽然见不到孟喜以十二消息卦推言灾异之内容，《周易集解》有孟喜对《坤·文言》“阴疑于阳必战”之注解：“阴乃上薄，疑似于阳，必与阳战也。”清人李道平疏曰：“阴迫于上，变而为阳，则‘疑似于阳’，故‘必与阳战也’。”这是说阴极必变为阳。潘雨廷先生加案语曰：“《说卦》‘战乎乾，言阴阳相薄也’。坤上六兼有群阳，与乾合体，战而相薄，乃能牝震。阴不

① 李学勤主编，于振波整理：《春秋左传正义》（下）（《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58—1360 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96 页。

与阳同盛，不能受化也。”<sup>①</sup>从上下文来看，潘雨廷先生的案语应该符合孟喜的原意。这是孟喜以气来释《易》的明证，说明他赞同以气释《易》，这就是他为什么承认以气释《易》的蜀人赵宾之说的原因。另外，《周易集解》还辑有孟喜对《丰》卦上六《象》辞“丰其屋，天际祥也”之注释：“天降下恶祥也。”李道平疏曰：“昭十八年《左传》‘郑之未灾也，里析曰“将有大祥”’。《汉书·五行志》‘妖孽自外来谓之祥’。是‘祥亦恶征也’。”<sup>②</sup>可见，孟喜这里所说的“恶祥”乃是较重之灾异，这也是孟喜注重灾异说的一个佐证。

《周易集解》中有许多易家用十二消息卦卦气说注《易》。如东汉易学家马融如此注《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晋代易学家干宝则曰：“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意谓乾卦(䷀)乃是从复卦(䷗)之一阳逐步息长而来，而乾卦初九爻正好表征“一阳来复”，与仲冬十一(子)月相对应，象征着阳气始动于地下之黄泉。《临》卦卦辞有“至于八月有凶”，东汉易学家郑玄注为：“……临卦斗建丑而用事……临自周二月用事，迄其七月，至八月而遁卦受之，此终而复始，王命然也。”指临卦主丑(十二)月。周正建子，故丑月于周为二月。遁卦(䷗)主六月，于周为八月，故有此说。《坤·上九》：“龙战于野”，东汉荀爽注为：“消息之位，坤在于亥。”《复·彖》：“复，其见天地之心。”荀爽注为：“复者，冬至之卦。阳起初九，为‘天地

①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3页。

②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88-489页。

心’。”显然是以十二消息卦卦气说注《易》。虞翻在注《系辞传》“寒往则暑来”时曰：“谓阴息阳消，从姤至否，故‘寒往暑来’也。”注“暑往寒来”时则曰：“阴拙阳信，从复至泰，故‘暑往寒来’也。”由于乾卦配应于西北寒凉之地，所以虞翻认为乾为寒；由于坤卦位于西南暑热之地，所以他又以坤为暑。从姤(䷫)至否(䷋)，伴随着阴息阳消，内卦从原来的乾卦(☰)变为坤卦(☷)，故称“寒往暑来”；从复(䷗)至泰(䷊)，伴随着阴拙阳伸，内卦由原来的坤卦(☷)变为乾卦(☰)，故称“暑往寒来”。显然，虞翻在此是以十二消息卦卦气说来注此段内容。

如前所述，孟喜所处的时代正是学术分化、章句之学开始盛行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可知，“《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三家在宣帝末之前皆立于学官，以上内容当是三家授徒的内容。施雠谦让而守师法，所以施氏《易》代表的是丁宽、田王孙一系的易学传统；孟氏《易》是在田王孙易学系统上再加入“《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内容；梁丘《易》代表的是杨何、京房（杨何弟子，曾任太中大夫，后出任齐郡太守）一系的易学传统。虽然孟喜在一开始承认好小数的蜀人赵宾为他的学生后来又不承认而不见信，但他在注《易》、授《易》时一定加入了阴阳灾异说的内容。从《汉书》来看，在孟喜之前，已有董仲舒、眭孟据《公羊春秋》言灾异，夏侯始昌据《洪范五行传》言灾异。尽管《汉书》没有直接记载孟喜以《易》来释阴阳灾异，但从他自称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来看，以《易》释阴阳灾异则应该肇始于孟喜，而充实、完善《易》之灾异说则是由焦延寿与京房来完成的。十二消息卦卦气说是诸卦气说中的主干，其源头也应当甚早，《易传》已经以“消息”之意来释《易》。且十二消息卦卦气说应该是下文所论“六日七



分”说之建构框架。“六日七分”法暨七十二候卦气说是对十二消息卦卦气说的进一步细化。

### (3) “六日七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解析。

《系辞上》有这样一段话：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乾之册二百一十有六，坤之册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sup>①</sup>

这里描述的是“大衍筮法”之步骤。依照宋人的说法，五十根蓍草，只用四十九根，其中一根不用，以象太极；然后把四十九根随意一分为二于左右两手中，象征太极生两仪；然后从右手蓍策中取一根置于左手无名指与小指之间，象征“三才”；然后将左右手之策以四根为一组而数之，象征“四时”；归余数于指间象征闰余；再扚而后挂象征五年中有两次闰月。这样，揲筮的过程就象征着宇宙衍化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揲筮，乾卦共有六爻，每一爻经十八变之后，皆得 36（即  $9 \times 4$ ，9 为老阳之数，4 代表四时）策，故六爻之策为  $36 \times 6 = 216$ （策）；坤卦六爻，每一爻经十八变之后，皆得 24（ $6 \times 4$ ，6 为老阴之数，4 代表四时）策，故六爻之策为  $24 \times 6 = 144$ 。乾、坤两卦策数相加，即  $216 + 144 = 360$ ，360 正与一年三百六十日天数相当。<sup>②</sup> 这样，乾坤两卦就象征着一年之期。因为帛书《系辞》没有这一段话，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这

①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5 年版，第 369 - 372 页。

②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9 页。

一段话是后来汉人篡入的。李学勤先生指出,此章的后部,内容与形式都与《系辞》其他各章融合无间,因而这一章应该是《系辞传》固有的。<sup>①</sup> 廖名春先生认为,根据今、帛本《系辞》的上下文来看,帛书《系辞》的祖本应该是有完整的“大衍之数”章的。<sup>②</sup> 笔者赞成李、廖二位先生的观点。因此,在《系辞传》作者看来,“大衍筮法”即象征着天地四时的衍化形成过程,这样,据“大衍筮法”即可进行占筮以占知未来。这一《易》筮系统被梁丘贺及其弟子张禹等所继承、发展。而在这一系统被继承、传播的同时,又兴起了一种以式图观念与卦爻象相结合的《易》阴阳推断系统。上文所说的四正卦卦气说与十二消息卦卦气说都属于这一系统。而更为细致的《易》阴阳推断系统则表现于另一种卦气说——“六日七分”说中。

“六日七分”说是将一年 365 又 1/4 日与六十四卦卦爻系统相相应,并将七十二候纳入其中的一种观念。只是这种配应在孟喜、焦贛、京房之间稍有不同。我们在这里首先介绍孟喜的“六日七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志第十七上历三上》一行《卦议》引《孟氏章句》曰:

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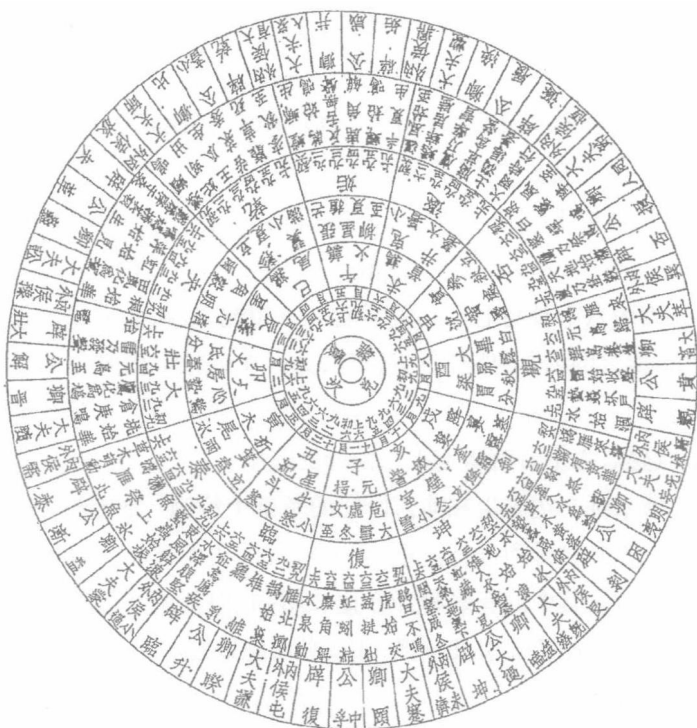
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复初。

意谓自仲冬十一月冬至初候开始,配以中孚卦,然后与其他卦依据一定的原则分配在一年 365 又 1/4 日之中。据僧一行所引

① 李学勤:《帛书〈系辞〉略论》,载《齐鲁学刊》1989 年第 4 期。

② 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0 页。

《孟氏章句》及所制孟氏卦气图,孟喜将一年 365 又  $1/4$  日分布于除坎、离、震、兑四正卦以外的其他六十卦中,并将二十四气中的七十二候分布于诸卦中,四正卦只主四季,不主具体之日。这样,365 又  $1/4$  日除以 60 即得 6 又  $7/80$  日,简称“六日七分”,即除四正卦以外的每一卦所值日数为“六日七分”。今引黄元炳所绘卦气图于下:



“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图

据孟氏“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除坎、离、震、兑以

外的六十卦被分成五组,并以官爵之号命名之,每一组十二卦。如此,则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便与六十卦相配应。这五组卦分别为:

①辟卦十二:《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

②公卦十二:《中孚》、《升》、《渐》、《解》、《革》、《小畜》、《咸》、《履》、《损》、《贲》、《困》、《大过》。

③侯卦十二:《屯》、《小过》、《需》、《豫》、《旅》、《大有》、《鼎》、《恒》、《巽》、《归妹》、《艮》、《未济》。

④卿卦十二:《睽》、《益》、《晋》、《蛊》、《比》、《井》、《涣》、《同人》、《大畜》、《明夷》、《噬嗑》、《颐》。

⑤大夫卦十二:《谦》、《蒙》、《随》、《讼》、《师》、《家人》、《丰》、《节》、《萃》、《无妄》、《既济》、《蹇》。

因为六十卦与七十二候不能一一相配,故在七十二候卦气说中,侯卦的内卦、外卦分主两候,共二十四候。内卦主上月中气之末候,外卦主下一个月节气之初候。其余四十八卦各配一候。这样,六十卦就将七十二候分配完毕。

清末阮文达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特制《卦气表》一幅,并对六十卦之排列进行注解,主要从气的角度彰显六日七分之涵义。虽然其中的有些解释亦比较牵强,但其说亦可谓一以贯之。我们在此特征引其解释,并在必要的地方加入笔者案语,以表明笔者之观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卦气表》作者阮文达先生对这一卦序各卦排列之理解,从而对六日七分说暨七十候卦气说之建构原则进行探讨。

卦气始中孚者何也?孚者,信也。万物有生之信,其气

浑于黄钟,如鸟之孚卵,故曰中孚。孚从爪从子,子位北值坎之初爻而广漠风至。日躔次于牵牛之初度,则丑与子合,冬至入第四爻也。<sup>①</sup>

这是从“孚”之象形之意解释卦气起中孚之缘由。需要注意的是,阮文达先生这里说冬至对应坎之初爻,这是从四正卦卦气说的角度来解释,与上文所用黄元炳先生卦气图不符,因为据黄图冬至对应的是坎卦六四爻,当以阮说为是。此处“子位北值坎之初爻”,是采四正卦卦气说,“广漠风至”则指正北方坎对应广漠风。这是采“八风”说(详见后文京氏易学“八卦卦气说”部分)。又案: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论中,中宫天极星被视为整个宇宙的中心,所谓“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sup>②</sup>,从而衍生出中国古代的太一崇拜,东汉易学家将“易有太极”之“太极”解释为“太一”<sup>③</sup>,亦是受此等观念的影响。而北斗七星像帝车一样以中宫天极星为中心携住东方苍龙七星之龙角而运转不息,所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sup>④</sup>。中宫天极星在正北方位。“中”象征整个宇宙之正中,于五行为土;“孚”为信,于五行亦为土。得中才能生万物。即便是历法中的置闰,也是为了得中:“历数以闰定天地之中”<sup>⑤</sup>，“朔不得中,是谓闰月,言阴阳虽交,

①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48页。

② [汉]班固:《汉书·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4页。

③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81页。

④ [汉]班固:《汉书·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4页。

⑤ [汉]班固:《汉书·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9页。

不得中不生”<sup>①</sup>。“六日七分”说将中孚与冬至、黄钟相配应，而冬至又与坎卦相配应，有可能受这种观念的影响。

次以复，何也？生物者，天地之心。自霜降以后交剥卦而艮而既济而噬嗑而大过而坤而未济而蹇而颐而中孚至是，日舍婺女，天心乃迁焉。<sup>②</sup>

这是从天文的角度来解释复卦被置于此的原因。案：十二辟卦为各月的主卦，当时设计此次序时，应该是先定好四正卦的位置，然后再将十二消息卦即辟卦设置于各个月，以形成一种阴阳消息之大的框架，然后再依据一定的原则将公、侯、卿、大夫之卦配入其中。而复卦正好为仲冬十一（子）月之辟卦，象征“一阳来复”，其所主日数在此则为六日七分。

次以屯，何也？阳气初动，屈而未信，象初生，屯然而难。屯字从屮从一，一者地也，屮尾屈曲上𠄎下𠄎，亦屈而未信之象，此天地生物之第一候也。日次玄枵，斗建指丑，小寒气应在第四爻。

阮氏在此对屯的解释较合理形象。这里的“小寒气应在第四爻”指屯卦内卦主十一（子）月之末候，而外卦从第四爻主十二（丑）月之初候。案：屯卦(䷂)上为坎(☵)水，下为震(☳)动，正合与此相配之“水泉动”之物象。亦有下虽然一阳来复，而上仍有寒冰之气覆盖之象。

次之以谦，何也？谦，纤也，阳气盎然而物尚守其纤细，如人之谦。日舍于虚，虚故益谦矣。

这是以“谦”之释议及日所舍来释之，其义可取。案：谦卦(䷎)

① [汉]班固：《汉书·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984 页。

②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 448 页。以下引文同。

上坤(䷁)下艮(䷳),象征一阳虽上升至第三爻,犹有坤地覆之,无如艮而止之,虽有阳气而止于地下,正是寒冬之时。

次以睽,何也?物机欲化,各以类触,如有乖戾。所谓同而异也。<sup>①</sup>

此解很好。若只根据阴阳画之数及火、泽之象则难以释通。

次以升,何也?值坎六三,大寒气应。日舍于危,阴不敌阳。阴袭物而幕之,阳扶物而穿之。<sup>②</sup>

案:前有一阳而止于地下(指谦卦),今有二阳升于地中,阳气渐升于地中之象也。《易纬》与孟、京易学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我们在此把《易纬》相关之说一并引出,以便了解汉人之意。《易纬·乾凿度》如此释之:“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阳气升上,阴气欲承,万物始进,譬犹文王之修积道德,弘开基业,始即升平之路。当此时也,邻国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泽而承吉。九三可处王位,享于岐山,为报德也。明阴以显阳之化,民臣之顺德也。”<sup>③</sup>《乾凿度》在此既以气来释之,又力求解通卦爻辞之义,其所谓“阳气升上,阴气欲承”乃同于荀爽之“阳升阴降”说,意谓九二阳爻欲升五,九四阴爻欲承之。

次之临,何也?临从卧从品。卧者,地也;品者,物也。

品物地类,乾元出之,阴虽盛而弱阳渐进而强。

阮氏在此只从“临”字之结构来分析。案:阳虽渐增而进,犹纽结于地中。《易纬·乾凿度》如此释之:“临者,大也。阳气在内,中和之盛,应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万民……”<sup>④</sup>前文已述,

①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48-449页。

②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49页。以下引文同。

③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4页。

④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8页。

“六日七分说”之制作者当以十二消息卦为其基本框架,因为十二消息卦能十分形象地表征出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阴阳盈虚。

十二消息卦卦气说象征阴阳二气在一年中大的消息盈虚,但我们知道,不管是酷暑之到来,还是严寒之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冬至经春天到夏至,总是热几天,然后再夹杂着冷几天,而总的趋势是阳气越来越盛,乃至到夏至时阳气最盛。从夏至经秋天到冬至之过程也是一样,只是总的趋势是阴气越来越盛行,乃至冬至之时,阴寒之气最盛。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阴阳消息之表征,人们无法以此详细地推断阴阳灾异。而六日七分说则在细微处将阴阳符号与天道密合一体,从而为当时盛行的推断阴阳灾异提供了方便。

《汉书·京房传》称京房的老师焦延寿之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sup>①</sup>,应该就是与六日七分说暨七十候卦气说相似的“焦林值日”法进行阴阳灾异推断的。那么这里的“寒温”是何意呢?《易纬·稽览图》卷上有这样一句话:“非太平而杂卦,以其度效一辰,则可矣。唯消息及四时,卦当尽其日。”郑玄注曰:“杂卦九三、上六决温,九三、上九微温,六三、上九决寒,六三、上六微寒……”<sup>②</sup>是说,对于杂卦来说,如果是第三爻为阳爻、上爻为阴爻,即九三、上六这种情况,温之上升决然而快;如果是九三、上九这种情况,温之上升则相对微小。同样,如果是其卦为六三、上九,寒气加重会决然而快;如果是六三、上六,寒气加重则相对微小。其实辟卦也符合此说。我们以此说来看一下六日七分图中从屯卦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60页。

②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42页。



至临卦之寒温变化。屯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谦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睽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升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临卦(䷒)为六三、上六,属微寒。从以上五卦来看,有三卦为阴寒之气,两卦为阳温之气,所以,从六日七分说的设计者来看,在这一个月中,按常态来讲,应该以寒为主,中间只有两卦所主之阶段(每卦主六日七分)属于决温。

我们接着看阮文达对接续下来的卦之解释。

次以小过,何也?旁通中孚。自中孚阳信一动历四十二日四十九分,而春气将至,又三百二十一分。日在艮,斗建指寅,物意蠢蠢,当第四爻也。<sup>①</sup>

阮氏在此以旁通卦进行解释较为牵强。这里所说的“当第四爻”指外卦震(䷲)主正(寅)月,而内卦艮(䷳)仍主丑月。案:小过(䷛)内艮(䷳)为止,外震(䷲)为动,阴气止于地下而阳气动于地表之象。

次以蒙,何也?阳气欲舒,万物孚甲,如童蒙然。

此释很好,于义可通。

次以益,何也?万物增益,以蕃以殖。

案:益卦(䷩)上巽(䷸)下震(䷲),阳复地中,风行地上之象。《易纬·乾凿度》说:“益者,阳用事,而雷风益万物也,上自损以益下。”又说:“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气下施,万物皆益……”<sup>②</sup>这像是以卦变说进行解释,即益卦(䷩)是由否(䷋)变来,如蜀才所说“乾之上九下居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sup>③</sup>。

①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49页。以下引文同。

②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4-85页。

③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61页。

次以渐，何也？自小过之四爻立春至此又十五日，而至坎之九五，气应雨水，万物锐上。

案：渐卦(䷴)上巽(䷸)下艮(䷳)，一阳渐升至地表，风行地上之象。

次以泰，何也？天与地交，万物棣通。日舍东壁，春气斯中。

案：泰卦(䷊)为正(寅)月辟卦，天气下降，地气上腾，阳气积至地表之象。《乾凿度》称：“泰者，天地交通，阴阳用事，长养万物也。”<sup>①</sup>又说：“泰者，正月之卦也。阳气始通，阴道执顺……”<sup>②</sup>从小过至泰共五卦，主要主正(寅)月。小过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蒙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益卦(䷩)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渐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泰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其中两个决温卦、两个决寒卦、一个微温，总的趋势是中和偏温。

次以需，何也？需者，濡也。物生尚稚，有以濡之。日舍于奎。三爻而移，既登外卦，乃应惊蛰，值坎上六也。此解甚好。“三爻而移”指内卦主正(寅)月末候；“既登外卦”指外卦主二(卯)月初候。

次以随，何也？阳乘雷行，万物从之。此解亦很好。另案：随卦(䷐)上兑(䷹)下震(䷲)，阳气积于地上，乘雷而行之象。《乾凿度》云：“随者，二月之卦，随德施行，藩决难解。万物随阳而出……”<sup>③</sup>

次以晋，何也？乾魂下游，坤魄上薄。自立春至此已四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84 页。

②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89 页。

③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85 页。

十五日，万物之生，有进有退。

案：晋卦(䷢)有“明出地上”之象，象征早晨太阳从正东方升起，而正东方又值春分。晋卦所符示的乃是春分将至之象。

次以解，何也？气应春分也。凡三百六十，当期之爻，皆自屯难之爻而始，至春分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天地之屯难释焉。

此解甚好，与卦气本义相合。亦说明把解卦安排在此有可能受《解·彖》“雷雨作而百谷草木皆甲坼”之影响。

次以大壮，何也？阴消而阳坚也。

案：大壮为二(卯)月辟卦，阳息至四。其阴阳消息之象甚明。

以上五卦主要主二(卯)月。其中需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随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晋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解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大壮(䷡)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在总体趋势变温的情况下仍杂以微寒、决寒。

次以豫，何也？万物熙熙，咸怀悦豫。三爻值震之初九，四爻值震之六二。日舍大梁，斗建指辰，气应清明。

案：《汉书·五行志》正好引有对此卦之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人对此卦之理解：“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言雷复归。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避盛阴之害；出地则养长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是时，隐以弟桓幼，代而摄立。公子翬见隐居

位已久，劝之遂立。隐既不许，鞏惧而易其辞，遂与桓公共杀隐。天见其将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电。是阳不闭阴，出涉危难而害万物。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弟佞臣将作乱矣。”<sup>①</sup>据七十二候卦气图可知，豫卦(䷏)为二月候卦，归妹卦(䷵)为八月候卦。刘向在此所据显示是七十二候卦气说，说明七十二候卦气说当时已成为人们推衍灾异的理论根据。刘向在此同时以卦象与卦气对此次灾异进行解释，显然优于阮氏之注解。

次以讼，何也？讼有争心，万物争茂，以遂其生。<sup>②</sup>

此解新颖、贴切。

次以蛊，何也？皿虫为蛊，风乘土物欣荣，其象蠕蠕然。这是以卦象释之。案：《孔子家语·执轡》及《淮南子·地形训》皆有“风主虫”之说，亦即巽卦有“虫”象。

次以革，何也？日舍于毕，气应谷雨，物形变易，阳薄于天。

案：革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气温有大的变革之象。

次以夬，何也？阳刚果决，毅然不挠。

案：夬卦(䷪)为三(辰)月辟卦，阳息至五，阳刚果决之象。《乾凿度》云：“阳消阴言夬……断制除害，全物为务，夬之为言决也。当三月之时，阳盛息，消去阴之气，万物毕生，靡不蒙化……”<sup>③</sup>

以上五卦主要主三(辰)月。其中豫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讼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蛊卦(䷑)为九三、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63 - 1364 页。

②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 449 页。以下引文同。

③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85 - 86 页。

上九,属于微温;革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夬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此月的总体趋势是温阳所占的比重较大,在进退中阳气继续壮大息长。

次以旅,何也?气应立夏而阳极,欲客四爻,值震之九四也。

旅卦(䷷)为四(巳)月侯卦,下卦主三月末候,上卦主四(巳)月初候。这里所说“值震之九四”,乃是以四正卦卦气说释之。案:前有晋为日出地上之象,此则日在山上,为日头更高、阳气更盛之象。

次以师,何也?日舍于参,物生益众。次以比,何也?立夏十五日而阳气溥博,周比无间。日舍东井矣。次以小畜,何也?气应小满,微阴蒞之。次以乾,何也?四月之君,幽明光被。

对这几卦的解释都很新颖、独到。

以上五卦主要主四(巳)月。其中旅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师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比卦(䷇)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小畜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乾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由此可知,在此月中,阳气息长之幅度已不如三(辰)月阳气息长之幅度大,预示着下一步的阳极盛而渐转衰,阴则逐渐由消退转为息长。

次以大有,何也?斗建指午,日舍鹑首,忙种之气,应之四爻,值震上六,万物皆将相见,有何大乎?次以家人,何也?阳为物郭,阴不能盗。次以井,何也?阳功已成,万物井井然。次以咸,何也?咸者,感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阳之生也,非信不来;阴之生也,以感而动。故冬至为中孚,夏至为咸也。日舍舆鬼,上值离初。次以姤,何也?姤,遇

也。成物者，天地之情。自谷雨以后，交夬卦而旅而师而比而小畜而乾而大有而家人而井而咸，至是日舍舍于柳，阴与阳遇焉。

对这五卦的解释皆很独到。特别是对中孚卦与咸卦相比较之解释，更突显了七十二候卦气说之建构原则。以上五卦主要主五（午）月。其中大有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家人卦(䷤)为九三、上九，亦属于微温；井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咸卦(䷞)九三、上六，属于决温；姤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这五卦皆为温卦，其中一卦为决温，其余四卦为微温，说明本月为最温之月。

次以鼎，何也？斗建指未，气应小暑，日舍鹑火，阴欲调阳，鼎乃宜之。次以丰，何也？阴为阳障，廓乎其容。次以涣，何也？阴思散阳，阳犹丽之，日舍张矣。次以履，何也？阳正于上，阴正于下，高卑以陈，厥象有礼。次以遁，何也？阴欲为主，阳将为客，物意芒芒，不知所往。<sup>①</sup>

阮氏对这几卦的解释亦很新颖、独到。以上五卦主要主六（未）月。其中鼎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丰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涣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履卦(䷉)为六三、上九，亦属于决寒；遁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其中三温两寒，说明此月阴寒之气已浸入不少。

次以恒，何也？恒为咸之倒卦。自咸卦阴位一动至是历四十二日四十九分又三百二十一分，而日在鹑尾，斗建指申，秋天将承夏天之经也。当第四爻，气应立秋。<sup>②</sup>

①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49—450页。

②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50页。以下引文同。

阮氏在此以倒卦来解释恒卦，有失偏颇，且这一体例又不能一以贯之。案：恒卦(䷟)上震(䷲)下巽(䷸)，一主六(未)月末候之“大雨时行”，又主七(申)月初候之“凉风至”。震为雷，巽为风，“大雨时行”则有伴有“雷风相薄”，而“凉风至”则为下有一阴浸阳(䷋)所至。

次以节，何也？立秋三日，阴欲据阳。阳制其度，庶几不失其恒。次以同人，何也？阴不离阳，阳亦友阴，是为大同，日舍于翼之九度，将交处暑矣。次以损，何也？日舍于轸，阴息而阳消也。

此据卦义注解，其义亦通。对于损卦(䷨)，《乾凿度》云：“损者，阴用事，泽损山而万物损也，下损以事其上。”<sup>①</sup>

次以否，何也？阴不舍气，阳不吐气，七月之中，值离六五。

案：否卦(䷋)上乾(䷀)下坤(䷁)，天地不交、万物不通之象，与其所配之候“天地始肃”亦相符。《乾凿度》则有：“否者，天地不交通，阴阳不用事，止万物之长也。”<sup>②</sup>

以上五卦主要主七(申)月。其中恒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节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同人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损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否卦(䷋)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由此可见，此月阴寒之气之息长较为剧烈。

次以巽，何也？阴将病物，阳降而养之。四爻值离上九，入八月之初气也。日舍寿星，斗建在酉。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4页。

②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4页。

案：六日七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把巽卦配置于此，恐与东汉“五世家传孟喜易学”的虞翻之月体纳甲理念有关。详细的分析请见下文，此不赘述。

次以萃，何也？物被阴收，阳不能止。白露即降，日舍于角。

案：萃卦(䷬)上兑(䷹)下坤(䷁)，兑为正秋，秋现于地上，万物萃聚之象。

次以大畜，何也？阳不敌阴，物思所归，大以畜之。大者，阳也。

案：大畜卦(䷙)上艮(䷳)下乾(䷀)。艮象征二阴息长，剥阳逮尽，又有阳来蓄阴，秋天收获之象；乾象征西北寒凉之气在此初现。

次以贲，何也？阳杂乎阴，如有文饰。自立秋至是四十五日，气应秋分，值兑初九。

案：贲卦(䷖)上艮(䷳)为山，下离(䷄)为日，有日落西山之象。在一日为下午太阳落山于西方之时，在一岁则为秋分之时。

次以观，何也？万宝告成，其形可观。

观卦为八(酉)月，其消息之象自然可见，不待解释。

以上五卦主要主八(酉)月。其中巽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萃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大畜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贲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观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由此观之，此月虽然阴寒之气继续息长，而微温之气亦夹杂其间。

次以归妹，何也？日舍大火，斗建在戌，气象寒露，阴舒阳敛，万物同归。兑之九二，当第四爻。

案：上文已述，刘向曾在《汉书·五行志》中推言灾异云：“于



《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言雷复归。”《乾凿度》则说：“归妹，八月卦也，阳气归下，阴气方盛……”<sup>①</sup>

次以无妄，何也？阳不持阴，复何所望？

案：无妄卦(䷘)上乾(䷀)为西北，又为戌、亥之地，下震(䷲)为雷，合而言之，则为雷没入西北寒凉之地之象。

次以明夷，何也？阳为阴病，物失其明。次以困，何也？

兑之六三，阴霜杀草，株木蒺藜，气象凜冽。次以剥，何也？

阳为阴割，悬而不用。《五行志》曰：“九月阴气至五，通于天位，其卦为剥。剥落万物，始大杀矣。”

这些解释于卦象相符，于义亦通。对于剥卦(䷖)，《乾凿度》亦有解释：“夫阴伤害为行，故剥之为行剥也。当九月之时，阳气衰消……剥之六五，言盛杀万物，皆剥堕落，譬犹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兴，安全之道废，阴贯鱼而欲承君子也。”这也就是在解经。

以上五卦主要主九(戌)月。其中归妹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无妄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明夷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困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剥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显然，此五卦以阴寒之气为主，说明此月阴寒之气息长幅度较大。

次以艮，何也？艮者，止也，万物各止其所。日舍析木，

斗建在亥。立冬之气应之，兑之九四，当第四爻。

据四正卦气说，立冬当兑之九四爻。艮卦(䷳)为下卦配九(戌)月末候，上卦与十(亥)月初候相应。案：据虞翻“月体纳甲”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89 页。

说，艮卦(䷳)为阴历二十三早上所见之月相，为阴息阳消之象。如果将每月月相之盈虚之式图与一年之月令相配，艮卦正好应在戌亥之间所谓后天八卦图中乾卦所处之位置。

次以既济，何也？阳潜地中，天道下济，物有所主，不惧阴伤。日舍于箕，地始冻也。

案：既济卦(䷾)上坎(䷜)为冬，有冰冻之象，下离(䷄)为日。合而言之，有日被冰冻所掩之象。

次以噬嗑，何也？阴阳相阖，冬气之极。次以大过，何也？立冬十五日而气应小雪，值兑九五，阳为阴夺，何以功物？

案：大过卦(䷛)阳被阴包，四阳陷于二阴，阳不敌阴之象。

次以坤，何也？天气上腾，地气下降。纯阴磅礴，无有端倪。

阮氏在此以坤卦(䷁)所配应之物候释之，甚当。

以上五卦主要主十(亥)月。其中艮卦(䷳)为九三、上九，属于微温；既济卦(䷾)为九三、上六，为决温；噬嗑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大过卦(䷛)为九三、上六，为决温；坤卦(䷁)为六三、上六，属于微寒。显然，虽然按十二消息卦说此月为纯阴之卦所主，但据七十二候卦气说可知，此月阳温之气已在息长。

次以未济，何也？阴功已成，将援于阳。阳不助之，犹若有待，日舍星纪，气应大雪。斗建指子，当第四爻，值兑上六也。

未济卦(䷿)为十一(子)月侯卦，下卦配十(亥)月末候，上卦配十一(子)月初候。据四正卦卦气说，大雪节配兑卦上六。案：未济卦既然与“闭塞成冬，鹖旦不鸣”之候相配，则未济之象现

焉。

次以蹇，何也？蹇，难也。阴难于阳，阳难于阴。次以颐，何也？阳气藏于黄宫而养其气，万物逸于洊寒而养其物。

此解与诸卦之象甚合。

以上三卦再加上中孚、复两卦主要主十一（子）月。其中未济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蹇卦(䷦)为九三、上六，属于决温；颐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中孚卦(䷼)为六三、上九，属于决寒；复卦(䷗)六三、上六，属于微寒。说明此月以阴寒之气为主，但乃有决温孕于其中。

(4)“六日七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卦序建构原则蠡测。

从上面所列辟、公、侯、卿、大夫卦之分配可以看出，辟卦之分配原则乃是沿用十二消息卦卦气说之原则，只是在十二消息卦气说中，每一卦主一月，而在此则主六日七分。显然，在这六十卦中，乃以十二消息卦为主干，借此可以很明了地看出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消息盈虚。至于公卦、侯卦、卿卦、大夫卦之排列原则，确实难以看出。尚秉和先生通过研究卦象与七十二候之间的关系后指出：“七十二候之词，皆由卦象而出。如中孚曰蚯蚓结。上巽为虫，故曰蚯蚓。中孚正反巽，相对于中，故曰蚯蚓结。于复曰麋角解。震为鹿故曰麋。艮为角。艮覆在地，则角落矣，故曰麋角解。初以为偶然耳，既求之各卦，无不皆然。且用正象、覆象、半象，靡不精切。”<sup>①</sup>尚先生虽有此说，但他没有对各卦卦象与七十二候之配应一一释出，所以我们难以窥见其说之全貌，且其覆象、半象等说有些地方比较牵强。在下文谈到焦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9页。

延寿易学时我们还要谈及这一问题,此不赘述。主要问题是,尚先生的解释太执著于卦象,而对气则有所疏略。

对于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图中阴阳爻之分布规律,阮文达先生如此认为:

《卦气解》云:自中孚迄井,阳爻八十九,阴爻九十一,共一百八十,当半岁。实其在晋以前阳爻三十八,解以后阴(注:当为阳)爻五十一。历日在春分前则少,在春分后则多之象也。自咸迄颐,阳爻九十一,阴爻八十九,其一百八十,当半岁。实其在大畜以前阳爻五十四,贲以后阳爻三十七。历日在秋分前则多,在秋分后则少之象也。阳爻多则阴爻少,象行度之缩焉;阳爻少则阴爻多,象行度之盈焉。自解迄大畜阳爻一百有五,阴爻七十五,昼永而夜短也;自贲迄晋,阳爻七十五,阴爻一百有五,昼短而夜永也。二至相距阴爻阳爻不正九十而多一少一者何也?曰吾以知岁实之有消长也。①

《卦气解》为清人庄存与(1719~1788年)所著,说明此段所云为庄存与所统计。因为卦气起中孚冬至,所以他从中孚开始统计阴阳爻之数。从中孚至井②,所对应的节气是冬至经过春天而至夏至。这半年的时间所配应的卦之阳爻数为八十九,阴爻数为九十一。其中,晋卦对应的是春分以前,而在晋卦以前的阳爻数为三十八;解卦对应是春分以后,而在解卦以后的阳爻数为五十一,以显春分前阳少阴多(或日短夜永)、春分后阴少阳多(或日永夜短)之象。自咸迄颐,对应的节气是自夏至经秋天而至

①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448页。

② 据七十二候卦气图,夏至与咸卦相配应,而咸卦之前的一卦为井卦。

冬至。在这半年的时间所对应的卦中,阳爻数为九十一,阴爻数为八十九,与前半岁的情况正好相反。其中,自大畜以前对应的节令是秋分以前,其阳爻数为五十四;自贲以后对应的节令是秋分以后,其阳爻数为三十七,显示的是秋分前阳多阴少(或日永夜短)、秋分后阴多阳少(或日短夜永)之象。随后,《卦气解》作者又从另一角度分析阴阳爻之数。自解迄大畜对应的节令是春分以后经夏天至秋分之前半岁长的时间,其阳爻数为一百零五,阴爻数为七十五,彰显的是昼长夜短之象;自贲迄晋对应的是秋分以后经冬天到春分前半岁长的时间,其阴爻数为一百零五,阳爻数为七十五,彰显的是昼短夜长之象。而自冬至至夏至之阴阳爻数不是正九十,而是多一少一,在庄存与看来,此乃表示岁实有消有长之故。

另据李尚信教授统计,阴阳爻的分布还有如下之妙:“子月至巳月(即十一月至四月):84 阳爻,96 阴爻;午月至亥月(即五月至十月):96 阳爻,84 阴爻。”从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每两月一组之阴阳爻数进行统计,可以得出 24、28、32、36 等数。而“24、28、32、36 除以 4 后,分别得 6、7、8、9,正是老阴、少阳、少阴、老阳之数”,且“依月为单元的变化也是较有规律的”<sup>①</sup>。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六日七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确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从整体上彰显的仍是阴阳的消息盈虚。从上文具体分析每月所配卦之寒温情况来看,七十二候卦气图所表征的也是阴与阳之间的消息盈虚,由此亦进一步

① 李尚信:《卦序与解卦理路》。成都:巴蜀书社 2008 年版,第 142 - 144 页。

可证，六日七分说在建构时确实应考虑过如郑玄所说的诸卦所表示的寒温情况，并成为焦延寿、京房等据以推言灾异的根据。

众所周知，宋代著名易学家邵雍据一分为二法所绘之六十四卦圆图，其各对冲之卦皆为阴阳爻相反之卦即虞翻所说的旁通卦。如乾(䷀)与坤(䷁)，复(䷗)与姤(䷫)，颐(䷚)与大过(䷛)之间皆是这种关系。在十二消息卦卦气说中，相对冲之两卦间即复(䷗)与姤(䷫)、临(䷒)与遁(䷗)、泰(䷊)与否(䷋)、大壮(䷡)与观(䷓)、夬(䷪)与剥(䷖)、乾(䷀)与坤(䷁)之间之关系显然亦遵循这一原则，且与《淮南子·时则训》“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之理念及《淮南子·天文训》“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之“六府”观念一致。但七十二候卦气图所显对冲卦之关系并非如此。如果对冲卦之关系皆为旁通关系，该图彰显的就会像邵雍之“六十四卦圆图”所彰显的完美的阴阳对待关系一样。而在孟氏四正卦卦气说对冲卦之关系就不是这种关系。在四正卦卦气说中，虽然配应冬至之坎(䷜)与配应夏至之离(䷝)互为旁通，但配应春分之震(䷲)与配应秋分之兑(䷹)之间即不是这种旁通关系。由此可知，“卦气说”注重的并不是阴阳爻的完全对待，而是卦爻符号所表征的阴阳之气。如前所述，从整体来看，虽然从庄存与的统计来看，七十二候卦气图所彰显的仍然是阴与阳在一岁中的消息盈虚，但从对冲卦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除十二辟卦中对冲卦之关系为旁通关系之外，在其余的四十八卦中，只有十二(丑)月之侯卦屯(䷂)与其对冲卦即未月侯卦鼎(䷱)为旁通关系。在剩下的十八组三

十六卦中,有六组十六卦对冲卦之上卦相同,分别为:正(寅)月侯卦小过卦(䷛)及其对冲卦七(申)月侯卦恒卦(䷟);二(卯)月大夫卦随卦(䷐)及其对冲卦八(酉)月大夫卦萃卦(䷬);三(辰)月侯卦豫卦(䷏)及其对冲卦九(戌)月侯卦归妹卦(䷵);三(辰)月大夫卦讼卦(䷅)及其对冲卦九(戌)月大夫卦无妄卦(䷘);三(辰)月公卦革卦(䷰)及其对冲卦九(戌)月公卦困卦(䷮);五(午)月侯卦大有卦(䷍)及其对冲卦十一(子)月侯卦未济卦(䷿)。我们可以发现,在以上诸卦中,上卦相同之卦只有震(䷲)、兑(䷹)、乾(䷀)、离(䷄)共四卦,其中震卦与兑卦各出现于两对对冲卦中即各出现四次,而乾卦与离卦各出现于一对对冲卦中,即各出现两次。这种安排首先让我们想到四正卦卦气说,因为在四正卦卦气说中,震(䷲)与兑(䷹)本来就在对冲的位置。这样安排又让我们联想到荀爽“乾起于坎而终于离”之说及魏伯阳的“月体纳甲”说。

东汉易学家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将月相的盈亏与八卦相配应,以阐发道教练丹“进阳火”与“退阴符”之旨。人们称这种配应为“月体纳甲”说。其说为:

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  
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  
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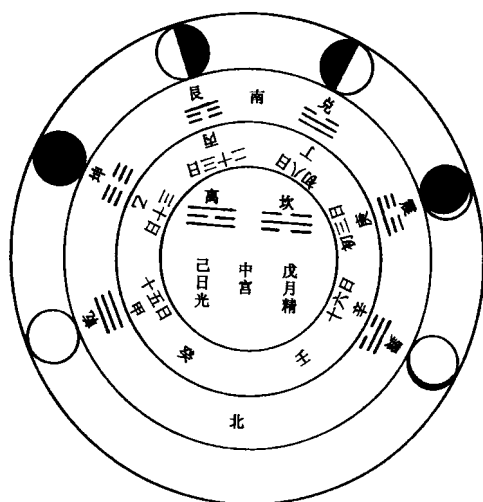
又说“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据此可知,魏氏将阴历(下同)每月初三日黄昏时于西方庚位在天穹上所出现之新月月相与震卦(䷲)相配,将每月初八日黄昏时南方丁位在天穹上所出现之上弦月与兑卦(䷹)相配,将每月十五日黄

昏时出现于东方甲位之地平线上之满月与乾卦(☰)相配,将每月十六日早晨天亮之时出现于西方辛位之稍缺之月相与巽卦(☴)相配,将每月二十三日晨出现于南方丙位之下弦月与艮卦(☶)相配。每月三十日,月相消失于东方乙位而继之灭藏于北方癸位,则用坤卦(☷)表征之。“每月三十日左右,日月相会于北方壬位,新月不久即将出现,表示阳生由微而著之意,故而乾卦同时又纳‘壬’。所谓‘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也’也。”<sup>①</sup>离卦(☲)坎卦(☵)表征日月之本相,坎月离日。每月晦夕朔旦,月亮处于中天戊的方位上,故以坎纳戊。而每日的正午,日处于中天己的方位上,故以离卦纳己。这样,就将十天干纳入八经卦。天干代表月相出现之方位,而八卦卦象除坎、离两卦分别代表月、日之本相外,其他六卦则表征月亮之盈亏。“月体纳甲”说后来成为号称五世家传孟喜易学的虞翻用以注《易》的主要学说。“月体纳甲”说以图表示则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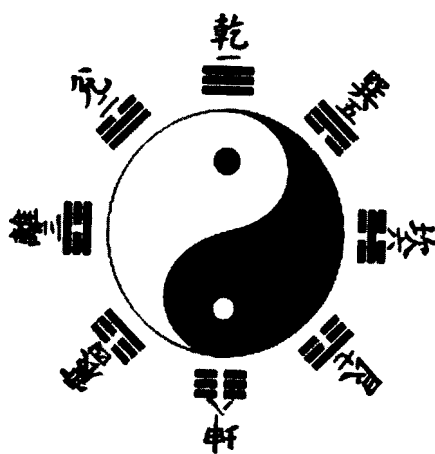
后世所谓“先天八卦图”亦可以形象地表示月相所寓示的阴阳二气在一个月(阴历)内的消息盈虚。其实,此图也是一个时空一体图:北方坤卦表征纯阴之状态,东北震卦表征一阳已经来复,东方离卦表征太阳从东方升起,东南兑卦表征阳气已大幅度息长,南方乾卦表征阳气已息长至极而为纯阳之气,西南巽卦表示一阴已从下面显现,西方坎卦表征每月月亮初现之位,西北艮卦表征阴气已大幅度息长。此图也可以表征阴阳二气在一年内的消长盈虚。有趣的是,如果将此图与七十二候卦气图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上卦为震卦之小过卦(☱☲)被安排在东北方

<sup>①</sup> 王新春:《虞氏易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卦气说”与“月体纳甲说”》。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一)。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05页。





月体纳甲图



先天八卦图

之丑寅之间,特别是巽卦(䷸)被安排为西南方之申酉之间,而艮卦(䷳)则恰恰被安排在西北方之戌亥之间,正好与上图震、巽、艮之方位相符。另外,由上文我们对每月寒温情况分析可知,东南方坎卦所主之辰月正是阳温之气息长幅度较大之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七十二候卦气说又可能把与月体纳甲相类的阴阳消息理念作为其卦序编排的一种根据。

对于其余的十一组对冲卦之规律,我们发现,某卦下卦与其对冲卦之上卦相同或某卦上卦与其对冲卦之下卦相同者亦有六组十二卦,分别为:十一(子)月之公卦中孚卦(䷼)与五(午)月之公卦咸卦(䷞);正(寅)月之大夫卦蒙卦(䷃)与七(申)月之大夫卦节卦(䷻);正(寅)月之公卦渐卦(䷴)与七(申)月之公卦损卦(䷨);四(巳)月之侯卦旅卦(䷷)与十(亥)月之侯卦艮卦(䷳);四(巳)月之大夫卦师卦(䷆)与十(亥)月之大夫卦既济卦(䷾);四(巳)月之公卦小畜卦(䷈)与十(亥)月之公卦大过卦(䷛)。如上所述,对冲卦上卦相同之卦也是六组十二卦,七十二候卦气说如此安排,或许有一定的考虑。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统计,除了十二辟卦之对冲卦及对冲卦屯与鼎互为旁通之外,上卦不同而下卦旁通之对冲卦有七组十四卦,分别为:中孚(䷼)与咸(䷞);渐(䷴)与损(䷨);晋(䷢)与大畜(䷙);解(䷧)与贲(䷖);革(䷰)与困(䷮)(注:亦属上卦相同之情况);师(䷆)与既济(䷾);井(䷯)与颐(䷚)。而下卦不同,上卦旁通者有两组四卦:升(䷭)与履(䷉);比(䷇)与噬嗑(䷔)。七十二候卦气说如此安排恐怕亦非偶然。

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进行统计,某卦下卦或上卦之覆卦为其对冲卦上卦或下卦之情况者有三组六卦,(由于乾、坤、坎、

离四卦之覆卦与原卦相同,故不在统计之内)分别为:谦(䷎)与丰(䷶);睽(䷥)与涣(䷺);小过(䷽)与恒(䷟)(注:亦属上卦相同之例)。这种情况所占比重如此之小,恐怕不是七十二候卦气说中对冲卦建构之原则,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尚秉和先生以覆卦来注解《易经》及物候与卦象之关系,恐怕不符合制作者的原意。

以上几种统计方法皆不能包括在内的对冲卦共有三组六卦,分别为:益(䷩)与同人(䷌);需(䷄)与巽(䷸);蛊(䷑)与明夷(䷣)。这些卦之安排恐怕主要是从卦象与卦义的角度来进行的,且如上文所述,巽卦被安排在西南申酉之间,恐怕受与“月体纳甲”说相关之理念的影响。

以上是我们对七十二候卦气说建构原则之揣测。从焦延寿“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来看及下文对京房运用七十二候卦气说推衍灾异来看,七十二候卦气说之建构原则应该并不那么简单。对于其具体建构原则,只能等待来哲进一步申明了。

至于六日七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形成之时代,“宋王应麟伯厚先生《困学纪闻》云:孔子《上系》七爻起于《中孚》‘鸣鹤在阴’,《下系》十一爻起于《咸》‘憧憧往来’。卦气图自复至咸八十八阳,九十二阴;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阳,九十二阳。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复亦六日七分,阴阳自然之数也。”<sup>①</sup>言外之意,“六日七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在《系辞传》制作年代之前已有之。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一种巧合。我们认为,受《说卦传》、时空一体的中国古代宇宙图式之影响

① 黄元炳:《易学探源·卦气集解·公辟侯大夫卿之次序·四》。

以及中国古代“顺时布政”观念之影响，四正卦主四方之说与八卦卦气说形成之时代应该很早，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七十二候卦气说之建构原则确实难于寻找，各卦卦象与物候之关系并不是特别严密，如据七十二候卦气图可知，“雷乃发声”之物候与大壮卦相配应，而没有与“雷出地奋”之豫卦相配应；“雷始收声”之物候与贲卦相配应，而没有与雷入于泽之归妹卦相配应。尚秉和先生通过覆卦、旁通、半象、大象等方式寻找卦象与物候之对应，看起来十分勉强，所以，“六日七分说”卦序系统与七十二候系统应该是两个较为独立的系统，两者之间即使相合也是偶然的。

从上文我们所引《管子·四时》、《管子·轻重》、《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时则训》，乃至魏相所采《易阴阳》与《明堂月令》以及十二消息卦卦气说可知，中国古代的“顺时布政”之历政思想之规律性很强，特别是“应在其冲”说贯穿于以上诸文中，且此说在下文将要介绍的八卦卦气说在推言灾异中一直得到应用。而七十二候卦气卦序排列之规律不符合此说。其卦序编排规则很难理出，即使这一图式久已存在，其所附阴阳灾异之内容亦恐在董仲舒倡导灾异说之后。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虽然因言灾异而差点丢掉性命而不敢再言灾异，但董仲舒死后，善言阴阳灾异、治《尚书》及《洪范五行传》的夏侯始昌却深得武帝器重。后来，夏侯始昌的族子夏侯胜亦因善言灾异而得到霍光与宣帝的赏识并迁任长信少府、太子太傅等位居九卿之职。这些都成为激励人们进一步深化细化《易》阴阳之推言灾异之功能。据《汉书·京房传》可知，“六日七分”在推言灾异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因此，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有可能是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

内容之图式部分,而阴阳灾变之说则是据此类图式所作之推衍。尽管《汉书》没有记载孟喜以《易》言灾异的内容,且他的学生翟牧、白光少子皆不承认延寿《易》即孟氏学。即使在他们之前有类似六日七分及七十二候卦气说之卦序,我们现在见到的七十二候卦气图亦极有可能被孟喜或焦延寿本人或其师修订过。至焦延寿、京房师徒生活之时代,再经历了无数次的验证之后,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系统在推言灾异方面之准确性才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而且京房借推言灾异屡中而得幸于汉元帝。其说贯穿的仍然是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理念,是汉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上所引,《汉书·五行志》以六日七分说既七十二候卦气说推言灾异是刘向对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之异的解释。“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言雷复归”。据六日七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可知,豫卦(䷏)为三(辰)月侯卦,内卦主二月末候,外卦主三月初候;归妹卦(䷵)为九月侯卦,内卦主八月末候,外卦主九月初候。刘向在此显然是用六日七分说释灾异。与京房生于同时代的刘向对京房易学亦多有继承,此待后文再论。

从《周易集解》所引诸家《易》注来看,郑玄、荀爽、虞翻、王弼、干宝、《九家易》、孔颖达、崔憬、李鼎祚等皆采六日七分说注《易》。例如,对于《屯·彖》“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崔憬注曰:“十二月阳始浸长而交于阴,故曰‘刚柔始交’。万物萌芽,生于地中,有寒冰之难,故言‘难生’。”《九家易》注《屯·彖》“云雷,

屯”曰：“雷雨者，兴养万物。今言‘屯’者，十二月雷伏藏地中，未得动出。虽有云雨，非时长育，故言屯。”据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屯卦(䷂)为十二月侯卦，下卦主十一月末候，上卦主十二月初候。虞翻在注《损·彖》“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时有云：“‘时’谓春秋也。损二之五，震二月，益正月，春也。损七月，兑八月，秋也。谓‘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他这里说“震二月”及“兑八月”运用的是四正卦卦气说，而据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益为正月卿卦，损为七月公卦。在释《蒙》卦卦辞“蒙，亨”时，干宝注曰：“……‘蒙’于世为八月，于消息为正月卦也。正月之时，阳气上达，故屯为‘物之始生’，蒙为‘物之稚也’。施之于人，则‘童蒙’也。苟得其运，虽蒙必亨，故曰‘蒙亨’。”据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蒙为正月大夫卦，故有此释。在《周易集解》中以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释《易》之例很多，说明此说已被后人接受，并成为人们注《易》的重要依据。

#### (5)从“六日七分”说看帛书《易传》中的卦气思想。

在讨论过孟喜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的相关内容之后，为了厘清孟喜卦气说之源流，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来看一下帛书《易传》中与此相关的卦气思想。帛书《要》篇有这样一段话：

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其冬(终)也凶；损之始凶，其冬(终)

也吉。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惠，故明君不食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故冒（谓）易道。

廖名春先生指出，“这段话有许多难解处，‘授者’之‘授’，当为‘损’字之误；‘故曰产’之‘产’，疑亦为‘损’字之误”<sup>①</sup>。这是孔子以天道之损益来推言人事之吉凶。孔子在这里将益卦与春夏之时相配，因为从春至夏是阳气逐渐增益之过程；将损卦与秋冬之时相配，是因为从秋至冬是阳气逐渐减损之过程。这两个过程用损益两卦来表征十分贴切，说明天道阴阳的消息盈虚与人事之吉凶之道理是相通的。很明显，孔子在此只是宽泛地将益卦与春夏相配，将损卦与秋冬相配，旨在说明损益盈虚、物极必反之规律。《淮南子·人间训》亦有与此类似的一段话：“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这正是孔子要表达的思想，所以帛《易》才说，懂得损益之道的人，“不可动于忧惠”。因为明君内心知道损益之道，所以才可以“不食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淮南子·人间训》在讲这段话之前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与《系辞传》“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之说，其旨相同。无独有偶，《说苑·敬慎》亦有类似的一段话：

<sup>①</sup> 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以上三段都是引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之故事。特别是孔子在这里说“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与帛书《要》篇引损益所代表的春夏秋冬来比拟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消息盈虚，其旨意是相同的。而董仲舒说“阴始于秋，阳



始于春”<sup>①</sup>，又说“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sup>②</sup>，亦是这种天道观的反映。所以，损益在帛书中与其说是一对代表春夏秋冬的时间概念，不如说是代表消息盈虚与吉凶的哲学概念。因此，孔子在这里以损益二卦映射春夏秋冬，应主要取损益之哲学义，而不是取其时间义。所以，尽管孔子在这里将益与春夏相相应，将损与秋冬相相应，他在此主要是想以损益明天道，再进一步以天道来明人事，恐怕不能称其为卦气说，因为据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益卦为正月之大夫卦，只主雨水之前的六日七分；损卦为七月之公卦，主处暑后的六日七分。且损益两卦在七十二候卦气图中又不处于对冲的位置上。再者，如果我们从咬文嚼字的角度出发，帛书所说的益所代表的“春以授夏之时”应该在春夏之交，而损所代表的“秋以授冬之时”，应当在秋冬之际，这与六日七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中益主初春、损主初秋的配置又不一致。所以，孔子在帛书《要》篇以损益来明春夏秋冬之天道变化，恐怕不能作为当时已有与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的证明。

那么，帛书《易传》中有没有与“卦气”说相关的内容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帛书《易传》彰显出对“时”的哲学之重视。帛书《二三子》对《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引孔子的解释为：“龙寝矣而不阳，时至矣而不出，可胃（谓）寝矣。”对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引孔子的解释为：“此言君子务时，

①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王道通三第四十四》（《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1页。

②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王道通三第四十四》（《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9页。

时至而动，□□□□□□屈力以成功，亦日中而不止，时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务时，猷（犹）驰驱也。故曰‘君子终日键键’。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故曰‘夕沂若厉，无咎’。”帛书《衷》篇对此的解释为：“‘君子冬（终）日键键’；用也。‘夕沂若厉，无咎’，息也。”又曰：“‘君子终日键键，夕沂若厉，无咎。’子曰：‘知息也，何咎之有？’”可见帛书《易传》对“时”的哲学的重视与今本《易传》是一致的。这些解释与《淮南子·人间训》“‘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而息，唯有道者能行之”的说法亦无二致，而与后儒对这句话的解释却不同。如《周易集解》引干宝对这句话的解释为：“……阳气始出地上而接动物，人为灵，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故君子以之忧深思远，朝夕匪懈。……此盖文王反国，大厘其政之日也。”《周易正义》引王弼《注》为“‘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孔颖达《疏》为“在忧危之地，故‘终日乾乾’，言每恒终竟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谓终竟此日后，至向夕之时，犹怀忧惕”，《程氏易传》对此的解释则为“日夕不懈而兢惕，则虽处危地而无咎”。如此不同说明，后儒注重的多为“时运”之“时”，而帛书《易传》与《淮南子》注重的多为“四时”之“时”，所以帛书《二三子》才有如下之说：“卦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此言天时戒葆常也，岁□□□□□□西南温□……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亦孙贵而宗不崩。”特别是帛书《衷》篇有这样一段话：

天气作□□□□□□□□，其寒不冻，其暑不曷。

《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逊）从之冒（谓）也。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穀。

显然，这种观念与我们上文所述中国古代时空一体的宇宙图式

是一致的。《淮南子·诠言训》“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之说，则是对这种天道观的继续。而董仲舒“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阴气始于东南而北行”<sup>①</sup>之说，则是以上观念的变形。董氏认为阳为德，阴为刑。他在阴阳之气运行方面作出如上调整，目的是说明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为辅，从而规劝人君顺天道以任德而远刑。这些理念都与孟、焦、京以后盛行的卦气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下文京氏易学部分，我们还要讨论京氏易学与董仲舒阴阳灾异理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帛书《二三子》在此所引孔子的话是对《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的解释。《周易集解》引干宝对此句话的解释为：“……阴气在初，自姤来也。”又引《九家易》的解释：“……初六始姤，姤为五月。盛夏而言‘坚冰’，五月阴气始生地中，言始于微霜，终至坚冰，以明渐顺至也。”显然，他们都是在以十二消息卦卦气说诠释这句话，彰显的是一种戒惧心理。而帛书《二三子》所引孔子的话是在强调顺应天地变化之道，彰显的是一种顺时而变之心态。孔子在此所根据的天道乃是从远古以来已经形成的一种时空一体的宇宙图式，可以说是“六日七分”说的一种雏形。

①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阴阳位第四十七》（《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7页。

## 第四章 焦延寿易学研究

前文已述,《周易》在西汉时期可约略分为《易》经、《易》筮、《易》阴阳三大形态。《易》筮系统一直贯穿于整个西汉时期。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因其为卜筮之书而躲过秦火的《周易》又被提升到“经”的地位。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所构画的治国蓝图正好与武帝期望达致的德泽和洽、四夷宾服的理想暗合,而武帝对神仙方术、长生不老之幻想及其好大喜功之性格又导致他不可能完全按儒家的治国理念来治国平天下。董仲舒在提供“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之天人理念的同时,亦强调了人君之治不合天意时之谴告与灾异说,成为约束皇帝专权的重要武器。尽管董仲舒因言灾异而差一点儿被下狱致死,但他“去位归居”、“以修学著书为事”之后,“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sup>①</sup>,董仲舒因此而享有儒者之宗之盛誉。所以,武帝确立的今文经学,一开始便与阴阳灾异说交织在一起。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其后,明于阴阳灾异、治《尚书》及《洪范五行传》的夏侯始昌受到武帝的器重。昭帝

---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5页。

时则有董仲舒的徒孙眭孟推说阴阳灾异。宣帝时,夏侯始昌的族子夏侯胜因推说阴阳灾异而引起霍光的注意。尽管时任长信少府的夏侯胜当时因非议宣帝初即位时欲褒扬武帝的诏书而被囚执,但至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因“关东四十九郡同时地动”,宣帝认为灾异乃天地之戒,于是下诏“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夏侯胜又因此次大赦而出为谏大夫,并很快恢复为长信少府,并迁太子太傅。<sup>①</sup>在这种背景下,以《易》言灾异之风正在悄然兴起。上文所论昭、宣时为《易经》博士的田王孙的学生孟喜,称田王孙且死时独传他一部《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虽然他的说法遭到他的同门师弟梁丘贺的否认,孟喜并因此而失去成为博士的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正如上文所论,由于当时曾为宣帝之中兴立下汗马功劳的魏相、丙吉等对阴阳二气之转化与治国方略关系之认识,再加上夏侯胜等灾异学说被宣帝认可、接受,以孟喜易学为代表的《易》阴阳系统还是在宣帝末梁丘《易》被立于学官之前已被立于学官。京房的老师焦延寿说曾向孟喜问《易》,随着元帝时京房以言灾异而近幸,京氏《易》被立于学官,孟、焦、京之《易》阴阳系统才全面而正式地被官方认可,焦延寿亦因京房之出名而被列入史册。虽然《汉书》没有单独为焦延寿立传,但从《京房传》、《儒林传》的相关内容及后人对焦氏易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仍可以梳理出焦氏易学的大体轮廓与发展脉络。

关于焦延寿易学产生的时代与学术背景,我们在第一章“西汉经学发展述论”中的“灾异说之兴起及经学内部之分化”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8-3159页。

部分已经论及,在此不再单独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 第一节 焦延寿生平评述

### ——兼论孟、焦易学之关联

《汉书》没有为焦延寿单独立传,我们只能从《汉书》中的《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及《儒林传》看到焦延寿生平的蛛丝马迹。《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在介绍京房生平时有这样一段话:

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sup>①</sup>

对于焦延寿、京房易学之源流,《汉书·儒林传》是这样记载的: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

---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60 页。

之学。<sup>①</sup>

关于焦延寿之易学著作,世传有《焦氏易林》一书,自从清初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十八中怀疑此书为“东汉以后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以后,清代嘉庆年间有位叫牟庭相的学者,“断然否定此书作者是焦延寿,而是东汉人崔篆”<sup>②</sup>。后来又有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重证今传《焦氏易林》非焦氏所作,特别是“胡适先生于1943年写、定于1948年发表的《〈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竟用‘法庭’判决的形式,彻底否决了焦延寿的著作权”<sup>③</sup>。《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焦延寿之易学著作,直到《隋书·经籍志》才记有焦贲撰《易林》十六卷,《易林变占》十六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焦贲撰《焦氏周易林》十六卷;《宋史·艺文志》载有《焦贲易林传》十六卷。“辽、金、元正史无‘经籍’、‘艺文’部,《明史·艺文志》只收本朝人著作,不再录历朝古籍书目”,据陈良运教授考证,“元代已有人为《焦氏易林》作注”,而“清代流行各种《易林》版本,皆焦氏而无崔氏之踪”<sup>④</sup>。陈良运教授根据《焦氏易林》对“浊政”之批判、对“奸佞”之抨击,以及其中所隐含的与《汉书·五行志》所载与京房《易传》相关之灾异内容的一致性,彻底推翻了胡适等的说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1-3602页。

②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86页。

③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483页。

④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86页。

法,重新把《焦氏易林》之著作权归还给焦贛。<sup>①</sup>

尚秉和先生亦推定《焦氏易林》确为焦延寿所作,理由有六:

一,所用春秋故事,有为三:传《国语》、《韩诗外传》、《说苑》等书所无者。故虽唐人不能注,古书亡也。又所用之字,古义甚多。在存西汉淳朴之气,文不加修饰,自然峭古,与魏晋之涂绩者异。二,显宗以《周易林》筮雨,遇《蹇》。其词在今《易林》中。以问沛献王辅。当此时,诸王如东平王苍,尤深经学。乃不问苍而问辅,以辅善说京氏易。焦贛为京氏师,既善京易,必知焦易,故独问辅。三,凡京氏易说可考见者,如“朋来”为“崩来”,《无妄》为大旱卦,皆与焦氏易说同,师弟授受,踪迹分明。四,《易林》卦象,如离东、坎西,坤水、坤鱼,东汉人若知,则解经不误矣。惟其为西汉,故至东汉而失传。管辂云,“既曰天地定位,岂容有别位哉?吾不知古之圣人何以处乾于西北,坤于西南,是疑《易》有先天位,求其说而不得,非失传而何?”致经诂皆误。五,用韵之古,直同周、秦。六,《隋志》即有焦贛《易林》,唐志焦《易林》与崔《易林》并存,其名实久定,不应忽误崔为焦。由以上诸证,定今之《焦氏易林》断非费直,亦非崔篆,更非东汉人陆绩、虞翻、管辂所能为,而确为《焦氏易林》。彼顾亭林等,不究其词之所谓,其误解固难怪矣。<sup>②</sup>

综合尚先生、陈教授之说,可谓论据充分,论证全面、翔实,笔者

①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81—524 页。

②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 页。有些明显的标点错误,笔者已进行修改。



赞同他们的结论,在此就不再对《焦氏易林》的真伪问题进行更多的考证了。但在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对焦延寿的生平及学术归属进行评述。

关于焦延寿之生年,“闻一多先生大致推定为生于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他没有晓示推定理由”<sup>①</sup>。关于焦延寿的生卒年,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实难确定,在此我们也觉得没有太大必要,我们只要把焦延寿的主要活动时间及其易学归属搞清楚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西汉时梁国梁王之发展状况。据《汉书·诸侯王表》可知,汉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二月乙卯,梁孝王武与太原王参、梁王揖同日立。梁孝王刘武一开始为代王,他最小的弟弟刘揖为梁怀王。刘揖好《诗》、《书》,文帝爱之异于他子。贾谊最初因周勃等排挤被贬长沙国,后来,文帝因感鬼神事而想起贾谊,把他召回,并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立十年后(公元前169年)因堕马而死,因无子而国除。梁王坠马死后,“(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sup>②</sup>。汉文帝在被周勃等迎立为皇帝之前亦为代王。文帝即位后“分代为两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后又徙代王武为淮阳王(据《汉书·文三王传》可知刘武于公元前175年被徙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梁怀王刘揖死后,贾谊在离世之前,看到淮南王地广而大,难以驾驭,而文帝的亲子只剩下淮阳王刘武与代王刘参,所以向文帝上疏曰:

①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页。

②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4页。

“……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捷之江，则大诸侯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据《文三王传》及《诸侯王年表》可知，淮阳王刘武于公元前167年徙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sup>①</sup>在此之前，淮南厉王刘长（汉高祖最小的儿子，于高祖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被立为淮南王）因骄奢过度、自作法令及造反之具而于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被免去王位，后来因不食而死。孝文帝前元八年（公元前172年），文帝哀怜淮南王，乃封淮南王四子为侯，其长子便是后来又被封为淮南王、招募宾客撰写《淮南子》的刘安。贾谊看到当时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知道文帝最终会将其四子更封为王，曾因此而向文帝提过建议，同时也是贾谊上述上疏之由来。可见，当初梁王所占地盘较大是因为文帝想扩大自己儿子之地盘，以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贾谊之远见卓识，因为四年后，文帝还是“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而贾谊最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那就是至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向京师，梁王扞之，卒破七国”<sup>②</sup>，“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sup>③</sup>。田何的学生即昭、宣时为博士的田王孙的老师

①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1—2263页。

②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4页。

③ [汉]班固：《汉书·文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08页。

丁宽亦参与到梁孝王距吴楚的行动中,号称“丁将军”(田王孙又为施、孟、梁丘之师)。可见,梁国此时已受到丁宽等易学思想的熏陶,这与后来焦贛治《易》并好学而得幸于后来之梁王,或许做了易学传统上的铺垫。梁孝王为文帝窦皇后即武帝时称为窦太后的的小儿子,深得窦后宠爱。在此之前,梁孝王的哥哥即汉景帝曾许诺自己驾崩后将把王位传给梁孝王,因为当时尚未立太子。梁孝王虽然当时辞谢,但他与太后都心生欢喜。

梁国此时本来已经成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此次距吴、楚之胜利,更增加了梁孝王的骄奢心理与行为,“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偃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后终因骄侈、觊觎皇位、暗中使人刺杀爰盎等大臣而遭到景帝的怨恨。后经窦太后在景帝面前通融且梁孝王亲自伏斧谢罪,才与景帝复归于好,但景帝此后便疏远孝王了。梁孝王便在郁郁不乐中结束了自己的余生,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因患热病而薨。

梁孝王很孝顺,每次听说窦太后有病便口不能食,因此常想留在长安侍候太后,窦太后也喜欢他。听说梁孝王已死之后,窦太后极为悲哀,不思饮食,认为是景帝杀了孝王。景帝听说后感到恐惧,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与他的姐姐长公主商量,“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sup>①</sup>。

① [汉]班固:《汉书·文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11页。

据《汉书·诸侯王表》可知，梁孝王死后，他的长子梁共王刘买于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嗣立，七年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梁平王刘襄嗣立，其时平王之后任后及平王因不孝而被削五县，“梁余尚有八城”；刘襄立四十年薨，其子梁顷王无伤于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嗣立，十一年薨；其子梁敬王定国于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嗣立，四十年薨；梁夷王遂于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嗣立，六年薨；梁荒王刘嘉于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嗣立，十五年薨，子刘立嗣。刘立骄奢淫逸，数犯法，元始（公元1~5年）中，“新都侯王莽奏废立为庶人，徙汉中。立自杀。二十七年，国除”<sup>①</sup>。

我们再来看一看焦延寿有可能与哪位梁王有关。焦延寿为梁人，而梁孝王时作为将军居吴楚、号丁将军的丁宽亦为梁人。如前所述，梁孝王失宠并在闷闷不乐中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去世后，丁宽及聚在梁王身边的其他游士邹阳、枚乘等人各自离去，而丁宽归家著书并教授学生，因为《汉书·儒林传》称丁宽“作《易说》三万言”，“授同郡碭田王孙”。及至后来的武帝本来就对招贤纳士的河间献王刘德及淮南王刘安等深具戒心，梁王因梁孝王曾僭越皇制并聚集士人而不被武帝欣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汉书·地理志》可知，梁平王（公元前136~前97年在位）在被削五县后梁国剩下的八城包括碭、留、杼秋、蒙、己氏、虞、下邑以及睢阳。

关于焦延寿的情况，《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八引《陈留风俗传》云：

---

① [汉]班固：《汉书·文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19-2220页。

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路不拾遗,囹圄空虚。诏迁贡。百姓挥涕守阙,求索还贡。天子听,增贡之秩千石。显然,此处焦贡即焦贛焦延寿,与《京房传》所说焦延寿事迹相同。这里透露出焦贛的故籍为蒙,正是《汉书·地理志》所云梁国八城之一。这里还透露出焦贛在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时为小黄令,而在做小黄令之前,焦贛曾为郡史,可证他因好学得幸梁王并受梁王资助以完成学业当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末或昭帝在位之初、中期。对照上文各梁王在位之年代可知,资助焦贛的当为梁顷王刘无伤(公元前96~前85年在位)或梁敬王刘定国(公元前85~前46年在位),而他受梁敬王资助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焦贛增秩当在宣帝时。《汉书·循吏传》有这样一段话:

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sup>①</sup>

此段记述把太守作为增秩对象,可知此前太守之迁应该比较频繁,或三年,或五年。由此可知,县令之增秩制度是在此制度实行之后,是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推行。据《汉书》中的《宣

---

① [汉]班固:《汉书·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4页。

帝纪》及《霍光传》可知,霍光薨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春,如果不迁官而增秩制度确实是这个时候实行的,则说明焦延寿以察举为小黄令当在昭帝末。而他完成学业则在此之前,当在昭帝中后期。据《汉书·地理志》可知,小黄县属于陈留郡,班固自注曰“武帝元狩元年置,属兖州”,而梁国则为“故秦碭郡……属豫州”。据陈良运先生考证,焦贛的老家蒙城(县)“在今河南商丘东北,春秋时称蒙泽之地”,而焦贛一生为官之小黄“在陈留与宁陵(今河南商丘县西有宁陵县)之间,当是今兰考一带”<sup>①</sup>。可证焦延寿老家与他任职的小黄县之间有八九十公里的距离。

《汉书·儒林传》又说焦延寿曾经从孟喜问《易》。我们在此再回顾一下孟喜的有关情况。前文已考证,“博士缺,众人荐喜”之时疑在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sup>②</sup>之时。而在此之前,孟喜已“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可见当时孟喜已在易学界很有名声。至此时梁丘贺已为少府(地节四年即公元前66年)多年,深得皇帝信任,且他的儿子梁丘临及门人张禹等已从施雠学《易》多年。在梁丘贺的极力推荐下,孟喜的同门师兄施雠被拜为博士,又由于梁丘贺之疏通证明,宣帝听说孟喜改师法,而没有拜孟喜为博士。但由于在此之前或同时“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的魏相(地节三年至神爵三年即公元前67~前59年为丞相)及此前以《洪范

①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页。

②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74页。

五行传》言灾异的夏侯胜之说已深得宣帝的认可,所以孟喜的《易》阴阳系统很快又得到宣帝的承认。据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之语可知<sup>①</sup>,在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石渠阁会议之后,“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之前<sup>②</sup>,孟喜《易》已经被立于学官。石渠阁会议是一次宣帝亲自称制临决、讲《五经》同异的、十分重要的会议。凡参加此次会议者,《汉书·儒林传》皆特别指出。就《易》家来讲,施雠及梁丘贺的儿子梁丘临参加了此次会议,而没有孟喜《易》的代表,说明当时梁丘贺已经“年老终官”,而在此之前孟喜有可能已经去世。虽然他的学生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但由于他们资历太浅,恐怕没有资格参加此次重大会议。因此,焦延寿曾对京房说“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则焦氏向孟喜问《易》之时间当在石渠阁会议之前孟喜将要或刚刚去世之时。孟喜具体死于何年,我们已无从考证,有可能在孟喜《易》被立于学官后不久孟喜就去世了。

那么,孟喜《易》与焦氏《易》到底有没有关联呢?如前所述,焦延寿受梁王资助学成后始任小黄令时当在昭帝末。他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由于“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贲,有诏许增秩留”,有诏许增秩极有可能在霍光死(地节二年即公元前68年)后宣帝始亲政之时。而田王孙为昭宣时《易经》博士,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1页。

②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页。

据孟喜诈言田王孙死时独传给他“《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诸儒以此耀之”，孟喜因此而没有在“博士缺”时被补为博士来看，田王孙去世离“博士缺”时（估为神爵元年即公元前 61 年）应该已有一段时间。田王孙受《易》于丁宽，可证田王孙为博士乃至年老时焦贛是时任小黄令的年轻人。丁宽、田王孙、焦贛都是梁人。如前所述，丁宽自从梁孝王去世以后，开始居家著《易》说并以《易》教授。由于武帝忌讳河间献王、淮南王等招贤纳士之风，梁孝王所纳之士如丁宽等理应因此受到冷落。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之后<sup>①</sup>，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上的专制与统一。武帝立《五经》博士后，《易经》主要是治王同、杨何一支易学传承者被征为博士，丁宽一支易学便隐而不彰了。由于丁宽居家教授时所著《易》说“训故举大谊而已”，他所教授的主要内容亦应是类似以传解经之说。而谦让、不愿教授的田王孙的学生施雠所继承的丁宽易学应该主要是这部分内容。那么，孟喜所说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及焦延寿的“隐士之说”到底是从何而来呢？笔者揣测，丁宽居家教授时一定教了很多学生，田王孙只是其中一位后来成为博士的知名弟子而已。由于丁宽从田何处学成后又至洛阳，复从他的同门师兄周王孙受古义，丁宽在授徒时亦有可能传授一些古义的内容。关于丁宽所学所授《易》之古义之内容，与上引《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睡虎地秦简日书》等所隐含的时空合一的宇宙图式有关，与《汉书·艺文志》《周易》部分的《古五子》（班固自注为“自甲

①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01 页。



子至壬子,说《易》阴阳”)、《古杂》等内容亦有关联。<sup>①</sup> 由于阴阳灾异说之兴起、流行自董仲舒始,而丁宽居家教授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武帝时代,对《易》之古义感兴趣的学生以及未入室的弟子或许受董仲舒、夏侯始昌等阴阳灾异说的激发,进一步将《易》与灾异说联系起来,形成了如上述所说用以推言灾异的“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之内容。甚至民间其他《易》师也在向这一方向努力。丁宽的这一部分学生或民间的其他《易》师有可能一直没有走向仕途,他们或许本来就乐于当隐士。这应该是班固所说焦延寿、京房师徒“独得隐士之说”之由来。

由于焦延寿本人官职不高,在小黄县父老乡亲的一再挽留下才终其余生一直为小黄令,他本人也可以说是半个隐士。在孟喜自称从田王孙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异书”之前,焦延寿一定已经对《易》之阴阳说烂熟于心或正在完善此说。如果焦延寿之学直接来自丁宽或丁宽的学生,由于丁宽的学生田王孙当时已成为官方承认的《易经》博士,且宣帝已认可并支持魏相所说的《易》阴阳与《明堂月令》系统,焦氏就没有必要有意隐瞒与丁宽、田王孙一支易学体系之关系。丁宽虽然有可能教授过与阴阳灾异相关的《易》之古义的内容,但从恪守师法的施雠之弟子即后至成帝时丞相的张禹在遇到日蚀、地震等灾异时仍用筮法进行占断来看,田王孙传给施雠的《易》学内容恐怕不包括用以占测灾异的《易》阴阳之内容,因为从焦、京师徒“以候司先知奸邪”来看,以《易》阴阳之系统推言灾异时,用的是与“六日七

<sup>①</sup> 刘大钧:《周易古义考》。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44页。

分”说暨七十二候卦气说相类的式图观念，而不是用筮法占测灾异。由此可见，焦贛或焦贛之师之易学直接来自丁宽、田王孙一支易学传承系统的可能性很小，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来自民间《易》师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sup>①</sup>，说明不管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阴灾变书是从其师田王孙处所得，还是从民间其他《易》师所得，大家都已知道孟喜手里有这部书，所以诸儒才以此耀之。焦延寿之所以去孟喜处问《易》，想必焦氏听说孟喜有“《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后想去探个究竟，看与自己“以候司先知奸邪”之说是否相同，也不排除焦延寿抱着向孟喜学习的心态。从焦延寿对京房所说的话来看，孟喜所得之“《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与焦氏“以候司先知奸邪”之说是相通甚至是相同的。从京房用“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占测灾异可知，“焦林直日”法、“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至少是焦氏“以候司先知奸邪”的图式内容或部分图式内容。从焦延寿“爱养吏民，化行县中”，甘于在小黄县终其余生做小黄令来看，焦氏不是一位汲汲于名利之徒，甚至是一位喜欢隐居生活的人。所以，依他自己的心态与性格，他不会高攀官方承认的田王孙及施、孟、梁丘们，他之所以往从孟喜问《易》，是因为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与他所用“以候司先知奸邪”之术相类，因此他也没有必要欺骗京房，他所说的“尝从孟喜问《易》”不会是谎话。因此，尽管“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sup>①</sup>,但班固说焦、京之说“托之孟氏”,确应是门户之见。

“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那么,为什么孟喜后为博士的白光少子及翟牧子兄不承认这一点呢?除了门户之见以外,笔者疑为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孟喜之易学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为由田王孙所传与施雠所接受的相同的《易》经系统(《汉书·艺文志》所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及“《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中孟氏《易》之部分,正是这部分内容),一为以“《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为内容的《易》阴阳系统。在赵宾事件之后,由于孟喜因此而不见信于诸儒,所以其弟子们也羞于谈及孟喜的《易》阴阳系统。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孟喜虽然得到“《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但他根本没有以此教人。因为“京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之时,当在京房以明灾异得幸于元帝之后。既然有以明阴阳灾异而得幸的机会,孟喜的弟子们也一定会想以此术得幸皇帝,而从《汉书》来看,他的弟子们没有以此得幸者,说明孟喜没有把其《易》阴阳系统作为教授门徒的主要内容,甚至发生赵宾事件后,孟喜也怠于以《易》阴阳系统教人了。而《汉书·艺文志》载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正说明人们已将孟、焦、京《易》阴阳灾异说当作同一个易学系统来对待。

关于焦延寿去世之年代,陈良运教授根据《焦氏易林》有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之事及成帝建始二年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1页。

(公元前 31 年)“新作初陵”之事,推定焦氏卒年在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 27 ~ 前 25 年)<sup>①</sup>,我们认为是合理的。果如此,则京房去世(公元前 37 年)以后,焦延寿又活了十几年的时间。

## 第二节 “焦林直日”法及 焦氏对卦象之扩展

如前一节所述,孟喜“《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与焦延寿“以候司先知奸邪”之说有内在相通之处。《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说焦氏之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孟康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注:当为六十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日,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善恶也。”即是说,一爻主一日,每卦主六日,震、离、兑、坎分别主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当日。今本《焦氏易林》亦附有“焦林直日”之法:

### 焦林直日

六十卦每卦直六日,共直三百六十日,余四卦各寄直一日。

立春 雨水(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

《小过》、《蒙》、《益》、《渐》、《泰》。

惊蛰 春分(春分震卦直一日):

---

<sup>①</sup>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0 页。

《需》、《随》、《晋》、《解》、《大壮》。

清明 谷雨：

《豫》、《讼》、《蛊》、《革》、《夬》。

立夏 小满：

《旅》、《师》、《比》、《小畜》、《乾》。

芒种 夏至(夏至离卦直一日)：

《大有》、《家人》、《井》、《咸》、《姤》。

小暑 大暑：

《鼎》、《丰》、《涣》、《履》、《遁》。

立秋 处暑：

《恒》、《节》、《同人》、《损》、《否》。

白露 秋分(秋分兑卦直一日)：

《巽》、《萃》、《大畜》、《贲》、《观》。

寒露 霜降：

《归妹》、《无妄》、《明夷》、《困》、《剥》。

立冬 小雪：

《艮》、《既济》、《噬嗑》、《大过》、《坤》。

大雪 冬至(冬至坎卦直一日)：

《未济》、《蹇》、《颐》、《中孚》、《复》。

(从大雪后将坎卦入数断,从立冬后四十五日,系王相不断。)

小寒 大寒：

《屯》、《谦》、《睽》、《升》、《临》。

每两节气共三十日,管五卦,逐日终而复始排定,一卦相次管六日。凡卜,看本日得何卦,便于本日卦内寻卜得卦,看吉凶。

由此可知,焦氏以除四正卦以外的六十卦配三百六十日,而四正卦各主一日,即“春分震卦直一日”,“夏至离卦直一日”,“秋分兑卦直一日”,“冬至坎卦直一日”。如此,焦氏所指六十四卦共主三百六十四日,余下的一日又四分之一,尚未进行配值。这与上文孟康所注要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显然,“焦林直日”法与孟喜“六日七分”法稍有不同,因为在“六日七分”法中除四正卦以外,其余各卦每卦值六日七分,四正卦则只表示春夏秋冬四季,而不值具体的日子。在“焦林直日”法中,四正卦各主一日,这种方法仍有四正卦卦气说的影子,应该是从四正卦卦气说发展而来。当然,“焦林直日”法仍以十二消息卦为纲领。如果上文所论“六日七分”法确出于孟喜“《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焦林直日”法确出于焦延寿“以候司先知奸邪”之术,说明在这一点上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与焦延寿“以候司先知奸邪”之术相通而又有不同之处。焦延寿从孟喜问《易》以后,也可能学会了孟喜的“六日七分”法,并以此教授。京房有可能从焦延寿处学到了孟氏“六日七分”法,又了解“焦林直日”之法,并将“六日七分”法作了进一步改进。《新唐书》志第十七上历三上僧一行《卦议》有云:

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

由上一部分所说孟氏“六日七分”说可知,由冬至“甲子卦气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sup>①</sup>。孟喜(或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将坎卦初六配冬至,而坎卦本身并未被分配具体所值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141、145 页。

之日。京房则将十一月公卦中孚卦之前与中孚卦毗邻的颐卦所主之六日八十分之七减去八十分之七十三,借为坎卦所值日数。这样,颐卦所主六日七分便被减为五日五十四分。晋、井、大畜三卦分别在与震、离、兑相对应之二月、五月、八月公卦之前,故这三卦所值日数亦如此计算。这样,从冬至坎卦所主八十分之七十三加上中孚卦所值六日八十分之七,至复卦“一阳来复”正好是“七日来复”(《复》卦卦辞)。因此,僧一行认为,京房给坎卦配值八十分之七十三,旨在附会《复》卦“七日来复”之辞。《汉书》没有记载孟喜以“《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推言灾异的内容与例子,但《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则记载焦延寿“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我们已无从知道焦氏是用“焦林直日”法,还是《焦氏易林》,还是其他推衍方法而达到如此高的占断水平。而从“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来看,京房所运用的可能不是“焦林直日”法,而主要是运用他自己改进过的“六日七分”法来推言灾异,且达到“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屢中”之相当高的推言灾异水平。至于焦延寿、京房师徒是如何以“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之术推言灾异的,我们将在下文京房易学部分进行探讨,此不赘述。

传世文献冠以焦贛名字者只有《焦氏易林》及其所附“焦林直日”法。从上一节所引陈良运教授与尚秉和先生之论证可以断定,《焦氏易林》确为焦延寿所作。虽然如此,由于其流传时间之久,汉魏时人《易林》又很多,传世本《焦氏易林》难免串入其他《易林》之内容,但无伤其大体,它仍可作为我们研究焦氏易学的重要依据。《焦氏易林》是以《易》之卦变为基础的。《周易》共有六十四卦,某一卦通过一个爻变、二个爻变、三个爻变、

四个爻变、五个爻变、六爻全变或六爻全不变而变成其他卦。这样,每一卦即可以变出六十四卦。《周易》六十四卦共可以变出四千零九十六卦。焦氏在每一卦下皆配有一首四言诗,称为“林辞”。

尚秉和先生是研究焦氏易学的大家。尚先生自称“老而学易”<sup>①</sup>,学《易》后他对《焦氏易林》用功最勤,对《焦氏易林》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著有《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二书。尚先生在研究《焦氏易林》的过程中,发现《焦氏易林》中有许多逸象,指出《焦氏易林》反映的乃是西汉古易正宗,认为“西汉释《易》之书,无如《易林》之完善。凡《易林》之辞无一字不从象生,且无一象不本之《易》”<sup>②</sup>。尚先生明确指出,“《说卦》系自古相传之象,至《周易》愈演愈精,故用象每与《说卦》异”<sup>③</sup>,“《易林》逸象,其与《易》有关,可以解经,并可以正《易》注之误者”<sup>④</sup>。尚秉和先生的学生黄寿祺亦从其师之说,认为“《易林》繇词,无一字不从象生,不从数出。且对象、覆象、大象、半象,往来杂用,妙义环生,与《周易》之彖辞、爻辞,合若符契,则二千年来无一人能察见也”<sup>⑤</sup>。《焦氏易林注·作壙叙》引王晋卿之语如此赞誉尚先生之发现:“此书将二千年易象之盲词吃说一一驳倒,使西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8页。

②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作壙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尚秉和例言》。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④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易林〉逸象原本考》。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⑤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詁·黄寿祺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汉易学复明于世,孟子所谓其功不在禹下。”又引陈散原之语说:“读尚氏《焦氏易詁》,叹为千古绝作,以今世竟有此人著此绝无仅有之书,本朝诸儒见之当有愧色。”<sup>①</sup>《焦氏易林》果真像尚秉和本人及上述诸儒先生所云吗?笔者对尚先生所说之逸象进行考察后,发现即便尚先生所说的“逸象”确为西汉及《周易》经、传文作者所用之象,这些“逸象”中的绝大多数仍可从《说卦传》所说其本卦象衍生而出或某卦本身可衍生出某种物象,或与古代天人一体的宇宙图式有关。我们在此据尚先生《〈易林〉逸象原本考》对其所云之逸象进行分析评论,以见其所谓“逸象”之内涵。

尚先生在《焦氏易林》中发现有一百七十余与《易》相关之逸象,“其与《易》无关推广之象,尚不知其几千百,皆省而不录”<sup>②</sup>。今据尚先生所录与《易》相关之“逸象”进行分析。

据《〈易林〉逸象原本考》,乾卦(☰)之逸象有:(1)“日”。尚先生注云:“《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彖》‘大明终始’,‘大明’即日。《晋·彖传》‘顺而丽乎大明’,是。”案:尚先生所谓“乾为日”之逸象,恐与荀爽注《乾·彖》“大明终始”时所说“乾起坎而终于离”及《九家易》注《同人》时所说“乾舍于离,同而为日”(见李鼎祚《周易集解》)之观念相通。又《说卦传》本来就说离“为乾卦”。这些观念出现很早,与东汉虞翻惯用的“月体纳甲”说亦有内在联系,说明先秦时就可能有这样一种表示一年、一月或一日中阴阳盈虚的宇宙图式,此图式与十二消息

①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作壙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易林〉逸象原本考》。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卦卦气说亦有内在相通之处。据此图式，乾卦正好被配于南方离位，而据《说卦传》，离为日。尚先生称此为“先天”，据笔者上文所讨论的“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之阴阳消息规律来看，宋人邵雍据“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加一倍法所得出的完全对称的“先天八卦”与汉时乃至先秦用以符示阴阳消息的概念是不同的，尽管这两种图式看起来是一样的。我们在此姑且称这种图式为“先天图式”。（2）河海。尚先生印证之以《同人》卦卦辞之“利涉大川”。案：《易纬·乾坤凿度》云“乾者，天也，川也，先也。川者，倚竖天者也”<sup>①</sup>。在此“河海”乃“川”之衍生义。（3）山陵。尚先生印证以《同人》“升其高陵”。案：乾在“先天图式”之艮位，艮为山陵。（4）石。尚先生印证以《说卦》“乾为玉”。案：《说卦》“乾为玉”一是取玉之寒凉之性与乾相通，一是取金、玉相近五行皆属金之义。崔憬注曰：“天体清明而刚，故‘为玉、为金’。”于义更胜。“乾为石”应仍取乾在“先天图式”中位于艮位，而艮为石之故。（5）虎。尚先生印证之以《文言》“风从虎”及《履》之“虎尾”。案：除《说卦传》以外的其他《易传》九篇之文本身就是对六十四卦卦义作进一步阐发，如果我们再从每一字上找其八卦卦象根据，则一定会有牵强附会之嫌。如虞翻在注《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时曰：“‘君子’谓三。乾健故‘强’。天一日一夜过周一度，故‘自强不息’。《老子》曰：‘自胜者强。’”（见《周易集解》。下文所引除特别注出者外，皆引自本书）本来《乾·象》已据卦之象推阐出人应“自强不息”的道理，虞氏一定要从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中找出《象传》中“君子”之卦爻象根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17页。

据,又从乾健的属性找出“强”的来源。这真如王弼所批评的象数家们之“案文责卦”了。这是虞翻等太泥于经、传文皆为“辞由象出”之故。尚先生在注《焦氏易林》时亦常犯类似的错误。据前文曾提到的濮阳西水坡出土的用蚌壳做成的“龙虎图”可知,早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中国古人已有东方苍龙、西方白虎的概念,而据《说卦传》,兑为西方,即使《周易》经文无一字不从象出,《履》(䷉)之“虎”象亦应该从下卦兑(䷹)卦象而出,而不是从乾而出。(6)大川。案:如前所引,《易纬·乾坤凿度》云“乾者,天也,川者,先也。川者,倚竖天者也”,可见此象确为西汉人所用之象。

坤卦(䷁)之逸象有:(1)水。案:坤在“先天图式”中在坎水,坎为水。(2)江淮、(3)鱼,其由同(1)。(4)蛇。案:帛书《周易》经传文“坤”皆作“川”。坤“川”之水流行有蛇象,故为蛇。又,“先天图式”巽位为后天八卦之坤位,巽为蛇。(5)渊、(6)云,皆取坤在“先天图式”所居坎位之象。(7)墟。案:墟为废土,而坤为土。(8)茅茹。案:茅茹柔和,可作为坤之衍生义。(9)逆。尚先生注曰:“坤逆行,《乾凿度》:‘坤右行,阴时六。’”是。(10)北、(11)心、(12)志、(12)忧、(14)疾病、(15)毒、(16)劳,皆可视为源自坤在“先天图式”中所居之坎位之象。《说卦》坎“为心病”、为“加忧”、为“亟心”。(17)风。尚先生引“《内经》谓:‘风,土气所生。’”以证之。是。亦可以坤阴之消自巽始释之。又:巽在“先天图式”中居于西南坤位。巽为风。(18)野、(19)郊、(20)原,皆可视为“坤为地”之衍生义。

震卦(䷲)之逸象有:(1)武。尚先生引《国语》“震,车也”,“车为震,武”以印证之。是。(2)旗。案:震(䷲)卦竖起来有旗帜飘动之象。(3)鸿、(4)隼,皆有飞鸟翅膀震动之象,可视为震

卦之衍生义。(5)南。案：震有“一阳来复”之象，据“先天图式”，阳息自震，经“春以授夏”，息长至乾则至南方。(6)爵、(7)樽，可视为震为筐象之衍生义。案：虞翻注《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时即释震为筐。从外形上看，震确有筐、簋、酒樽之象。(8)食。案：兑为口，则震有大口之象，故《震》卦卦辞有“笑言哑哑”之说。(9)鹤。亦取震为飞鸟之衍生义。(10)君。案：取长子代父之义。据《说卦传》，震为长子。(11)周。尚先生引《文言》“反复道也”，“周而复始”以证之。是。另，震“一阳来复”亦有一个新的阴阳消息之周期开始之象。(12)姬。尚先生认为其为“周姓”。案：以卦象释姓与各国国名，甚为牵强。(13)瓮、(15)舟船，亦为“震为筐”之衍生义。(14)胎。亦为“一阳来复”之义。(16)飞翼。取震为飞鸟翅膀震动之象。(17)老夫。案：可能取年老后之长子之象。据《说卦传》，震为长子。(18)商旅。案：或许取震为动，各处走动不息之象。(19)公、(20)父，皆取长子代父之象。(21)口。案：据《说卦传》，兑(☱)为口，那么，震(☳)则有大口之象。(22)羊。尚先生证之以“《大壮》、《归妹》上六皆曰羊”。案：据《说卦传》，兑(☱)为羊，上面之阴爻(--)有羊角之象，而震(☳)亦可视为有羊角之象。(23)神。尚先生云：“‘帝出乎震’，帝即神。”是。(24)襦。尚先生证之以《既济》“襦有衣袽”。虞翻注之以为有衣败裂之象。案：下文巽卦(13)亦有此逸象。巽为震之伏象。巽卦(☴)有一阴消阳之象。若乾(☰)为完美之衣之象，则巽为败衣之象。于义更胜。所以，尚先生此处将其统计为震之逸象，恐有疏失之处。(25)缶、(26)瓶，皆可视为“震为筐”之衍生义。(27)辰。尚先生曰：“邵子以震为辰，本此辰，时也。《损》、《益》皆曰‘与时偕行’，皆以震故。”案：此当为震之“一阳来复”

之衍生义。(28)登、(29)狩、(30)乘,皆可视作“震为动”之衍生义。(31)华。案:震(䷲)有较大之花瓣之象。(32)羽翰。取震为飞鸟之翅膀之象。(33)发。尚先生证之以“《巽》‘寡发’,巽反为震,故多毛”。案:震(䷲)两阴爻有毛发之象。(34)袂。与(24)襦之取象相类。(35)东北。案:在“先天图式”中,震据东北艮位。(36)萌芽、(37)箕子。案:震(䷲)有树芽之象。(38)孩子。案:乾坤生六子,震、坎、艮皆有孩子特别是男孩子之象。(39)田。可视为从“震为大涂”之象衍生而出。(40)山阴。若把震(䷲)竖起来,其两阴爻有山之阴面之象。(41)嘉。震(䷲)卦“一阳来复”,故有嘉美复来之象。(42)邻。据尚先生“同性相敌,异性相感”之说,<sup>①</sup>震卦(䷲)下面之一阳爻与上面两阴爻相感相应,可以说是阴阳之间是好邻居。(43)藩。尚先生印证之以《大壮·九三》“羝羊触藩”。案:大壮(䷡)三、四、五爻所互之兑(䷹)有羊角之象,震(䷲)有藩篱之象。整个卦有羊角伸入藩篱,进退两难之象。(44)斗。尚先生印证之以《丰·九四》“日中见斗”。案:根据尚先生研究《易林》之思路,于省吾先生发现震(䷲)在《易林》中有丘象,尚先生没有发现此象。于先生指出,“《说文》谓‘四方高中央下为丘’,《淮南子·墜形》的‘和丘’,高注谓‘四方而高曰丘’。按震作䷲,象四方高中央下之形。丘字卜辞作,金文作,以卦画有横无竖验之,则古文字的丘字正与震象相符洽”,“以震为丘,于《周易》中之言丘者无一不合。贲卦作䷖,六五:‘贲于丘园’,丘园指‘上互’为震言之;颐卦作䷚,六二:‘拂经于丘’,丘指内卦为震言之;涣卦作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周易尚氏学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六四:‘涣有丘’,丘指涣‘下互’为震言之”<sup>①</sup>。这样,震之斗、虚、筐、瓶、缶之象皆是从其中虚之象而出。(45)福。阳出成震(䷲),“一阳来复”,故为福。(46)虚。与(44)解同。(47)岁年。震既然为辰、为时,即可衍生出岁年之义。

巽卦(䷸)之逸象有:(1)母。尚先生印证之以《小过》“遇其母”,《蛊·九二》“干母之蛊”。案:巽(䷸)为阴始消乾(䷀)之象,消至极致则为坤(䷁)母。(2)齐。尚先生证之以《说卦》“齐乎巽”。是。(3)姜。尚先生云:“齐姓犹震为周,故为姬。《左传》‘若异国必姜姓也’,以巽为姜。”此说较勉强,不知所出。笔者以为,以卦象释姓氏、国名等较为勉强,有“案文责卦”之嫌。(4)少姜、少齐。尚先生云:“《大过》‘老夫得其女妻’,以巽为少。”案:巽(䷸)阴始剥阳,故为少。(5)陨落。巽(䷸)阴始剥落阳爻,故有陨落之象。(6)豕。案:豕腿可以巽(䷸)下之阴爻象之,豕体可以巽上两阳爻象之。(7)豚。从尚先生对《中孚》“豚鱼”的解释来看,它是把“豚”当作“豕”的通假字来看的<sup>②</sup>,此象之由同(6)。(8)虫。尚先生证之曰:“《左传》‘三虫为蛊’故巽为虫。”案:《淮南子·天文训》、《孔子家语·执轡》皆有“风主虫”之说,据《说卦传》“巽为风”,则巽亦有虫象。(9)蠹。尚先生以《周易》经文印证之曰:“《大过》‘栋桡’,虫在下也。”案:此象与第(8)之释同。(10)腐。尚先生证之曰:“《剥》‘烂也’。”案:一阴消阳,故“腐”。(11)敝漏。尚先生证之以《井》“瓮敝漏”。案:亦一阴消阳,完体从下而破之义,故有敝漏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于省吾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

②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中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8页。

之象。(12)隙。其解同(11)敝漏。(13)柳。尚先生证之以《既济》“濡有衣柳”。案:上文震卦有此逸象,此逸象在此处归于巽卦,于义更胜。(14)盗贼。尚先生印证之曰:“《杂卦》:‘巽,伏也。’故与坎同。”案:巽(䷸)有一阴伏于二阳之下之象,故有“盗贼”隐伏之象。(15)烂。尚先生注云:“《杂卦》:‘剥,烂也。’烂始于巽。”是。亦为一阴剥阳之象。(16)寇戎。其解同(14)之释。(17)病。尚先生云:“为羸,《说文》:‘羸,病。’”案:此亦为一阴剥阳之衍生义。(18)枯。尚先生印证之以《大过》“枯杨”。案:一阴剥阳,下体腐烂,于木则有“枯”象。(19)𦍋。尚注曰:“马云‘麋’也,未济之无妄:‘求麋耕田’,以《无妄》互巽为麋。”案:巽(䷸)下一阴象麋之腿,中上二阳象麋之身。(20)疑。尚先生印证之曰:“《丰·六二》:‘往得疑疾。’《巽·初六》:‘进退,志疑也。’”是。

坎卦(䷜)之逸象有:(1)首、(2)大首。尚先生印证之《说卦》“为下首”及《明夷》“得其大首”。案:荀爽注《说卦》坎“为下首”云:“水之流,首卑下也。”是。(3)肉、肺。尚先生以《噬嗑》“噬干肉”、“噬干肺”、“噬腊肉”印证此象。案:此处坎所象之肉应为带骨之肉。坎(䷜)中间一阳象骨,两阴爻象附于骨上之肉。(4)夫。案:此当为坎“中男”之衍生义。(5)矢。案:坎(䷜)中间一阳爻象矢之主体,两阴爻两矢之羽翼。(6)鬼。尚先生印证之以《说卦》坎为“隐伏”。甚是。(7)孤。案:一阳陷于两阴之中,故“孤”。(8)西。案:坎在“先天图式”中居于西方兑位,故有此象。(9)泥。案:为坎“水”之衍生义。(10)食。坎(䷜)两阴吞一阳,故有“食”象。(11)筮。案:筮有稽疑之功,可作为智谋之凭据之一。智与坎水相配在《管子》在已有记载,此乃坎为“水”之衍生义。

离卦(☲)之逸象有:(1)星。尚先生印证之以《丰·九二》“日中见斗”、“见沫”。案:星可视为小日,此为离“日”之衍生义。(2)东。案:离在“先天图式”中居东方震位;又:离日出于东方。(3)金。尚先生注曰:“《鼎·六五》‘金铉’,外坚之义。”案:乾在“先天图式”中据南方离位,乾为金。又:《说卦》离“为乾卦”。(4)巷。案:离(☲)中虚,象两墙所夹之巷。(5)肤。案:坎为美脊、为骨,则离为肤,坎伏离见之故也。

艮卦(☶)之逸象有:(1)火。案:《说卦》艮“为狗”。《淮南子·墜形训》、《孔子家语·执轡》皆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之说。此说应有极早之渊源。故艮在很早之前亦有星斗之象。斗柄所指定季节。又:古有火历,以昏时心宿(称为大火星)所处位置定季节。(2)鸟、(3)鸿、(4)隼,盘旋时靠下之翅膀与艮卦卦象合,而其上面翅膀则与震卦卦象合。因此,小过(䷛)卦之大象确有飞鸟之象。尚先生认为,“凡鸟之鸛者,无不黔喙”<sup>①</sup>,亦即这些象乃为“艮为黔喙之属”之衍生义。(5)面。案:人面额部象艮上之阳爻,眼、口则象艮下之两阴爻。(6)簪。案:此为艮“止”或“指”之衍生义。(7)须。案:人面象艮上之一阳,须则象艮下之两阴。(8)祖。案:《说卦传》艮为“门阙”,其衍生义则为宗庙、为祖。(9)臣、(10)臣妾,当取艮为“少子”之衍生义。(11)角。尚先生注曰:“凡《易》言角,指上阳。”案:角与艮(☶)之伏兑(☱)之象更合,而艮为黔喙之属取的才是阳元在前、在上之象。(12)啄。《说卦》“艮为黔喙”之衍生义。(13)负。案:艮有肩负之象。(14)寿。尚先生证之以《说卦》艮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序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0页。



为“坚多节”。案：艮既然为宗庙、为祖，则年代久远，故亦有寿象。(15)贵。案：一阳乘两阴，故“贵”。(16)邑邦国。案：此取艮止防御之衍生义。(17)床。尚先生印证之以《剥》“剥床以足”。案：《巽·九二》“巽在床下”，宋衷注曰：“二阳在上，初阴在下，床之象也。”巽(䷸)有床象，而艮(䷳)亦有床象，只是巽所象之床床腿矮而床体厚，艮所象之床床腿高而床体薄。所以二者皆有床象。(18)斯所。案：此为艮“止”之衍生义。(19)贝。案：艮有贝壳卧伏之象。(20)金。案：此为艮为石之衍生义。又：艮在“先天图式”中居西北乾位，乾为金。(21)观、(22)视。案：艮有半观(䷓)之象，又有从门阙(艮为门阙)窥观之象。(23)光明。案：一阳在上，光明之象。(24)龟。案：艮上之阳爻象龟壳，下二阴爻象龟腹及足。其实艮(䷳)比离(䷄)更有龟象(《说卦》离“为龟”)。(25)西北、(26)天、(27)刀剑。案：艮在“先天图式”中居西北乾位，“刀剑”为乾金之衍生义。(28)枕。尚先生以《坎·六三》“险且枕”以印证之。案：虞翻注曰：“枕，止也。艮为止。”所以，在虞翻看来，艮即有止象。枕，程颐释为“支倚。居险而支倚以处，不安之甚也”(《程氏易传》)；朱熹释为“倚着未安之意”(《周易本义》)；尚秉先先生释为“检制”。皆有“未安”之意。艮(䷳)一阳居于二阴之上，基础不牢，“依着未安”之象。(28)牛。丑为牛，丑在艮位，故艮亦为牛。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亡盗》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盗者》已将丑与牛相配应<sup>①</sup>，说明这种配应应该很早。另外，笔者在上文孟喜十二消息卦气说部分已经指出《左传·哀公九年》的一段记载

<sup>①</sup>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221页。

表明,至晚在春秋时期已经将子与北方水位即坎位相配应,将丑寅与东北艮位相配应也应该是很早就已经完成。至少至焦延寿写《易林》时,这种配应已经完成。(29)豕。案:豕嘴坚而硬,与“黔喙之属”相类。(30)夫。案:此为艮为“少男”之衍生义。(31)巢。案:鸟巢在树上,下面空虚,一阳浮于二阴之上之象。(32)僮仆。案:此可视为艮为“少男”之衍生义。(33)终日。案:艮既为时、年岁,其衍生义亦可为终日。(34)谷。案:此乃艮山之衍生义。

兑卦(☱)之逸象有:(1)月。于省吾先生如此解释:“按《说文》:‘月,阙也。’《释名·释天》:‘月,阙也,满则阙也。’是月、阙叠韵,以音为训。再就形言之,古文字月作或,正像月阙形。兑上偶画中阙,故以兑为月。”<sup>①</sup>甚是。(2)华。尚先生印证之以《大过》“枯杨生华”。尚先生指出,“兑悦,华形又象兑也,故以兑为华”<sup>②</sup>。是。(3)老妇。尚先生以为,“兑虽为少女,而与乾连,乾顺行,自下而上,在下者少,在上者老,时不同也”<sup>③</sup>。可备一说。(4)鲁。尚先生以为,“《说卦》‘兑刚卤’,鲁卤通”。案:如前所述,以卦象释国名,很牵强。(5)资斧。案:兑有斧头之象。(6)井。案:兑有浅井之象。(7)牙齿。案:此取兑之刚卤决断之象。(8)鸡。尚先生注为“居西”。案:上文已云《左传·哀公九年》的一段话已说明至晚在春秋时期,子与北方坎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于省吾序言》。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 页。

②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詁》。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6 页。

③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詁》。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7 页。

水之位相配,那么,酉与西方兑位相配亦在情理之中。起码至焦氏写《易林》时,酉与西方兑位早已相配,是古代图式观念的一种反映。(9)燕。案:燕为黑色,本属坎水。据“先天图式”,坎在西方兑位,故兑亦可为燕。(10)耳。案:耳为浅穴,兑有浅井、浅穴之象,故兑亦有耳象。(11)酒。尚先生注云:“兑水故与坎同象。”是。(12)穴。如上所云,兑本身就有浅穴之象。(13)兵戎。案:《说卦》兑为“正秋”,有肃杀之象,故为兵戎。(14)雨。案:兑既与坎同有水象,故亦有雨象。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尚先生所说的这些逸象,绝大多数为八卦自然之物象,贯彻的正是《系辞传》“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之旨。少数逸象则与古代天人一体的宇宙图式有关。这些逸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卦象与卦辞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观象系辞”之义。但正如于省吾先生在上述对震为丘之解释之后所说,尚先生对卦象之挖掘有不能一以贯之之处:“先生有的谓艮为山以当丘,有的训丘为空,又以巽为虚,既不能一以贯之,又均背于易象。此外,鼎卦作䷱,《乾凿度》谓‘鼎象以器’。毛奇龄《仲氏易》说:‘鼎有足有腹有耳有铉,而卦文俱象之。下画偶似足,二三四画奇皆中实,似腹,五画偶似耳,上画奇似铉。’按毛解甚确,而先生于本书从端木国瑚之说,谓‘鼎象不在鼎,而在伏象屯’,舍鼎形之实象而信伏象,未免疏失。”<sup>①</sup>尚先生在寻找逸象时,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又如他比较注重大象,而在真正需用大象进行解释时他又往往不用。如小过卦(䷛)在大象上更具飞鸟之象,而尚先生却从上卦震、

<sup>①</sup>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于省吾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页。

下卦艮之逸象皆为飞鸟来释之。又如颐卦(䷚)从大象来看自具口象,噬嗑(䷔)从大象看显为口咬梗物之象,而尚先生却又以八卦之象进行解释:“震为口,初至四,正反震口合。上离,正反兑口合。故曰噬嗑。”《噬嗑》有“利用狱”之词,噬嗑从大象上看更具枷锁之象,而尚先生又以“坎为狱”释之,又失其大象之旨。由此说明,尚先生所说的逸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尽管如此,尚先生对《焦氏易林》的解释总体上能讲得通,向我们展示了古《易》易象之丰富性。

《东观汉记》有一条用《易林》占筮的例子:

永平五年秋(公元62年),京师少雨。上(明帝)御云台,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蚁封穴户,大雨将集。”上即以诏书问沛王辅曰:“道岂有是邪?”辅上书曰:“按易卦《震》之《蹇》:‘蚁封穴户,大雨将集。’蹇,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出云为雨,蚁灾居而知雨,将云雨,蚁封穴。故以蚁为兴文。”诏报曰:“善哉王次序之!”

《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之《沛献王辅传》说“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讖,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可证沛献王刘辅用的是《焦氏易林》。可以看出,刘辅是以《说卦传》之卦象对之卦卦象进行解释,没有从两卦中寻找蚁、穴、封之象,而是说“以蚁为兴文”,说明古人对易象之解释可能不像尚先生这样寻找每一个字之卦象之根据。《林辞》之写作除有《周易》象思维逻辑之外,应该有更深的建构原则等待我们去研究、探讨。

《焦氏易林》的另一个特点是有些《林辞》与“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或“焦林直日”暗合。如《屯》之《中孚》:“北陆

闭蛰,隐伏不出。目盲耳聋,道路不通。”据“六日七分”等说,中孚居北方坎水之位,“北陆闭蛰,隐伏不出”正是北方坎水之象。《否》之《随》:“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在七十二候卦气说中,随与“桃始华”之候相配应。对照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大有》之《豫》“雷行相逐,无有休息”,《豫》之《兑》“秋蛇向穴,不失其节”,《泰》之《无妄》“桑之将落,陨其黄叶”,《泰》之《大畜》“长生以时,长育根本。阴阳合德,岁乐无忧”,等等,皆与七十二候卦气说相合,说明焦延寿在写《林辞》时有可能把卦气说之因素亦曾考虑进去。

另外,《焦氏易林》中对许多灾异现象的描述与《汉书·五行传》所引《京房易传》对灾异的描写有许多相同之处,从而可以看出师徒言灾异之内在联系。我们将在京房易学部分详述之,此不赘述。

至于《焦氏易林》为什么不见于《汉书》等记载,陈良运教授给出三个理由:第一,《易林》涉及政治方面的繇辞,有的太尖锐,大有“犯上”之嫌……他必定有意将《易林》秘不示人,藏而不传;第二,焦延寿在“鼠舞庭堂”、“飞言如雨”的环境里,不愿以自己呕心沥血之作去博取什么名望;第三,“门户之见”的干扰,孟喜的弟子白生、翟牧便不肯承认“延寿《易》即孟氏学”<sup>①</sup>。陈教授所言甚是,笔者赞同他的观点。

《周易集解》只引有一条焦氏易《注》。《随》“元亨利贞,无咎”,焦贲注曰:“汉高帝与项籍,其明征也。”李道平疏曰:“焦延寿字贲,汉人,即京房所从受学者也。著有《焦氏易林》十六卷,

<sup>①</sup>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3-514页。

今存。又有《易林变占》十六卷，今佚。兹所引焦氏云云，当《变占》中语也。史称汉高祖宽仁爱人，常有大度，顺民而定天下。规模宏远。又谓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卒亡其国。一众随而有是四德则兴，一众随而无是四德则亡，故云‘汉高祖与项籍，其明征也’。”<sup>①</sup>由此可知，焦氏此释有点以史证《易》的味道，与《焦氏易林》多征引历史典故以明事理确有相通之处。

---

<sup>①</sup>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9-210页。

## 第五章 京房易学研究

经学发展至宣帝时代,是学术上进一步分化的时代。就《春秋》来讲,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只有《公羊春秋》。宣帝听说他的爷爷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便于元康(公元前65~前61年)中选十人习《谷梁春秋》,并于十余年后之石渠阁会议上立《谷梁春秋》于学官。又如其时善说灾异的夏侯胜治《尚书》及《洪范五行传》,夏侯胜从父之子夏侯建是夏侯胜的学生,又师事《尚书》大师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侯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夏侯建亦非议夏侯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sup>①</sup>由此可见,夏侯建之章句之学除扩展《尚书》本身之学以外,亦融入了其他诸经之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既融合又创新的过程,而其目的则是应对论敌。可见,在孟喜之前或同时,夏侯建已经改师法,但夏侯建仍被擢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至宣帝末,大小夏侯《尚书》皆立于学官。由此亦不难理解,孟喜“诈言”从其师田王孙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也有易于应敌之

---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9页。

想法,而其所应之敌包括其同门师弟梁丘贺在内。就易学而言,宣帝听说梁丘贺的老师京房(注:此京房是杨何的学生,后出为齐郡太守,梁丘贺便更事田王孙)为《易》明,在求其门人时得到梁丘贺。后来梁丘贺因以筮有应而近幸,并很快升至少府之职。显然,宣帝当时十分喜爱京房法。后来博士缺,众人推荐孟喜时(估为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这时宣帝正令人习《谷梁春秋》),宣帝以孟喜“改师法”而没有擢用孟喜。虽然孟喜、梁丘贺后来共同师事田王孙,但梁丘贺一开始接受的是王同一杨何—京房一系的易学,而田王孙则是丁宽—一系易学,两个系统在宣帝时已经因分化而有所不同,这也是何以有“京房法”之名的原因。所以,孟喜搬出“《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来,一定有应对梁丘贺之“京房法”之意。尽管宣帝听说孟喜改师法而没有拜孟喜为博士,由于在此之前的魏相、丙吉以阴阳气说治国并为宣帝所接受,且大小夏侯之灾异说亦得到宣帝的认可,所以在宣帝末梁丘《易》被立于学官之前,已融入《易》阴阳特色的孟氏《易》依然被立于学官。同时,以《齐诗》言灾异的翼奉之灾异说也在悄然兴起,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在孟喜自称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诸儒以此耀之”的同时,“长于灾变”、“以风雨寒温为候”的昭帝末时已为小黄令的焦延寿之易学已经在民间悄然兴起。二者皆属于《易》阴阳系统,只是焦氏易属于更为纯粹的《易》阴阳系统,有《焦氏易林》流传于当世。而孟喜仍保留有田王孙传承下来的经学《易》系统,有“《易经》十二篇”及“《章句》二篇”流传于当世。在政治上,由于宣帝亲政后任用魏相、丙吉、黄霸、龚遂、郑弘等贤良之吏,出现了“凤皇、甘露降集”、“神爵数集”、“嘉谷、玄稷降于郡国”、“金芝九茎产生函德殿铜池中”、“黄龙登兴,醴泉滂流”等所谓祥瑞。但由于宣帝看到元帝



为太子时即好儒,而宣帝不喜纯任德教,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sup>①</sup>,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sup>②</sup>。这就为元帝时萧望之、周堪、京房等被陷害及元帝一朝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而元帝初即位后正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师事焦延寿、精于焦氏阴阳灾变说的京房之易学便应运而生了。

## 第一节 京房易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前文“西汉经学发展述论”部分,我们没有详述京房易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为了更好地探究京氏易学之原委,我们在此对京房易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论述。

《汉书·魏相丙吉传》有言:“古之制名,必繇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乎哉!”<sup>③</sup>宣帝亲政后,任用魏相、丙吉等贤相,“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称其职,民安其业”<sup>④</sup>,真可谓“天

---

① [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7 页。

②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284 页。

③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50—3151 页。

④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5 页。

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泰·彖》）。而这一良好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宣帝取缔了霍光时所主之中朝。而导致西汉再衰的主要原则是由于宣帝后期如武帝时期对宰相权力的再次剥夺及任用宦官弘恭、石显等人。进入元帝时代以后，灾异现象频频发生，随着儒学内部经学系统的分化，灾异说逐渐成熟并渐被重视，“灾异”说成为攻击政敌，排除异己的政治工具。京房易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政治舞台的。

## 一、重用宦官与西汉再衰

宣帝因重用“少学《易》、有师法”的魏相及敦厚持重、善用阴阳二气变化理念治国的丙吉等而致西汉之中兴，而导致元帝时西汉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宣帝一开始省却而晚年又重新拾起的对中书宦官的重视。宣帝促成西汉中兴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为他亲政后“省尚书事”，给丞相以相当的权力，任用贤材，综合名实，重贤良直谏方正之士，而其“家天下”的治国理念又决定了他不会纯用儒术，因而他对儒家士大夫提出的建议与意见并不完全接受，所以他对“柔仁好儒”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从内心便感到不满：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惲、（盍）〔盭〕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

好法，宜为吾子。”<sup>①</sup>

可见，宣帝内心崇尚的乃是法家思想。他看到元帝好儒，认为这将是导致汉家衰乱的祸根，因而，为了确保他死后汉家天下的进一步延续，他又重犯武帝晚年所犯的错误——重用中书宦官。中国古代的这种“家天下”的专制制度，皇家不是相信宦官，就是相信外戚，而对于方正直谏的儒家士大夫总抱着防范的态度而不敢真正放心使用。又由于私欲渐次膨胀的宦官或外戚之从中作梗，最终总是一次次地导致“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的悲惨局面（《周易·否·彖》）。而这正是历朝历代最后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宣帝驾崩后，从元帝开始走向衰落，直至最后的王莽篡位，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元帝的好儒，而在于宦官石显等弄权。这乃是宣帝重用宦官为此埋下的伏笔。

及宣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待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sup>②</sup>

本来宣帝让元帝的老师、当时的鸿儒萧望之、周堪受遗诏辅政并

① [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②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83页。

领尚书事为元帝施政开了一个好头,但宣帝信用宦官则对此造成极大的破坏。“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恭、显又时倾仄见诎。”<sup>①</sup>史高属外戚,其先人曾对宣帝有恩。石显、弘恭“皆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恭为令,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sup>②</sup>。这样,外戚与宦官便勾结在一起来设法陷害忠良之士。这时,中书与尚书便产生了直接的冲突:“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与高、恭、显忤。”<sup>③</sup>周堪后被拜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张猛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石显虽为中书令,但他对尚书事多有干涉,“显幹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sup>④</sup>。而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望之自杀,(周)堪、更生(即刘向)废锢,不得复进用”;“后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皆尝奏封事,或召见,言显短。显求索其罪,房、捐之弃市,猛自杀于公车,咸抵罪,髡为城旦。及郑令

---

①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84页。

② [汉]班固:《汉书·佞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26页。

③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84页。

④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48页。

苏建得显私书奏之,后以它事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sup>①</sup>如此致使朝廷元气大伤。这就是宣帝重用弘恭、石显等宦官的直接危害,从而也导致元帝时政治的一蹶不振。京房易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政治舞台的。

## 二、利用“灾异说”评议政治

武帝时期,尽管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已谈及“灾异”说,但“灾异”说并未对武帝产生明显的谴告作用。昭帝时霍光辅政,虽然因为夏侯胜言灾异之准确性令霍光越来越重视经术士,“灾异”说并未成为其辅政的核心理念。宣帝封睦孟的儿子为郎,说明宣帝还是承认“灾异”说的。从宣帝所重视的贤相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相数陈便宜,上纳用焉”可知<sup>②</sup>,宣帝对“灾异”说已深信不疑,因为《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与卦气说及“灾异”说有紧密的联系。而宣帝一朝多有当时人们所说的祥瑞之象,如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本始四年“五月,凤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夏四月,凤皇集鲁郡,群鸟从之”;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元康四年三月,“神爵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嘉谷、玄稷集于郡国,神爵乃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风为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甘露降,神爵集”,“鸾凤又集长

---

① [汉]班固:《汉书·佞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27页。

②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40页。

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甘露元年（公元前 53 年），“黄龙见新丰”；甘露三年，“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乡凤皇立，以万数”<sup>①</sup>。遇到这样的年份，多采取大赦、赐民爵等奖赏措施。而对于少有的几次灾异，亦对宣帝起到了一定的谴告作用。如，本始四年（公元前 70 年）夏，“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上乃素服，避正殿……”<sup>②</sup>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sup>③</sup>并大赦天下。夏侯胜前因非议诏书而下狱，正是此次大赦，夏侯胜才得以出狱“为谏大夫给出事中”。这是发生在宣帝亲政前的一次灾异事件。宣帝亲政后，多祥瑞之事，直至五凤四年（公元前 54 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sup>④</sup>可见，当时的“灾异”说确实对宣帝起到了一定的谴告作用。

与宣帝时相反，元帝时则多灾异而少祥瑞。如初元元年

---

①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42—253 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58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45 页。

④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68 页。

(公元前48年)夏四月下诏曰:“……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可知当时曾有数次地震,又曰:“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元帝初即位即遇到这么多的灾异事件。后面的灾异事件更是接连不断。如,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獮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等等,不一而足。而从元帝因灾异事件而下的诏书可知,元帝对这些灾异事件是多么战战兢兢。如,对于连年地震及水灾,元帝于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下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其之?其悉意陈朕之过,靡有所讳。”初元三年夏天大旱,元帝乃下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初元五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参。元帝下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可见,对于当时的灾异,元帝多进行自责。从下面的一道诏书可知,对于灾异元帝除自责外,亦间接地将灾异归咎于大臣。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元帝下诏曰:“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惟阴阳不调,未烛其咎,娄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施与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错躬。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可见,“灾异”说当时已成为从上至

下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学说。由于皇帝已对此说深信不疑,此说除了帮助皇帝真正地由阴阳说的角度分析问题之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评议政治、步入仕途的工具了。

京房易学便产生于这种政治背景下,京房正是以明灾异而得幸于元帝。京房试图以与其卦气说密切相关的“灾异”说劝说元帝疏远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充宗等佞臣,反而被石显等人所制。此一部分内容将在下文“京房生平评述”中进行详论,此不赘述。在此,我们只是简要地看一下,当时人们是如何利用“灾异”说评议政治的,以利于我更全面地了解京房易学产生的大背景。

其实汉宣帝时已有人以“灾异”说为根据向皇帝提建议了。如,宣帝时有一位叫张敞的大臣,霍光去世后,宣帝始亲政事,大封霍光的亲属,时任山阳太守的张敞在上封事中除提到历史上因大臣权力过重而导致的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季氏颛鲁以外,他还以灾异论说霍光之政:“乃者大将军(霍光)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朏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请罢霍氏三侯皆就弟。上甚善其计,然不征也。”<sup>①</sup>可见,如前所述,宣帝虽然承认“灾异”说,但不把它作为施政的主要根据。至元帝时,“灾异”说越来越作为为政好坏的根据。如元帝初立时任丞相的于定国即遇到此类问题:“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复以

---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7-3218页。



诏条责曰：‘郎有从东来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何以错缪至是？……’定国惶恐，上书自劾，归侯印，乞骸骨。”虽然元帝当时认为发生灾异的原因很复杂，不将此完全归咎于丞相等大臣：“……阴阳不调，灾咎之发，不为一端而作，自圣人推类以记，不敢专也，况于非圣者乎！……经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定国遂称笃，固辞。”<sup>①</sup>由此可证，元帝针对灾异乃以自责为主，而于定国认为这些灾异现象与他作丞相未尽尽职尽责有关，所以极引力咎辞职。最后，元帝还是接受了他的辞呈。利用灾异评议政治逐渐成为皇帝与众人认可的方式。如对于初元二年（公元前 47 年）的一次地震，元帝下诏曰：

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獬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赦天下。……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sup>②</sup>

这时，与元帝的师傅萧望之及后来成为元帝时丞相的匡衡同师，治《齐诗》的翼奉奏封事曰：

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

① [汉]班固：《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044—3045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81—282 页。

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说，伤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灭亡。<sup>①</sup>

翼奉所谓“天地设位，县日月，布星辰”，与《系辞传》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所描述的天道理念是一致的。而“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等说法与魏相、京房等所崇尚的“卦气”说的精神亦无二致。在翼奉看来，以上这些内容就是道的体现，而圣人见此道，就知道王治之象，这是翼奉等汉儒们所向往的五帝三王之道。而后世的贤者据此道而“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待贤者而用之，这是“经”的意义所在。而这里的“经”指的是儒家的六经。而贤者看到“经”就知道人道。而六经就是为人道所约定的行为规范。在这六经之中，《易》之阴阳说、《诗》之五际说及《春秋》之灾异说“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所以这三部经典又体现了王道。这是翼奉在为其推灾异寻找经典与天道上的根据。据《汉书·五行志》可知，《易》之阴阳说主要是以孟、京易学为代表，这正是本文所论的主要内容所在。翼奉主要治《齐诗》，他主要是以《诗》之五际说来言灾异。我们在此据其所奏之文大体了解一下他如何言灾异的，以更好地了解京房易学产生时的氛围与政治背景。翼奉接下来说：

---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72 页。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居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日临中时接律而地大震，其后连月久阴，虽有大令，犹不能复，阴气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①

翼奉是根据《诗》之五际来推灾异的。按他的说法，只要明了《诗》之五际说，就可以彻底明白日蚀、地震等灾异的原因所在，就像巢居之鸟禽知道风之将来，穴居之野兽知道雨之将至那样容易。翼奉在此说了这么多，旨在说明日蚀、地震是由于阴气太盛造成的。而阴气太盛的表现是朝廷后戚之党太多。对治阴气太盛的办法是增加同姓之臣以明亲亲，增加异姓之臣以明贤贤。他在奏封事的下文所说的减少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之数等措施以恢复人之天性并达到“损阴气应天救邪”的目的。这些与董仲舒之“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②的对治方法相仿。

由翼奉此次奏封事可知，当时以干支等推言灾异已成为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73—3174 页。

②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524 页。

时人评议政治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比董仲舒推灾异之法更加细化。虽然从《汉书·翼奉传》来看,翼奉的这一奏封好像没有引起元帝的特别重视,但至少元帝对这种言灾异的方式也没有进行反对与指责。从西汉后来的历史发展可知,翼奉这里所说的后戚权势过重正是元帝以后朝廷的特点,而且是西汉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翼奉的这一奏封事没有特别地将其时发生的日蚀、地震等指向石显、弘恭等宦官,所以翼奉并没有因此而引来杀身之祸。而因言灾异屡中而得幸于元帝的京房因把矛头直指向问题的症结即中书令石显、尚书令王鹿充宗等人作祟,在当时的体制之下,其被此等人剪除、陷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时的大儒萧望之、匡衡与翼奉同师而治《齐诗》。“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sup>①</sup>因翼奉“好律历阴阳之占”,推言灾异应该是他的强项。而其同门师弟、后为丞相的匡衡在上疏时亦含有“灾异”说的内容。

据《汉书·匡衡传》载:“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据《汉书·元帝纪》可知,这时应该就是前文所说元帝于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下诏问灾异之由的时间。上文已评述翼奉针对此诏的奏封。这时翼奉的同门师弟匡衡也针对此诏而上疏。匡衡在强调了礼让与教化之后,也涉及了对灾异的看法:

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

---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67页。

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晦，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sup>①</sup>

他认为日食是由于皇帝为下面不称职的官员所蔽造成的，又由于这些官员赋敛太多民不堪重负而导致阴变，阴变又导致了地震。匡衡没有把矛头指向元帝身边的大臣，恐怕主要是因为他为当时为辅佐元帝的外戚史高所荐。元帝初即位时，“乐陵侯史高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为副。望之名儒，有师傅旧恩，天子任之，多所贡荐。高充位而已，与望之有隙”<sup>②</sup>。元帝的师傅萧望之多有举荐，如当时萧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刘向）给事中，与待中金敞并拾遗左右”，而史高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落得名声不好。因为史高与中书令弘恭、石显等相为表里，而与萧望之等有隙。这时，史高便听从了长安令杨兴的建议，荐举家贫而好学的“平原文学匡衡”，这样就可以落下一个荐贤的好名声，于是史高便“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匡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疏的。从匡衡所上之疏可知，他虽与翼奉同师，但他并不专言灾异，其对灾异的解释与董仲舒对灾异的解释相近，而没有达到京房、翼奉等用更为精细的方法推算灾异的水平。但可以看出，当时以灾异说来评议政治已成为普遍的被人们接受的现象。

①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337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332 页。

元帝时期利用言灾异说来评议政治、攻击皇帝身边小人的人莫过于京房攻击佞臣之犀利，我们在此即对京氏易学及其灾异说进行探讨。

## 第二节 京房生平评述

——兼论《汉书·京房传》所涉及的阴阳灾异说

我们从《焦氏易林》看不出明确的推言灾异之方法，也看不出明确的与卦气说之关系，只能从其所附“焦林直日”看到“焦林直日”与孟喜“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有内在联系。京房对西汉象数易学之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京房是以明灾异近幸而出名的，他所传承并有所发展的灾异说是西汉灾异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因此而为京房立传，而焦延寿之说是在《京房传》中被提及的。我们在此节即从《京房传》入手，对京房之生评进行评述，并对其上封事中所含卦气说进行解析。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云：

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贛。……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sup>①</sup>

前文已述，焦延寿“以候司先知奸邪”之术是与《焦氏易林》及所

---

①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60页。

附“焦林直日”法相关的内容,而京房又对“焦林直日”法与孟喜“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说进行了改进。这里说京房“用之尤精”,说明京房已经完全掌焦氏占验之术。陈良运教授认为这里所说的“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这句话,应该是京房死后焦贛所常说的。① 笔者认为,陈教授所言是有道理的。《史记索引》(卷二十)引京房对《井》卦卦辞“可用汲”的注解为:“言我道可汲用也。”对“王明并受其福”的注解为:“上有明王汲我道而用之,天下并受其福,故曰‘王明并受其福’也。”可见,京房对自己所持之道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作用深信不移。这里还说京房“好钟律,知音声”,本传最后又说“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说明京房酷爱音律,在音律方面造诣颇深。又据《后汉书·历律志》:“元帝时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字少翁)、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说明京房之音律学亦得自焦延寿之传授,且说明他研究音律学的目的乃是完善其易学体系。卢央指出,“按史籍所说,从黄帝时代到汉元帝时代,流行的乐律只有十二律一种。到京房才始创六十律之说”②。《汉书·律历志》用的是刘歆所奏,而《后汉书·律历志》认为:“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前文已述,京房易学产生之时正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在他以孝廉为郎之前的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九月,“关东郡

①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页。

②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

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sup>①</sup>，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齐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复震”<sup>②</sup>，于是元帝下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赦天下。……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sup>③</sup>治《齐诗》、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同师的翼奉这时曾以《诗》之五际说奏封事，认为以上灾异之产生，是由于阴气太盛造成的。所谓阴气太盛，指皇帝“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翼奉与萧望之、匡衡共同师事后仓，“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sup>④</sup>。翼奉奏封此事时，京房还没有脱颖而出。京房至初元四年（公元前 45 年）才以孝廉为郎。《京房传》接着说：

永光（公元前 43 ~ 前 39 年）、建昭（公元前 38 ~ 前 34 年）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

① [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80 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71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81 - 282 页。

④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67 页。



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据《汉书·元帝纪》可知，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三月“有雪，陨霜伤麦稼，秋罢”。《汉书·刘向传》称“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元帝诏曰“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秋七月，西羌反。永光四年六月，日有蚀之，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秋八月，“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可见此段时间灾异出现之频，说明京房数上疏就在这几年间。京房精通焦延寿“以候司先知奸邪”及“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之术，所以“所言屡中”。元帝很高兴，因此多次召见京房询问对策。京房认为这些灾异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元帝不以功举贤，而是以毁誉取人造成的，于是他便向元帝建议推行以功举贤之策即他所说的考功课吏法，认为这样才能止熄灾异。明经术并以《诗》之五际说言灾异的翼奉虽然“数言事宴见”，但他的推言灾异的准确率可能不如京房推言灾异的准确率高，所以他言灾异的结果只是赢得“天子敬焉”，而不像京房那样让“天子说之”。从《汉书·五行志》所载《京房易传》可知，京房非常重视举贤、荐贤，认为贤人得到重用灾异才会熄灭，祥瑞才会出现。下文对此将有详述。从这段记载来看，京房的考功课吏法一是对抱有私心的官吏约束太多，所谓“令上下相司”，一是确实可能比较复杂、琐碎，环环相扣，所以公卿朝臣乃至部

刺史皆以为不可行，主要原因应该是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都认为不可行。只有当时比较正直的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而元帝从内心还是想实行考功课吏法。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非。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在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瘡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石显专权要从宣帝为元帝所留遗患谈起。上文已述,宣帝不喜元帝为太子时好儒之性格。宣帝临终前病重之时,“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大夫刘更生(注:即刘向)给事中,与待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sup>①</sup>。萧望之师事后仓,后仓治《齐诗》与《礼》;周堪事夏侯胜,治《尚书》;刘向始治《易》,后治《谷梁春秋》。三人都参加过石渠阁会议。金敞是以忠孝著称的金日磾的弟弟金伦的孙子,世名忠孝。这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又为儒官与宦官两派之间的斗争埋下了伏笔。“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论议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所以至元帝即位时弘恭、石显等久典枢机的宦官之势力已根深蒂固。由于萧望之、周堪等益见尊重,“恭、显又时倾仄见诎。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与高、恭、显忤”<sup>②</sup>。武帝时任用中书宦官以加强其专制之弊端,由于宣帝之重新任用中书宦官再一次显露出来。望之等“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

①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83页。

② [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84页。

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史及恭、显所潜愬，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sup>①</sup>。萧望之等儒官第一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正好这一年（初元二年即公元前 47 年）的春天地震，夏天客星见昴、卷舌间。元帝有所感悟，认为这是罢免萧望之等所致，乃“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秋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白皆为中郎”。碰巧这年冬天又发生了地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为了将这次地震归咎于弘恭等，刘向乃使其外孙上变事，说“……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案，据《元帝纪》，当为二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sup>②</sup>。可见，此时推言灾异已成为攻击政敌的重要工具。弘恭、石显怀疑此为刘向所为，便奏请考问奸诈。他的外孙果然辞服，刘向因此被下狱而“坐免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自冤前事，恭、显白令诣狱置对。望之自杀”<sup>③</sup>。据《元帝纪》可知，萧望之自杀于初元二年（公元前 47 年）十二月。萧望之自杀后，“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刘向看到周堪、张猛在位，就像自己被复位一样，害怕他们再次被陷害而倾危，于是上封事而进谏曰：“……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929—1930 页。

②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930—1932 页。

③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932 页。

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潜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sup>①</sup>可见,刘向重贤、荐贤的治国理念与京房的治国理念是一致的。弘恭、石显见刘向之书后,进一步与许、史等外戚结党并怨恨刘向等。这一年(据《汉书·元帝纪》可知,当为永光元年即公元前43年)“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碰巧当时的长安令杨兴违心地说周堪与刘向的坏话,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周堪、张猛的短处,元帝于是“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这样,石显等人就越来越有了专权的机会。又过了三年多,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蚀之。(据《汉书·元帝纪》可知,此事发生在永光四年即公元前40年夏六月)“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元帝于是乃拜周堪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显幹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sup>②</sup>。可见当时政治斗争之复杂及石显之阴险。由此亦可知,支持京房考功课吏法的周堪此时已没有实权。在此支持京房考功课吏法的郑弘亦为明经之士,“通法律政事”,后为“南阳太守”,“著治迹,条教法度,为后所述”,“迁淮阳相,以高第入为右扶风,京师称

①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42-1943页。

②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48页。

之”，于永元元年（公元前 43 年）“代韦玄成为御史大夫”<sup>①</sup>。可见，郑弘是一位正直实干之士。而永光元年时既代于定国为丞相的韦玄成却畏惧石显而不敢失其意<sup>②</sup>。早在这些事件之前（当在元帝初元三年即公元前 46 年前后），贾谊的曾孙贾捐之亦因元帝召见时数言石显之短而遭到石显的陷害“竟坐弃市”<sup>③</sup>。可见，京房在与元帝进行上面的对话之前，石显已陷害如此多的贤明、正直之士。

石显是一位很会耍政治手腕的人，“初，显闻众人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望之当世名儒，显恐天下学士姗己，病之。是时，明经著节士琅邪贡禹为谏大夫，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显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妒潜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sup>④</sup>。石显推荐的贡禹确实是一位贤明、正直之士，治《公羊春秋》，师事嬴公与眭孟，曾建议元帝省俭用度、定汉宗庙迭毁之礼等，但贡禹任御史大夫后数月而卒。据《汉书·元帝纪》可知，贡禹卒于初元五年即公元前 44 年冬十二月，这时是京房为郎一年多的时间，当时京房应该还没有得到元帝的赏识。

这里还提到石显的友人五鹿充宗。五鹿充宗是梁丘贺的学生。萧望之有个叫朱云的学生，他“少时通轻侠”，“年四十，乃

---

① [汉]班固：《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902—2903 页。

② [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344 页。

③ [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838 页。

④ [汉]班固：《汉书·佞幸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729 页。

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贡禹为御史大夫后，华阴守丞嘉曾上封事推荐朱云试守御史大夫。“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衣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为博士”<sup>①</sup>。这段记载从侧面反映了五鹿充宗之强势与霸道。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元帝虽然好梁丘《易》，但也十分看重善于推言灾异的京氏《易》。上文已述，梁丘贺的老师是杨何的学生京房。宣帝喜爱此京房之易学，号称“京房法”，并选高才郎十人从梁丘临讲。梁丘《易》与孟喜《易》可能有较大区别，且梁丘贺与孟喜之间也存在较大的矛盾。五鹿充宗学的是梁丘《易》，而京房所学为焦氏《易》即孟氏学，二人属于本来就有矛盾的两个《易》学派别。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京房受元帝数次召见，一定引起治梁丘《易》的五鹿充宗的嫉妒。“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再加上“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sup>②</sup>。这样，石显之党便盘根于整个朝廷了。京房在与元帝进行上面的对话之前，石显已经陷害过多人，以孝廉为郎的京房心里应该很清楚，说这些话会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为了弘道并达到国家大治，京房置这些危险于不顾，最终也没有逃过被石显等小人迫害的命运。

① [汉]班固：《汉书·杨胡朱梅云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913 - 2914 页。

② [汉]班固：《汉书·佞幸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726 页。

房罢出，后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雍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

尽管多数大臣反对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元帝还是想试一试。但元帝一开始并不是想让京房亲自去试，而是让京房的弟子去试一试。京房便向元帝推荐了他的两个学生——任良与姚平。京房向元帝提出的条件是让他当刺史，以便在朝中可以直接向皇上汇报考功法试行之情况，以防皇帝得不到真正的信息。石显与五鹿充宗都嫉恨京房，因此想把京房支开，所以他们建议让京房试以郡守。元帝于是以京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而当时的郎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可以说是给京房提高了二百石的待遇。但京房提出的条件是，他所做的魏郡太守不能属有举察权的刺史举报，并可以调用其他郡的人，然后是年底亲自向皇上汇报情况。皇帝答应了京房的要求。据《汉书·地理志》，魏郡属冀州，下辖邺、馆陶、斥丘、沙、内黄等十八个县，离京城长安的距离较远。这样，石显、五鹿充宗的第一步阴谋就得逞了。

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内与石显、五鹿充宗有隙，不欲远离左右，及为太守，忧惧。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



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京房知道他的考功课吏法遭到大臣们的非议，在朝内又与石显、五鹿充宗有矛盾，所以他不愿意离开皇帝左右。等到拜他为太守，他就忧惧于心了。京房于建昭二年（公元前 37 年）二月朔被拜为太守。他的上封事正好反映了他是如何据阴阳灾异说推测皇帝与大臣们的心理与行为的。卢央先生认为，“建昭二年二月朔为甲子日，则最靠近二月之前的辛酉日当是該年正月二十八日，即在二月朔前三日。从所述事情过程和辛酉日后面日子的安排看来，似应是越前一个干支周的辛酉日，即是建昭元年（公元前 38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辛酉日。这个辛酉日之后的己卯日当时建昭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即这一天他受命为魏郡太守”<sup>①</sup>。京房精于日占、日食占、月占、杂星占及气候灾异占等。据他观察，辛酉日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他感到很高兴，这种天象说明皇帝下定决心要实行京房的考功之法。所谓蒙气，据《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云：“蒙，如尘云。”所以，蒙气当是像烟尘一样的遮蔽太阳的云一类的东西。至于如何以蒙气为占，《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云：

臣私禄及亲，兹谓罔辟，厥异蒙，其蒙先大温，已蒙起，日不见。行善不请于上，兹谓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谋，臣辟异道，兹谓不见，上蒙下雾，风三变而俱解。立嗣子疑，兹谓动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兹谓不聪，蒙，日不明，温而民病。德不试，空言禄，兹谓主窳臣夭，蒙起而白。

①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7 页。

君乐逸人兹谓放，蒙，日青，黑云夹日，左右前后过日。公不任职，兹谓怙禄，蒙三日，又大风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兹谓闭上，蒙大起，白云如山行蔽日。公惧不言道，兹谓闭下，蒙大起，日不见，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云蔽日。禄生于下，兹谓诬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兹谓盗明，蒙黄浊。下陈功，求于上，兹谓不知，蒙，微而赤，风鸣条，解复蒙。下专刑，兹谓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厌小臣兹谓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风发，赤云起而蔽日。众不恶兹谓闭，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日不见。漏言亡喜，兹谓下厝用，蒙微，日无光，有雨云，雨不降。废忠惑佞兹谓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兹谓不明，蒙浊，夺日光。公不任职，兹谓不绌，蒙白，三辰止，则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进善君不试，兹谓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众在位，兹谓覆国，蒙微而日不明，一温一寒，风扬尘。知佞厚之兹谓庠，蒙甚而温。①

以上介绍了“蒙”的种种情况，亦随之说了一些风雨寒温的情况。这可能是焦延寿“以风雨寒温为候”“以候司先知奸邪”的部分内容或者是据焦氏之说推衍而出。这里提到“辟不下谋，臣辟异道”，显然，辟指皇帝而言，卦气说称消息卦为辟卦亦有这层意思。这里还提到“尊卦用事”，孟康注曰：“尊卦，《乾》《坤》也。”说明蒙气说与卦气说亦有一定的联系。在京房看来，蒙主要由臣下蒙蔽皇上所致。所以，京房观察到“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说明佞臣蒙蔽皇帝的因素已经远去，皇帝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60 - 1461 页。

有了自己的主心骨。但是他又看到“少阴倍力而乘消息”。“消息”指消息卦即辟卦,如果至下面的己卯日确如卢央所说的十二月十五日,那么这个消息卦就应该是临卦(䷒)。据“焦林直日”、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坎离震兑分主四季,在京房这里又将这四卦各配以八十分之七十三日,其他六十卦中的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为十二辟卦,又叫十二消息卦。其余的四十八卦为杂卦。在这六十卦中,“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新唐书》志第十七上历三上僧一行《卦议》)卢央先生认为,“这十二个消息卦分消卦和息卦两大类;自复卦至乾卦六卦为息卦,亦称太阳。自姤卦至坤卦六卦为消卦,亦称太阴。消息卦领公侯大夫卿连自身五卦。非辟卦之四卦称为杂卦,按其所属分为少阳卦或少阴卦。息卦所领之杂卦称为少阳卦,消卦所领之杂卦称为少阴卦”<sup>①</sup>。他还指出:

大约元帝决心试考功课吏法是在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该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乙卯冬至,中孚卦历六日七分,至十一月二十七日起复卦,复为十一月辟卦,再历六日七分,到屯卦,屯为侯卦,此时已是十二月初四晨;然后就是谦卦,谦卦为大夫卦,应是十二月初十上午起,其中十二月初六庚午为小寒。再就是睽卦,睽为卿卦,已到十二月十六中午。而谦卦结束之昨日为己卯日,京房发为魏郡太守已成定局。这从屯卦至睽卦为少阳卦。所谓“少阴倍力而乘消息”即是指十二月初以来,在诸少阳卦

①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值日期间,内臣(少阳少阴皆为臣下,而阳主外,阴主内)必极力蒙蔽君王。至己卯日正当谦卦(大夫卦)覆太阳时,作出了京房出为郡守之令。这说明内臣还在起着蒙蔽君王的作用。<sup>①</sup>

笔者认为卢先生的推论有些问题。京房在这里所说的“消息”当指十二月辟卦即临卦(䷒)或太阳之象征。所谓“少阴倍力而乘消息”应该指本来这一段时间在风雨寒温方面应该表现为临卦所对应的风雨寒温之特点,但实际表现的则是某少阴卦之特点。也就是说,少阴卦之特点表现得特别突出,即所谓“倍力而乘消息”,寓示着佞臣阻碍元帝推行考功课吏法的力量远胜过元帝做出决定的力量。所以京房怀疑虽然元帝决意推行此道,但不得如意。这正是京房忧惧的原因。因为如果像卢央先生之分析,每年的这段时间都固定为“少阴倍力而乘消息”之状态,皇帝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被蒙蔽,这是没有道理的。京房的推测是以实际的观察为根据的。卦气图展示的是一年中风雨寒温应然之状态,如果实际情况与此不符,就会有灾异现象发生,说明君王或大臣的想法与做法有问题。其间,“阳平侯凤欲见未得”。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阳平侯王凤的情况。王凤是元帝王皇后的哥哥。而王皇后就是后来篡汉的王莽的姑姑。王皇后的父亲叫王禁。元帝为太子时,王皇后为婕妤。元帝即位后王婕妤被立为皇后,封王禁为阳平侯。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禁薨,谥曰顷侯。长子凤嗣侯,为卫尉侍中”<sup>②</sup>。这时王家的势力

①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9页。

② [汉]班固:《汉书·元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16页。

还不是很盛，至成帝时，王凤的其他五个兄弟同日封侯，《汉书·五行志》将许多灾异与现象与王家专权联系起来，如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 27 年）正月，“沛郡铁官铸铁，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工十三人惊走。音止，还视地，地陷数尺，炉分为十，一炉中销铁散如流星”，《汉书·五行志》认为这是火不炎上，与“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号五侯。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秉政”联系起来<sup>①</sup>，并将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 32 年）正月皇考庙灾与“大将军王凤颛权擅朝，甚于田蚡，将害国家”联系起来<sup>②</sup>。京房在这里说“阳平侯凤欲见未得”，指石显等佞臣想通过时为卫尉待中的王凤向元帝建言把京房支走，但王凤没有见到元帝，这也是“少阴倍力而乘消息”的表征。等到己卯日的时候，元帝最终还是决定拜京房为魏郡太守，这说明石显等佞臣之想法与做法又胜过了元帝的初衷。

因为元帝一开始想让京房的学生去试行考功课吏法，而让京房仍待在左右。京房又怕出为郡守以后，皇帝被用事之佞臣蒙蔽，所以才提出来“岁末乘传奏事”。元帝一开始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到了辛巳日，也就是京房被任命为魏郡太守的第三天，他观察到“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也就是说，蒙气又起来了，太阳之正色被干扰蒙蔽，卦气呈现的不是应然之状态。这种状态与上文《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所描述的“众不恶恶，兹谓闭，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日不见”情况相类，说明恶人的势力十分强大。京房据此推测在己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34 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36 页。

卯日与庚辰日间，一定有人想隔绝京房与元帝之间的直接联系而不让他“乘传奏事”。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果不其然，京房的上封事还没有发出，元帝已令阳平侯王凤向京房下诏，告诉他不能“乘传奏事”。京房心里就更恐惧了。他又不得不打点行装赴任魏郡。到了新丰这个地方，他又邮寄上封事给元帝。据《汉书·地理志》，新丰属于京兆下属之县，说明京房这时刚刚出发不久。他在这次上封事中说，在此之前的六月中，遁卦(䷗)不效，据灾异推测之法，如果遁卦(䷗)不效，当有有道之人开始离去或死去，天气变寒，涌水为灾。据十二消息卦气说，遁卦对应的是六月；据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遁卦对应的节气为大暑，物候为“土润溽暑”。京房在六月中观察感觉到当时的风雨寒温之情况与遁卦应然之情况不相符合，到七月的时候又确实发生了“涌水出”之灾异现象，正好应了“涌水为灾”这句话，意味有道之人该离去或死去。所以京房的学生姚平对京房说，京房可以说是知道，而不可以说是信道；京房言灾异没有不中的时候，如今涌水之异已出，有道者当被逐死，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京房对姚平说，陛下至仁，对我又特别优厚，虽然说了会死，我仍然要说。言外之意，尽管石显、五鹿充宗等强烈反对他的考功课吏法，他也要说出来并极力推行之。姚平又说京房可以称作小忠，而不可称作大忠。以前秦二世时赵高用事，有个叫正先的人，因非议刺激赵高而死，而赵高因此而树立起自己的威风，所以秦之乱乃是因正先引起的。京房出为郡守，本来想立功以报效元帝，有如此灾异发生，恐怕还没立功报效皇上而自身先死。所以京房希望元帝不要让自己应了涌水之异，像正先那样为佞臣陷害而死，被他的学生姚平笑话。言外之意，京房希望元帝不要受石显等人的蒙蔽，要有自己的主见和决断力，设法留住有道之人及直谏之士。

房至陕，复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房去月余，竟征下狱。

京房至陕县时，又重新写了一封上封奏事。据《汉书·地理志》，陕县是弘农郡下属的一个县，是出京兆往东至河东所经过

的一个县,在京兆与弘农交界的地方。说明京房写此上封事时已离开长安有一段距离。卢央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丙戌日,当是建昭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次日二月二十四日丁亥春分”<sup>①</sup>。京房发现,丙戌日有小雨,至丁亥日蒙气去,本来说明蒙蔽皇上的因素在消失,另外亦与上文《京房易传》所云蒙气中的“忠臣进善君不试,兹谓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这一占辞相类,说明元帝不用京房的善言。而从卦气的角度来看,“少阴并力而乘消息”,说明小人佞臣们在同力干扰元帝之意,至戊子日更为严重。至戊子日的五十分,蒙气复起,说明这帮小人又起来兴风作浪了。这几天的天气变化说明皇上想正定自己的意志,但杂卦所象征的小人合力而争,结果元帝的想法没有胜过佞臣的邪意。至了己丑日的夜里,有还风,一直刮到辛卯日一整天,而且太阳复侵色。

我们在此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还风”。《易纬·稽览图》有云:“降阳为风,降阴为雨。升气上,降气微。是故阳还,其风必暴;阴还,其雨亦暴。降阳之风,动不鸣条;降阴之雨,润不破块。还风者,善令还也。”对于“降阳为风”,郑玄注曰:“上九用事,卦效后一百二十日,降为卒风,其不效也,后九十一日,降为灾风。天恶气不得上天中,九十一日为灾风,其阳不时”。对于“降阴为雨”,郑玄的解释为:“上九(案:“九”疑为“六”)用事,卦效后一百二十日,降阴为雨。”而“升气上,降气微”在郑玄看来则表示“君弱臣强,不得以时升降。升气,喻君;降气,喻臣也”。“是故阳还,其风必暴”意味着“君弱臣强,君令不得行,降气积后,一百三十日内,阴(案:张惠言认为“阴”当为“阳”)得同

①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类并下，故薄，故必暴也”。接下来的“阴还，其雨亦暴”则表示“臣强君弱，君泽不得行，降气道积后，一百三十日内，得同类并下，故薄也。一曰，升降气为阴阳，卦升于九三、六三，寒温过，暴疾起时，降气而上也，降气盛至十日七日，近三日四日，其降也，有鸣风之口，发屋折木之风，是一百三十日，故曰还也”。对于“还风者，善令还也”，郑玄注为：“还，暴也。君出善令盖者若（案：张惠言认为此三字有误）百姓，君弱臣强，还而不还，阳气道积，不以时降，后得同类并下，故暴也，故曰令还也。”由此可见，京房在这里说到的还风，指的是一种暴风，主要是因为君弱臣强，君令不得实施所致。而与卦气相符之应然状态应该是“降阳之风，动不鸣条，降阴之雨，润不破块”。京房看到的正是作为灾异的还风。据卢央先生推算，“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交冬至起公卦中孚，至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好九十一日”<sup>①</sup>，与郑玄所注“其不效也，后九十一日，降为灾风”正好相符，从而反过来可以推证，京房当认为这种还风又是卦气不效、君弱臣强所致。说明元帝在一开始想试用考功课吏法时，便露出了卦气不效的征兆。在从己丑到辛卯一整天刮了近三天还风之后，“太阳复侵色，日月相薄”，说明石显等佞臣们邪阴同力而进，作为太阳之象征的元帝又对自己的决定推行考功课吏法产生了怀疑与动摇。

这里提到“日月相薄”。何谓“日月相薄”？《汉书·五行志》正好录有《京房易传》之说：“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诛将不以理，或贼臣将暴起，日月虽不同宿，阴气盛，薄日光也。”《京房传》在此所说的“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

①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5 页。

色,至癸巳日,日月相薄”,如果像卢央先生所推算的丁亥日为二月二十四日的话,如果此月为小月即二十九天,癸巳日当为三月初一日,为朔日;如果本月为大月即三十天,癸巳日则二十九日,属于晦日。所以,如果京房在此所说的癸巳日发生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日月相薄”,就不应该发生在这两天。估计京房这里所说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月相薄”,而可能是一种日偏食,或者当时的历法不健全,而在这一天日落之前出现了月亮。京房在此又说“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可能是针对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二月的那次地震或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的“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而言的<sup>①</sup>。茂陵白鹤馆是孝武园馆。对于白鹤馆之灾,“刘向以为,先是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辅政,为佞臣石显、许章等所潜,望之自杀,堪废黜。……天戒若曰,去贵近逸游不正之臣,将害忠良”<sup>②</sup>。《汉书·五行志》虽然没有对这两次灾异引用《京房易传》之解释,但京房于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以孝廉为郎以后,由于言灾异屡中,他有可能向元帝对这两次灾异进行过评论。如果是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京房对这两次灾异进行预测,则离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的地震发生之时为九周年,而离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的白鹤馆之灾的时间是九年头。所以,京房在此说“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旨在说明元帝这九年来没有改变,而他所说的“星亡之异”在此即是指“日月相薄”。

---

① [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35-1336页。

京房一开始想让任良试验考功课吏法,而自己在朝内,目的就是为消除星亡之异。石显等知道这样做对他们自身不利,且不能蒙蔽京房,所以对元帝说试弟子不如试师。京房又退一步愿意为刺史,他们又说做刺史恐怕太守不配合,不如直接做太守,目的是隔绝京房与皇帝的直接联系。元帝对他们的话不予以反对而听从他们的话,这就是为什么蒙气不解而太阳亡色的原因了。京房看到,他离开朝廷越远,太阳被蒙蔽的程度就越严重。京房只是希望元帝不要在返回朝廷方面为难自己而违背天意。在京房看来,石显之党的歪理邪说虽然听起来有道理,但天气必然会随着改变,所以说人可以被欺骗,而天不可以被欺骗,他希望元帝能够明察。遗憾的是,京房离开朝廷一个多月后,竟然被征入狱。

《汉书·京房传》接着说:

初,淮阳王舅张博从房受学,以女妻房。房与相亲,每朝见,辄为博道其语,以为上意欲用房议,而群臣恶其害己,故为众所排。博曰:“淮阳王上亲弟,敏达好政,欲为国忠。今欲令王上书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无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荐士,何为不可?”房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事县官十余年;及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课者也。淮阳王即朝见,劝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书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迁中书令置他官,以钩盾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从房记诸所说灾异事,(固)[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淮阳王。石显微司具知之,以房亲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显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

诖误诸侯王……初，房见道幽厉事，出为御史大夫郑弘言之。房、博皆弃市，弘坐免为庶人。

京房本来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岳父大人张博给他带来了致命的麻烦。京房的岳父张博是淮阳宪王刘钦的舅舅。我们先来看一下淮阳宪王的情况。淮阳宪王于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立，他的母亲张婕妤有宠于宣帝。宣帝被立为皇帝后，立他民间时所娶许妃为皇后。霍光的夫人显想让她的女儿霍成君为皇后，便设法阴使乳医淳于衍于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用毒药将许皇后害死。在霍光的帮助下，霍成君很快便成为皇后。元帝于霍光死（地节二年即公元前68年）后的第二年即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被立为太子，霍光的夫人十分愤恨，便教皇后霍成君设法毒害太子而一直没有机会得逞。后来，霍夫人杀许皇后的事被越来越多的人泄露出去，霍光的夫人“显遂与诸婿昆弟谋反，发觉，皆诛灭”<sup>①</sup>。霍皇后也因此被废。霍皇后被废以后，宣帝欲立淮阳宪王刘钦的母亲张婕妤为皇后。过了较长时间以后，为了避免像霍氏那样欲毒害皇太子的事情再次发生，便更选后宫无子而谨慎的长陵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后来王皇后无宠，很少得到宣帝御见，只有张婕妤最受皇帝宠幸。淮阳宪王长大以后，“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帝甚爱之”<sup>②</sup>。而太子即后来的元帝宽仁好儒，宣帝数次嗟叹，认为宪王才真像他的儿子，所以常有立张婕妤为皇后并立淮阳宪王为皇太子之意，然而由于太子起于民间微细，而宣帝年少时依于许

① [汉]班固：《汉书·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68页。

② [汉]班固：《汉书·宣元六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11页。

氏,等到宣帝即位许氏立为皇后以后又被毒害而死,太子因此而早失其母,所以宣帝最终不忍心废太子而立宪王。又过了很久,韦玄成的父亲韦贤去世后,众人都推荐韦玄成嗣侯,而韦玄成假装患狂病而将侯位让给他的哥哥。且韦玄成经明行高,称于朝廷,宣帝于是召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此来感谕宪王,辅以推让之臣,这样,太子的地位才安定下来。宣帝驾崩后,元帝即位,于是遣宪王之国。可见,元帝与淮阳宪王本来就有这样一种因争太子之位而久存于心的矛盾。

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博的情况。元帝即位及宪王之国以后,张婕妤已去世,而宪王的外祖母尚健在。宪王的舅父张博等三人每年都到淮阳以亲戚的身份见淮阳宪王,每次都受到宪王的赏赐。后来宪王上书,愿请徙外祖母家张氏于淮阳国,而张博上书,说他愿意留下来守坟墓,所以只有他不愿迁往淮阳,宪王因此而怨恨他。后来张博再到淮阳的时候,宪王给他的赏赐就变少了。张博说自己欠债数百万,希望宪王能帮他偿还,宪王不答应。可见张博有爱占便宜的毛病。张博又设法得到宪王的好感,并得到宪王五十斤黄金。张博很高兴,回信表示感谢,说些谄媚的话奉承宪王,并因之向宪王建言:“当今朝廷无贤臣,灾变数见,足为寒心。百姓咸归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见,辅助主上乎?”并让他的弟弟张光数次劝说宪王应该听从张博之计,让张博在京师游说掌权之贵人为宪王求入朝之事。宪王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后来张光想去京城长安,向宪王告辞,又一次说起愿与他的哥哥张博努力促成宪王入朝之事。至此宪王已开始动心。张光赶快让人告诉了张博。张博得到此消息后,又向宪王写了一封信,说他曾北游燕赵,想循行郡国以求幽隐之士,听说有一位懂兵法的驸先生,可以安边境之不安及天下之骚

动,还听说北海之滨有一位贤人。张博本来想把此二人推荐给元帝,认为此推荐之功亦不少。但他缺乏通融之资,声称赵王使谒者持牛酒、黄金三十斤犒劳他,他没有接受,又让人告诉张博愿让他女儿嫁给张博,聘金为二百斤,张博亦未接受。不想这时宪王回心转意了。张博便信誓旦旦,愿杀身报德。宪王看到张博的信后感到很高兴,并遣有司预支张博赏金二百斤。

将以上情况交代清楚之后,我们在此就可以将张博与京房联系起来了。看来张博应该比较喜欢京房的《易》阴阳系统,所以他除了向京房学习京氏《易》以外,还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京房。当然,从张博好贪的性格来看,看到京房以明《易》阴阳得幸于上,数召见言事,他亦应该有指望京房往上爬的想法。在鼓动淮阳宪王请求入朝的同时,当听到京房之议为石显、五鹿充宗等所排斥及京房与元帝之密语之诉说以后,张博也在鼓动京房,说淮阳王是元帝的亲弟弟,敏达好政,想为国尽忠。张博因此想让淮阳王上书要求入朝,来佐助京房。京房一开始对如此做法是否可行表示怀疑,张博又说以前的楚王入朝时亦有荐士之举。京房便对张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指出石显、五鹿充宗等巧佞之人相互勾结,任职已有十余年,而丞相韦玄成很久以来无补于民,无甚功劳可说。所以他们尤其不愿意实行考功课吏法。如果淮阳王能够朝见并劝告元帝实行考功之法,这样最好;实在不行就只说丞相韦玄成、中书令石显居官如此之久而社会不治,可以建议罢免丞相,而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将石显迁任他官,而以钩盾令徐立代之。京房幼稚地认为这样他的考功课吏法就可以得以实施了。张博因此令京房为淮阳王作求入朝草奏。张博为了向淮阳宪王炫耀,便把京房所推之灾异及皇帝召见时所说之密语,一一记下,拿给淮阳王以为信验,并欺骗淮阳王说:“已

见中书令石君求朝，许以金五百斤。贤圣制事，盖虑功而不计费。昔禹治鸿水，百姓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今闻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堕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阴阳不调，百姓疾疫饥馑死者且半，鸿水之害殆不过此。大王绪欲救世，将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与大儒知道者为大王便宜奏，陈安危，指灾异，大王朝见，先口陈其意而后奏之，上必大说。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变节，功德亡比，而梁、赵之宠必归大王，外家亦将富贵，何复望大王之金钱？”<sup>①</sup>由此可见，张博在此欺骗淮阳王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名利二字，而京房的一片报国之心也因张博为了博取名利之私心而被石显等借为把柄。张博在这里所说的“佞人用事，阴阳不调，百姓疾疫饥馑”等反映的确为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他这里所说的大儒知道者当指京房而言。淮阳宪王看到张博的这些具有蛊惑性的说法后很高兴，对张博大加赞赏，并给张博金五百斤作为通过石显说动元帝让他入朝之费用。

京房、张博等太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被石显所派奸细掌握，只是由于京房与元帝太亲近，所以石显没敢揭发。等到京房出为魏郡太守，石显才告发京房与张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诬误诸侯王。京房在上任途中所观察到的“蒙气”、“少阴并力而乘消息”之时正是石显等向他与张博等下黑手之时。当初京房向元帝讲周幽王、周厉王之事，出来后便告诉了御史大夫郑弘。他之所以告诉郑弘，可能是因为郑弘支持他的考功课吏法吧。班固说京房因不密以失身，确实有这方面

---

① [汉]班固：《汉书·宣元六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14—3315页。

的原因。这场斗争的结果是，“房、博皆弃市，弘坐免为庶人”<sup>①</sup>。京房被弃市时年仅四十一岁。

《汉书·五行志》记载全为阴阳灾异之事。《五行志》引《洪范五行传》有云：“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恒寒……”在“厥罚恒寒”部分，《五行志》载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 37 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是岁，魏郡太守京房为石显所告，坐与妻父淮阳王舅张博、博弟光劝告淮阳王以不义。博要斩，光、房弃市，御史大夫郑弘坐免为庶人。”显然，《五行志》将这次灾异归咎于元帝偏听不聪，下情隔塞，对京房等用刑太过所致。这样，一场以京房“考功课吏法”为主题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石显、五鹿充宗等人的一再阻挠下就这样流产了，而京房也因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 第三节 京房《易》注及著述

京房虽然只渡过了短暂的四十一岁人生生涯，但他留给人们的易学思想却是灿烂丰富的。关于京房《易》著，《汉书·艺文志》记有三种：《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颜师古注曰：“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可证此处所说“段嘉”应是京房的学生“殷嘉”）。这里的前两种书之所以还带上“孟氏”，应该与“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有关，而其内容则应为京房所作。《京氏段嘉》有可能为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睦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167 页。



京房师徒合著,也可能主要为殷嘉所著,即使如此,也是京氏《易》之系统。到《隋志》,关于京房的著述就多了起来,但已没有以上三种。此后,新旧《唐志》、《释文》、《宋志》均有记载。《隋书·经籍志》将京房著作归于经部《易》类的有:

1.《周易》十卷,汉魏郡太守京房章句。新旧《唐志》及《释文》均称其为“京房《章句》十卷”。《释文》又引南朝梁人阮孝绪《七录》说“十卷,录一卷目”。《宋志》无录,盖亡。

2.《周易错》八卷,京房撰。(注谓“梁有《周易错》八卷”)新旧《唐志》称:“《周易错卦》八卷。”《宋志》无录,盖亡。

《隋志》归于五行类的京房著作包括易类与杂占类两种情况。其目录为:

3.《逆刺》一卷。新旧《唐志》称“三卷”,《宋志》无录。

4.《周易占》十二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5.“梁《周易妖占》十三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6.《周易守林》三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7.《周易集林》十三卷。《隋志》又引《七录》云“伏万寿撰”。

8.《周易飞候》九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9.《周易飞候》六卷。新旧《唐志》同,《宋志》无录。

10.《周易四时候》四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11.《周易错卦》七卷。新旧《唐志》称“八卷”,《宋志》无录。

12.《周易混沌》四卷。新旧《唐志》同,《宋志》无录。

13.《周易委化》四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14.《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

录。

15.《风角要占》三卷，梁有八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16.“梁有《风角五音占》五卷，亡”。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17.《京君明推偷盗书》一卷。

18.《占梦书》三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隋志》归于兵家类的京房著作有：

19.《京氏征伐军候》八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隋志》归于天文类的京房著作有：

20.《京氏释五星灾异传》一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21.《京氏日占图》一卷。新旧《唐志》及《宋志》皆无录。

以上所载京氏众多之《易》著，有些可能伪托京房所著。而以上著作，只有极少数见于新旧《唐志》，而《宋志》均无著录，说明京氏的这些著作至唐宋时期，几乎全部亡佚。由于自西汉以后京氏之书流传甚广，所以他的著作也有《隋志》及新旧《唐志》未著录者。如“郑樵《通志·艺文略》亦载京房著述书目共二十种，其中有《周易飞伏例》一卷为以上三志所未有，其余则大体略同。此外《太平御览》引京氏著述有：《京房易传》、《京房易说》、《京氏律术》等十种。《乾象通鉴》引京房著述等九种”<sup>①</sup>。又如《宋史·艺文志》在“蓍龟类”著作中录有“京房《易传算法》一卷，《易传》三卷”。据刘玉建教授考证，“此即是传于今世

①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8 - 89 页。

的《京氏易传》”。刘玉建教授以结实的证据证明今传《京氏易传》三卷确为京房所作<sup>①</sup>，笔者赞同他的观点，此不赘述与重复。

“现今京氏易学尚存者，按清严可均说，有无锡王保训所辑《京氏易八卷》，《汉魏丛书》有《京氏易传》三卷”<sup>②</sup>。

今传唐《开元占经》辑有不少京氏易占的内容，其中或许有后人的伪托，不能作为研究京氏易占的全部真实材料。《汉书·五行志》记载了不少京氏易占的材料，我们据此对京房易占中所包含的易学进行探讨研究。

## 第四节 京房灾异说研究

——以《汉志》所引《京房易传》为例

孟、焦、京易学是西汉象数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孟喜既传授《易》阴阳系统又传授其师田王孙所传之《易》经系统，而其“《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由于有“改师法”之嫌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与传授。至焦延寿活动的主要时期，阴阳灾异说进一步受到重视并在官方得以应用，其《焦氏易林》与“焦林直日”法得以流传下来，但焦延寿主要活动在民间，做官也只做到一个小小的县令。直到他的学生京房由于言灾异屡中而近幸，《易》之阴阳灾异说才得以彰显。尽管京房在朝中做官时间不长便被石显等陷害而死，但元帝仍认可他的灾异说，所以在元帝世京氏《易》还是被立于学官。《汉书·五行志》主要记述西汉末期以前的灾异现象，并据汉代的阴阳灾异说尽可能地对这些灾异进

①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册）。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4—198 页。

②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9 页。

行解释。

在西汉一代,对于阴阳灾异说来讲,武帝时的董仲舒开其端,昭、宣时的眭孟、夏侯胜接其绪,元成时的京房、谷永等将其推至高潮。至班固写《汉书》时,阴阳灾异说已成为人们对灾异现象进行解释的主要理论根据,而对王莽以前之灾异现象的解释主要集中在《汉书·五行志》中,借此我们可以了解西汉一代对灾异进行解释的大体脉络及其背后的哲理根据。《汉书·五行志》开篇即云: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虞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乌呼,箕子!惟天阴鹭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陞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此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sup>①</sup>

这是根据《尚书·洪范》记载的武王访问箕子询问治国大道的一段故事,引出禹所受《洪范》九畴。在刘歆看来,伏羲氏继天而王,据《河图》而画八卦;大禹因顺五行而得《雒书》九畴。言外之意,《河图》(或八卦)、《雒书》(或九畴)、五行是古代圣贤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5页。

安邦治国的大法。《五行志》接着谈到箕子所说《雒书》之内容：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sup>①</sup>

这是在说《雒书》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在远古时代《河图》、《雒书》，八卦、九章相须而备。至殷商末期，政治弛怠，商纣王未按河、雒之学治国，世道不同，时世变易，周文王因时变而演《周易》；再至《春秋》末期，周道衰敝，孔子因此而述《春秋》。所以，在班固看来，文王所演《周易》、孔子所述《春秋》皆是对《河图》、《雒书》，八卦、九章之法的延续，是对古人天人之道的继承与发展。言外之意，阴阳灾异说的理论根据就是古人所流传下来的天人之道。那么，经历春秋、战国之后，这种天人之道又是如何传续的呢？《五行志》接着说：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摭仲舒，别向、歆，转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6页。

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sup>①</sup>

除了这里点明的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刘向治《谷梁春秋》及《洪范五行传》、刘歆治《左氏春秋》以外，据《汉书》记载可知，眭孟治《公羊春秋》、夏侯胜治《尚书》及《洪范五行传》、京房治《易》阴阳、谷永治京氏《易》、李寻治《尚书》及《洪范五行传》。可见，《春秋》三传、《尚书》（及《洪范五行传》）、《易》皆有推言灾异系统。据此段内容可以看出，班固不欣赏刘歆之说，认为他所治《左氏传》及《洪范五行传》不合《春秋》、《尚书》之原意。《汉书·五行志》所据《易》阴阳系统主要为《京房易传》。前人鲜有对《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进行系统研究者。我们在此将《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诸条一一列出，以期对《京房易传》所含之易学思想及灾异说进行探讨。

《汉书·五行志》以《尚书·洪范》所引箕子所说的禹所受的九章大法中提到的“五行”、“羞用五事”、“建用皇极”为基本框架，然后再加以《传》、《说》。其中所引董仲舒、刘向、刘歆之说较多，《京房易传》所占的比重也很大。我们在此依此基本框架来分析一下《汉书·五行志》是怎样将京房之阴阳灾异说与五行之说相结合来阐明天人之道的，从而也可以发现京房《易》阴阳系统的关注点之所在。

## 一、初一日五行

《汉书·五行志》云：

经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7页。

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sup>①</sup>

显然，《传》、《说》在此表达的是一种天人一体、万物一气相通的理念，人君只有顺应这种天时所需，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性。就五行中的木来说，它对应的是东方，与此相关的人事活动为田猎、农桑等。如果在此时夺民时、伤民财、饮食不节，与此相通的木类就会伤失其本性。曲直为木之本性，木失其性则不能曲直。这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三春之纪中所要求的人事活动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吕氏春秋·十二纪》更强调人君要顺时而动，而《五行志》更强调如果不顺木气而动所导致的灾异，或某种与木相关的灾异说明人君施政是否合时宜。《说》还引《周易》《观》卦(䷓)之象来说明王事活动。《五行志》引《春秋》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正月，雨，木冰”为“木不曲直”的例子，但在这一部分《五行志》没有引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8-1319页。

《京房易传》来进一步解释灾异。

对于“火不炎上”之由,《汉书·五行志》有:

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乡明而治。……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適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灾宗庙,烧官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sup>①</sup>

在这里,《说》并没有完全按《传》的路子进行解释。案:法律按五行为水,“弃法律”则水不能与火制衡,人君火性无制,则火不炎上;“逐功臣”则不明贤贤,心路不明,如此亦为火不炎上之征;“杀太子,以妾为妻”亦说明人君不明尊卑之礼,不能向明而治,故亦“火不炎上”。《春秋》所载及《汉书》所载宗庙起火之异比较多。这在类灾异中,《五行志》曾引《京房易传》的一则说法:

定公二年(公元前 508 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诛季氏,又用其邪说,淫于女乐,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显而奢僭者。一曰,门阙,号令所由出也,今舍大圣而纵有罪,亡以出号令矣。《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官。”<sup>②</sup>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20 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29 页。



董仲舒、刘向将此次灾异归咎于奢僭过度,其实就是归咎于鲁定公之作为不合礼节,礼属火,所以属“火不炎上”之类。而京房则不是从五行的角度来解释,而是将此类灾异归咎于“君不思道”。“君不思道”包含的面更广。从下面所引《京房易传》的内容可知,京房在这里所说的“君不思道”应主要指人君不思用贤之道。刘向还将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四月孝武园白鹤馆灾归咎于石显潜害萧望之、周堪等,将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这时京房已为元帝说灾异)六月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归咎于石显潜毁周堪、张猛等事。

对于“土不稼穡”之异,“金不从革”之异,《五行志》皆没有引用《京房易传》之说。

至于“水不润下”之异,《汉书·五行志》说:

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说曰:水,北方,终藏万物者也。其于人道,命终而形藏,精神放越,圣人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此圣王所以顺事阴气,和神人也。至发号施令,亦奉天时。十二月咸得其气,则阴阳调而终始成。如此则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穡,是为水不润下。《京房易传》曰:“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以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厥灾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解,舍也,王者于大败,诛首恶,赦其众,不则皆函阴气,阙水流入国邑,陨

霜杀(谷)[叔草]。”<sup>①</sup>

这里引用了《京房易传》的一段话。《传》、《说》将祭祀、阴气、鬼神与水相配。京房则把坎水与诛罚、归狱、追诛不舍等刑罚过度相联系。在《周易集解》中，虞翻释坎为“狱”，《九家易》释坎为“法律”，可证他们的解释与京房对坎水的理解是一致的。另外，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 39 年，即京房被弃市的前两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班固对此灾异的解释是：“先是一年，有司奏罢郡国庙，是岁又定迭毁，罢太上皇、孝惠帝寝庙，皆无复修，通儒以为违古制。刑臣石显用事。”<sup>②</sup>这是以《传》、《说》为根据进行的解释。

## 二、羞用五事

如上所述，《五行志》在“经曰：‘初一曰五行’”部分，只引用了两条《京房易传》。而在下面的“《经》曰：‘羞用五事’”部分却大量引用《京房易传》。

经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艾，明作愬，聪作谋，睿作圣。休征：曰肃，时雨若；艾，时阳若；愬，时暋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咎征：曰狂，恒雨若；僭，恒阳若；舒，恒暋若；急；恒寒若；雾，恒风若。”<sup>③</sup>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42 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47 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51 页。

这是将人君的体貌恭敬与否(貌)、所发号令是否顺民心、是否有明察善恶的能力、是否兼听而明、是否宽大而包容臣下与五行及灾异现象相联系。我们可用下表归类并表示之：

五行	木	金	火	水	土
五事	貌	言	视	听	思
	恭	从	明	聪	睿
休征	肃	艾	愆	谋	圣
休征	时雨若	时阳若	时暘若	时寒若	时风若
咎征	狂	僭	舒	急	糞
咎征	恒雨若	恒阳若	恒暘若	恒寒若	恒风若

如果人君在貌、言、视、听、思各相方面表现都很恰当、贴切，在自然界就会出现风雨寒温应时而至之休美之表征；反之，就会出现风雨寒温过度、不应时而至之咎恶或灾异之表现。需要注意的是，《五行志》将雨与木相联系，将风与土相联系，与传统的五行说将雨与水相配应，将风与木相配应不同。《汉书·五行志》对此的解释为：“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至春阳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暘，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sup>①</sup>

### (一) 貌之不恭

《汉书·五行志》在对“羞用五事”进行概括说明之后，首先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54页。

对与木相对应的“貌之不恭”相关的灾异进行了描述：

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病，时则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水）[木]。”<sup>①</sup>

这里所说的《传》即夏侯始昌、夏侯胜、刘向所传之《洪范五行传》。班固指出，刘歆亦有《洪范五行传》，但与以上三人所用《洪范五行传》有差异。《汉书·五行志》的这一部分即以《洪范五行传》为根据推言历史上灾异产生之原委。由此可证，在上一部分即“《经》曰：‘初一曰五行’”部分主要是根据董仲舒所治之《春秋公羊传》、刘向所治之《谷梁传》及刘歆所治之《左氏传》之灾异理论推言灾异，而《京氏易传》的说法只被引用了两条。而在这一部分即“羞用五事”部分，《京房易传》对灾异之解释却被大量引用。这里的“肃”是“敬”的意思。“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水伤百谷，衣食不足，则奸轨并作，故其极恶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丑恶，亦是也。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类动，故有龟孽。于《易》，‘巽’为鸡，鸡有冠距文武之貌。不为威仪，貌气毁，故有鸡祸。……上失威仪，则下有强臣害君上者，故有下体生于上之病。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伤者病木气，木气病则金沴之，冲气相通也”<sup>②</sup>。由“貌之不恭”一项可以推出如此多的与此相关的灾异现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52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53—1354页。

“冲气”说与下文相关部分的“应在其冲”说是一致的。

在“服妖”、“犬祸”部分,引有两段《京房易传》之解释:“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王贺狂悖……骄慢不敬。……《京房易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適,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sup>①</sup>《京房易传》的解释确实正好符合差一点就做成皇帝的昌邑王刘贺的下场,且与《洪范五行传》的精神是一致的。显然,据常理,奴婢与狗是不能戴帽子的,狗与奴戴帽子不合礼法,有以下犯上之象。京房把这些异象归咎于人君之行不顺民心或“君不正”。

在“鸡祸”部分,有四条解释引自《京房易传》。(1)《左氏传》曰:周景王(公元前544~前520年在位)大夫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刘向以为近鸡祸也。是时,王有爱子子鼂,王与宾起阴谋欲立之。……宾起诛死,子鼂奔楚而败。《京房易传》曰:‘有始无终,厥妖雄鸡自啗断其尾。’”<sup>②</sup>这是以雄鸡之头为始,以雄鸡之尾为终。雄鸡自断其尾,预示着有始无终。这是根据物象来推断。(2)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未央殿辂轸中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公元前48~前44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公元前43~前39年)中,有献雄鸡生角者。班固引《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sup>③</sup>这是以鸡之稟性来进行推断。京房以为自己知时,恐怕此异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而刘向以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66-1367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69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0页。

为京房此说不当,认为“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秉君威,以害正事,犹石显也”。班固则认为,“黄龙、初元、永光鸡变,乃国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皇后以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生男,立为太子。妃,王禁女也。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崩,太子立,是为元帝。王妃将为皇后,故是岁未央殿中雌鸡为雄,明其占在正宫也。不鸣不将无距,贵始萌而尊未成也。……丞相府史家雌鸡为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鸣将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阳平顷侯禁薨,子凤嗣侯……王氏之权自凤起,故凤始受爵时,雄鸡有角,明视作威颛君害上危国者,自此人始也。其后群弟世权,以至于莽,遂篡天下”<sup>①</sup>。可见,对同一灾异现象,时人有不同的理解,而就此外所论灾异来看,班固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3)班固还引《京房易传》之语以佐证自己的说法:“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鸡生角,时主独。”“妇人颛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sup>②</sup>京房在此以《明夷》卦(䷣)卦象起兴,以说明像他自己那样的知时知道者会受到夷伤,但没有从明夷卦具体的卦象出发来予以解释,也就是说他没从明夷卦中寻找鸡、伤等象。而他说“牝鸡雄鸣,主不荣”,又是从物象之寓意出发而作出的对灾异之阐释。

在“青祥”部分,《五行志》引用了四条《京房易传》之说,分别为:(1)“祭天不慎,厥妖鼯鼠啮郊牛角。”这是将子鼠或坎水与祭祀相联系,与“初一日五行”部分所说的“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的理念是一致的,京房在此运用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0-1371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1页。

了子鼠与北方坎水之位相配应的理念。(2)“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子不子”即是说儿子做得不像儿子,亦寓示着儿子祭祀时有失敬意。此条与上条之义相通。(3)“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案:这一条亦出现于“黄祥”部分)显然,京房在此将鼠与诛伐等与坎为狱、坎为水之象相联系。(4)“臣私禄罔辟,厥妖鼠巢。”<sup>①</sup>这是根据老鼠偷盗之性来比类臣下私贪利禄将会导致的灾异现象。

“金沴木”之“沴”为“伤害”之意。在“金沴木”部分,《京房易传》被引用过一次。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自覆。刘向以为,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吴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逆乱。城犹国也,其一门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曰,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京房易传》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坏。’”<sup>②</sup>城门就像一国一家之门户,城门自倾、自坏象征门户将倒,是上下悖乱所致。京房在此用的乃是物象之寓意。

## (二)言之不从

《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病,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sup>③</sup>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2-1374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5-1376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6页。

从,顺也;艾,治也;僭,差也。“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愤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于《易》,兑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气毁故有犬祸。一曰,旱岁犬多狂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口喉咳者,故有口舌病。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伤者,病金气;金气病,则木沴之。其极忧者,顺之,其福曰康宁”<sup>①</sup>。

在“言之不从之咎”部分,没有引用《京房易传》。在“庶征之恒阳”部分,有一条引自《京房易传》。“庶征之恒阳,刘向以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谓之大雩。不伤二谷,谓之小雨。《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而除。师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居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sup>②</sup>京房把恒阳不雨归咎于“欲德不用”、“师出过时”、“上下皆蔽”、“上缘求妃”、“居高台府”、“庶位逾节”等,与班固所说“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之思维理路不同。“欲德不用”则国缺贤德之人,缺乏贤人则上下不交,阳亢失济,故旱;“师出过时”即杀伐过度则金气被伤,阳气过胜而至大旱;“上下皆蔽”则上下不交,积阴成阳而致大旱;“上缘求妃”、“居高台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6-1377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86页。



府”、“庶位逾节”等皆为以下犯上、以阴侵阳，阳气暴胜，因而致旱。可见，京房在这里主要是根据天地交、上下交等宇宙大化之应然状态受到破坏来解释造成大旱的原因。

在“诗妖”部分，没有引《京房易传》。在“毛虫之孽”、“青祥”部分，有两条引自《京房易传》：(1)“废正作淫，大不明，国多麋。”(2)又曰：“《震》遂泥，厥咎国多麋。”<sup>①</sup>麋之为言迷也。废正不用，人君淫乱，政治黑暗，故有麋(迷)象。这仍是以物象来推断灾异。“震逐泥”为《震》卦九四爻辞，刘大钧、林忠军先生解释为“霹雳坠入泥中”<sup>②</sup>，黄寿祺、张善文先生的解释为：“此言九四阳刚失位，刚德不足，又陷于上下四阴之间，故当‘震’之时惊惶失措，坠入泥泞不能自拔。”<sup>③</sup>可见，京房是以卦爻辞与卦爻象起兴，而以灾异现象为喻。

在“犬祸”部分，《汉书·五行志》有两条引自《京房易传》。(1)文帝后五年(公元前159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先是，帝兄齐悼惠王亡后，帝分齐地，立其庶子七人皆为王。兄弟并强，有炕阳心，故犬祸见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乡者也。犬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乡京师也。……后六年，吴、楚畔，济南、胶西、胶东三国应之，举兵至齐。……狗生角于齐而三国围齐。汉卒破吴、楚于梁，诛四王于齐。《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96页。

②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③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

妖狗生角。’”<sup>①</sup>京房在此所采之象与班固所说“犬守御，角兵象”、“犬不当生角”之说相通。另外，狗亦象征下人，狗生角则表征下人有抗上之心。这是根据物性与物象来推言灾异。(2)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二月，邯郸狗与彘交。悖乱之气，近犬豕之祸。班固引《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革。”狗、豕异类而相交，所以说是悖乱之气，据京房的理论，这是由夫妇不严导致的自然界之异象。

在“白祥”部分，有四处引自《京房易传》。(1)“孝昭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鸟数千集其旁。”<sup>②</sup>又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曰：“公孙病已立。”眭孟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并继之提出“汉家尧运，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sup>③</sup>。霍光以其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为借口而将眭孟诛杀。眭孟据此想让家天下的汉王朝实行儒家理想中的禅让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巧合的是，五年后兴于民间的汉宣帝正好是武帝的曾孙，且他的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97-1398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0页。

③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3-3154页。

字为“病已”。所以宣帝即位后征眭孟的儿子为郎，表示宣帝对灾异说的承认，也寓示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定。《汉书·五行志》在记载此异之后引《京房易传》曰：“‘《复》，崩来无咎。’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2)又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①京房与眭孟的推衍理路差不太多，只是京房之推衍更为细密，如京房把庶人将为天下雄分为同姓与异姓，石立如人又分为立于水及立于泽两种情况。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京房先引《复》卦卦辞“崩来无咎”，“崩”今本作“朋”，京房在此解释为“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令人很容易想到复(䷗)是由剥(䷖)颠覆而来，而剥卦上卦为艮卦(䷳)为山。剥卦颠倒为复卦正是山自上而下之象。所以，京房在此是在以卦象及物象释灾异。而所谓“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是以取类比象的方法而推断。(3)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公元前98年)八月，天雨白鼈。《京房易传》曰：“前乐后忧，厥妖天雨羽。”这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4)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②京房的这一占断与武帝后期的政治基本相符，也映射出京房依靠贤人治国的政治理念。

在“木沴金”部分，《五行志》引有一条《京房易传》、一条京房《易妖辞》。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正月，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函谷关次门牡亦自亡。《京房易传》曰：“饥而不损兹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0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1页。

谓泰，厥灾水，厥咎牡亡。”《妖辞》曰：“关动牡飞，辟为亡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sup>①</sup>百姓饥馑，人君不予以振济而泰然自若，百姓应会有怨气，其灾异表现为大水及牡亡。牡象关闭门户的枢纽，人君不仁、无道，则门户不能关闭，进而不能进行自防，门户将要改变，乱臣乘机谋篡之象。京房在这两处都是用物象之寓意来释灾异。

### （三）视之不明

传曰：“视之不明，是谓不愆，厥咎舒，厥罚恒奥，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羸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病，时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愆，知（智）也。班固对此段的解释为，“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则不能知善恶，亲近习，长同类，亡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百官废乱，失在舒缓，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长，暑以养物，政弛缓，故其罚常奥也。奥则冬温，春夏不和，伤病民人，故其极疾也。诛不行则霜不杀草，繇臣下则杀不以时，故有草妖”，“温奥生虫，故有羸虫之孽，谓螟螣之类当死不死，未当生而生，或多于故而为灾也”，“于《易》，刚而包柔为《离》，《离》为火为目。羊上角下（號）[躡]，刚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视气毁故有羊祸。一曰，暑岁羊多疫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目者，故有目病。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视伤者病火气，火气伤则水沴之。其极疾者，顺之，其福曰寿”。并在此引《京房易传》曰：“禄不遂行兹谓欺，厥咎奥，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禄乐逸兹谓乱，奥而生虫。知罪不诛兹谓舒，其奥，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重过不诛，兹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01 页。

谓亡征,其咎当寒而奥六日也。”<sup>①</sup>在京房看来,这些都是政治弛缓、臣下苟且所导致的灾异现象,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君王之不明哲。

在“草妖”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五条《京房易传》。(1)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歆以为草妖也。刘向以为,“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为天位,(为)君位,九月阴气至,五通于天位,其卦为《剥》,剥落万物,始大杀矣,明阴从阳命,臣受君令而后杀也。今十月陨霜而不能杀草,此君诛不行,舒缓之应也”。前文已述,刘向在此是以十二消息卦卦气说释灾异。《五行志》在此引《京房易传》云:“臣有缓兹谓不顺,厥异霜不杀也。”<sup>②</sup>京房也是认为陨霜不杀是由于行政舒缓、该杀不杀所致。(2)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中,有虫食其叶。前文已谈及眭孟的推断。《五行志》在此引《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sup>③</sup>“枯杨生稊”是《大过》九二爻辞。全文为:“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意为:“枯萎杨树发新芽,老夫又得小娇妻,(这)没有什么不利。”<sup>④</sup>可以看出,京房在此没有采用《大过》卦九二爻辞之本义,没有将“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作为吉利的意象,而是把它作为下人将起,人君无嗣之象。由此可以看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5-1406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9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12页。

④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出,京房在以《周易》卦爻辞言灾异而起兴时,不是完全以卦爻辞之本义来推言灾异的。(3)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须发,稍长大,凡六寸一分。对于此异,《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sup>①</sup>京房在此所采与上卦孟“木阴类,下民象”之说是相通的,只是他又把“王德衰”看作导致此类灾异的原因。(4)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零陵有树僵地……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卒立故处。《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颺,木仆反立,断枯复生。天辟恶之。”<sup>②</sup>可见,在京房看来,木亦有妃后之象。所以,“木仆反立,断枯复生”为在下之势力死灰复燃之象,而其根源则是由于人君放弃正道而陷于淫乱所致。(5)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缪结,大如弹丸;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正月,天雨草,状如永光时。对于此类灾异,《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君吝于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sup>③</sup>天以时雨为正常,而下草(状之雨),则为灾异。雨以润物,天下雨就像人君施禄于大臣或润泽于天下,如果人君在施禄方面吝啬或夹杂其不诚之心,就会失信于民,贤人就会离去,从而导致“天雨草”之异。京房在此运用的是“雨草”之意象。

在“白黑祥”部分,《五行志》引有六条《京房易传》。(1)景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13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13-1414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14页。

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班固认为此异预示着楚王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失败之结局,并引《京房易传》曰:“逆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sup>①</sup>白乌黑乌属同门同类,二者相斗象征兄弟相残,所以京房将此异与“逆亲亲”联系起来。(2)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 80 年),有乌与鹊斗燕王宫中池上,乌堕池死,近黑祥也。班固认为,当时燕王刘旦阴谋为乱,此异预示燕王必败,燕王“遂不改寤,伏辜而死”。并引《京房易传》:“专征劫杀,厥妖乌鹊斗。”<sup>②</sup>乌鹊不同类,二者相斗象征专征劫杀。京房在此仍在用物象来推言灾异。(3)昭帝时有鹈鹕或曰秃鹫,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杀之。刘向以为,水鸟色青,青祥也。班固认为,“野鸟入处,宫室将空”,并引《京房易传》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鸟集于国中。”<sup>③</sup>按《汉书·五行志》的分类,“厥咎狂”属于“貌之不恭”之类。京房把“水鸟集于国中”之异归咎于人君辞退有德行之人,如此则导致野鸟入于人居之处之异象。(4)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 28 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鸢焚其巢。班固以《旅》卦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以证之,认为这是赵飞燕谋杀皇子之预兆,并引《京房易传》曰:“人君暴虐,鸟焚其舍。”<sup>④</sup>京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15 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16 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16 页。

④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17 页。

房把此类灾异归咎于人君暴虐所致,因为在京房看来,人君之想法及行为合道与否,直接影响到自然界万物之常或异。(5)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飞去。班固直接引《京房易传》曰:“贼臣在国,厥咎燕生爵,诸侯销。”<sup>①</sup>贼臣在国,扰乱人君之视听,内隐不祥之气,外在之异则表现为燕生非其类,诸侯因有贼臣在而被剥削。京房在此用的是取类比象之法来推言灾异。

在“赤眚”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三条《京房易传》。(1)《左氏传》鲁襄公(公元前572~前542年在位)时,宋有生女子赤而毛,弃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见而收之,因名曰弃。长而美好,纳之平公,生子曰佐,后宋臣伊戾谗太子痤而杀之。刘向认为这是火灾赤眚之明应也。班固引《京房易传》曰:“尊卑不别,厥妖女生赤毛。”<sup>②</sup>赤毛为野兽生时所有,人生而有赤毛,为野兽同于人类之象,京房认为此妖乃人君“尊卑不别”所致。(2)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天雨血于宜阳,一顷所。刘向以为赤眚也。班固以为,此异乃是当时“政舒緩,诸吕用事,谗口妄行,杀三皇子,建立非嗣,及不当立之王,退王陵、赵尧、周昌”所致,并引《京房易传》曰:“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谓不亲,民有怨心,不出三年,无其宗人。”(3)又曰:“佞人禄,功臣僇,天雨血。”<sup>③</sup>班固所举的事实与京房所说的“兹谓不亲,民有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19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0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0页。



怨心”、“佞人禄，功臣僇”确实相符。天雨血乃血雨腥风之象，京房将此与“归狱不解”、“民有怨心”、“佞人禄，功臣僇”相联系，运用的仍是取类比象法。这两条都谈到“天雨血”之异，说明京房对同一类灾异根据情况不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 （四）听之不聪

传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恒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病，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班固对此段的解释为，“言上偏听不聪，下情隔塞，则不能谋虑利害，失在严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杀物，政促迫，故其罚常寒也。寒则不生百谷，上下俱贫，故其极贫也。君严猛而闭下，臣战栗而塞耳，则妄闻之气发于音声，故有鼓妖。寒气动，故有鱼孽”，“于《易》，《坎》为豕，豕大耳而不聪察，听气毁，故有豕祸也。一曰：寒岁豕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听伤者病水气，水气病则火沴之。其极贫者，顺之，其福曰富”<sup>①</sup>。

在“厥罚恒寒”部分，《汉书·五行志》共引用三条《京房易传》。（1）秦始皇即位后年龄尚幼，他的母亲与吕不韦及嫪毐私通。秦始皇既冠之后，嫪毐惧怕被诛而作乱，“始皇诛之，斩首数百级，大臣二十人，皆车裂以徇，夷灭其宗，迁四千余家于房陵。是岁四月，寒，民有冻死者”。显然，《汉书·五行志》认为此年四月之寒是由秦始皇用刑过深所致，并引《京房易传》曰：“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寒。诛过深，当奥而寒，尽六日，亦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1-1422页。

为雹。害正不诛，兹谓养贼，寒七十二日，杀蜚禽。道人始去，兹谓伤，其寒物无霜而死，涌水出。战不量敌，兹谓辱命，其寒虽雨物不茂。闻善不予，厥咎聋。”<sup>①</sup>京房在此将诛罚与坎水法律之相配应，既运用了五行之说，又运用了八卦卦象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京房在此说“诛过深，当奥而寒，尽六日”，“六日”有可能受“六日七分”说的影响；而在此所提到的“七十二日”，指的将一年分为五季时每一季所值之日数，显然受五行说的影响；这里所说的“道人始去”、“涌水出”又与《汉书·京房传》所说的《遁》卦不效，“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一致<sup>②</sup>。可证在京房看来，有道之人有阳达光明之象，“道人”离开之后，寒阴之气就会显现。(2)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六月，大雨雪。《汉书·五行志》将此异与后来的淮南厉王刘长谋反被诛相联系，并引《京房易传》曰：“夏雨雪，戒臣为乱。”<sup>③</sup>由此可证，京房把大臣作乱与寒阴之气相配应。(3)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四月，陨霜杀草木。《汉书·五行志》把此异归咎于武帝“自是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并引《京房易传》：“兴兵妄诛，兹谓亡法，厥灾霜，夏杀五谷，冬杀麦。诛不原情，兹谓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风，冬先雨，乃陨霜，有芒角。贤圣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兹谓私贼，其霜在草根土隙间。不教而诛兹谓虐，其霜反在草下。”<sup>④</sup>这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2页。

② [汉]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64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4页。

④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7页。

仍是从物象、五行、卦象的角度出发来推言灾异的。班固还认为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三月的陨霜杀桑及九月的陨霜杀稼是由当时的中书令石显用事专权所造成的。

在“鼓妖”部分,《汉书·五行志》引用一条《京房易传》。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良吏陛下皆闻焉。元帝问时为黄门侍郎的扬雄和李寻应如何解释这一异象。李寻说这就是《洪范》所说的鼓妖,并建议辞拜丞相、御史,以应天变。扬雄亦以鼓妖释之。《汉书·五行志》兼引《京房易传》:“今不修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动,若有音。”<sup>①</sup>金性安固,若不修本,下不安,金就会有无故自动,像发出声音一般。京房在此仍是以物象物性来推言灾异,但最终总是把灾异归咎于人君之政令不合时宜。

在“鱼孽”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两条《京房易传》。(1)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此近鱼孽。《汉书·五行志》以为,“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并引《京房易传》:“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sup>②</sup>京房的这种解释与班固的解释基本相同,亦即把鱼与水、阴、民之类相配应。(2)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秋,雨鱼于信都,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对此类灾异,班固引《京房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9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30页。

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sup>①</sup>可见，京房亦把鱼类看作阴类、民、邪人之象。

在“豕祸”部分，《五行志》引有一条《京房易传》。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 80 年），“燕王宫永巷中豕出阍，坏都灶”，刘向以为近豕祸也。班固以为，“灶者，生养之本，豕而败灶……宫室废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并引《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sup>②</sup>显然，京房把豕所对应之坎象作为众人之心来看待。

在“火沴水”部分，《五行志》引有两条《京房易传》。（1）史记鲁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550 年），谷、洛水斗，将毁王室。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班固以为此为卿大夫将分争以危乱王室之象，并引《京房易传》曰：“天子弱，诸侯力政，厥异水斗。”<sup>③</sup>这是把水作为臣下、民众等象。（2）秦武王三年（公元前 308 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 237 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五行志》认为此类灾异是由秦法刻急所致，并引《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sup>④</sup>这时将酒、淫等与坎水之象相配应。

#### （五）思心之不睿

传曰：“思心之不睿，是谓不圣，厥咎霖，厥罚恒风。厥

---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31 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36—1437 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37 页。

④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38—1439 页。

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病，时则有黄眚黄祥，时则有金木水火殄土。”

睿，宽也。班固如此解释此段，“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貌言视听，以心为主，四者皆失，则区霭无识，故其咎霭也。雨旱寒奥，亦以风为本，四气皆乱，故其罚常风也。常风伤物，故其极凶短折也。伤人曰凶，禽兽曰短，草木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区霭则冥晦，故有脂夜之妖……温而风则生螟螣，有裸虫之孽。刘向以为于《易·巽》为风为木，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主木之华实。风气盛，至秋冬木复华，故有华孽……于《易·坤》为土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虑，思心气毁，故有牛祸。一曰，牛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病。土色黄，故有黄眚黄祥。凡思心伤者病土气，土气病则金木水火殄之……其极曰凶短折，顺之，其福曰考终命。刘歆思心传曰时则有羸虫之孽，谓螟螣之属也”<sup>①</sup>。刘向称巽卦在三月、四月，这是以八卦卦气说释《洪范五行传》。与传统五行说不同的是，这里将心与土相配应。显然，这里的“心”居于人体中央，有中央土之意；传统的五行说将土与湿相配应，在此却把土与风相配应，是从“雨旱寒奥，亦以风为本”这一观念出发的。

在“其罚恒风”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较长的一段《京房易传》关于风占的内容。釐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正月，六鹫退蜚，过宋都”。《左氏传》曰：“风也。”刘歆以为，象宋襄公区霭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马子鱼之谏，而与强楚争盟，后六年为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1—1442页。

楚所执，应六鹄之数云。班固在此引《京房易传》：“潜龙勿用，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其风也，行不解物，不长，雨小而伤。政悖德隐兹谓乱，厥风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守义不进兹谓毫，厥风与云俱起，折五谷茎。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焱发屋。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纪）[纬]，止即温，温即虫。侯专封兹谓不统，厥风疾，而树不摇，谷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谓无泽，厥风不摇木，旱无云，伤禾。公常于利兹谓乱，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弃正作淫兹谓惑，厥风温，螟虫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兹谓叛，厥风无恒，地变赤而杀人。”<sup>①</sup>《京房易传》此段对风的分类很详细，说明京房对风占进行仔细而深入的研究。显而易见的是，《汉书·五行志》在此所引京房的风占之术用的仍是取类比象之法，京房在此还以《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起兴，在此他用的是“潜龙勿用”之本义。在京房看来，每一种灾风都与人君或公侯大臣之施政不合大道有关。京房在此遵循的仍是一种取类比象的思维理路，与《汉书·翼奏传》所涉及的翼奉之风角术有较大区别。

在“虫孽”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一条《京房易传》。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秋，螟”。董仲舒、刘向以为时公观渔于棠，贪利之应也。《京房易传》曰：“臣安禄兹谓贪，厥灾虫，虫食根。德无常兹谓烦，虫食叶。不绌无德，虫食本。与东作争，兹谓不时，虫食节。蔽恶生孽，虫食心。”<sup>②</sup>可以看出，京房把“臣安禄”看作根本性的问题，所以“臣安禄”会导致“虫食根”。估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3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6页。

计他的考功课吏法让大臣们不能安禄贪污,所以才遭到那么多大臣的反对。京房在此还把“德无常”与“叶”、“不恤无德”与“本”、“与东作争”与“节”、“蔽恶生孽”与“心”相对应。

在“牛祸”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一条《京房易传》。秦孝公五年(公元前357年),游胸衍,有献五足牛者。刘向以为近牛祸也。班固以为这是秦文惠王广大宫室,思心失,逆土气造成的,并引《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sup>①</sup>兴繇役则动土过度,坤为牛为土,京房在此显然是运用卦象说来推言灾异。

在“黄祥”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两条《京房易传》。(1)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班固以为是黄祥,是燕王刘旦谋反将败而死亡之象,并引《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sup>②</sup>如前所述,京房在此有可能是将诛伐之象与子水坎卦相联系来推言灾异的。(2)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班固认为这是王凤始用事之岁,成帝又同日封王凤的庶弟五人为侯,“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并引《京房易传》曰:“经称‘观其生’,言大臣之义,当观贤人,知其性行,推而贡之,否则为闻善不与,兹谓不知,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黄者,日上黄光不散如火然,有黄浊气四塞天下。蔽贤绝道,故灾异至绝世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7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9页。

也。经曰‘良马逐’。逐，进也，言大臣得贤者谋，当显进其人，否则为下相攘善，兹谓盗明，厥咎亦不嗣，至于身僂家绝。”<sup>①</sup>由此可知，京房十分强调大臣要知贤荐贤，否则就会有不嗣之恶果。京房在此引《观》卦上九爻辞“观其生，君子无咎”。刘大钧、林忠军两位先生将此句爻辞译为：“观察他国庶民，君子无灾。”<sup>②</sup>黄寿祺、张善文先生将这句爻辞解释为：“此谓上九阳刚居《观》之终，虽属虚高之位，但下者均在观仰其施为，故须有‘君子’之德才能‘无咎’。”<sup>③</sup>京房对此爻辞的解释与以上两种译法皆不相同，可证他在此并不是为了解经而解经，而是从他理想中的宇宙大化应然之状态出发来理解经文之义。京房在此还对《大畜》卦九三爻辞“良马逐”进行解释。本爻辞的全文为：“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本义为：“良马驰逐，宜艰难中守正。每日练习用车马防卫，宜有所往。”<sup>④</sup>可见，京房在此还是没按《观》卦上九爻辞及《大畜》卦九三爻辞之本义进行解释。在京房的心目中，只有贤人、有道之人得到推荐与任用，整个国家才能阴阳调、风雨时，整个宇宙之阴阳大化才能得以有序进行，否则就会出现以上所说之灾异现象。这正是一种从阴阳祥瑞及灾异理念出发来对《周易》经文进行诠释。《汉书·艺文志》没有说京房所著之《周易章句》，清人王保训所辑《京房周易章句》正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50页。

②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③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④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好没有辑入京房对这两句爻辞的解释。我们已无从知道京房当时是否作过《周易章句》，即使作过《周易章句》，我们也无从知道他在著《周易章句》时是否在诠释整个经、传文时一直贯穿着这一理念，至少在《五行志》所录《京房易传》中涉及《周易》经文时皆贯穿着这一理念。《京房易传》的这一理念亦是对石显等佞臣的一种鞭策，所以京房的施政措施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

在“金木水火沴土”部分，《汉书·五行志》共引有三条《京房易传》。(1)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周三川皆震。刘向以为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阳甫作出西周将亡的推断。班固引《京房易传》曰：“君臣相背，厥异名水绝。”<sup>①</sup>这是从“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的理念出发来诠释灾异的。(2)鲁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九月癸酉，地震”，刘向认为是周襄王失道，诸侯皆不肖，权倾天下所致，天戒若曰，臣下强盛者将动为害，“后宋、鲁、晋、莒、郑、陈、齐皆杀君”。班固引《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摇，于屋则瓦落。大经在辟而易臣，兹谓阴动，厥震摇政官。大经摇政，兹谓不阴，厥震摇山，山出涌水。嗣子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出。”<sup>②</sup>这是京房对地震的解释，全是从君臣关系、人君与嗣子之关系来进行解释。京房把整个国家之政治看作一个宇宙大化的模型，如果以上关系出现不协调之情况，就会发生地震以警告之。(3)釐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刘向认为这是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天戒若曰，伯道将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52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52页。

废，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执命，臣下不事上矣”。班固引《京房易传》曰：“小人剥庐，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sup>①</sup>京房在此是以《剥》卦上九爻辞起兴。此爻辞全句为：“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本义为：“有硕大之果而不食，君子可得到车舆，小人则剥去屋舍。”<sup>②</sup>或：“若以‘君子’获此‘硕果’则‘吉’，若为‘小人’窃此‘硕果’则‘凶’。”<sup>③</sup>显然，京房在此仍没有完全按此爻辞之本义来解释灾异，而是将小人视为邪阴之气，剥落得整个大厦将倾之象，并据剥卦(䷖)上卦艮(䷳)山之象以推断之。

### 三、建用皇极

据《汉书·五行志》，天赐禹九章大法，而《汉书·五行志》所引条目只是其中的“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五曰建用皇极”三部分，当然，在这些条目中，亦涉及“念用庶征”、“向用五福”、“畏用六极”等内容。在“建用皇极”部分，《汉书·五行志》亦采用了不少《京房易传》的说法。

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病，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sup>④</sup>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55 页。

②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3 页。

③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2 页。

④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58 页。

班固对此段的解释为：“皇，君也。极，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云起于山，而弥于天；天气乱，故其罚常阴也。一曰，上失中，则下强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龙有悔，贵而亡位，高而亡民，贤人在下位而亡辅’，如此，则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极弱也。盛阳动进轻疾。礼，春而大射，以顺阳气。上微弱则下奋动，故有射妖。《易》曰‘云从龙’，又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阴气动，故有龙蛇之孽。于《易》，《乾》为君为马，马任用而强力，君气毁，故有马祸。一曰，马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君乱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诛，则有篡弑之祸，故有下人伐上之病。凡君道伤者病天气，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乱行，星辰逆行’者，为若下不敢沴天。”<sup>①</sup>

在“厥罚恒阴”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一大段《京房易传》关于蜺占、蒙占之内容。昭帝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崩，亡嗣，欲立昌邑王刘贺。刘贺到达京师后，天阴，昼夜不见日月。刘贺想出门，时任光禄大夫的夏侯胜挡住刘贺的车进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刘贺听了大怒，把夏侯胜抓起来让相关官吏处置。这位官吏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将军霍光。当时霍光正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要废掉刘贺。霍光责备张安世，以为张安世泄露了机密，其实张安世并没有泄露机密，霍光于是召问夏侯胜。夏侯胜献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58—1459页。

云臣下有谋。”霍光与张世安看到这一说法以后，大为震惊，因此更加尊重经术之士。《汉书·五行志》随之引了一大段《京房易传》：

有蜺、蒙、雾。雾，上下合也。蒙，如尘云。蜺，日旁气也。其占曰：后妃有专，蜺再重，赤而专，至冲旱。妻不壹顺，黑蜺四背，又白蜺双出日中。妻以贵高夫，兹谓擅阳，蜺四方，日光不阳，解而温。内取兹谓禽，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兹谓薄嗣，蜺直而塞，六辰乃除，夜星见而赤。女不变始，兹谓乘夫，蜺白在日侧，黑蜺果之，气正直。妻不顺正，兹谓擅阳，蜺中窥贯而外专。夫妻不严兹谓媾，蜺与日会。妇人擅国兹谓顷，蜺白贯日中，赤蜺四背。適不答兹谓不次，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于不专，兹谓危嗣，蜺抱日两未及。君淫外兹谓亡，蜺气左日交于外。取不达兹谓不知，蜺白夺明而大温，温而雨。尊卑不别兹谓媾，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则日出且雨。臣私禄及亲，兹谓罔辟，厥异蒙，其蒙先大温，已蒙起，日不见。行善不请于上，兹谓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谋，臣辟异道，兹谓不见，上蒙下雾，风三变而俱解。立嗣子疑，兹谓动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兹谓不聪，蒙，日不明，温而民病。德不试，空言禄，兹谓主麻臣夭，蒙起而白。君乐逸人兹谓放，蒙，日青，黑云夹日，左右前后行过日。公不任职，兹谓怙禄，蒙三日，又大风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兹谓闭上，蒙大起，白云如山行蔽日。公惧不言道，兹谓闭下，蒙大起，日不见，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云蔽日。禄生于下，兹谓诬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兹谓盗明，蒙黄浊。下陈功，求于上，兹谓不知，蒙，微而赤，风鸣条，解复蒙。下专刑兹谓分

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厌小臣，兹谓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风发，赤云起而蔽日。众不恶兹谓闭，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日不见。漏言亡喜，兹谓下厝用，蒙微，日无光，有雨云，雨不降。废忠惑佞，兹谓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兹谓不明，蒙浊，夺日光。公不任职，兹谓不绌，蒙白，三辰止，则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进善君不试，兹谓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众在位，兹谓覆国，蒙微而日不明，一温一寒，风扬尘。知佞厚之兹谓庠，蒙甚而温。君臣故弼兹谓悖，厥灾风雨雾，风拔木，乱五谷，已而大雾。庶正蔽恶，兹谓生孽灾，厥异雾。<sup>①</sup>

班固说，“此皆阴云之类”。这些都是“皇之不及”之异。可见，京房对“恒阴”有如此详细的区分。对《洪范五行传》过于粗略的说法是一种很好的补充。京房把阴云从大的方面分为三种：蜺、蒙、雾。蜺为日旁气，其占主要与后妃有关；蒙如尘云，其占主要与大臣蒙蔽人君有关；雾为上下合气，其占主要与君臣关系有关。显然，京房在此运用的仍是取类比象之术。这里提到“后妃有专，蜺再重，赤而专，至冲旱”，孟康注曰：“专，员也，若五月再重，赤而员，至十一月旱也。”乃是用的“应在其冲”说。（详见后）

在“射妖”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一条《京房易传》。鲁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秋，有蜮”。刘向以为蜮生南越。越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生。蜮生活在水旁，能射人，南方谓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鲁国之所以出现这种东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0—1461页。

西，刘向以为其时严公将取齐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齐女，将生淫惑篡弑之祸。严公不寤，遂取之。入后淫于二叔，二叔以死，两子见弑，夫人亦诛。班固在此引《京房易传》曰：“忠臣进善君不试，厥咎国生蜮。”<sup>①</sup>看来京房所说与严公之事没有太大的关系。京房在此运用的仍是取类比象之法，忠臣进善，而人君不加以试用，则邪阴之气就会滋生，国家就会有蜮出现。

在“龙蛇之孽”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四条《京房易传》。(1)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班固以为，“郑以小国摄乎晋、楚之间，重以强吴，郑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以自危亡。是时，子产任政，内惠于民，外善辞令，以交三国，郑卒亡患，能以德消变之效也”。灾异说十分强调修德以消变，通过修德、纳善、进贤，灾异自然会消失。班固在此随之引《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sup>②</sup>坤为众，乾为龙，“众心不安”则阴不附阳，阳不能统阴，“龙战于野”之象。看来京房在此没有把龙与人君相联系。(2)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刘向以为，龙贵象而困于庶人井中，象诸侯将有幽执之祸。其后吕太后幽杀三赵王，诸吕亦终诛灭。《汉书·五行志》在此引《京房易传》云：“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3)又曰：“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sup>③</sup>京房在此是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3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6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7页。

将龙与有德之人联系起来。龙被困于井中,象征有德之人遭到迫害。(4)鲁严公时有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国南门中,内蛇死。刘向以为近蛇孽也,是郑国内部为争夺君位内外相残之象。《京房易传》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sup>①</sup>这是把蛇与王子相联系。

在“马祸”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三条《京房易传》。(1)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公元前235年)牡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皆为马祸也,象征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将以兵革亢极成功而还自害。牡马非生类,妄生而死,犹秦恃力强得天下,而还自灭之象。班固在此引《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sup>②</sup>不管是“方伯分威”还是“诸侯相伐”,都是由于“皇之不极”引起的,京房在此与《洪范五行传》的思维理路基本一致,说明京房在著《京房易传》以前,有可能参考过《洪范五行传》,只是二者之文体不相与同。(2)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有马生角于吴,角在耳前,上乡。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不当举兵乡上也。《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sup>③</sup>(3)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由于“皇之不极”,所以大臣才敢易上,而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贤士不足,京房念念不忘“贤士”“道人”等关系国家治乱之重大因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7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9-1470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0页。

素；同样也是由于“皇之不极”，诸侯不听调度，天子才不得不亲伐。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皇之不极”造成的，又一次说明京房在此与《洪范五行传》的思路是一致的。

在“下人伐上之病”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七条《京房易传》。(1)鲁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17年)，“败狄于咸”。《谷梁》、《公羊传》曰，长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鲁，一者之齐，一者之晋。……刘向以为，是时周室衰微，三国为大，可责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礼义，大为夷狄之行，将至危亡。其后三国皆有篡弑之祸，近下人伐上之病也。班固佐之以《京房易传》云：“君暴乱，疾有道，厥妖长狄入国。”(2)又曰：“丰其屋，下独苦。长狄生，世主虏。”<sup>①</sup>人君暴乱，有道之人遭到驱逐，亦为“皇之不极”，国家元气、正气不足，所以才有长狄入国之异。“丰其屋”为《丰》卦上六爻辞。全句为：“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意为：“宽大的屋子，阴影遮蔽了家，窥视其门户，静悄悄空无人迹，三年什么也没有见到，凶。”<sup>②</sup>京房在此只是以“丰其屋”起兴，而他所用之义碰巧与本爻辞原意相近。人君丰大其屋，在下之百姓独受其苦，据爻辞之义，是一种凶象。世主被虏也是“皇之不极”、正气不足之象。(3)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05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班固直接引《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sup>③</sup>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1页。

②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2页。



京房在此所用仍是取类比象之法，其义甚明。(4)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2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敛棺积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当死。”对于此异，班固直接引《京房易传》曰：“‘干父之蛊，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见先人之非，不则为私，厥妖人死复生。”<sup>①</sup>京房在此引《蛊》卦初六爻辞以起兴。意为：“匡正父亲过失，有这样儿子，(则父亲)没有灾祸。”<sup>②</sup>京房在此所用与该爻辞原意基本相同。(5)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正将变更。凡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媿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sup>③</sup>京房在此所说非常重要，道出了其推言灾异的依据是“各象其类”，亦即取类比象之思维方式。又说“凡妖之作，以谴失正”，这种理念继承的乃是董仲舒的“谴告”说。京房在此引《睽》卦上九爻辞以起兴。全句为：“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意为：“乖异孤独之时，见猪满身泥土，又有一车鬼。先张弓欲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3页。

②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3-1474页。

射,后喜悦置酒相庆,不是盗寇,是求婚的。前往遇雨则吉利。”<sup>①</sup>看来这是虚惊一场。而京房在此只是据此以引述下面的异象,所以没有采纳爻辞之原意。(6)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当时胶东、胶西、济南、齐四王有举兵造反谋,此谋由吴王刘濞发起,加上楚、赵,共七国。班固以为:下密,县居四齐之中;角,兵象,上向者也;老人,吴王象也。年七十,七国象也。天戒若曰,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以向京师也;祸从老人生,七国俱败云。并佐之以《京房易传》曰:“家宰专政,厥妖人生角。”<sup>②</sup>家宰专政乃下人抗上之象。京房在此采用的仍是取类比象思维。(7)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横城门,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户者莫见,至句盾禁中而觉得。班固以为,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小女而入宫殿中者,下人将因女宠而居有宫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繫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时,帝母王太后弟弟王凤始为上将,把持国政,天知其后将威天下而入宫室,故象先见也。班固并引《京房易传》之说:“妖言动众,兹谓不信,路将亡人,司马死。”<sup>③</sup>妖言惑众,百姓不再信任人君,所以路将亡人。京房在此强调的是人君要取信于民,才能维持其政治。

---

①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4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5页。

日食、月食、彗星等现象在古人看来属于“日月乱行”、星辰逆行之类的灾异。京房亦有其日占、月占、星占之说。《汉书·五行志》把这类灾异归于“皇之不极”部分。在日食占部分,《汉书·五行志》共引有四条《京房易传》,另有两条谷永转引之《京房易占》,我们在此一并进行统计讨论。(1)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其后戎执天子之使,郑获鲁隐,灭戴,卫、鲁、宋咸杀君。班固指出,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故《经》书灾而不记其故,盖吉凶亡常,随行而成祸福也。班固在此引用了一大段与日食相关的《京房易传》:

亡师兹谓不御,厥异日食,其食也既,并食不一处。诛众失理,兹谓生叛,厥食既,光散。纵畔兹谓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专禄不封,兹谓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烛。君臣不通兹谓亡,厥蚀三既。同姓上侵,兹谓诬君,厥食四方有云,中央无云,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兹谓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诸侯相侵,兹谓不承,厥食三毁三复。君疾善,下谋上,兹谓乱,厥食既,先雨雹,杀走兽。弑君获位兹谓逆,厥食既,先风雨折木,日赤。内臣外乡兹谓背,厥食食且雨,地中鸣。冢宰专政兹谓因,厥食先大风,食时日居云中,四方亡云。伯正越职,兹谓分威,厥食日中分。诸侯争美于上兹谓泰,厥食日伤月,食半,天营而鸣。赋不得兹谓竭,厥食星随而下。受命之臣专征云试,厥食虽侵光犹明,若文王臣独诛纣矣。小人顺受命者征其君云杀,厥食五色,至大寒陨霜,若纣臣顺武王而诛纣矣。诸侯更制兹谓叛,厥

食三复三食，食已而风，地动。適让庶兹谓生欲，厥食日失位，光晡晡，月形见。酒亡节兹谓荒，厥蚀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发雾而寒。<sup>①</sup>

这是京房对日食占的专门论述。从京房在此所说之内容多与风雨寒温相关来看，京房在此所论与其说是日食占，倒不如说是“以风雨寒温为候”。班固随之评论说：“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辄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sup>②</sup>可以看出，京房的这些推论有其意象上的根据。如“诛众失理，兹谓生叛，厥食既，光散”，由于诛众失理，众人从内心就不服气君王的判决，所以内心就会产生叛上之心，其在日食上的表现就是日全食，日光分散。又如“内臣外乡，兹谓背，厥食食且雨，地中鸣”，内臣既然有向外之心，他们就会设法蒙蔽君王，反映在日食上，就是“食且雨，地中鸣”之象。以上所录京房对日食之占法，有些内容可能得自其师焦延寿，有些内容则可能是他的独创，因为元帝继位后至京房被弃市前，发生过许多次日食、地震等灾异，京房对这些问题不得不进行深入的思考。（2）鲁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刘向以为，前事已大，后事将至者又大，则既。先是，鲁、宋弑君，鲁又成宋乱，易许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称王。后郑距王师，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刘歆以为六月，赵与晋分。先是，晋曲沃伯再弑晋侯，是岁晋大乱，灭其宗国。显然，他们是将日食与人君被弑联系起来。《京房易传》“以为桓三年日食贯中央，上下竟而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9—1480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80页。

黄,臣弑而不卒之形也”<sup>①</sup>。后楚严称王,兼地千里。可见,京房也是认为日食与人君被弑有关,亦可证《京房易传》中有专门对《春秋》所载日食进行占测之部分。(3)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几尽,在七星。刘向以为,五月微阴始起而犯至阳,其占重。至其八月,惠帝驾崩,有吕氏诈置嗣君之害。刘向在此显然将日食占与十二消息卦卦气说联合起来一起运用。而《京房易传》则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诛将不以理,或贼臣将暴起,日月虽不同宿,阴气盛,薄日光也。”<sup>②</sup>依《京房易传》,发生在惠帝七年五月的这次日食属于“日月相薄”这种情况。在京房看来,这种情况是由于人君诛将不以理,或贼臣将暴起造成的。(4)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京房易传》推衍以为,“是时日食从旁右,法曰‘君失臣’”。明年丞相公孙弘薨。“日食从旁左者,亦君失臣;从上者,臣失君;从下者,君失民”<sup>③</sup>。可见,京房把大臣作为人君的左右臂膀,所以他才认为日食从旁左及旁右是君失臣的预兆;同理,他把人君看作人臣的上司,把百姓视为人君的臣民,所以才有如上之占。这仍是一种取类比象思维。另外,京房能知道桓公三年时日食贯中央、上下竟而黄,武帝时日食从旁右等较详细的情况,说明京房手中已掌握到以往较详细的日食记录。(5)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九月丁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82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00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02页。

已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曰：“元年九月日蚀，酒亡节之所致也。独使京师知之，四国不见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别，祸在内也。”谷永在此影射的是成帝沉湎于酒色之事。“祸在内”之说仍属取类比象思维。(6)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曰：“今年二月日食，赋敛不得度，民人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见，京师阴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宫室，大营坟墓，赋敛兹重，而百姓屈竭，祸在外也。”<sup>①</sup>谷永在此影射的是成帝于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开始大兴土木、营造昌陵。谷永所引这两条《京房易占》，说明京房对日食占可能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只是我们现在已无法窥见其全貌了。

在“日月乱行”部分，《汉书·五行志》引有一条《京房易传》。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八月戊午，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京房易传》曰：“‘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妇强，为阴所乘，则月并出。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朏，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仄，仄则侯王其肃，朏则侯王其舒。”<sup>②</sup>京房在此以《小畜》上九爻辞引发对两月重见之异之解释。正常情况下，农历每月的初三日黄昏时月见于西方，晦、朔之日则在昏、晨时皆见不到月亮。所以在这两日如果能见到月亮，则是一种异象。下面是刘向、刘歆父子对《京房易传》此条的进一步解释。刘向以为，朏者疾也，君舒缓则臣骄慢，故日行迟而月行疾也。仄者不进之意，君肃急则臣恐惧，故日行疾而月行迟，不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05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06页。

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刘歆以为，舒者侯王展意颢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肃者王缩朒不任事，臣下弛纵，故月行迟也。当春秋时，侯王率多缩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者十八，食晦日朒者一，此其效也。考之汉家，食晦朒者三十六，终亡二日仄朒者。班固认同刘歆的说法。需要注意的是，刘向、刘歆父子对《京房易传》此条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他们父子俩应该研究或学习过京氏《易》。

在“日、月色之异”部分，《汉书·五行志》共引有三条《京房易传》。(1)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时有景亡光。这一年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班固直接引《京房易传》曰：“美不上人，兹谓上弱，厥异日白，七日不温。顺亡所制兹谓弱，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亲伐，兹谓不知，日白，体动而寒。弱而有任，兹谓不亡，日白不温，明不动。辟(讐)[讐]公行，兹谓不伸，厥异日黑，大风起，天无云，日光晦。不难上政，兹谓见过，日黑居仄，大如弹丸。”<sup>①</sup>显然，京房在此以日比君，其占各种情况皆出取类比象之思维方式。(2)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营室，时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颇有光，烛地赤黄，食后乃复。《京房易传》对此类灾异的解释为：“辟不闻道兹谓亡，厥异日赤。”把这类异象与人君不听闻大道联系起来。(3)这一年的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京房易传》曰：“祭天不顺兹谓逆，厥异日赤，其中黑。闻善不予，兹谓失知，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07页。

厥异日黄。”<sup>①</sup>将此类灾异与人君“祭天不顺”、“闻善不予”联系起来,说到底仍是“皇之不及”之表象。

在占较大篇幅的“星辰之异”部分,《汉书·五行志》只引有两条《京房易传》,说明班固对京房的星占之说不是特别认同,或者京房关于星占的理论本来就比较少。(1)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这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流星雨”。谷永对曰:“星辰附离于天,犹庶民附离于王者也。王者失道,纲纪废顿,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严以来,至今再见。”谷永也是以取类比象的方式来解释之。《京房易传》:“君不任贤,厥妖天雨星。”<sup>②</sup>此与京房的贤人及道人之政治理想是分不开的。(2)鲁釐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鵩退飞过宋都”。董仲舒、刘向以为,象宋襄公欲行霸道将自败之戒也。石,阴类;五,阳数。自上而陨,此阴而阳行,欲高反下也。石与金同类,其色以白为主,近白祥也。鵩,水鸟;六,阴数;退飞,欲进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属于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国小,勿持亢阳,欲长诸侯,与强大争,必受其害。《京房易传》则曰:“距谏自强,兹谓却行,厥异鵩退飞。适当黜,则鵩退飞。”<sup>③</sup>可见,在京房看来,进谏之议会帮助人君进步,否则就会退步。

①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07-1508页。

②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1页。

③ [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9页。



京房在此采取的仍是取类比象的方法。

综合上述,《汉书·五行志》共引用近七十条《京房易传》(包括谷永所转引的《京房易占》),旨在以当时所能得到的材料,彰显古人以“八卦、九章相为表里”的方式来评议政治得失,推显天人之道。《汉书·五行志》以《尚书·洪范》所云箕子向武王转述之大法九章为基础,以其中“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五曰建用皇极”为主体或基本框架,推言春秋以来所谓灾异之事。而其所采主要为董仲舒所治之《公羊春秋》说,夏侯始昌、夏侯胜、刘向等所治之《洪范五行传》之说,并掺杂以刘歆所治之《洪范五行传》。于《易》,则主要取《京房易传》中的阴阳灾异说。由于受这一框架形式的限制,《汉书·五行志》所采《京房易传》的内容可能只是整部《京房易传》很少的一部分。以上诸说皆以取类比象作为其推言灾异的根据,而《京房易传》的最大特点是把君道、道人、贤人等理念与其阴阳灾说紧密联系在一起。源于《周易》经、传的取类比象说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象思维”在中医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中国中医药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人们的健康福寿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对其价值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同样,从《汉书·五行志》所记林林总总的灾异现象及对这些灾异的解释来看,有些解释我们今天看起来可能属于牵强附会,但如果把这些解释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我们仍有对它们进行研究的必要。京房能够对灾异现象“所言屡中”,说明其《易》阴阳系统中的取类比象说绝对不是简单的胡乱联系。特别是《京房易传》所彰显的有德之人、有道之人、贤人等在国家政治中的重大作用,在其时过于专制的皇权形式下,确实能对当权者产生一定的警告与劝诫作用,以达到《周易》中《泰·彖》所描述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

志同”的国家大治状态,同时也是对石显等佞人势力的一种批判与鞭策。所以,在京房这里,这些灾异现象是次要的,而主要的是看人君是否让有道、有德之贤人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作用。如果有道、有德之贤人得到重用,国家就会大治,灾异现象自然就会消失。显然,在京房的心目中,整个宇宙有一个祥和有序的常态,这一常态之所以受到破坏是由于“君不正”、“欲德不用”、“臣私禄罔辟”、“诛不原情”、“废正作淫”、“禄不遂行”、“知罪不诛”、“王德衰”、“辟退有德”、“人君暴虐”、“有德遭险”、“兴兵妄诛”、“众心不安君政”、“君湏于酒,淫于色”、“臣安禄”、“兴繇役,夺民时”、“君臣相背”、“忠臣进善君不试”、“有德遭害”、“君暴乱,疾有道”、“辟不闻道”、“君不任贤”、“距谏自强”等原因造成的,这些正是元帝时的政治弊病所在。而京房的理想乃是希望人君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由此亦可见京房作《易传》的良苦用心。但在西汉“家天下”、“私天下”的背景下,宣帝为了纠正元帝好儒的偏向,为元帝安插了石显等佞臣,以确保“以霸王道杂之”之汉家制度,再加上“建昭(公元前38~前34年)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sup>①</sup>,便给石显等留下了投机钻营的空子,京房之“卦气效,瑞应著”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灾异说所应有的“谴告”作用由于有石显等中书宦官的存在最终在元帝这里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 四、《京房易传》与《焦氏易林》之关联

京房师事焦延寿,焦延寿有《焦氏易林》一书流传至今。在研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76页。

究《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时,笔者发现《焦氏易林》与《京房易传》拥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资料,我们在此列举数则:

(1)《焦氏易林》《蒙》之《比》为:

豕生鱼魴,鼠舞庭堂;奸佞施毒,上下昏荒,君失其邦。

据上文《汉书·五行志》“羞用五事”之“貌之不恭”中的“青祥”部分,及“思心之不睿”中的黄祥部分,皆引《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据《汉书·艺文志》,《京房易传》的这一说法与昭帝时发生一个灾异事件有关。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燕国有黄鼠衔其尾舞于燕王刘旦王宫之端门中,刘旦亲自过去看视,鼠舞如故。燕王便让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这确为一个比较奇异的现象。班固认为,这是燕王刘旦谋反将死之象。显然,《焦氏易林》与《京房易传》皆是据这一事件而发出的推断。从事实情况来看,《京房易传》的这句话与燕王谋反被诛除国一事没有直接的联系,《焦氏易林》所说的“上下昏荒,君失其邦”则与这一事件更为相符,说明《京房易传》更努力从事件本身找出灾异发生原因之普遍性。另外,按十二生肖,鼠与十二地支中的子相配应,而子又处于北方坎水之位,所以,京房在此之断语似取坎水所主诛伐、坎狱之象。

(2)《焦氏易林》《艮》之《否》云:

兴役不休,与民争时;牛生五趾,行危为忧。

《汉书·五行志》在“羞用五事”“思心之不睿”之“牛祸”部分记载,秦孝公五年(公元前357年),有献五足牛者。班固在此引《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显然,师徒二人所论相同,而所据的故事来源也应是秦孝文王时献给五足牛之事。

(3)《焦氏易林》有数条言及“山崩”之占。如:

忧在腹内,山崩为疾,祸起萧墙,竟制其国。(《豫》之

《随》))

山石朽弊，消崩坠落，上下离心，君受其祟。(《谦》之《姤》))

高阜山陵，陂也颠崩，为国妖祥，元后以薨。(《旅》之《姤》))

《汉书·五行志》亦引有两条《京房易传》对“山崩”的解释：一为“‘《复》，崩来无咎’，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一为“小人剥庐，厥妖山崩，兹谓乘阳，弱胜强”。显而易见，京氏在此所采意象与其师焦延寿所采意象相似。

(4)《焦氏易林》《坎》之《需》为：

狗冠鸡步，君失其所。出门抵山，行者忧难。水灌我园，高陆为泉。

《汉书·五行志》所引有一条《京房易传》与此相类：“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而《五行志》在此所叙之事件则是昌邑王刘贺被废之前所见之灾异。显然，京房与其师焦延寿在此所采意象亦基本相同。

(5)《焦氏易林》有许多关于“虫害”的描述，如：

螟虫为贼，害我稼穡，禾殫麦尽，秋无所得。(《豫》之《谦》))

焦氏在此只是描述虫害之情景，而没有说出造成虫害的理由。

上政摇扰，虫螟并起；害我嘉谷，季岁无稷。(《解》之《既济》))

焦氏在此只是说虫害为“上政摇扰”所致。《汉书·五行志》正好引有一京房对虫害之灾的解释：“臣安禄兹谓贪，厥灾虫，虫食根。德无常兹谓烦，虫食叶。不绌无德，虫食本。与东作争，兹谓不时，虫食节。蔽恶生孽，虫食心。”京房在此以取类比象

的方式说出了虫害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其阴阳灾异说之特点显露无遗。

(6)《焦氏易林》亦有一些冬奥夏寒之描述。如,《屯》之《颐》云:

冬华不实,国多盗贼。疾病难医,鬼哭其室。

《汉书·五行志》所引正好有一条《京房易传》与此相对应:“禄不遂行兹谓欺。厥咎奥,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禄乐逸兹谓乱,奥而生虫。知罪不诛兹谓舒,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重过不诛,兹谓亡征,其咎当寒而奥六日也。”此段与“冬华不实”相对应之原因为“知罪不诛兹谓舒”,这也正是造成“国多盗贼”的原因。所以在此师徒二人对此类灾异的认识仍然是一致的。

(7)《焦氏易林》也有与《汉书·五行志》所说“恒阳”相关之占例:

振急绝理,恒阳不雨。物病焦干,华实无有。(《泰》之《困》)

《汉书·五行志》在“厥罚恒阳”部分正好引有一条《京房易传》:“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而除。师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居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在京房看来,造成“恒阳不雨”的主要原因是人“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逾节”等。这些都与焦延寿所说的“振急绝理”有内在联系,但比焦氏所说之原因更为细化。

(8)《焦氏易林》亦有与“鱼孽”相关之说法:

鱼欲负流,众不同心,至德潜伏。(《归妹》之《屯》)

《汉书·五行志》引有一条《京房易传》与此义相通：“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水上。”

(9)《焦氏易林》也有“女变男”之异：

阴变为阳，女化作男。治道得通，君臣相承。（《屯》之《离》及《蛊》之《大壮》）

《汉书·五行志》正好引有一条与此相关的《京房易传》：“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京氏与焦氏的说法看起来有所不同，其实是一致的。京房是从反面的角度讲，认为阴变为阳，女化作男，是阴胜的表现，而焦延寿是从正面的角度讲，认为如果邪阴之势力化作正阳之气，其表现就是“治道得通，君臣相承”。

从以上所引九则京氏与焦氏说法相关之处可以看出：一，京房在作《京房易传》之前，已经听焦延寿讲过与《焦氏易林》相关的内容；二，由于《焦氏易林》针对的是百姓的生活日用，所以《焦氏易林》含有人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林林总总的吉凶悔吝之事，其中既有正面之事，亦有反面之事，而《京房易传》针对的是灾异之事，旨在“谴告”人君返回正道，所以多反面之事，因而我们不可能从《焦氏易林》找出与《京房易传》一一对应之关系；三，由于《汉书·五行志》以《尚书·洪范》中的部分说法为框架，受文体与表达方式的约束，《汉书·五行志》只能引用与此相关的一部分《京房易传》之说法，因而我们据《汉书·五行志》只能看到《京房易传》的一部分内容。但不管怎样，从以上所列九条《易林》与《京房易传》之关联，亦可以看出焦延寿、京房师徒思想之一致性，亦可从一个侧面证明今传《焦氏易林》确为焦延寿所作；四，《汉书·五行志》及此后各朝史书《五行志》之所以多引用《京房易传》而不引用《焦氏易林》，是因为《焦氏易林》

是一种百科全书似的占筮手册,而不是专门针对灾异而发之书,而《京房易传》则是专门针对阴阳灾异之书,且有明显的以有道之贤人治国的理念在内。

## 第五节 京房八宫卦说研究

我们在上一节对《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之易学思想进行了探讨。而今唯有《京氏易传》三卷流传于世,是我们今天研究京氏易学的主要依据,我在此据《京氏易传》对京氏易学的思想进行梳理与挖掘。在《京氏易传》中,京房以一种独特的思维理路建构了后世所说的八宫卦序,其中蕴含着纳甲、纳支、飞伏、互体、建候、积算、气候分数、五行、五星、二十八宿入卦诸说。这一切都被纳入八宫卦中,形成了一个庞杂而有序的宇宙图景。从哲理上来讲,这一图景所彰显的乃是阴阳二气的对待与流行。

### 一、八宫卦说中的阴阳对待与流行理念

#### (1) 八宫卦说中的阴阳对待理念

京氏易学将天干、地支、五行、五星、二十八宿等纳入八宫卦,构画了一幅阴阳相荡、生生不息的动态的宇宙图景。但这种动态性和有序性首先是通过静态的阴阳对待来展示的。

首先,八宫卦序便是一幅宏观的阴阳对待图。京房将六十四卦分布于八宫,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八纯卦各领一宫,每宫由八个卦组成,兹根据三国时陆绩所注《京氏易传》所述卦序之旨列八宫卦图如下:

八宫 世魂	乾䷀	震䷲	坎䷜	艮䷳	坤䷁	巽䷸	离䷄	兑䷹
一世	姤䷫	豫䷏	节䷻	贲䷖	复䷗	小畜䷈	旅䷷	困䷮
二世	遁䷗	解䷧	屯䷂	大畜䷙	临䷒	家人䷤	鼎䷱	萃䷬
三世	否䷋	恒䷟	既济䷾	损䷨	泰䷊	益䷩	未济䷿	咸䷞
四世	观䷓	升䷭	革䷰	睽䷥	大壮䷡	无妄䷘	蒙䷃	蹇䷦
五世	剥䷖	井䷯	丰䷶	履䷉	夬䷪	噬嗑䷔	涣䷺	谦䷎
游魂	晋䷢	大过䷛	明夷䷣	中孚䷼	需䷄	颐䷚	讼䷅	小过䷽
归魂	大有䷍	随䷐	师䷆	渐䷴	比䷇	蛊䷑	同人䷌	归妹䷵

显然，八宫卦以乾坤为纲，以乾坤所生之六子为目，重在突显乾坤在万物生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系辞传》云：“天地絪縕，万物化醇”，“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系辞传》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昼夜之道”等皆与此旨相通。京氏在建构其八宫卦序时即是基于这一点，体现的是《京氏易传》所谓“乾坤者，阴阳之根本”的理念。然后，由乾卦及其生出的分别代表长男、中男、少男三个阳卦震、坎、艮组成阳性的一极；由坤卦及其生出的分别代表长女、中女、少女的三个阴卦巽、离、兑组成阴性的一极。可见，八宫卦序在此是基于“乾坤生六子”的理念来安排的，即《说卦传》所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基于此，京房将纯阳之卦乾卦作为阳极的一面，将纯阴之卦坤卦作为阴极的一面，乾坤两卦及其他由阴阳相荡而形成的六十二卦则按一定原则划归到八个宫中。这就形成了一个



以乾坤为两极的大的阴阳对待。

在京氏易中,阴阳二气的对待深入于其各种学说。于其纳甲体系,《京氏易传·卷下》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阴阳、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显然,京氏的纳甲原则为阳卦配阳干,阴卦配阴干,即:

阳卦	乾震坎艮	阴卦	坤巽离兑
阳干	甲庚戊丙	阴干	乙辛己丁
	壬		癸

除纳甲之外,京房还把十二支纳入八宫卦中。广义的纳甲也包含纳支。纳支遵循的原则同纳甲一样,仍是阳卦纳阳支,阴卦纳阴支。对于其内在机制,卢央认为,乃是据历法及隔八生律法纳入。具体为:从历法来看,冬至所在之月或建子之月为一年之始,而十二律以黄钟为首,黄钟又自冬至始,所以黄钟当乾之初九,纳支为子。此起点确立之后,京氏又据音律之三分损益法,按隔八生律之则,纳其他各支。隔八生律法即:律起于黄钟子位当乾初九爻,再从子位起算,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位,这时为林钟未位,当坤初六爻,于时为六月。再从未位算起,历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八位,这时律为泰簇寅位,当乾九二爻,时为正月。如此隔八相生,得出全部十二律及其支位所对应的爻位。这样,乾从初九到上九分别纳子、寅、辰、午、申、戌六支;而坤卦是阴卦,据“天道左旋,地道右旋”之原则,应右旋即与六阳律相反之方向运转,最后得出坤卦从初爻至上爻分别纳未、巳、卯、丑、亥、酉六支。

其余六卦各爻配支的法则,按律历之相配,“十一月和五月为子午,阳支配阳卦各爻,故配长男震……与乾卦同。十二月和六月为丑未,阴支配阴卦,故长女巽卦当之。……接着正月和七

月当寅和申,又纳于阳卦,则以中男坎配之。……再接着二月八月为卯和酉,则以中女离配之。……然后是三月和九月,当辰和戌,以少男艮卦配之。……最后是四月和十月为巳和亥,以少女兑卦配之”<sup>①</sup>。据《汉书·艺文志》,京房“好钟律,知音声……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由此可证,京氏确有可能据历法及生律法将十二支纳入卦体中。

综合上述,京氏八卦干支排纳可列图如下:

	乾	震	坎	艮
上爻	壬戌一	庚戌--	戊子--	丙寅一
五爻	壬申一	庚申--	戊戌一	丙子--
四爻	壬午一	庚午一	戊申--	丙戌--
三爻	甲辰一	庚辰--	戊午--	丙申一
二爻	甲寅一	庚寅--	戊辰一	丙午--
初爻	甲子一	庚子一	戊寅--	丙辰--
	坤	巽	离	兑
上爻	癸酉--	辛卯一	己巳一	丁未--
五爻	癸亥--	辛巳一	己未--	丁酉一
四爻	癸丑--	辛未--	己酉一	丁亥一
三爻	乙卯--	辛酉一	己亥一	丁丑--
二爻	乙巳--	辛亥一	己丑--	丁卯一
初爻	乙未--	辛丑--	己卯一	丁巳一

汉代之前,人们已将音乐看作阴阳和合的产物。如《乐记》云:“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地气相荡,鼓之以雷霆,奋

<sup>①</sup>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7 - 129 页。

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显然是受《系辞传》宇宙生成论的影响并把“乐”作为天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的产物，将音律节奏视为阴阳升降的表征。《管子·地员》与《吕氏春秋》皆对音律之“三分损益”及“隔八生律”法进行过描述。如此，京氏便将天干地支按其隐含的阴阳属性细致入微地纳入到其八宫卦序中。这样，纳甲说的背后乃是一幅阴阳对待、流行图。

京氏八宫卦中的建候、积算体系也反映出一种阴阳对待关系。因为我们在下文有专论，此不赘述。

京氏八宫卦中之飞伏说亦明显地显示出阴阳二气的对待关系。飞伏有卦之飞伏，有爻之飞伏，此处我们只讨论八纯卦之飞伏。对于八宫卦来说，阴阳相对者互为飞伏，即虞翻所谓旁通。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皆互为飞伏。《京氏易传·坤》云：“阴凝感，与乾相纳。”此已明示乾坤、阴阳的相涵相纳关系。两个互为飞伏的卦之间互相对待、互相涵摄，一显一隐，显隐无间。《京氏易传·乾》云：“六位纯阳，阴象在中。”即是说，乾卦的显象是纯阳之象，而其中隐含的则是纯阴坤卦之象。因而京氏的飞伏说主要说明的是阴阳的对待与流行关系。显象的背后是与其相对待的隐象。二者随着爻变的进行而流通不已，形象地显示出阴与阳即对待又流行的关系。

## (2) 八宫卦说中的阴阳流行理念

京房通过八宫卦序彰显出一幅阴阳二气相互对待的图景，而他构画此静态图景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生生不息的阴阳流行图景。《系辞传》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京氏将阴阳的对待关系分布于八宫卦之纳甲、飞伏、建候、积算诸说中，旨在彰显《易》之“一阴一阳”之

道,将“一阴一阳”之《易》道逐步落实到具体之处,从而从具体处阐发《易》的阴阳流行关系,体现《易》之生生不息之精神,即如京氏所云:“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相荡。二气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京氏易传·卷下》)

京氏的八宫卦序从表面上来看,是一幅静态的阴阳对待图。在京氏看来,每一宫的本宫卦或八纯卦,决定着该宫诸卦的原本卦体的五行属性,然后再根据每一爻所纳地支的五行属性确定六亲关系。如乾宫本宫卦乾卦从初爻至上爻的纳支分别为子、寅、辰、午、申、戌,而乾宫属金,故初爻至上爻的六亲分别是子孙、妻财、父母、官鬼、兄弟、父母。<sup>①</sup>这种阴阳相互对待的关系确定之后,每一本宫卦从初爻变起,实现爻的阴阳转变。如乾卦(䷀)第一爻变则变成姤卦(䷫)。因此一变,则本宫乾卦原来的阴阳对待或暂时的平衡关系即被打破,其所纳的干支、建候、积算、气候分数、星宿等都要随之作相应变化。如乾卦变成姤以后,变出的姤卦从初爻至上爻所纳的干支分别变为辛丑、辛亥、辛酉、壬午、壬申、壬戌,原来乾卦所纳的五星则由镇星变为太白,所纳星宿则由参宿变为井宿,建候则由从甲子至己巳变为从庚午至乙亥,积算也相应地由从己巳至戊辰变为从乙亥至甲戌,六亲从初爻至上爻也相应地变为父母、子孙、兄弟、官鬼、兄弟、父母等等。这可以说是因一变而引起万变。在京房看来,这种变化是“阴荡阳”或“阳荡阴”的结果,或者是阴阳积气变化的结果。如京氏于《姤》卦云:“巽积阴入阳。”即指明此一系列变化

① 这是以乾金为“我”为出发点,根据五行生克来定六亲之关系。“我”生者为“子孙”,乾为金,子为水,所以初爻为子孙爻;“我”克者为“妻财”;生“我”者为“父母”;克“我”者为“官鬼”;同“我”者为兄弟。

是由乾卦初爻由阳变阴所造成的。这就是阴阳之流行。显然，京房把整个八宫卦看作整个宇宙之存在模式，每一宫又是一种具有其五行属性的存在模式，每一卦则又是某种具有五行、干支、建候、积算、五星、星宿之属性的存在模式，每一爻则是具有阴或阳及某种五行、干支、建候、积算之属性的存在模式。只要有阴阳之间的流行变化，以上诸因素皆会因之而产生变化。

《京氏易传·姤》云：“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这为主的一爻就是引起乾卦变为该卦的一爻。因此，对于该卦来说，这一爻便是关键的一爻，京氏称其为“世爻”，与该爻相隔两位之爻为应爻。世爻多为一卦之卦主。这就是所谓的“卦主说”。在《京氏易传》中，亦寓有以少为多之主，以少为多之宗之义在。如京氏于《剥》卦(䷖)云：“成剥之义，出于上九。”剥卦为一阳五阴之卦，只有上九为一阳爻，故以上九爻为此卦之主；于《大有》卦(䷍)云：“少者为多之所宗。”显然，京氏在此是以大有卦唯一的一个阴爻——六五爻为该卦之主；于《谦》卦(䷎)云：“一阳居内卦之上，为谦之主。”这显然是以此卦唯一的阳爻——九三爻为卦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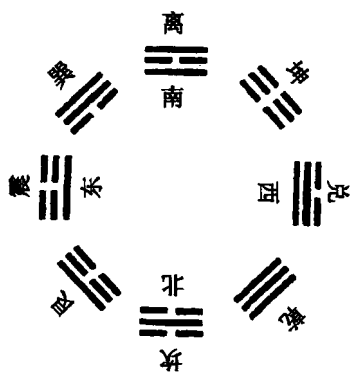
在讨论京氏易的阴阳流行关系时，我们还必须谈一下京氏易中的天、地、人、鬼四易之说，因为该说从大的框架上正可以说明阴阳二气的流行变化。《京氏易传·卷下》云：“有四易，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京氏在此既借鉴了《易传》的“三才”之说，又借用了《易传》的游魂说。（《系辞传》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从本宫卦初爻变起，如果某卦初爻变后，上下卦皆变为相同之卦即成为一个八纯卦，这就是一世卦，如姤卦(䷫)初爻阴爻(--)变为阳爻(—)之后即变为上下卦相同之纯乾(䷀)之卦，这样，姤卦就是乾宫一世卦。同样，如果某卦一至二

爻变后上下卦变为相同之某纯卦,则此卦就是二世卦,如大畜卦(䷙)初爻及二爻变后变为上下皆相同之艮卦(䷳),大畜卦就是艮宫二世卦。……如果从初爻至五爻变后为上下皆相同之卦,则为五世卦。变化不能至极,因为如果上爻变了以后,就变成了与本宫卦阴阳相对的另一卦,则在上爻不变的情况下,从五爻返回至四爻变,亦即恢复本宫卦中的第四卦爻象,即为游魂卦,如晋卦(䷢)从初爻变至五爻后上下卦仍不是相同之卦,则第四爻再变回原本之阳爻之时,上下卦才皆变为乾卦(䷀),那么,晋卦就是乾宫之游魂卦。游魂卦下卦恢复为本宫的下卦象,即为归魂卦,如大有卦(䷍)从初至五爻变后,上下卦仍不能变为相同之卦,第四爻变为原本之爻时还是不能变为上下相同之卦,只有下三爻变为原本之爻时,才变为上下卦相同之乾卦,那么,大有卦即是乾宫之归魂卦。

这种从一世至归魂的卦变规律,反映了同一卦体中的阴阳流行之次递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系反映到乾宫和坤宫的游魂、归魂卦上,则突显的是一种阴阳二气的大化流行,从而也可以看出乾坤两卦的卦变规律与十二消息卦间递变规律之间的联系。《京氏易传·卷下》云:“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而乾宫游、归魂卦之上卦皆为离卦,坤宫游、归魂卦之上卦皆为坎卦。这正说明了荀爽为何在注《乾·彖》“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云:“乾起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故曰‘大明终始’也。六爻随时而成乾。”<sup>①</sup>依十二消息卦卦气说,从复卦(䷗)历临(䷒)、泰(䷊)、大壮(䷡)、夬(䷪)至乾卦(䷀),是一个阳息阴消

①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5 年版,第 91 页。

的过程,而复卦符示十一月子(在式图中位于后世所说的“后天八卦”图之“坎”位),阳息至四月巳火位则成乾体;从姤卦(䷫)历遁(䷗)、否(䷋)、观(䷓)、剥(䷖)至坤卦(䷁)是一个阴息阳消的过程,对应月份是从五月午(在式图中位于“后天八卦”图之离位)起,至十月亥位则坤体就。这也正是《京氏易传·卷下》“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所昭示的阴阳流行的《易》道变化观。“后天八卦”中的离坎两位,正对应后世所谓“先天八卦”的乾坤两位。从“后天八卦”的坎位左行至离位,是在平面上由阴极至阳极的过程,而从“先天八卦”中的震卦至乾卦,则是阳气从“潜藏”至“亢极”的过程,是阳气在竖面上由微至极的过程;同样,从“后天八卦”方位的离位右行至坎位,是平面上的阳极至阴极的过程,而由“先天八卦”中的巽卦至坤卦,则是阴气在竖面上的由微至极的过程。横面与竖面的阴阳流转同时进行,形成一幅立体的、涵摄时空的、动变不息的阴阳对待流行图。京房以此方式构画了一幅“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并能“知幽明之故”的宇宙图景。八宫卦所纳



后天八卦图



先天八卦图

的干支、星宿、五星等也随之成为体现《易》道的有机组成部分。

京房虽未提出系统的卦变说,但后世系统的卦变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京氏易的启发。从爻变到卦变是京房建构八宫卦的基本方法。从一世卦至归魂卦,由爻变逐次变化形成的各卦在隐含本宫卦五行属性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由不同于本宫纯卦的干支、星宿、建候、积算等因素的卦体,从而体现出由一爻之阴阳变化而造成整个卦体的变化。这种阴阳流行变化反映了部分变化与整体变化之关系。部分变化或量变是造成整体变化或质变的先决条件。从初爻变至五爻再返回至四爻变而变成游魂卦,下体复归本宫卦,则为归魂卦。如此从一世至归魂七卦的显象虽各不相同,但它们的隐象除了其所伏之卦以外,仍以本宫卦为基础,而陆绩更注重世爻之隐象。世爻之隐象即本宫卦与世爻同位之爻所纳干支,如陆绩注《姤》卦“元世居世”云:“辛丑土,甲子水”,这里的“辛丑土”即指姤卦初爻世爻所纳干支,“甲子水”则指本宫卦乾卦初爻所纳干支;又如他注《否》卦“三公居世”云:“乙卯木,甲辰土”,这里的“乙卯木”指否卦世爻六三爻所纳之干支,“甲辰土”则是本宫卦乾卦九三爻所纳之干支。其它卦皆仿此。如此则在阴阳流行的过程中,仍时时存在显与隐之间的阴阳对待关系。后世流行的“纳甲筮法”在所得卦六亲不全或用神不上卦时,便从该卦之本宫卦中寻找,即是继承和发展了陆注京氏易的爻之飞伏说。

若本宫卦从初爻至上爻全变,则变成与此本宫卦阴阳相对的另一宫的本宫卦,即虞翻所说的与之旁通之卦。前文已述,京氏八宫卦序是以乾坤两纯阳、纯阴之卦为统领的,在从乾到坤的阴阳流行中,乾宫先变至震宫,再变至坎宫,再变至艮宫,而不直接从乾宫变入坤宫。因而在京氏看来,这种阴阳的彻底转换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乾宫逐次变至艮宫归魂卦《渐》卦才“终极阳道”，“阳极则阴生，柔道进也，降入坤宫八卦”。（《京氏易传·渐》）同样，至兑宫归魂卦《归妹》卦，京氏云：“阴阳运动，适当何爻？或阴或阳，或柔或刚，升降六位，非取一也。”徐昂注曰：“八宫六十四卦虽以兑终，而终非止也。终而复始，易之道在此。三五上阴变为阳，回转成《乾》卦。此与阳宫终止之卦，艮宫《渐》卦三五上阳变为阴，降入坤卦，其例相同。”<sup>①</sup>另外，《归妹》卦之建候、积算与《乾》卦之建候、积算相同，都是“建始甲子至己巳，积算起己巳至戊辰”，（只是乾卦建候从初爻起）这正体现了京氏八宫相续、循环无端之意。此证京氏八宫卦序虽无今本卦序以《未济》为最后一卦寓示“物不可穷也，故受之未济”之意，（《序卦传》）但八宫卦序亦暗含阴阳流行、循环无端之旨。

从《京氏易传》可以看出，阴阳二气的流行还通过爻象的变化来体现。乾为纯阳之卦，坤为纯阴之卦，乾坤为阴阳二气流行之门户，阴阳两极之间的彻底变化为乾变为坤或坤变为乾。而作为乾坤及其所生六子之宫内的阴阳变化则是相对独立的。对每一宫来说，从本宫卦始，通过爻变之阴荡阳或阳荡阴，至归魂卦即形成一个小的循环，或者说是阴阳二气在该宫内的流行。如对乾宫八卦来说，本宫卦《乾》卦变入一世《姤》卦时，京氏说“阳极阴生”；《姤》卦变入《遁》卦时说“五行升降，以时消息，阴荡阳降入《遁》”；至归魂《大有》卦云：“阴阳交错，万物通焉；阴退阳伏，返本也。乾象分荡，八卦入大有终也。乾生三男，次入震宫八卦。”因而至《大有》卦，乾宫八卦内部之阴阳相荡已完

<sup>①</sup> 徐昂：《京氏易传笺·归妹》，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排印本，第145页。

成,所以从《大有》卦至震宫本宫卦《震》卦即不再言“阴荡阳”或“阳荡阴”了。

在每一宫的卦变过程中,卦体之阴阳转换也伴随着爻变而进行。如坤宫一世卦《复》卦转入二世卦《临》卦时,京氏于《复》卦云:“阴来阳去,气渐隆,火之<sup>①</sup>入地泽临卦。”而于《临》卦则云:“震入兑,二阳刚,本体阴柔降入《临》。”此二阳刚显然指初、二两阳爻。从阳爻数量来说,内卦兑比其所由来之震多一阳爻,但震卦为阳体,兑卦为阴体,因而对内卦来说,并不因其比震多一阳而更刚,反而因多一阳爻而成为柔体。其实这是对《系辞传》“阳一君而二民,阴二君而一民,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说的继承。又,京房还非常重视互体之象。如他于《蛊》卦(䷑)云:“内互悦而动”即指从二爻至五爻互出归妹卦(䷵)来。如此则在每一卦体中又可以增加更多新的卦体,从而从细微处展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一消一息、阴阴相荡、生生不息的阴阳二气的流行机制。

另外,在由爻变引起的卦变过程中,除建候积算随卦变发生变化外,气候分数也随着卦变而盈虚消长。《京氏易传》于各卦多提及分气候三十六或分气候二十八。徐昂于此云:“凡建始阳刚而历十二节者,分气候三十六;建始阴柔而历十节者,分气候二十八。”<sup>②</sup>如《姤》卦建始庚午,为阳干支,则气候分数为三十六,而《遁》卦建始辛未,为阴干支,则气候分数为二十八。其余卦皆仿此。如乾卦建始甲子至己巳,按节气来说,是由十一月节大雪至四月中小满共十二节;而遁卦建始辛未至丙子,按节气由

① 徐昂认为“火之”二字为衍文,见《京氏易传笺·复》。

② 徐昂:《京氏易传笺·气候分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排印本,第204页。

六月中大暑至十一月节大雪，历十节。就气候分数来说，每一卦都蕴含着该卦所对应的气候分数，或三十六，或二十八。每一卦所内蕴的节气也就有了盈虚之分。这样，由爻变而导致的卦变也致使气候分数发生了变化。可见，京房已把每一卦作为一种节气度数的象征，阴阳二气的盈虚变化皆在其中。而导致这种气候度数产生盈虚消长变化的正是阴阳二气的互荡和流行，即如京氏所云：“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京氏易传·卷下》）这显然是对《易传》宇宙生成论的进一步落实与发展。

《周易集解》诸家采用八宫、世应等说释《易》者以荀爽、《九家易》、干宝为胜。荀爽注《恒·彖》“恒亨，利贞，久于其道也”曰：“恒，震世也，巽来乘之，阴阳会合，故‘通无咎’。长男在上，长妇在下，夫妇道正，故‘利贞，久于其道也’。”恒卦(䷟)为震宫三世卦，故曰“震世”。震由一世变至三世则下体由震(䷲)而变成巽(䷸)，故说“巽来乘之”。《九家易》注《系辞下传》“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时云：“夬本坤世，下有伏坤，书之象也。上又见乾，契之象也。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夬，决也，取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其事。契，刻也。大壮进而成夬，金决竹木为书契象，故法夬而作书契矣。”依八宫卦说，夬(䷪)为坤宫五世卦，故云“夬本坤世”，夬下体乾卦(䷀)伏坤(䷁)（此处亦采“飞伏说”），故云“下有伏坤”，“上又见乾”。大壮(䷡)为坤宫四世卦，阳进而成夬，故曰“大壮阳进而成夬”。据八宫说注《易》最多者当属“留思京房易学”的东晋易学家干宝（？～336年）。干宝注《噬嗑》初九爻辞“履校灭趾”云：“履校，贯械也，初居刚躁之家，体贪狼之性，以震掩巽，强暴之男也。行侵陵之罪，以陷‘履校’之刑。”噬嗑

(䷧)为巽宫五世卦，噬嗑下卦为震卦，震为躁，为长子，又在巽宫，故有“初居刚躁之家”、“以震掩巽，强暴之男也”之说。干宝在注《讼》卦(䷅)卦辞“有孚”时云：“讼，离之游魂也。离为戈兵，此天气将刑杀，圣人将用师之卦也。”讼为离宫游魂卦，离又为阴之始，依《京氏易传·卷下》“虎刑五月午在离卦”之说，处于离卦之午月为“天气将刑杀”。

## 二、京氏建候、积算的建构原则

在八宫卦说中，建候、积算也是重要的内容。对于建候、积算之义，徐昂有云：

建月六辰，分配六爻，建始一辰受气，中间经历四辰皆积气，末一辰成象立体。每爻历一月两节。凡由某月节至某月中者为十二节，由某月中至某月节者为十节。<sup>①</sup>

徐昂下了很大工夫研究《京氏易传》，著有《京氏易传笺》一书。但徐昂认为京房于有些宫、卦，特别是巽宫、兑宫之建候、积算错乱，而以其个人之意更订之。卢央先生也认为建候、积算“在京易中这是较为混乱的一部分”<sup>②</sup>。郭彧先生又据自己的揣测，认为《京氏易传》关于建候、积算部分文字颠倒错乱，认为是在传抄的过程中有许多错误所致。<sup>③</sup>笔者在对京氏易建候、积算说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他们的说法及随意改动京氏建候、积算排列之做法甚为不妥。尽管京氏建候、积算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

① 徐昂：《京氏易传笺·建候积算》，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排印本，第175页。

②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③ 郭彧：《〈京氏易传〉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8-36页。

问题且其中确有明显的错误之处,我们仍能够看出其建候积算之较强的规律性,即京房建候、积算仍是依阴阳二气的对待与流行观念及隔八生律法而建构。

黄宗羲在其《易学象数论》中概括京易建候、积算之规律云:

曰“建”,以爻直月,从世起建,布于六位(惟乾坎从初爻起)。乾起甲子,坤起甲午,一卦凡六月也。曰“积算”,以爻直日,从建所止起日。

今据《京氏易传》及陆绩注,列八宫六十四卦建候之表如下:

建候 世游归	八宫六十四卦							
上世	乾 甲子-己巳	震 丙子-辛巳	坎 戊寅-癸未	艮 庚寅-乙未	坤 甲午-己亥	巽 辛丑-丙午	离 戊申-癸丑	兑 乙卯-庚申
一世	姤 庚午-乙亥	豫 丁丑-壬午	节 甲申-己丑	贲 辛卯-丙申	复 乙未-庚子	小畜 壬寅-丁未	旅 己酉-甲寅	困 丙辰-辛酉
二世	遁 辛未-丙子	解 戊寅-癸未	屯 乙酉-庚寅	大畜 壬辰-丁酉	临 丙申-辛丑	家人 癸卯-戊申	鼎 庚戌-乙卯	萃* 戊寅-癸未
三世	否 壬申-丁丑	恒 己卯-甲申	既济 丙戌-辛卯	损 癸巳-戊戌	泰 丁酉-壬寅	益 甲辰-己酉	未济 辛亥-丙辰	咸 戊午-癸亥
四世	观 癸酉-戊寅	升 庚辰-乙酉	革 丁亥-壬辰	睽 甲午-己亥	大壮 戊戌-癸卯	无妄 乙巳-庚戌	蒙 壬子-丁巳	蹇 己未-甲子
五世	剥 甲戌-己卯	井 辛巳-丙戌	丰 戊子-癸巳	履 乙未-庚子	夬 己亥-甲辰	噬嗑 丙午-辛亥	涣 癸丑-戊午	谦 庚申-乙丑
游魂	晋 己卯-甲申	大过 丙戌-辛卯	明夷 癸巳-戊戌	中孚 庚子-乙巳	需 甲辰-己酉	颐 辛亥-丙辰	讼 戊午-癸亥	小过 乙丑-庚午
归魂	大有 戊寅-癸未	随 乙酉-庚寅	师 壬辰-丁酉	渐 己亥-甲辰	比 癸卯-戊申	蛊 庚戌-乙卯	同人 丁巳-壬戌	归妹 甲子-己巳

注: \* 萃卦的建候与积算属明显错误,应为:建始丁巳至壬戌,积算起壬戌至辛酉。

通过此表,我们可以看出京氏建候的阴阳顺逆排布规律:乾宫本宫卦《乾》卦“建子起潜龙,建巳至极主亢位”<sup>①</sup>;至震宫本宫卦《震》卦,建“丙子至辛巳”;坎宫本宫卦《坎》卦“建戊寅至癸未”<sup>②</sup>;艮宫本宫卦《艮》卦建“庚寅至乙未”。至坤宫本宫卦《坤》卦则“建始甲午至己亥”;巽宫本宫卦《巽》卦“建始辛丑至丙午”;离宫本宫卦《离》卦“建始戊申至癸丑”;兑宫本宫卦《兑》卦“建始乙卯至庚申”。

显然,代表阳极的纯阳之卦乾卦建始甲子(坎),代表阴极的纯阴之卦坤卦建始甲午(离),遵循的乃是“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的原则,(《京氏易传·卷下》)体现着“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子)离(午)者,阴阳之性命”的阴阳对待本旨。(《京氏易传·卷下》)其他阳宫本宫卦或阴宫本宫卦之间的建候之排列则仍遵循着音律之隔八生律之阴阳升降、对待原则:从乾宫本宫卦乾卦世爻所建己巳历八位经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至丙子,为震宫本宫卦震卦建始;从丙子数八位,历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至癸未,为坎宫本宫卦世爻所建<sup>③</sup>;从癸未数,历八位经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

---

① 很明显,这是从初爻“潜龙”建始,至上九“亢龙”之位建末,另一证据是该宫一世《姤》卦“建庚午至乙亥”,按常则应为建乙丑至庚午,所以这里的《姤》卦建始是接续《乾》卦上爻即世爻所建己巳而来。所以黄宗羲称乾从初爻建起。徐昂说乾卦是从上爻世爻建始,五爻建末,非也。

② 按常则,坎宫一世卦《节》卦应接续《坎》卦建候而来,即应为建“己卯至甲申”,而实际上《节》卦却是“建起甲申至己丑”,因而其建始乃是接续《坎》卦建末即世爻所建“癸未”而来,故黄宗羲称“坎从初爻起”,如此,本宫一世建始方能接续本宫卦上世所建而来。

③ 这样,坎卦上爻即世爻所建为癸未,而初爻所建就是戊寅。黄宗羲称坎卦建候从初爻起,甚是。

亥、戊子、己丑至庚寅，为艮宫本宫卦艮卦之建始。自坤宫本宫卦坤卦建始甲午数起，历八位经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至辛丑，乃巽宫本宫卦巽卦之建始；从辛丑数八位历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至戊申，为离宫本宫卦离卦之建始；从戊申数八位，历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至乙卯，为兑宫本宫卦兑卦之建始。可见，每宫本宫卦世爻所建之间极有规律，而且是按照“子午分行”、隔八生律的阴阳对待模式进行排布的。这样，乾震坎艮四阳宫之一世卦建始也遵循这一原则，二世至归魂卦建始亦如此；坤巽离兑四阴宫间的一世卦建始也遵循这一原则，二世至归魂卦亦复如此。

因积算是自每卦的建末始，历六十甲子，如：乾卦建候从甲子至己巳，积算则“起己巳火至戊辰土，周而复始”。所以积算也相应地遵循这一原则。

至于京房是如何把建候、积算用于占测灾异的，因我们在《汉书·五行志》及《京房传》中找不到相关的例子，所以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不管怎样，京房关于建候、积算所具有的上述规律是确凿无疑的。

徐昂将巽宫和兑宫建候、积算重新以自己之臆测进行排列，郭彧亦自行打乱京氏原本的建候、积算之序，虽自持有理，但却改变了京氏之本意，笔者以为不妥。

### 三、京氏“世卦起月例”

京氏八宫说中还有“世卦起月例”之说。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在京房看来，世爻在每一卦中多为卦主，由此可知世爻在每一卦中的重要性。元人胡一桂称京房有“起月例”之法，清人惠栋在其《易汉学》中称其为“世卦起月例”。胡一桂在《易学启

蒙翼传》“京易起月例”中云：

一世卦阴主五月，一阴在午也；阳主十一月，一阳在子也。二世卦阴主六月，二阴在未也；阳主十二月，二阳在丑也。三世卦阴主七月，三阴在申也；阳主正月，三阳在寅也。四世卦阴主八月，四阴在酉也；阳主二月，四阳在卯也。五世卦阴主九月，五阴在戌也；阳主三月，五阳在辰也。八纯上世阴主十月，六阴在亥也；阳主四月，六阳在巳也。游魂四世，所主与四世卦同。归魂三世，所主与三世卦同。

可见，京房在八宫卦说的大框架内，十分重视世爻的作用，以世爻主月。“世卦起月例”显然受到“十二消息卦”说之影响。所谓“一世卦阴主五月”，乃从十二消息卦卦气说中姤卦(䷫)主五月而来，京氏只是将一世卦为阴爻者皆定为“主五月”。京房从十二消息卦卦气说出发，将消息卦所主之月推至相应的世爻之阴阳相同之卦所主之月，如姤卦(䷫)为一阴之消息卦，为一世卦，为阴，主五月。其他一世卦为阴爻者，如旅(䷷)(离宫一世卦)、困(䷮)(兑宫一世卦)等卦皆主五月。复(䷗)为一阳之消息卦，为一世卦，为阳，主十一月，其他一世为阳爻之卦，如贲(䷖)(艮宫一世卦)、节(䷻)(兑宫一世卦)、小畜(䷈)(巽宫一世卦)等皆主十一月。余可类推。游魂卦世爻在第四爻，故“所主与四世卦同”；归魂卦世爻在第三爻，故“所主与三世卦同”。如此，八宫六十四卦每卦还主一月。这样，“世卦起月例”便将“十二消息卦”与其八宫卦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对“十二消息卦卦气说”的深化与发展，说明京氏“八宫说”亦有卦气的成分在内。可见，京房之八宫说除了上文所说的由爻变而引起卦变所寓示的阴阳对待与流行之义之外，还寓有以十二消息卦卦气说在内的阴阳对待与流行。



在《周易集解》中，干宝曾用“世卦起月例”注《易》。如他在注《蒙》卦(䷃)时云：“蒙者，离宫阴也，世在四，八月之时，降阳布德，荠麦并生，而息来在寅，故蒙于世为八月，于消息为正月卦也。”据八宫卦说，蒙为离宫四世卦，世爻为阴爻。又据“世卦起月例”，“四世卦阴主八月，四阴在酉也”，所以干宝在此说“蒙于世为八月”。

#### 四、京氏纳甲说探源

我们在上文第一部分已讨论过京氏纳甲说的部分内容，我们在此对京氏纳甲机制及其来源作进一步的探讨。所谓纳甲，即是以十天干纳入八卦之中。由于甲为十干之首，故以甲代表十天干，简称“纳甲”，即如宋代易学家朱震在其《汉上易传》卦图中所说：“纳甲何也，曰举甲以该十日也。”如上所述，广义的纳甲亦包含纳支。上文已述，京房纳甲（包括纳支说）是根据阳卦纳阳干支、阴卦纳阴干支的原则纳入卦体，而纳支又是根据“隔八生律”及“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原则纳入卦体的。而据相关资料来看，京氏纳甲说应该有其更早之渊源。

《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命大桡作甲子”，说明在司马迁看来，六十甲子的说法在黄帝时就已经成形并得到实际应用。但《史记》的说法难以得到传世文献的支持，好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正好有一片完整的“六十甲子”，用以纪日，说明“六十甲子”确有其很早的渊源。所谓“六十甲子”就是将十个天干与十二个地支相配，这样配完一轮正好是六十组干支对。六十甲子最初用于纪日，后来又发展为纪年、纪月、纪时。《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有云：“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这是以“六十甲子”纪年的标志，亦说明十干属于天

的系统,所以称为十天干;十二支属于地的系统,所以称为十二地支。因此,“六十甲子”的形成确实应该很早。

那么,干支与《周易》又是何时相结合的呢?刘大钧先生早就指出:

《蛊》卦卦辞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而《巽》卦其爻辞,除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外,又有“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等等……此足证《周易》作者早已将天干纳入其占筮中了。……《革》卦卦辞有“巳日乃孚”,六二爻有“巳日乃革之”……《蛊》《巽》《革》三卦,当依帛书《易经》作《箇》《筭》《勒》于义更胜。因为“箇”乃竹枚,“筭”即衍算,“勒”指具体演算之法,所以这三卦卦爻辞中才出现了“先甲”“后甲”“先庚”“后庚”及“巳日”等,此足以说明古人筮法演算中早已纳入天干地支。<sup>①</sup>

对于“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之解释,《周易集解》引《子夏传》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后甲三日’者,乙丙丁也。”<sup>②</sup>《周易正义》孔颖达将“先甲三日”疏为“辛”日,“后甲三日”疏为“丁”日。《汉书·武帝纪》中亦曾引过“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亦是“先甲三日”作为“辛”日,“后甲三日”作为“丁”日来看待,说明孔颖达之疏是符合汉人对“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理解的。又据《吕氏春秋·十二纪》可知,“辛”日与“丁”日也是举行大的祭祀活动的重大日子。据此我们亦可推论,“先庚三日”亦当指“丁”日,“后庚三日”当指“癸”日。既然以“甲”与“庚”为基点,“甲”日与“庚”日当是比较重要的日子。如据《尚书·

① 刘大钧:《周易概论》(增补本)。成都:巴蜀书社 2008 年版,第 180-181 页。

②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5 年版,第 177 页。

牧誓》，武王伐纣选在甲子日，西周利簋之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的说法，亦可印证这一点；而中国古代把从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作为“伏天”的开始，这种传统在西汉既已有之，应该是从先秦流传而来。由此说明，甲日与庚日在中国古代确是十分重要的日子。这些后来都有可能成为中国古代择日术与算命术的重要参考了。

东晋葛洪(284~364年)所著《抱朴子》曾提到以“五音六属”推人年命之说，葛洪《抱朴子内篇》有云：“案《玉策记》及《开明经》皆以五音六属，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属庚，丑未属辛，寅申属戊，卯酉属己，辰戌属丙，巳亥属丁。”这里所说的是“六属”之说。清人惠栋对此进行解释并推论纳甲之源云：

《抱朴子》曰：“案《玉策记》及《开明经》皆以五音六属，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属庚（原注庚主震，初爻庚子、庚午），丑未属辛（巽初爻辛丑、辛未），寅申属戊（坎初爻戊寅、戊申），卯酉属己（离初爻己卯、己酉），辰戌属丙（艮初爻丙辰、丙戌），巳亥属丁（兑初爻丁巳、丁亥）。”《礼记·月令正义》引《易林》云（今《易林》无之）：“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离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兑主丁巳亥。”案：《玉策记》、《开明经》皆周秦时书，京氏之说本之焦氏，焦氏又得之周秦以来先师之所传，不始于汉也。<sup>①</sup>

惠栋的说法很有道理。“五音”指宫、商、角、徵、羽。《抱朴子》还将五音与数及五行属性相配应：“一言得之者，宫与土也；三言得之者，徵与火也；五言得之者羽与水也；七言得之者，商与金

① [清]惠栋：《易汉学·卷四》，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汇文轩刊本影印本，第100页。

也；九言得之者，角与木也。”简言之，宫属土，其数为一；徵属火，其数为三；羽属水，其数为五；商属金，其数为七；角属木，其数为九。古人在天干地支的原始五行（即甲乙属木，丙丁属火，戊己属土，庚辛属金，壬癸属水；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亥子属水，辰未戌丑属土）之外，还根据“五音六属”推知某干支纪年所属五行之属性亦即某年生人之年命，即所谓“纳音五行”。如甲子年，根据“六属”，子属庚，从甲属至庚，历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天干，七数属于商音，五行属金，所以甲子年的纳音五行即属金，甲子年出生的人即属于金命人。又如丙寅年，根据“六属”，寅属戊，从丙数至戊，历丙丁戊，三个天干，三数属于徵音，五行属火，所以丙寅年的纳音五行即属火，丙寅年出生的人即属于火命人。这就是所谓的“以五音六属，知人年命之所在”。显而易见，京房在其纳甲体系中，采纳的是“六属”之说，具体为：子午属庚，即将庚子配对纳入震卦初爻；丑未属辛，即将辛丑配对纳入巽卦初爻；寅申属戊，即将戊寅配对纳入坎卦初爻；卯酉属己，即将己卯配对纳入离卦初爻；辰戌属丙，即将丙辰配对纳入艮卦初爻；巳亥属丁，即将丁巳配对纳入兑卦初爻。前文已述，京氏八宫卦纳支是以历法及隔八生律法纳入的<sup>①</sup>，而与各卦初爻所纳之支相配之天干则与“五音六属”说相符。至于为何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项安世说旨在“包括首尾，则天地父母之道也”<sup>②</sup>，笔者赞同他的这一看法。李淳风亦据以上因素概

① 从京氏建候、积算亦以“隔八生律”的原则建构来看，京房对“隔八生律”说确实是情有独钟，从而也反过来证明，“隔八生律”确是京氏纳支的一项重要原则。

② [清]惠栋：《易汉学·卷四》，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汇文轩刊本影印本，第102页。

括京氏纳甲的建构原则如下：

乾主甲子壬午，甲为阳日之始，壬为阳日之终。子为阳辰之始，午为阳辰之终。

坤主乙未癸丑，乙为阴日之始，癸为阴日之终。丑为阴辰之始，未为阴辰之终。

震主庚子庚午，震为长男，即乾之初九。甲对于庚，故震主庚；以父授子，故主子午，与父同也。

巽主辛丑辛未，巽为长女，即坤之初六。乙与辛对，故巽主辛；以母授女，故主丑未，同于母也。

坎主戊寅戊申，坎为中男，故主于中辰。

离主己卯己酉，离为中女，亦主于中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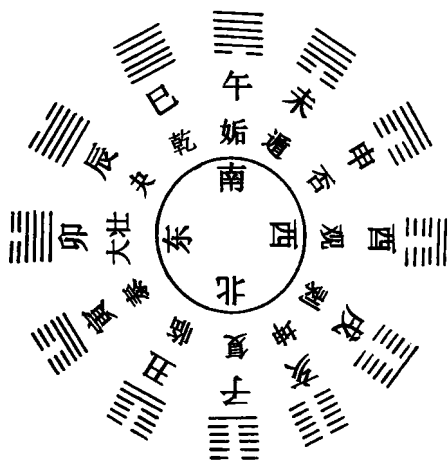
艮主丙辰丙戌，艮为少男，乾上爻主壬对丙，用丙辰丙戌是第五配。

兑主丁巳丁亥，兑为少女，坤上爻主癸对丁，用丁巳丁亥乃第六配。<sup>①</sup>

李淳风总结的这些原则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十分重甲日与庚日，那么把甲与乾父相配，把庚与震长子相配，是容易被人接受的。如果把十二支按其所属方位放在一圆图中来看，亦可以作如下之解释：依据历法及音律，冬至所在之月为“一阳来复”，对应之律为黄钟，而乾卦又是父卦，所以乾卦初爻纳子；依隔八生律法，坤卦纳未；震为长子，长子继嗣，所以震卦亦纳子；巽为长女，巽不能继母，故不能像坤卦一样初爻纳未，而丑为阴之始，故巽卦初爻纳丑；寅为阳支之第二支，因为据

① [清]惠栋：《易汉学·卷四》，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汇文轩刊本影印本，第97-100页。

《说卦传》乾坤生六子之说，坎为中男，故坎卦初爻纳寅；卯为阴支之第二支，离为中女，故离卦初爻纳卯；辰为阳支第三支，艮为少男，故艮卦初爻纳辰；巳为阴支第三支，兑为少女，故兑卦初爻纳巳。各卦初爻确定之后，再根据“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原则，阳卦自初爻始，按顺时针方向纳其他阳支；阴卦自初爻始，按逆时针方向纳其他各支。这样，八个卦的纳支体系就完成了。由此可以看出，京氏纳甲说亦可能受到古代式图观念的影响。



十二消息卦卦气及十二地支配位图

另外，“五音六属”或许与“五官六府”说有一定联系。帛书《易传·要》篇曾谈到“五官六府”：“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左传》已提及“五官”之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载：

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

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

这里的“五官”指五行之官。从此段记载可以看出，“五官是否称职，对万物的盛衰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sup>①</sup>。《国语·楚语下》亦有：“古者，民、神不杂……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职，不相乱也。”可见，“五官”之说，渊源甚古。在此我们还未见到将“五官”与“六府”合称之说。至《管子·五行篇》则云：“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也。”说明“五音六律”与“五官六府”有内在联系。《礼记·曲礼下》则有：“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说明这里的“五官六府”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职。

《淮南子·天文训》对“五官六府”却有另一种解释：“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何谓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在此，五官已与五行、五方相配应，而“六府”则发展为六对相冲之地支。这也是一种式图观念，表现出阴阳之间的对待。这种相冲说在《淮南子·时则训》中表现为：“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这段话正好表明了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子午、丑未每组相冲之地支之间的即相对又相合之关系。这六组相对冲之干支，亦是“五音六属”中之“六属”所用之对支。在京氏纳甲体系中，八纯卦之初四、二五、三上爻所纳地支间也正

<sup>①</sup> 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 页。

好是由这六对对冲之支组成。如：乾卦初四、二五、三上之爻所纳地支分别为子午、寅申、辰戌三对对冲之支，离卦初四、二五、三上之爻所纳地支分别为卯酉、丑未、亥巳三对对冲之支。京氏易中还有“应在其冲”说，（见下文京氏“八卦卦气说”部分）此说与《淮南子·时则训》及《管子·侈靡》的一些说法相通，说明京氏纳甲说所本必有极早之渊源。

“五音六律”、“五官六府”、五星等说都与“五行”说有内在联系。《京氏易传》十分重视“五行”，如卷中《困》卦有“五行配六位，生悔吝四时休王”，卷下有“五行迭终，四时更废”，“考五行于运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于指掌”，“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等说。既然帛书《要》篇提到“五官六府”，说明帛书《易传》之作者已在努力将五行说、“五官六府”说纳入《周易》体系，甚或当时有人已将五行说、“五官六府”说纳入《周易》体系。另外，帛书《易传·要》篇还说：“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刚柔；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上下……”这段文字一是对《易传》三才之道的进一步落实，一则说明早在帛书《易传》之底本成书之前早已有人先于京房尝试把日月星辰（包括五星、二十八宿等）、五行、五常之道等纳入《周易》体系了。另外，《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一段甲子至戊子受制的话：

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受制。……甲子受制则行柔惠……丙子受制，则举贤



良……戊子受制，则养老鰥寡……庚子受制，则缮墙垣……

壬子受制，则闭门闾……<sup>①</sup>

《管子·五行》亦有：“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命左右工师内御……七十二日而毕。”《汉书·艺文志》在《易经》类文献中收录有《古五子》一书，颜师古注曰：“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经刘大钧先生考证，《淮南子·天文训》及《管子·五行》所说就是《古五子》的内容。<sup>②</sup> 笔者以为，这些内容与京房五行说、五音六属说、纳甲说等有内在联系。

另外，东汉郑玄常用一种称作“爻辰说”的体例来注《易》，是一种把乾坤十二爻与十二支地支及十二律吕相配应的学说。其配应情况可用下图表示：



郑氏爻辰图

① 何宁：《淮南子集释·天文训》（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25-227页。

② 刘大钧：《周易古义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49页。

郑玄之“爻辰说”与京房之纳支法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于乾卦所纳之支及顺序相同，即从初爻至上爻分别对应子、寅、辰、午、申、戌，不同之处是二者的坤卦所纳地支之序不同。爻辰说坤卦所纳地支从初爻至上爻分别为：未、酉、亥、丑、卯、巳；而京氏纳支法坤卦所纳地支从初爻至上爻分别为：未、巳、卯、丑、亥、酉。至于二者为何有此区别，李道平先生认为：

二家同出于律辰。郑氏本乎月律，即月令十二月所中之律，隔八相生之次也。月律之行顺，故爻辰亦顺。京氏本乎合声，《周礼·太师》：“掌以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泰蕤、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中吕、夹钟。合声始终之序，不同于月律也。合声之行逆，故爻辰亦逆。<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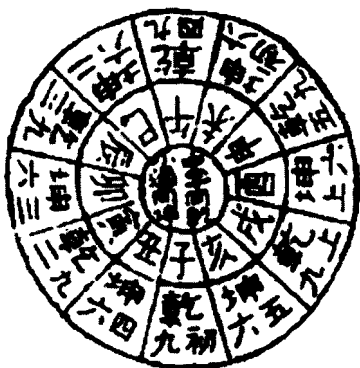
李氏所说也符合京房所说“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原则。

此外，《易纬·乾凿度》有两卦十二爻主一年，六十四卦共主三十二年之说。对于乾坤两卦所贞地支与京氏乾坤两卦所纳地支相同，即乾卦自初爻至上爻依次纳子、寅、辰、午、申、戌，坤卦自初爻至上爻依次纳未、巳、卯、丑、亥、酉。而《乾凿度》所据原则则是“阴卦与阳卦同位者，退一辰以为贞，其爻右行，间辰而治六辰”<sup>②</sup>。意思是说，乾卦初爻所贞即从子月起，与乾卦相对的坤卦本来应该贞于与子相对的午，而午是阳位，由于坤卦是阴卦，不能从阳位起，所以退一辰而从未月起。坤卦其他的爻的排列亦是按“地道右旋”的原则排列的：“乾贞于十一月子，左行，阳时六；坤贞于六月未，右行，阴时六，以奉顺成其岁。”从我

①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诸家易学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页。

②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96页。

们上面对京氏纳支据“隔八生律”的原则构建来看,《乾凿度》坤卦纳支的原则与京氏坤卦纳支的原则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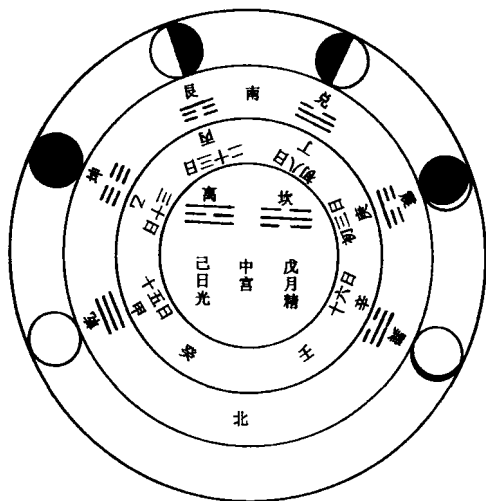


乾坤贞辰图

被称为“丹经之祖”的东汉易学家魏伯阳,将月相的盈亏与八卦相配应,提出了“月体纳甲”说,以阐发道家炼丹“进阳火”与“退阴符”之旨。“月体纳甲”说与京氏纳甲说的区别在于,京氏纳甲说将十个天干纳入六爻别卦,而“月体纳甲”则将十干纳入由三画组成的八经卦。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如此描述:

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又说:“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据魏氏描述可知,每月(阴历,下同)初三日黄昏,一弯新月出现于西方庚位之天穹上,用震卦(䷲)表征之;每月初八日昏,一上弦月现于南方丁位之天穹上,用兑卦(䷹)表征之;每月十五日昏,一轮满月

现于东方甲位之地平线上,用乾卦(☰)表征之;每月十六日晨天刚亮时,一稍缺之月现于西方辛位,用巽卦(☴)表征之;二十三日晨,一下弦月现于南方丙位,用艮卦(☶)表征之;每月三十日,月相消失于东方乙位而继之灭藏于北方癸位,用坤卦(☷)表征之。“每月三十日左右,日相会于壬(北)方位,新月不久即将出现,为示阳(月之光明面)生由微而著之意,故而乾卦同时又纳‘壬’”<sup>①</sup>。离(☲)坎(☵)表征日月之本相,坎月离日。每月晦夕朔旦,月亮处于中天戊的方位,故以坎卦纳戊。每日的正午,日处于中天己的方位,故以离卦纳己。如此,则将十天干纳入八经卦。天干表示月相显现之方位,而八卦卦象除离、坎两卦外皆表征月亮之盈亏。以图表示则为:



月体纳甲图

① 王新春:《虞氏易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卦气说”与“月体纳甲说”》。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一)。济南:齐鲁书社 1996 年版,第 105 页。

三国时代的虞翻(164~233年)据此以注《易》,如他在注《系辞上传》“在天成象”时云:“谓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丧乙,坎象流戊,离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sup>①</sup>注“县(悬)象著名莫大乎日月”云:“谓日月县(悬)天成八卦象:三日莫(暮),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则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县(悬)象著名,莫大乎日月’者也。”<sup>②</sup>据《虞翻别传》载,虞翻在给汉献帝献上其《易注》时的奏章中曾说:“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散发被鹿裘,布《易》六爻,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经!”虞翻在此虽托言郡吏陈桃之梦,亦应该是他自己的想法。萧汉明教授推定,虞翻在此所说的道士必为魏伯阳无疑。<sup>③</sup>果如此,从纳十天干于《易》六爻别卦之中转为纳十天干于三画经卦之中,当完成于魏伯阳。因此,“月体纳甲”说应当是京氏纳甲说的一种发展,是由一种时空一体图式到另一种时空一体图式的转换。

在《周易集解》中,用京氏纳甲说注《易》最多者当属干宝。如干宝在注《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时云:“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据京氏纳甲说,乾初九纳甲子。注《乾》卦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时云:“‘渊’谓初九甲子,龙之所由升

①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51页。

②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81-382页。

③ 萧汉明:《虞翻易学与〈周易参同契〉》。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96-97页。

也。”注《井》卦初六爻辞“井泥不食，旧井无禽”时云：“在井之下，体本土爻，故曰泥也。”井卦(䷯)下体为巽(䷸)，依京氏纳甲说，井卦初爻纳辛丑，丑为土，故曰“体本土爻”。再如干宝注《震》卦(䷲)六二爻辞“震来厉”时云：“六二木爻，震之身也。”据京氏纳甲说，震六二爻纳庚寅，寅为木，故言木爻，又震为木，故称六二木爻为“震之身”。这些解释与虞翻据纳甲说所说“日月在天成八卦象”的思维理路有很大不同。由此可知，干宝有可能不接受虞翻的“月体纳甲说”，而推崇京氏纳甲之说。

## 第六节 京氏卦气说研究

如前所述，京房通过其八宫卦说，及纳入八宫卦体系的纳甲、建候、积算、爻变、卦变、飞伏诸说，勾画出一幅生生不息、阴阳二气相互对待与流行的宇宙图景，从而由微而著地显示出一阴一阳之互待、互涵、互易之道。而京氏的这一体现阴阳对待、流行的宇宙视野，也蕴含于其卦气说中。卦气说是京氏易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与其灾异说亦有紧密的联系。京氏卦气说主要包括六日七分说、八卦卦气说、六子卦气说等。京氏“六日七分”说对孟氏“六日七分”说及“焦林直日”法的发展，我们在前文已经述及，在此不再进行讨论。在这一节我们主要探讨京氏八卦卦气说及六子卦气说的来源及其哲理内涵。

### 一、京氏八卦卦气说

所谓八卦卦气说，是把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分别与八经卦相配应的一种学说：乾主立冬、坎主冬至、艮主立春、

震主春分、巽主立夏、离主夏至、坤主立秋、兑主秋分。清人吴翊寅在其《易汉学考一·易纬考上》中有云：“《易纬·乾凿度》为孟喜所述，《稽览图》、《通卦验》皆京房所述。”关于孟、京易学与《易纬》诸篇之关系，下文将有详述，此不赘述。据《太平御览》引《京氏占易》曰“夏至离王”、“立秋坤旺”等文来看，京房确主八卦卦气说，《易纬·通卦验》所言八卦卦气说，当为京氏八卦卦气之遗说。《易纬·通卦验》（卷下）云：

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故设卦观象，以知有亡。夫八卦缪乱，则纲纪坏败，日月星辰失其行，阴阳不和，四时易政。八卦气不效，则灾异气臻，八卦气应失常。<sup>①</sup>

显然，这与上文所述《汉书·五行志》及其所引《京房易传》的理念是一致的，是对董仲舒灾异、谴告说在八卦系统中的落实。如果人君施政应和天心、民心，就可达致“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等天下和平之境，否则就会出现灾异气臻、八卦气应失常等异象。对于各卦所主节气及如何占验卦气效与不效，《易纬·通卦验》云：

冬至四十五日，以次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复当卦之气，进则先时，退则后时，皆八卦之效也。夫卦之效也，皆指时卦，当应他卦气，及至其灾，各以其冲应之，此天所以示告于人者也。

乾，西北也，主立冬，人定，白气出，直乾，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万物伤。乾气不至，则立夏有寒，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99页。

伤禾稼，万物多死，人民疾疫，应在其冲……

坎，北方也，主冬至，夜半黑气出，直坎，此正气也。气出右，天下旱；气出左，涌水出。坎气不至，则夏至大寒雨雪，涌泉出，岁多大水，应在其冲……

艮，东北也，主立春，鸡鸣，黄气出，直艮，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霜；气出左，山崩，涌水出；艮气不至，则立秋山陵多崩，万物华实不成，五谷不入。应在其冲……

震，东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气出，直震，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蛟龙出。震气不至，则岁中少雷，万物不实，人民疾热，应在其冲……

巽，东南也，主立夏，食时，青气出，直巽，此正气也。气出右，风概木；气出左，万物伤，人民疾湿。巽气不至，则岁中多大风，发屋扬砂，禾稼尽，应在其冲……

离，南方也，主夏至，日中，赤气出，直离，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赤地千里。离气不至，则无日光，五谷不荣，人民病目痛，冬无冰，应在其冲……

坤，西南也，主立秋，晡时，黄气出，直坤，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地动。坤气不至，万物不茂，地数震，牛羊多死，应在其冲……

兑，西方也，主秋分日<sup>①</sup>，白气出，直兑，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不生；气出左，则虎害人。兑气不至，则岁中多霜，草木枯落，人民疥痒，应在其冲……<sup>②</sup>

---

① 林忠军教授加注曰：按《古微书》“日”下有“人酉”二字。《书钞》百五十四引同。

②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200 - 204 页。



《管子·轻重》已经以八节为时间划分单位,反映的是一种“顺时布政”的思想。但没有提到这些节令的具体名称,说明当时这些节令名称可能还没有得到落实并被人们公认与接受。且《管子·轻重》没有言灾异的成分,更没有卦象之推衍。这里已明确指出,每卦主三个节气共45日。关于“左”“右”之意,郑玄在注乾卦“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万物伤”时云:“立冬之左霜降之地,右小雪之地。”可证“气出左”指卦气提前到达,“气出右”则指卦气延后到达。这是一幅完美的时空一体图,并加入卦象的成分,规律性很强。从这一段描述可以看出:一,候卦之时与该卦所居后天八卦方位所配应的时辰相合。如,乾卦候卦之时为人定即亥时,从方位上来讲,亥在后天八卦乾卦之位;坎卦候卦之时为夜半即子时,从方位上来讲,子在北方坎位。其余六卦候卦之时亦与其所居方位相符。这样,就把时间与空间之配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八卦既具有空间方位之性质,又具有节令即时间之性质,又具有卦象物象之性质。又由于每卦之卦象可以无限地衍展下去,如此,这八个卦之常态就符示了时空万有中的一切事物。二,将五行引入八卦卦气说,即乾、兑于五行为金,于五色为白,则于相应之时察其白气;坤、艮于五行为土,于五色为黄,则于其相应之时察其黄气;坎于五行为水,于五色为黑,则于其相应之时察其黑气;离于五行为火,于五色为赤,则于该卦相应之时察其赤气;震、巽于五行为木,于五色为青,故于其相应之时察其青气。三,卦气不效时的物候异象多采该卦所具卦象及卦象之衍生象。乾卦卦气不效时,则“立夏有寒,……夏雨雪水冰”,此乃采乾为寒、为冰之象;坎卦卦气不效时,则“夏至大寒雨雪,涌泉出,岁多大水”,此乃采坎为水,为雨之象;艮卦卦气不效时,则立秋山陵多崩,乃取艮为山之象;震卦

卦气不效时，则岁中少雷，乃取震为雷之象；巽卦卦气不效时，则岁中多大风，乃取巽为风之象；离卦卦气不效时，则日无光，乃取离为日之象；坤卦卦气不效时，地数震，牛羊多死，则取坤为地、为牛之象，在此取羊之象，应是取坤在十二地支中的未位，未为羊之象；兑卦卦气不效时，则草木枯落，乃取兑秋肃杀之象，特别是说至兑卦“气出左”时，则“虎害人”，此显然取西方白虎之象。四，八卦卦气不效则会产生灾异，灾异出现之应皆在其所冲之卦所值卦气之阶段。这就是“应在其冲”说，强调的乃是阴阳之间的对待与转化。

这种“应在其冲”说渊源甚早，如《淮南子·时则训》有云：“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正是这种“应在其冲”说的反映。《管子·侈靡》“冬厚则夏热，其阳厚则阴寒”之说也是这种理念的反映。

最明显的是，八卦卦气说受到《说卦传》的影响，是以《说卦传》所描述的时空一体图式为框架的。殷商甲骨文既然有四方风的说法，估计八方风概念之形成也不会太晚，因为中国北方是典型的大陆季风气候，每年的季风都很有特点及规律，中国古人在密切体验日月运行所形成的不同季节的同时，必然对风也会十分关注。《说卦传》主要阐释八卦之象及八卦与季节、方位之配应，八风说之形成甚至有可能比《说卦传》之成书还要早。《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八风之说，《淮南子·天文训》亦有八风八政之说，《时则训》更是多次提到“服八风水”。《黄帝内经·

灵枢》(一般认为成书于汉初或先秦)曾论及九宫八风之说。1977年春,在阜阳双古堆发掘的西汉汝阴侯墓的出土文物中,有一面“太乙九宫占盘”,“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完全一致”<sup>①</sup>。由此可证,九宫八风之说,至少在汉初之前就已经成熟。《灵枢经·九宫八风》云: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官(注:天官即上天)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因视风之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所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

九宫除中宫外,其他八宫方位正好与后天八卦方位一一对应。所谓“明日”,张景岳注曰:“即上文四十六日之次日,谓起于四十七日也。”太一巡行一周为一年365日。正常的八方风应“从其所居之乡来”,此之谓实风,从其冲后来,则谓之虚风。在《灵枢经》这里,八风之名称为:大弱风(从南方来),谋风(从西南方来),刚风(从西方来),折风(从西北方来),大刚风(从北方来),凶风(从东北方来),婴儿风(从东方来),弱风(从东南方来)。这种“风从其所居之乡来”的说法正与《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律书》所载八方风向相符,只是八方风所叫的名称不同。对于八方风名,《淮南子·天文训》与《史记·律书》的说法一致。二者的不同之处是,《淮南子·天文训》只是说出了每方风各包括45日,而没有明确把八风与

<sup>①</sup>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8期。

八方相配应,而《史记·律书》已将八风与八方相配应,但每一种风所值日数却与《淮南子·天文训》所说不同:不周风居西北,值十月;广莫风居北方,值十一月、十二月;条风据东北,值正月;明庶风居东方,值二月、三月;清明风据东南维,值四月;景风居南方,值五月;凉风居西南维,值六月、七月、八月;闾阖风居西方,值九月。可见,《史记·律书》所记每种风所值之时段有可能是实际观察的结果,而《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及京氏八卦卦气说每种风所值之时段当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模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律书》称“凉风据西南维,主地”,因为据《说卦传》可知“坤为地”,这是《史记·律书》已将西南维、坤及凉风相配应的明证。而《淮南子·时则训》说“凉风至,则报地德”,亦说明《淮南子》已经将坤卦与凉风相配应,相应地,也已经将凉风与方位即西南坤位相配应。既然已经把坤卦与八风之一的凉风相配应,其他七卦与其他七种风的配应就已经暗含其中了。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京氏八卦卦气说确实渊源甚早,只是到京房这里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增加了更多相配应的内容。可见,最迟至秦汉之际,人们已将后天八卦与八方、八风相配应,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常态体系。而与此常态不同者,即为异态,并以常态为参照,对异态所造成的后果进行占测。只是《灵枢经》关注的是异常风对人体所将要造成的伤害暨可能引起的疾病,如其于大弱风曰:“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而京房关注的则是异态风对社会人生造成的影响,如《乙巳占·八方暴风占第八十一》云:

北方坎,名曰广莫风,主冬至四十五日。京房云:“四时暴风起北方,主盗贼起,天下兵皆动。”

八卦与八节相配应即形成八卦卦气说。至此,八风说也被

纳入八卦卦气说及《说卦》诸卦象说，如《易纬·通卦验补遗》云：

春分，震风至，震风不至，则雷震毁舟。……立夏，巽风至，巽风不至，则城中多大风，发屋扬沙，禾稼尽卧。……夏至，离风至，离风不至，则日无光，五谷不荣，人民病目，人多死于火。……立秋，坤风至，坤风不至，山颓地陷，妖魔遍市。……秋分，兑风至，兑风不至，外戚执政。……立冬，乾风至，乾风不至，则日月无光。……冬至，坎风至，坎风不至，则水自生，火死而反生。……立春，艮风至，艮风不至，则启之者亦终之。<sup>①</sup>

据《说卦传》所云卦象，震为雷，故春分“震风不至，则雷震毁”；巽为风，故立夏“巽风不至”，则“多大风”。离为日、为目、为火，故夏至“离风不至”则“日无光”，“人民病目，人多死于火”；坤为地，故立秋“坤风不至”则“山颓地陷”。兑为少女，其延伸义为后宫之皇妃，故秋分“兑风不至”则“外戚执政”，外戚为后宫之亲属也。乾为天，故立冬“乾气不至”则日月无光；坎为水，冬至坎风不至则“水自生”。艮为“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立春艮风不至，则“启之者亦终之”。

前文已述，宣帝时曾任过丞相、“少学《易》，有师法”的魏相，已将八卦与四时相配，且正有八风之说。魏相在其所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上奏中说：

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

<sup>①</sup> [汉]郑玄注，常秉义编：《易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86页。

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颡顓，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雹。<sup>①</sup>

说明至魏相时，已将春、夏、秋、冬四时分别与震、离、兑、坎四方伯卦相配，但他将坤、艮两卦配值中央之土，证明至魏相时代，《易》阴阳系统尚无成熟的八卦卦气说，否则就是因为魏相之师没有传八卦卦气说。八卦卦气说有可能是京房或孟喜、焦延寿沿着八风说的思路，在四正卦卦气说的基础上，将四时八节分别与后天八卦相配值而臻成熟的，并将八风说纳入其八卦卦气说，成为八卦卦气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且将八风说进一步完善：

春分，震风至，震风不至，则雷震毁舟。巽风至，则制作失度。坎风至，则阴遏阳，有谋不成。离风至，则孕女不育。艮风至，则小人擅威。兑风至，则谗谀行，媚谄用。乾风至，则父谋其子，君谋其臣。坤风至，则岁饥谨，人民相食，以后为餐，上不禁下，横水逆流。<sup>②</sup>

春分当刮震风，八卦卦气说将此时段内其他七种卦风所预示的灾变皆列出，并多采相应卦象释之。如春分，艮风至，则小人擅威。小人乃艮卦之象。八卦卦气说在每一时节所当值卦风，分别列出其余七卦风所预示的灾异。如此，则八宫六十四种风变情况已较详细地列出，极大地丰富了原始的八风说。这仍是一种取类比象思维。《白虎通·八风》如此定义“八风”：“风之为

---

① [汉]班固：《汉书·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9页。

② [东汉]郑玄注，常秉义编：《易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言萌也。养物成功，所以象八卦。”这显然是受了八卦卦气说的影响。这种推言气候异常的模式，在《吕氏春秋》已经存在，如《孟夏纪》有云：“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孟夏行秋令，秋天寒凉之气提前到来，所以会有“苦雨数来”，而行冬令导致的“大水”显然是取冬天对应的坎水之象，行春令中所说的“虫蝗”、“暴风”则显系巽卦之象。这说明在孟、京之前，这类的推理在先秦时期早已有之，只是有可能到孟、京时期才得以完备。

如果说八卦卦气说以此种取类比象的方式推言灾异显得粗糙或机械的话，那么，京房的八宫卦说则比八卦卦气说更为抽象化、系统化了，因为八卦卦气说占测灾异以卦变为单位，而八宫卦逐卦之间的变化主要以爻变为单位。京氏八宫卦序更能细微地突显天地间阴阳二气的流行。

九宫八风说除中宫代表中央外，其余各宫所配应的风皆与该宫所居的后天八卦位相应。《京氏易传》在论及乾、震、坎、坤、巽、离、兑诸卦时，分别云：“居西北之分野”，“为发生之始，故取东也”，“分北方之卦也”，“西南方之卦”，“东南向明”，“积于西郊”，此显受《说卦传》之后天八卦方位之影响。据此可知，在京氏八宫卦序中，八宫纯卦所居方位与它们所居的后天八卦方位相同，也正与八卦卦气说中各卦所对应之方位相同。但九宫八风说中八风所配之八卦指八经卦而言，而京氏八宫纯卦指由经卦相重而成的别卦而言。因而，京氏的八宫卦卦序仍带有《说卦传》及八方风说中后天八卦方位说的烙印。但京氏并未仅停留于此，他在将八宫卦排序时，遵循的乃是《说卦传》中所论及的“乾坤生六子”的原则建构的，只是《说卦传》所谓乾坤、

六子皆指八经卦,而京氏所谓乾坤、六子皆指由经卦相重而成的别卦而言。

我们再返回来看一下京氏八宫六十四卦建候表(参见前图),可以发现,八宫纯卦乾卦世爻所建己巳与坤卦建末己亥正好相对;艮卦世爻所建庚寅与兑卦建末庚申正好相对;震卦世爻所建丙子与巽卦建末丙午正好相对;坎卦世爻所建癸未与离卦建末癸丑正好相对。这正与《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旨相通,亦是一种阴阳对待。各相对之宫卦之一世卦至归魂卦之建候亦符合这一原则。如乾宫一世姤卦世爻所建庚午与坤宫一世复卦建末庚子正好相对。其余卦皆仿此。由此可知,京氏八宫卦体系,已寓有后世所说“先天八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两两相对之精神,也是“应在其冲”说的一种反映。

综合上述,八宫卦序有可能是京氏在《说卦传》之后天八卦方位、八风说、八卦卦气说的基础上创立的一套更为完备的系统,其中蕴含着阴阳二气的对待与流行,也贯穿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精神,是京氏对《说卦传》、八风说的继承与发展。京氏纳甲、建候、积算诸说,使《易传》所蕴含的宇宙大化体系更加具体化。

## 二、京氏“六子卦气说”与“飞伏说”

《京氏易传》还含有“六子卦气说”及“飞伏说”。“六子卦气说”中的阴阳分行理念及“飞伏说”中的阴阳互涵互摄理念亦值得我们研究。所谓“六子卦气说”是指以震、坎、艮、巽、离、兑六子卦配一年二十四节气。京氏云:

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



吉,吉凶之道,子午分时。立春正月节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处暑同用;惊蛰二月节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兑卦九四,春分同用;清明三月节在戌,艮卦六四,寒露同用;谷雨三月中在酉,离卦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节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小满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芒种五月节在午,乾宫<sup>①</sup>九四,大雪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巳,兑宫(卦)初九,冬至同用;小暑六月节在辰,艮宫(卦)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离宫(卦)初九,大寒同用。<sup>②</sup>

今据京氏此说列六子卦气表如下:

节气	月中、月节	地支	所配卦爻
立春	正月节	寅	坎卦初六
雨水	正月中	丑	巽卦初六
惊蛰	二月节	子	震卦初九
春分	二月中	亥	兑卦九四
清明	三月节	戌	艮卦六四
谷雨	三月中	酉	离卦九四
立夏	四月节	申	坎卦六四
小满	四月中	未	巽卦六四
芒种	五月节	午	震卦九四
夏至	五月中	巳	兑卦初九
小暑	六月节	辰	艮卦初六

① 案:从上下文来看,“乾宫”当为“震卦”。

② 郭璞:《京氏易传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33页。

(续表)

节气	月中、月节	地支	所配卦爻
大暑	六月中	卯	离卦初九
立秋	七月节	寅	坎卦初六
处暑	七月中	丑	巽卦初六
白露	八月节	子	震卦初九
秋分	八月中	亥	兑卦九四
寒露	九月节	戌	艮卦六四
霜降	九月中	酉	离卦九四
立冬	十月节	申	坎卦六四
小雪	十月中	未	巽卦六四
大雪	十一月节	午	震卦九四
冬至	十一月中	巳	兑卦初九
小寒	十二月节	辰	艮卦初六
大寒	十二月中	卯	离卦初九

京房把六子卦的初、四两爻分别与二十四节气相配,每一爻值两个节气。因为六子卦之初、四爻的总和为十二爻,所以,京氏除将某卦所纳之支与所值之节气相配外,还将该支与该支相对之节气相配,如坎初六纳寅,除与正月节立春相配值之外,还与立秋申相配。这样,六子卦之初、四两爻与上半年的节气相配一次,再与下半年的节气相配一次。显然,按京氏的这种排法,节气按立春、雨水、惊蛰……顺行的方式排列,而地支则按寅、丑、子……逆行的方式排列。这种观念应由来有自,与董仲舒关于阴阳二气在一年中运行情况之说法亦可能

有内在联系。关于阴阳二气在一年之中是如何运行的,董仲舒有一段较详细的说法:

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出则阳入,阳出则阴入;阴右则阳左,阴左则阳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于前,冬交于后,而不同理。……天之道,初薄大冬,阴阳各从一方来,而移于后。阴由东方来西,阳由西方来东,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冬至。别而相去,阴适右,阳适左。适左者其道顺,适右者其道逆。逆气左上,顺气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见天之冬右阴而左阳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尽,而阴阳俱南还,阳南还出于寅,阴南还入于戌,此阴阳所始出地入地之见处也。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阴日损而随阳,阳日益而鸿,故为暖热。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夏至。别而相去,阳适右,阴适左。适左由下,适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见天之夏右阳而左阴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尽,而阴阳俱北还。阳北还而入于申,阴北还而出于辰,此阴阳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见处也。至于中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阳日损而随阴,阴日益而鸿,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毕藏,天地之功终矣。<sup>①</sup>

①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阴阳出入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2-345页。

董仲舒的这一段描述很有启发意义,表达了他对阴阳二气在一年中运行情况的看法,与十二消息卦说亦有相通之处。特别是董子所说的冬至、夏至、寅月、申月之阴阳入伏之情况,可以用十二消息之卦象形象地符示出来。在董子看来,阴阳一直是相别而行,至仲冬之月,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即是指冬至之时。然后阴阳随即各别而去,“阴适右,阳适左”,而此时适右之阴气在上,而适左之阳气在下,故下暖而上寒,寒厚而暖薄。如果我们把一卦六爻之初爻至三爻符示黄泉至地表,四爻以上符示地上,那么用复卦(䷗)符示这种状态就很合适。冬月结束之后,阴阳俱南还,“阳南还出于寅”。意味着至寅月时,阳气从地下而出于地表,用泰卦(䷊)符示这种状态亦很合适。至夏至时,阴阳相遇于南方,合而为一,然后随即各别而去。这时适右之阳气在上,适左之阴气在下,故上暑而下寒,暑厚而寒薄,用姤卦(䷫)来符示这种状态十分确当。阳至申月而入于地中,用否卦(䷋)符示之亦很合适,表示下面之阳气已没入地中。而对阴气之出地入地来说,当阳气出于寅时,阴气入于戌,亦可用剥卦(䷖)来符示之,表示阴气为上面一阳所掩蔽。当阳气入于申时,阴气出于辰,亦可用夬卦(䷪)来符示之,表示上面一阴已经浮出。《易传》中已包含十二消息往来屈伸之变,如果在董仲舒之前已有十二消息卦卦气说,董仲舒此说就应该受到易学十二消息卦卦气说的影响,如果十二消息卦确如僧一行所说出于孟喜,那么,孟喜之说有可能受到董氏阴阳出入说的启发。董氏将阴阳分为两个独立的成分各自按自己的轨道运行,阳气左行,阴气右行,至“二至”日,阴阳二气相交于正南(午)、正北(子)两位,然后阴阳二气再分行,至“二分”时则阴阳二气各居东西。京房六子卦气说中“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的说法正同于

董氏之阴阳二气在子、午两位分行，阳气左行、阴气右行之说，只是京氏将节气对应的是阳（左行），将地支对应的是阴（右行）。至于京氏为何将此序从“寅”而不从“子”开始，亦与董氏“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阴始于秋，阳始于春”的观念相合（《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当然也与帛书《易之义》篇所说“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之义相合，只是帛书《易之义》只是就阳之义而言，亦与《淮南子·诠言训》所说“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之义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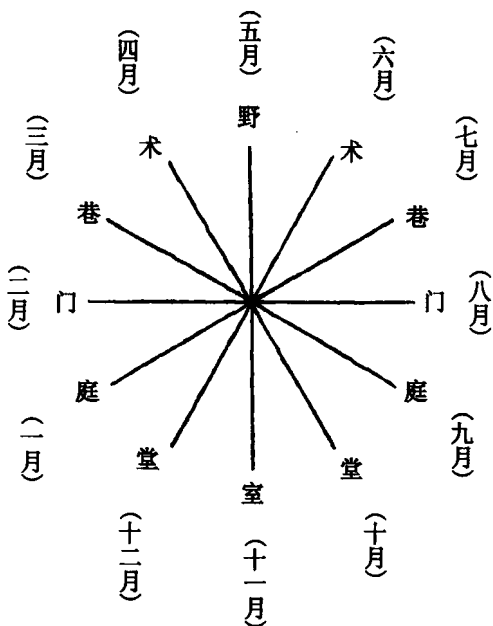
另外，京房“阳从子，阴从午，子午分行”之说与京氏之“刑德说”亦有内在联系。京氏云：“龙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在午，在离卦，右行。”这种说法与董仲舒“阳，天之德；阴，天之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阴，刑气也；阳，德气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sup>①</sup>等说法是一致的。其实，刑德说渊源甚早，如在董仲舒之前或同时的《淮南子·天文训》就有：“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案：此亦与复卦[䷗]之象甚合）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案：此亦与姤卦[䷫]之象甚合）”特别是《淮南子·天文训》提出的“刑德七舍”说与京氏“子午分行”及董氏“阴阳分行”说又有同源之妙：

阴阳刑德有七舍。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

十一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后日至十五日而徙，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02页。

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阴阳相德，则刑德合门。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门。德南则生，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而万物生，八月会而草木死。



刑德七舍图

马王堆帛书《十六经·观》又有“春夏为德，秋冬为刑”之说，说明“刑德”之说有很早之渊源，“古代推刑德，往往托之黄帝”。<sup>①</sup>

<sup>①</sup>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 页。

后来，“刑德说”成为中国先秦时期择日等方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刑德说、董仲舒之阴阳分行说、京氏子午分行说皆是中国古人所体认的时空一体的式图观念之反映，说明京氏易学深受中国古代天人一体、时空一体的宇宙观念的影响，并将当时流行的与此相关的方术亦纳入其易学体系。

京房六子卦气说把六子卦之初、四两爻分别与相对的两个节气相配，如坎卦初六既与立春寅配应又与立秋申配应，则体现了与“六属”相关的“六合”说之理念：“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淮南子·时则训》）又，《淮南子·地形训》“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淮南子·天文训》“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水，三辰皆木也”及“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轩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鱼之圉也”诸说，皆为京氏所得。如前所述，睡虎地秦简《日书》等已含有“亥卯未合木局，寅午戌合火局”等“三合局”之说，且有子午相冲之式图观念，因此，京房之说既富含自古而流传下来的宇宙观念，又吸纳了许多与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密不可分的数术内容。这也注定了京氏易学与阴阳灾异密不可分的功用所在。

另外，京房的“六子卦气”说、《淮南子》的“刑德七舍”说及董仲舒的“阴阳出入”说又使我们想起了京房的“飞伏”说。飞伏说是京氏易学中的重要体例之一。宋代易学家朱震是如此概括“飞伏”的：

伏爻，何也？曰京氏所传飞伏也。乾坤、坎离、震巽、兑艮相伏者也。见者为飞，不见者为伏。飞，方来也；伏，既往也。《说卦》巽“其究为躁卦”，卦例飞伏也。太史公《律书》

曰：冬至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此论复卦初爻之伏巽也。

朱震认为：“见者为飞，不见者为伏。”所谓见者，即所见到的显象；所谓不见者，指与所见者阴阳完全相反的卦，为伏象。如此则乾(䷀)坤(䷁)互为飞伏之卦，坎(䷜)离(䷝)互为飞伏之卦，震(䷲)巽(䷸)互为飞伏之卦，艮(䷳)兑(䷹)互为飞伏之卦。乾显则坤伏，坎显则离伏，震显则巽伏，兑显则艮伏。反之亦然。按朱震的说法，《说卦》已采用飞伏说，《史记·律书》对冬至之节的阐释正好合飞伏之说。朱震虽有此说，而据现有资料来看，直至京氏才明确地大谈飞伏之说。飞伏说有卦之飞伏与爻之飞伏之分。以上所云为卦之飞伏。爻之飞伏指阳爻伏阴，阴爻伏阳。由于京氏八宫卦从初世到上世反映的是一种由爻变导致卦变的关系，相应地，卦之飞伏也是由爻之飞伏衍变而来。京氏的飞伏说比较复杂，民国徐昂对《京氏易传》中的飞伏说总结如下：

八宫中阴阳相对者互为飞伏。如乾坤相互，震巽相互，坎离相互，艮兑相互，此一例也。八宫所化生之卦，自一世至五世，前三卦与内卦飞伏，后二卦与外卦飞伏，如乾宫一世姤卦飞伏在内巽，二世遁卦飞伏在内艮，三世否卦飞伏在内坤，四世观卦飞伏在外巽，五世剥卦飞伏在外艮。此又一例也。游魂卦由五世外卦魂复于第四爻，归魂卦由游魂内卦魂反于第三爻，各与为飞伏。如乾宫游魂晋卦九四，由五世剥卦外艮六四爻变来，与艮为飞伏；归魂大有卦九三，由游魂晋卦内坤六三爻变来，与坤为飞伏。此第三例也。八宫所辖诸卦世位所当之爻，各与本宫为飞伏。如姤卦隶乾宫第一世，世位在初六爻，与乾宫初九爻为飞伏。遁卦隶乾宫第二世，世位在六二爻，与乾宫九二爻为飞伏。



此第四例也。<sup>①</sup>

尽管有如此四种情况,但总不离“阴中寓阳,阳中涵阴”之旨。这种理念与董仲舒的如下理念十分相近:“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出则阳入,阳出则阴入;阴右则阳左,阴左则阳右。”<sup>②</sup>因此,京氏之飞伏说有可能受这类理念的影响。

另外,虽然《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陈厉公使周史筮陈敬仲之例已采互体说进行解卦,但从现存文献来看,最早明确提出“互体说”者,乃是京房。《京氏易传》多次谈到互体。如京氏于《大过》卦(䷛)云:“互体象乾。”是由于大过卦二、三、四爻或三、四、五爻均可互出乾卦(䷀)。又如于《中孚》卦(䷼)云:“互体见艮。”是由于三、四、五爻互体为艮(䷳)。再如于《无妄》卦(䷘)云:“内互见艮……外互见巽。”是由于二、三、四爻互体为艮(䷳),三、四、五爻互体为巽(䷸)。这样,在每一个卦体中,又增加了更多的显象。而据飞伏说特别是后世虞翻所推崇的“旁通说”,有了显象,隐象自然亦在其中。这样就大大地扩充了《周易》取象的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京房把天干、地支、五行、五星、二十八宿等纳入其八宫卦体系,通过八卦卦气说、七十二候卦气说,将天道运行、阴阳二气的消长、五行之生克,进行了细密的描述,其目的不是为哗众取宠或玩象数游戏,而是最终落实于人事。本天道以立人道,开天文以立人文,是由《易传》开显的易学哲学的基

① [民国]徐昂:《京氏易传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排印本,第165-166页。

②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阴阳出入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2页。

本特色。刘大钧先生指出：“古人经过‘仰观’，‘俯察’，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而生、旺、墓、绝的发展规律有了明确认识之后，以其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数建构出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并由此派生出一套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由法天地而循四时之序引申出人文之政道与治道。”<sup>①</sup>京房在其《易》阴阳系统中更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京氏云：“《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又说：“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夫作《易》所以垂教。”（《京氏易传·卷下》）显然，京氏阐发天道的最终目的乃是借天道以立王道、治道。而此种王道、治道的好坏首先是借助自然之天道的运行常异来体现的：“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帝明王所以至太平法。……夫八卦缪乱，则纲纪坏败，日月星辰失其行，阴阳不和，四时易政。八卦气不效，则灾异气臻，八卦气应失常。”<sup>②</sup>京氏对人文、人道的关怀多渗透于《京氏易传》之字里行间，如他在《剥》卦云：“君子俟时，不可苟变，存身避害，与时消息。”于《井》卦云：“天地之数，分于人事，吉凶之兆，定于阴阳。”于《革》卦云：“天地变革，人事随而更也。”于《夬》卦云：“雷动风行，山泽通气，人之运动，体斯合矣。”等等。可见，尽管京房之象数体系十分繁杂、细腻，但他最终关注的乃是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的合一。那种认为京房等象数学家只关注象数，而不注重义理，只注重天文，而不注重人文的说法有失偏颇。

① 刘大钧：《“卦气”溯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29页。

②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99页。

## 第六章 孟、京易学与《易纬》

西汉末期特别是新莽王朝时期,谶纬神学兴起。“谶”是预示吉凶的隐语;“纬”与“经”相配,是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六经皆有纬,而与《易经》相配的是《易纬》,且“《易纬》是纬书中保存最为完整的部分,其中尤以《乾凿度》为著”<sup>①</sup>。有学者指出:“谶纬的出现,既依附于孔子和儒家经典,又可以借助于宗教神权的力量来指导现实和预示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样既便于同汉代的现实和政治结合,并以神权的力量增加了经学的权威性,从而巩固了经学的统治地位,这就是谶纬附经,亦以辅经的妙用。”<sup>②</sup>还有人认为,“有经必有纬,汉代的纬书,实际上是经学的一部分,如果研究经学而抛弃纬学,就难以把握经学的源流及全貌”<sup>③</sup>。至于《易纬》的来源与成书,林忠军教授基于确凿的证据指出,“《纬书》包含了孟、京易学,故从易学讲,可以说它源于

---

① [汉]郑玄注,常秉义编:《易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② 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③ [汉]郑玄注,常秉义编:《易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孟、京易学”，而“《纬书》定型至少不会早于成帝时代”<sup>①</sup>。而从更细致的角度来划分，清人吴翊寅认为“《易纬·乾凿度》为孟喜所述，《稽览图》、《通卦验》皆京房所述”。（《易汉学考一·易纬考上》）钟肇鹏先生如此评价吴翊寅之说，“其说主名虽未必是，但是《易纬》为孟京《易学》一派，则是可以肯定的”<sup>②</sup>，并从此八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在此对《易纬》诸篇进行简要的考察，以期了解孟、京易学与《易纬》诸篇之关系。

《易纬》包括《乾凿度》、《乾坤凿度》、《稽览图》、《辨终备》、《通卦验》、《乾元序制记》、《是类谋》、《坤灵图》八种。常秉义所据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本所编《易纬》而辑有以上八篇之《补遗》，又据散见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等书中的内容还辑有《中孚传》、《天人应》、《通统图》、《运期》、《内传》、《萌气枢》、《内篇》、《太初篇》、《九厄谶》、《礼观书》、《易纬记》、《纪表》、《决象》、《易统通卦验玄图》、《河图数》、《易纬》诸篇。

## 第一节 《易纬》诸篇与孟、京易学之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乾凿度》与孟、京易学之关系。《乾凿度·卷上》有“光明四通，效易立节”，《京氏易传·卷下》则有“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乾凿度·卷上》有“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京氏易传·卷下》则有“天地若不变易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

② 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0 页。

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惟变所适”；《乾凿度·卷上》有“能消者息……必专者败”，《京氏易传·卷下》则有“则天而行，与时消息”；《乾凿度·卷上》有“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京氏易传·卷下》则有“《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显然，《乾凿度》这些内容是以京氏易为基础的。《乾凿度·卷上》又有“岁三百六十日，而天气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备岁焉”，这部分内容，显然是京氏八卦卦气说之遗存。《乾凿度·卷上》又说：“三画已下为地，四画已上为天，物感以动，类相应也。易气从下生。……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谓应。”这显然是根据京氏八宫卦中的“世应说”而发。特别是《乾凿度·卷上》如下一段论述：“五音六律七变，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数五十’，‘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四方各七四七二十八周天也。凡五十，所以大闳物而出之者也。”关于“大衍之数五十”，《周易正义》引京房之说云：“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①《乾凿度》此段显然亦来自京氏之说。《乾凿度》云：“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此亦采自《京氏易传·卷下》之说：“阳三阳四，位

① 刘玉建：《周易正义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5 年版，第 384 页。

之正也。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之所出，又圆者径一而开三也。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径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终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阴阳也。”《乾凿度·卷上》所说“升者，十二月之卦也”，“益者，正月之卦也”，“随者，二月之卦”，等等，则源自孟、京“六日七分”说。《乾凿度·卷上》“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之说显系来自《京氏易传》之“爵位”说。《乾凿度·卷上》有：“易，有君人五号也。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大君者，与上行异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也。”《礼记·曲礼正义》引孟、京对《泰》卦卦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云：“易有周人五号。帝，天称，一也；王，美称，二也；天子，爵号，三也；大君者，与盛行异，四也；大人者，圣人德备，五也。”可证《乾凿度》此段亦是来自孟、京之说。而《困学纪闻》引京房对《泰》卦卦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的解释为：“汤嫁妹之辞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本天地之义也，往事尔夫必以礼义。”《乾凿度·卷上》所谓“泰者，正月之卦也。阳气始通，阴道执顺，故因此以见汤之嫁妹，能顺天地之道，立教戒之义也”，显然是据京氏之说而进行的发挥。《乾凿度·卷下》“汤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义，顺阴阳之道，以正夫妇，夫妇正则王教兴”，亦是由京氏此说而发。《乾凿度·卷下》还有“甲子，木德……庚子，金德……丙子，火德……壬子，水德……戊子，土德”之说，与《汉书·艺文志》《易》类所说《古五子》有关，与京氏易也许有内在联系。可见，《乾凿度》多采京氏说，而孟氏说则占很小的比例，因此，吴翊寅“《易纬·乾凿度》为孟喜所述”的说法有失妥当。

《乾坤凿度》有“乾为天门”、“坤为人门”、“巽为风门”、“艮

为鬼冥门”之说，这应该是受《京氏易传·卷下》“地易”、“人易”、“天易”、“鬼易”之说的影响。《乾坤凿度》也提到“阳三阴四”之说，如前所述，此亦是受京氏说之影响。《乾坤凿度》还有许多很庞杂的内容，估计与孟京易学关系不是特别密切。

《稽览图》所采孟、京之说较多。《稽览图》有“甲子卦气起中孚”之说，“卦气起中孚”本于孟、京“六日七分”，而“甲子”则应本于京氏纳甲说中乾卦初爻纳甲子，与中孚卦所居北方黄钟之位正好相应。《稽览图》又有：“非太平而杂卦，以其度效一辰，则可矣。”郑玄注曰：“杂卦九三、上六决温，九三、上九微温，六三、上九决寒，六三、上六微寒，日<sup>①</sup>七分中一辰效则可也。”可见《稽览图》在此所采乃焦延寿、京房之“以寒温为候”之说。而《稽览图》“惟消息及四时，卦当尽其日”，郑玄注为“寒温之气，消息尽六日七分，四时七十三分也”，这又是采京氏“六日七分”说。《稽览图》还提到许多“以风雨为候”的说法，这些说法亦当本于焦、京之说。《稽览图·卷上》最后部分所列各卦与月份之配应与孟、京“六日七分”说中的六十四卦与月份之配应不尽相同，此部分内容可能另有来源。而《稽览图·卷下》开篇即采孟喜“六日七分”说。中间一部分亦有将孟喜“六日七分”说与八风说及八卦卦气说相结合者。而此篇的末尾说“候六甲子日中寒暑风雨，记其日占，发时方来，万不失一”，显然受焦、京“以风雨寒温为候”说的影响。

《辨终备》亡佚严重。所辑部分有星占、风占、日食占、月食占的内容，或许与京氏此类占法相关。而《辨终备补遗》说《大畜》卦“九二甲寅木为世。立六五丙子水为应”，显然采京氏纳

① 张惠言曰：“‘日’上脱‘六’字。”

甲世应说。

《通卦验·卷上》多言讖，与孟、京易学没有太大的关联。而《通卦验·卷下》及《通卦验补遗》多言八卦卦气说，当为京氏说之遗存。

《乾元序制记》有云：“辟卦温气不效，六卦阳物不生，土功起，三卦阳气不至，疾伤，日蚀既。六卦不至，震水涌，寒气不效。六卦不至，冬荣实物不成，夏寒伤生，冬温伤成，日月不明，四时失序，万物散去。”这很像京氏之说，且《汉书·京房传》曾说：“六月《遁》卦不效。法曰：‘涌水为灾。’”此篇最后则采纳孟喜四正卦气说及与京氏八卦卦气说密切相关之八风说。

《是类谋》多言机祥推验，其中所提“震气不效”、“离气不效”、“坤气不效”……“乾气不效”等等当是采京氏八卦卦气说而发。《是类谋补遗》则有孟喜四正卦气说的内容，亦有八风说之内容。

今存《坤灵图》内容很少，我们在此看不到直接与孟、京易学相关的内容。《坤灵图补遗》有：“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称之曰帝，帝者，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天子者，继天治物，改正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生人，至尊之号也。大君者，君人之盛也。”这一段应受京房“易有周人五号”说的影响。“雷之始发大壮始，君弱臣强，从解起”显然受“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的影响。“阳气出于东北，入于西北，发于孟春，毕于孟冬”之说显然受董仲舒“阴阳出入”说的影响，且与京房“六子卦气说”可能有内在联系。

《中孚传》就两句话，其中一句是：“阳感天不旋日，诸侯不旋时，大夫不过期。”可能受孟、京“六日七分”暨“七十二候卦气”说的影响。



《天人应》今存共有三条：“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上不俭，下不节，灾火并作，烧君室。”这些表达方式，皆像《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之语气，且《京房易传》有一条：“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又有“居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之说。可见，《天人应》这三句话是模仿《京房易传》之表达方式而作，或者直接来自京氏之说。

《通统图》与《运期》所存内容很少，看不出与孟、京易学之直接联系。

《内传》所存几句话皆像出自京房之言。其中“后妃擅国，白虹贯日”一条，《宋书·五行志》直接说引自《京房易传》。

《萌气枢》多类《京房易传》之语式，有些内容可能直接来自京房《易传》，有些内容或许是模仿京氏之语而作。

《内篇》、《太初篇》每篇所存仅一两句话，据此看不出与孟、京易学之直接联系。

《九疋讖》有：“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别，贤不肖并，不能忧民，急气为之舒缓，草不摇。主失礼烦苛，则旱之，鱼螺变为蝗虫。”这些话多似模拟京氏之语而作。而下面推厄之术与孟、京易学可能没有直接关系。

《礼观书》仅存一句话：“五礼修备，则五诸侯星正行，光明不相陵侵五木，王木应以大丰，天下大治，养不息。”前文已述，《汉书·五行志》在占篇幅较大的“星辰之异”只引有两条《京房易传》，说明京房关于星占的说法比较少，或班固不太赞同京房关于星占的说法。《礼观书》这句话像是沿着《五行志》的理路而发，不像是京氏语。

《易纬纪》、《纪表》、《决象》每篇所存各有一句话，看不出与

孟、京易学有何直接关系。

《易统通卦验玄图》仅存一句话：“荔挺不出，则国多火灾。”像是模拟京氏语而发。

《河图数》所存亦很少，其中有“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同道，三与八为朋，四与九为友，五与十同途”之说。此说渊源甚久，与孟、京易学没有直接联系。

由于我们所掌握的孟、京易学之材料有限，再加上《易纬》亦非全貌，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易纬》中孟、京易学之成分全面地挖掘出来。但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现存《易纬》的大部分内容确受孟、京易学的深刻影响。正如朱彝尊所说：“（焦）贛深明典奥，讖录图纬，能精微天意，传道与京君明（房）。则是纬讖远本于焦（焦）氏、京氏也。”<sup>①</sup>

## 第二节 《易纬》对孟、京 易学的拓展与完善

从上节的分析可以看出，除了一些篇章因佚文缺失太严重而看不出与孟、京易学有直接关系以外，《易纬》中的大多数篇章与孟、京易学有内在联系。基于这种内在关联，由于人们对讖纬之书的反感，人们对孟、喜易学的评价也随之降低。《四库》馆臣也认为：“《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讖纬。”<sup>②</sup>显然，

① 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本 1998 年版，第 1537 页。

② 李学勤主编，李申、卢光明整理，〔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十卷》（《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四库馆臣把孟、京易学视为易学之末流。其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世间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如果不从客观的角度来理解孟、京易学,我们就会把孟、京易学打入死牢。从前几章的分析可知,孟、焦、京易学亦包含有深刻的哲理,揭示了宇宙万用真实存在的部分内容。虽然孟、京易学有被谶纬神学利用的潜在因素,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孟、京易学应有的价值。即使是作为谶纬之学代表的《易纬》也应如此对待。不仅如此,由于现存孟、京易学资料的严重缺失,通过审视《易纬》中与孟、京易学相关的内容,我们还可以获得对孟、京易学特别是京房易学更为全面的、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使孟、京易学的本来面目更加丰满、完善。

如前所述,《京氏易传·卷下》有:“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如果没有《乾凿度》亦引有与此相类的一段话,我们对《京氏易传》这段话的理解可能会比较肤浅。《易纬·乾凿度·卷上》云:

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苞籀。”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无门,藏神无内也。光明四通,效易立节,天地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五纬顺轨,四时和,粟孽结。四渎通情,优游信洁,根著浮流,气更相实,虚无感动,清净炤哲,移物致耀,至诚专密,不烦不挠,淡泊不失,此其易也。①

《乾凿度》在此把“易”之义分为三层,第一层意思为“易”,就是随之而介绍的这种宇宙万有应然存在的“光明四通,效易立节”、“八卦错序”之自然淡泊之状态。这种状态与《通卦验卷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77-78页。

下》所说“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帝时王所以致太平法”之状态是一致的。这正是京房理想中的“卦气效”时的一种完美状态。从《乾凿度·卷上》下面的介绍来看，伏羲画八卦时的社会状态，正是这种“易”的状态：“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质而无文，以天言，此易之意。”而伏羲通过仰观俯察所画之八卦，也是“易”之状态的体现，所以说“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乾凿度·卷上》），这也应该正是京房“《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京氏易传·卷下》）所要表达的意思。而对于“变易”之意，《乾凿度·卷上》云：

变易也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和，能消者息，必专者败。君臣不变，不能成朝。纣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吕，九尾见。夫妇不变，不能成家；妲己擅宠，殷以之破；大任顺季，享国七百。此其变易也。<sup>①</sup>

在《乾凿度》作者看来，人君只要能与时消息，就能一直保持以上所说的“易”的状态即“卦气效”的状态。之所以产生“变易”与朝代更替，是因为人君不能“与时消息”而专权暴虐。这正是商周朝代更替的原因，亦即“变易”的体现。而体现在夫妇关系上，商朝之灭亡是由于妲己擅宠造成的。所以《乾凿度》进一步指出“不易”的意思指“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78页。

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这正是京房“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京氏易传·卷下》）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乾凿度》的这种“变易”观也正是京房“天地若不变易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京氏易传》卷下）所要表达的内涵。《乾凿度》又有：“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这显然是把“易”的状态理解为《老子》所说的“无”的状态。相应地，“变易”就应该是一种“有”的状态。《乾坤凿度》有“易起无，从无入有”之说。<sup>①</sup> 这些说法与京房“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于有无，且《易》者备包有无”（《京氏易传·卷下》）所表达的理念是一致的。

关于“大衍之数五十”，《周易正义》引京房之说云：“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sup>②</sup> 这里也有《易》备包有无的意思。而《乾凿度》对“大衍之数五十”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京氏之意。《乾凿度·卷上》云：“五音六律七变<sup>③</sup>，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数五十，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闳物而出之者也。”对于“五音”，郑玄注为：“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宫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而“十二辰”则为“六律益六吕，合十二辰”。《京氏易传》把十干、十二地支、二十八宿皆纳入卦体，正可以说明京房为何如此释“大衍之数五十”。而《乾凿度》对五音六律的解释，又可以反过来印证京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24页。

② 刘玉建：《周易正义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84页。

③ 案：由上下文看，“变”当为“宿”。

房纳甲说与“五音六律”、“五官六府”、“五音六属”等说有内在联系。

《乾凿度》有云：“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郑玄对此的解释为：“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所出也。又圆者，径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径一而匝四也。”《京氏易传·卷下》则说：“阳三阴四，位之正也。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之所出，又圆者径一而开三也。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径一而取四也。”可见，郑玄在此是以京氏之说对《乾凿度》进行注解。《京氏易传·卷下》接着说：“言日月终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阴阳也。奇偶之数，取之于乾坤。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这句话的意思除与荀爽注《乾·彖》“大明终始”时所云“乾起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坎离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的说法相合之外，《乾凿度》对此的解释更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京氏这句话的本义。《乾凿度》接着说：

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为上篇始者，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终始万物，故以坎、离为终。<sup>①</sup>

可见，《乾凿度》在此是以今本卦序上经首乾坤而终坎离来解释阳三阴四，也是对京氏“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的注解。《乾凿度》进而说明为何下经首咸恒而终既、未济：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3页。

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主也，故为下篇始者，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sup>①</sup>

显然，《乾凿度》认为今本《周易》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事。此说被唐人孔颖达所采纳。不管京房是否有此观点，《乾凿度》此说乃源于京房之说，并被唐人孔颖达所采纳。

《礼记·曲礼正义》引孟、京对《泰》卦卦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云：“易有周人五号。帝，天称，一也；王，美称，二也；天子，爵号，三也；大君者，与盛行异，四也；大人者，圣人德备，五也。”如果孤立地审视这句话，我们难以理解其中的真实内涵。而《乾凿度》对此段话的采纳与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孟、京之原意。《乾凿度》称这五个称号为“变文以著名，题德以别操”。郑玄注为：“夫至人一也，应遗迹不同而生五号，故百姓变其文名，别其操行。”可见，这五个称号的实质是一致的，而百姓认为这五号所表达的操行却有所不同。《乾凿度》在此对其中的“王”、“天子”、“大君”、“大人”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王者，天下所归往”，“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至尊之号也”，“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大人者，圣人之在位者也”。《乾凿度》的这些说法，可以丰富孟、京之说，或许孟、京之说本来要表达的就是《乾凿度》在此所发挥的“君人五号”之意。

《汉书·京房传》说焦、京之学“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我们从《汉志》本身难以知道焦延寿、京房师徒是如何以风雨寒温为候的。借助《易纬·稽览图》及郑玄之注，我们可以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3-84页。

了解“以风雨寒温为候”的部分内容,并可以了解京氏卦气说、蒙气说的部分内容。《稽览图·卷上》有云:“非太平而杂卦,以其度效一辰,则可矣。”郑玄注曰:“杂卦九三、上六决温,九三、上九微温,六三、上九决寒,六三、上六微寒,日<sup>①</sup>七分中一辰效则可也。”<sup>②</sup>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焦、京师徒是如何据每一卦判断寒温的。《稽览图》接着说:“惟消息及四时,卦当尽其日。”郑玄注曰:“寒温之气,消息尽六日七分,四时七十三分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六日七分”与寒温之气的关系。所谓“四时七十三分”指四正卦各主八十分之七十三分日。据唐僧一行《卦议》可知,《稽览图》在此所采乃京氏“六日七分”说。《稽览图》又云:“太平之时,太阴用事。”郑玄注:“谓从否至临也。”可知太阴卦指从否卦(䷋)至临卦(䷒)。相应地,据郑玄注可知,太阳卦指从泰卦(䷊)至遁卦(䷗)。这两种情况都是就消息卦而言。而少阴卦则指从七月至十二月之中的杂卦而言,少阳卦指从正月至六月之中的杂卦而言。关于“风雨”之占,我们在“京房生平评述”部分已涉及,在此不再赘述。《稽览图》:“侵之比先蒙。”郑玄注:“蒙之比,非一也。先蒙者,臣将欲侵其君,乱气而起,雾冒之,故先蒙。”此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书·京房传》及《五行志》志中的京氏“蒙气说”。如前所述,《易纬·通卦验》中所涉及的八卦卦气说,当是京氏八卦卦气说的遗存。

总之,《易纬》诸篇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孟、京易学的理解,而孟、京易学又对《易纬》的成书做了理论上的铺垫。由以上分析可知,孟、京易学与《易纬》皆含有深刻的哲理内涵。我们不能

① 张惠言曰:“‘日’上脱‘六’字。”

②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42页。



因为《易纬》有与讖及推验机祥相关的内容,孟、京易学中有推言灾异的内容,而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一概抹杀。有学者认为:“汉易象数学实际上是以神秘的五行运数与天人感应论相结合做为理论支撑,借用天文历法知识做为外在形式而建构起来公式化的占算系统,是五行运数说与天人感应论相结合的怪胎,十分荒诞无稽。”<sup>①</sup>这就把汉易象数学的价值完全否定。从以上我们对孟、京易学及《易纬》的探讨可知,对汉易象数体系下如此结论,未免因其对汉易象数学的先入之见而有失公允。

---

<sup>①</sup> 梁韦弦:《“卦气”与“历数”,象数与义理》。原载《松辽学刊》(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全文转载,2002年第2期,第46页。

## 第七章 孟、焦、京易学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易学之影响

孟、京易学被立于学官后，在中国易学史乃至中国哲学史上就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易学与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sup>①</sup>。焦氏易学由于有京房因言灾异屡中近幸而得到官方的认可，特别是京氏易学在元帝世被立于学官之后，更是如此。从此，与言灾异密切相关的孟、焦、京《易》阴阳系统才在官方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同时也说明，孟氏《易》被立于学官后在官方流传，而《焦氏易林》及“焦林直日”等内容主要在民间得以流传，但这些内容在民间是如何具体传承的，我们从《汉书》已无从得知。

“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除了做到郎、博士之官之外，从《汉书》我们看不出京房死后他的这几位学生在传播京氏《易》方面的贡献，

---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而西汉成帝时的谷永“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sup>①</sup>。《汉书·五行志》亦引有谷永对一些灾异的解释，且谷永曾引《京房易占》来释灾异。据《汉书·五行志》载，刘向、刘歆父子曾对《京房易传》做过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他们学习或研究过京氏《易》，且基于刘歆《三统历谱》的《汉书·律历志》多有与孟、焦、京氏易学相通之内容，说明刘向、刘歆父子之易学深受孟、焦、京易学的影响。扬雄虽然准太初历而作《太玄》，但“‘《玄首》皆以《易》卦气为次序而变其名称’，所以《太玄》的仿《易》，实在是仿《易》卦气，也就是主要仿京氏《易》”<sup>②</sup>，可见京氏《易》对扬雄之《太玄》有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在前一章已专门论述孟、京易学对《易纬》的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今文经学之章句之学，至西汉末时已至如此局面：“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sup>③</sup>“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sup>④</sup>从《汉书·儒林传》及《艺文志》所载情况来看，这种特点主要存在于《尚书》、《春秋》与《礼》三部经典中。对《易经》来说，在西汉时期《章句》有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他们的章句之学是否有以上特点，我们已无从得知。但到西汉末期时，随着人们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古文《尚书》、《逸礼》、《左氏

① [汉]班固：《汉书·谷永杜邳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472—3473 页。

②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0—421 页。

③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23 页。

④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赞》。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20 页。

春秋》等受到更多人的青睐。于《易》,“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的费氏《易》正好与古文经学以传解经的路子相符,所以费氏《易》至西汉末时既受到更多学人的赏识。但这并没有影响孟、焦、京《易》阴阳系统在东汉一代的流传与发展。因为当时人们反对的主要是今文经学繁琐的解经理路,而孟、焦、京《易》阴阳系统以天人一体、时空一体的宇宙图式为根据来推言灾异,所以这一系统的建构主要并不是为了解经,所以,反对今文经繁琐解经风气的儒者并没有着意对孟、焦、京《易》阴阳系统进行抨击,相反,由于东汉光武帝等对谶纬神学的重视,与谶纬之学有内在联系的孟、焦、京易学反而受很多儒者的推崇,所以据《后汉书》记载可知,整个后汉一代习孟、焦、京易特别是孟、京易者便不乏其人。据《后汉书》记载,建武(公元25~56年)初为博士,后迁为大鸿胪的洼丹“世传孟氏《易》”(《儒林传》),永平(公元58~75年)年间曾为少府的鲒阳鸿“亦以孟氏《易》教授”(《儒林传》),光武帝即位后被拜为郎中,后迁太山都尉的夏恭习孟氏《易》(《文苑传》),《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在《序》中称《易》用孟氏,名门望族袁安家族世代家传孟氏《易》(《袁安传》),家居教授的任安“受孟氏《易》”(《任安传》),两汉象数易学的集大成者虞翻自称五世家传孟氏《易》;光武帝的儿子沛王刘辅曾以《焦氏易林》进行占测,说明刘辅曾习焦氏《易》;东汉初年的著名经学家戴凭“习京氏《易》”,“征试博士”(《儒林传·戴凭传》),永平(公元58~75年)年间曾官至弘农太守的魏满“亦习京氏《易》”(《儒林传·戴凭传》),沛王刘辅既习《焦氏易林》,又“说京氏《易》”(《光武十王列传》),安帝时期(公元107~125年在位)的郎宗、郎顗父子皆精通京氏《易》,筮术高明,郑玄“师事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

(《郑玄传》),其他如杨秉、折象、徐稚、韦著、孙期、东汉经学家崔骃之子崔瑗、刘宽、唐檀、杜乔、樊英、李暹、范冉、度尚、傅燮、张纡等皆研习过京氏《易》。以上习京氏《易》者亦多习京氏风角、星算、六日七分等术。郑玄(127~200年)始通京氏《易》,后来从马融(79~166年)习费氏《易》。费氏《易》属于古文经学的传统,而京氏《易》为今文经学传统。前文已述,孟、焦、京《易》阴阳系统在构建时主要不是为了解经,而是为推言灾异建构一个严密而实用的体系。《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中涉及的《周易》经文多不是经文之本义,即可证明这一点。以上所云习京氏《易》者,多是沿袭的京氏之《易》阴阳系统。“费氏《易》学由于未立于学官,只行于民间,故在西汉时的影响不大。西汉除王璜外,传者甚少。但至东汉尤其是中叶之后,情势就大为改观。《后汉书·儒林传》孙期传说:‘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sup>①</sup>费氏《易》最初“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走的是“训诂举大谊”的路子,符合古文经以传解经的简约传统。从《经典释文》、《周易集解》所辑马融《易》注来看,马融对《周易》经文确作过不少训诂,说明马融仍在沿着费直“训诂”的路子注经,但从《周易集解》所辑马融《易》注来看,马融亦以孟、京十二消息卦、互体、阴阳之气、五行诸说注经。其后,郑玄因始通京氏《易》,故他以孟、京象数体系注《易》自不必说,治费氏《易》的

---

<sup>①</sup>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册)。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页。

荀爽(148~209年)更是多汲取孟、京象数内容释《易》。郑玄已为融合今、古文易学做出努力,而荀爽等亦朝这一方向发展,且马融、荀爽等象数易学与号称五世家传孟喜易学的虞翻之象数易学多有相通之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象数体系皆是以孟、焦、京《易》阴阳系统为其根源。由于孟、京《易》阴阳系统主要不是用来解经,所以马融、郑玄、荀爽、虞翻等试图用孟、京《易》阴阳系统把整个《周易》经传完全解通,一定会遇到很多麻烦,因而必然会有许多牵强之解。就以象数解《易》来讲,根于孟、京易学的虞翻易学对《周易》经、传之解释就有许多牵强之处,且繁琐至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样,王弼玄学义理易学的兴起就成为必然之势了。但由于《周易》本来就是象数与义理的合一,所以即使“扫象不谈”的王弼在注释《周易》时也不得不借卦象来注《易》。<sup>①</sup>

南北朝之后,南崇王弼义理易学,北尚郑玄以天道观为主的象数易学。永嘉之乱后,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易》人无传者。至隋代,王弼《易》注盛行,而郑学浸微。唐初孔颖达奉诏撰定《五经正义》,于《易》则“先以辅嗣(王弼)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周易正义序》)力排汉儒象数,而又力图融合诸家,但于汉《易》诸家仅及荀爽、刘表、马融、郑玄而未及虞翻。至唐中叶,李鼎祚读世人不读之书,通过“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郑玄)之逸象”,辑汉魏以来近四十家《易》注,而虞氏之注几占二分之一,其保留汉易之功,实无它书可替代。其实,《周易集解》所集诸家《易》注,皆以孟、焦、京之《易》阴阳系统所内蕴的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宇宙图式为模式。

①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3页。

此外,宋初陈抟所传的道教易学及宋代兴盛的图、书之学所蕴含的象数,皆可在孟、焦、京《易》阴阳系统中找到根据。而宋代图、书之学,也随之成为宋人阐发义理即宋明理学的重要根据。及至清代,朴学兴起,作为宋易的反动,汉易考据之学得到了空前发展,惠士奇、惠栋父子及张惠言等皆对恢复汉《易》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我们研究孟、焦、京易学作了很好的资料上的铺垫。但历来就有不少反对汉易象数学之学者。如王船山先生曾对易学发展作如下之评价:

秦焚书,而《易》以卜筮之书,不罹其灾,故六经惟《易》有全书,后学之幸也。然而《易》之乱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连山》《归藏》二家杂占之说,犹相淆杂。如《春秋传》之繇辞,多因事附会,而不足以垂大义,而使人惧以终始。孔子赞而定之,以明吉凶之一因于得失,事物之一本于性命,则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之于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讲习,技术之士又各以其意拟议,而诡于情伪之利害。汉人所传者非纯乎三圣之教。而秦以来,杂占之说纷纭而相乱,故襄楷、郎顗、京房、郑玄、虞翻之流,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尽弃其说,一以道为断,盖庶几于三圣之意。而弼学本老庄虚无之旨……然自是以后,《易》乃免于鬻技者猥陋之诬,而为学者身心事理之典要。<sup>①</sup>

显然,王夫之把孟、京、郑玄、虞翻等之象数易学视为易学之末流。但如前所述,本天道以立人道,开天文以立人文,象数与义

---

<sup>①</sup> [清]王夫之:《船山遗书》(卷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理融合为一,是《易传》固有的特点。<sup>①</sup>且《易》本为卜筮之书,即使是高扬人文主体价值的《易传》仍包含象、数、理、占四个方面的内容,正如《系辞传》所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sup>②</sup>又有:“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诚然,孟、京等或许在天道的追索方面走得稍远了一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其价值及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王夫之等则过于强调《易》所蕴含的主体道德意识即过于强调人文或义理,而在天文与象数方面则有所偏失,这样就违背了《易传》的主旨。所以,有学者认为:“正因孔子《易传》不尚占筮,阐扬义理,使易学从史巫之术摆脱出来,变为有益人们心智的学术,所以历久不衰。而汉易象数学以占筮为能事,几使易学重新沦为史巫之术,像这样的东西失去其学术上的地位而流落江湖是毫不奇怪的。”<sup>③</sup>从上文所引《易传》中的内容可知,这种说法是失之偏颇的,且象数易学也没有失去其学术上的地位,就如宋元以后中医学与象数易学愈来愈紧密的结合,即可说明基于孟、京象数易学的整个象

① 张文智:《论〈易传〉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与天人合一的理论架构》。载《周易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74—375页。

③ 梁韦弦:《“卦气”与“历数”,象数与义理》。原载《松辽学刊》(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全文转载,2002年第2期,第47页。



数学有不可泯灭的价值。亦如儒家思想本来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一样,过于强调内圣的方面,在外在制度的建设等外王方面就会有所偏失,而只注重外王的一面而忽略内圣的一面,则外王只会变成没有实质内容的外在形式。《周易》中天道与人道、象数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也应如此看待。

孟、焦、京易学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它上契先秦易学与哲学,又下启宋、元、明、清易学与哲学,是汉代以后易学发展的根柢,同时也是汉以后影响中国哲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入研究孟、焦、京易学,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所在,孟、焦、京易学所蕴含的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天人观对我们当今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一、著作部分

1.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2.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3. [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4. [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5. [唐]瞿昙悉达编:《唐开元占经》。北京:中国书店 1989 年版。
6. [五代]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7. [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8. [清]王夫之:《船山遗书》(卷一)。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9. [清]惠栋:《易汉学》。《无求备斋易经集成》第 119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版。
10.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 1954 年版。
11.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12. [清]黄奭辑:《汉学堂经解》。扬州:广陵书社 2004 年版。
13.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14.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15. 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1954 年版。

16. [清]王谟:《孟喜周易章句》。清嘉庆三年刊《汉魏遗书钞》本影印本。

17. [清]王谟:《京房易传》。清嘉庆三年刊《汉魏遗书钞》本影印本。

18. 沈祖緜:《周易孟氏学附孟氏易传授考》。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影印本。

19. 黄元炳:《易学探源·卦气集解》。黄膺白、沈颢民、蒋竹庄、周晋年等助印本。

20. 阮文达:《卦气表》。《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21. 徐昂:《京氏易传笺》。民国三十二年排印本影印本。

22. 焦延寿著,尚秉和注,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

23. 尚秉和著,常秉义点校:《焦氏易詁》。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

24.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25. 尚秉和著,张善文校理:《尚氏易学存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

26. 尚秉和:《周易古筮考》。北京:中国书店 1990 年版。

27. (题)列圣齐注:《大学证释》。台北:若意出版社 1993 年版。

28. 李学勤主编,于振波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9. 李学勤主编,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0. 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1. 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

32.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3.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载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4. 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5. 傅有举、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36. 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

37. 张立文:《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版。

38. 韩仲民:《帛易说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9. 裘锡圭:《中国出土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0. 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版。

41.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2.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

43. 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44.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版。

45.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4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47.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48.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49.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50. 高怀民:《两汉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51.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52. 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上、下册)。北京:中国书店 2008 年版。

53. 龚鹏程:《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54. 黄寿祺:《易学群书平议》。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55. 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56.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 2000 年版。

57. 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济南:齐鲁书社 1994 年版。

58. 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齐鲁书社 1998 年版。

59.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下册)。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60.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61. 江弘远:《京房易学流变考》。台中:瑞成书局 2006 年版。

62. 郭彧:《京氏易传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

63. 郭彧:《京氏易源流》。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

64.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2 年版。

65. 郑玄注,常秉义编:《易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66. 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67. 梁韦弦:《汉易卦气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2007 年版。

68.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69.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70. 刘大钧:《周易概论》(增补本)。成都: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71. 萧汉明:《周易本义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3 年版。

72. 刘玉建:《周易正义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5 年版。
73. 王新春:《神妙的周易智慧》。北京:中国书店 2001 年版。
74. 李尚信:《卦序与解卦理路》。成都: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75. 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济南:齐鲁书社 2005 年版。
76. 易玄:《讖纬神学与古代社会预言》。成都:巴蜀书社 1999 年版。
77.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78. 尚秉和原著,刘光本撰:《周易古筮考通解》。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79. 常秉义:《周易与历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版。
80.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81.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
82. 王葆玟:《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83. 林忠军:《周易郑氏学阐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84. 杨树达:《周易古义 老子古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85. 黄庆萱:《周易纵横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二、论文集部分

1. 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一)。济南:齐鲁书社 1996 年版。

2. 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二)。济南:齐鲁书社 1997 年版。

3. 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 2003 年版。

4. 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版。

5. 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要》。济南:齐鲁书社 1994 年版。

6. 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成都:巴蜀书社 1998 年版。

7. 刘大钧主编:《大易集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8. 刘大钧主编:《大易集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9. 刘大钧主编:《元典哲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10.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11.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12. 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二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

13. 丁四新主编:《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一)。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14.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16. 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 年版。

17. 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18.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七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三、论文部分

1. 刘大钧:《帛〈易〉初探》。载《文史哲》1985 年第 4 期。

2. 连劭名:《读帛书〈周易〉》。载《周易研究》1988 年第 1 期。

3. 王葆玟:《帛书〈周易〉所属的文化地域及其与西汉经学一些流派的关系》。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 3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4. 李学勤:《帛书〈易传〉与〈易经〉的作者》。载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 1 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 年版。

5. 陈来:《孔门易学的不同诠释与发展》。载《本体诠释学》第 2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6. 刘大钧:《〈周易〉古义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7. 刘大钧:《帛〈易〉源流蠡测》。载《文史哲》2005 年第 4 期。

8. 邢文:《帛书〈周易〉与卦气说》。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 3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9. 刘大钧:《关于“图”“书”及今本与帛本卦序之探索》。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一)。济南:齐鲁书社 1996 年版。

10. 刘大钧:《今帛本卦序与先天方图及“卦气”说的再探索》。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二)。济南:齐鲁书社 1997 年版。

11. 邓立光:《从帛书〈易传〉看孔子之〈易〉教及其象数》。载《周易研究》1994 年第 3 期。

12. 廖名春:《帛书〈易传〉引〈易〉考》。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要》。济南:齐鲁书社 1994 年版。

13. 陈来:《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载《国学研究》第 2 卷,1994 年版。

14. 廖名春:《帛书〈易传〉象数学说考释》。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一)。济南:齐鲁书社 1996 年版。

15. 刘大钧:《帛书〈易传〉中的象数易学思想》。载《哲学研究》2001 年第 11 期。

16. 邓立光:《从帛书〈易传〉考察“文言”的实义》。载《周易研究》2002 年第 4 期。

17. 李学勤:《帛书〈系辞〉略论》。载《齐鲁学刊》1989 年第 4 期。

18. 傅荣贤:《孟喜易学略论》。载《周易研究》1994 年第 3 期。

19. 高怀民:《西汉孟喜改列卦序中的哲学思想》。载《周易研究》2000 年第 2 期。

20. 李尚信:《孟喜卦气卦序反映的思想初论》。载《江汉论坛》2001 年第 2 期。

21. 连镇标:《焦延寿易学渊源考》。载《周易研究》1996年第1期。
22. 王葆玟:《西汉易学卦气说源流考》。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3. 郑万耕:《〈易传〉与西汉道家》。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24. 张涛:《西汉后期象数易学兴起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根源》。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4期。
25. 秦学颀:《京房及其考课法》。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
26. 李周龙:《周易十翼与京房易说》。载《孔孟学报》第54期,1987年9月。
27. 祝瑞开:《易传的象数学雏型和孟喜、京房、易纬的象数哲学》。载《两汉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8. 余敦康:《京房易学的象学(数)模式与义理内涵》。载《周易研究》1992年第2期。
29. 傅荣贤:《京房律学略论》。载《中国音乐》1992年第2期。
30. 郭志成:《先天八卦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内卦序排列关系证》。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
31. 俞齐煜:《京房八宫卦结构与意蕴新探》。载《学海》1994年第1期。
32. 崔波:《京房易学思想述评(上)》。载《周易研究》1994年第4期。
33. 崔波:《京房易学思想述评(下)》。载《周易研究》1995年第1期。

34. 刘玉建:《试论京房易学中的世卦起月例——兼与朱伯崑先生商榷》。载《周易研究》1996年第2期。

35. 刘玉建:《五行说与京房易学》。载《周易研究》1996年第4期。

36. 陈良运:《京房〈易〉与〈焦氏易林〉》。载《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

37. 唐子恒:《谈京房解〈易〉的一段佚文》。载《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

38. 苏永利:《疑隔八生律释京房纳支》。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

39. 苏永利:《论京房八官卦序的五行易学思想》。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6期。

40. 梁韦弦:《京房之学与京房之死》。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5期。

41. 萧汉明:《论京房易传与后世纳甲的文化内涵》。载《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大会论文集》1999年版。

42. 贺海鹏:《试析西汉易学的政治化特征》。载《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

43. 萧汉明:《论〈易纬〉与中医气象医学》。载《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

44. 萧洪恩:《〈易纬〉、〈易讖〉辨以及〈易纬〉与河图、洛书和录、符候的关系》。载《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

45. 连劭名:《考古发现与〈易纬〉》。载《周易研究》1991年第3期。

46. 李学勤:《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兼论帛书周易与汉易的关系》。载《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1994年版。

47. 张涛:《略论〈易纬〉的易学思想》。载《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

48. 林忠军:《〈易纬〉宇宙观与汉代儒道合流趋向》。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0期。

49. 萧洪恩:《“元气”演化史观——〈易纬〉的自然史观研究》。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4期。

50. 刘彬:《〈易纬〉八卦卦气思想初探》。载《周易研究》2004年第6期。

51. 刘彬、王敏:《〈易纬·稽览图〉“一爻直一日”卦气术考》。载《周易研究》2005年第5期。

52. 崔波、王军:《论京房“作易以垂教”的教化思想》。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53. 黄黎星、孙晓辉、黄钟:《京房援〈易〉立律学说探微》。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54. 乔宗方:《试论龟卜与京房五行易思维模式》。载《周易研究》2008年第1期。

55. 王新春:《哲学视野下的京房八宫易学》。载《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

56. 史怀刚、南金花:《京房易学的目的:以汉代的政治经济、自然、科学为背景》。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10期。

57. 贺海鹏:《试析西汉易学的政治化特征》。载《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

58. 张巍:《西汉地方〈易〉学中心考》。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59. 胡士颖:《〈易纬〉的气论及其哲学意义》。载《周易研究》,2009年第4期。

60. 任蜜林:《〈易纬〉各篇形成考》。载《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3期。

61. 王兆立:《〈易纬〉对〈周易〉经传的新认识》。载《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2期。

62. 陈应时、黄钟:《“京房六十律”再辩》。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63. 史怀刚:《易道与政治——略论京房易学中的宇宙图式与天人感应》。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4. 郑万耕:《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载《周易研究》2004年第2期。